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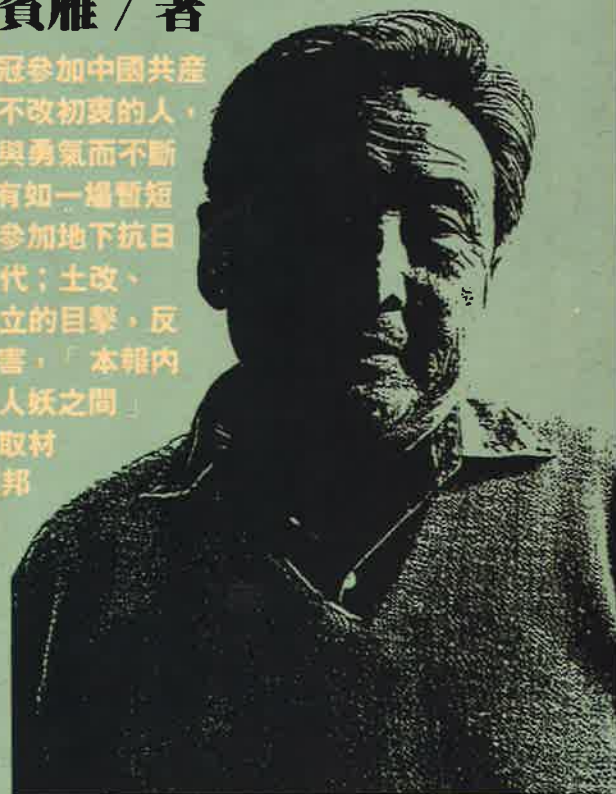
劉賓雁自傳

劉賓雁 / 著

這是一個弱冠參加中國共產黨，虔誠奉獻不改初衷的人，
因著他的良知與勇氣而不斷受難的歷史：有如一場暫短的夢的童年，參加地下抗日組織的青年時代；土改、
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目擊，反右、文革的受害，「本報內部消息」、「人妖之間」
等諸多名作的取材背景，與胡耀邦的命運糾葛……

這是一個美麗的靈魂水晶般的傳奇

/



歷史與現場

8



歷史與現場 8

劉賓雁自傳

劉賓雁◎著

ISBN 957-13-0084-5



▲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參加〈中國青年報〉讀者活動日，即興演講（一九八四年四月）。



▲一九五〇年冬，隨同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個代表團——中國青年代表團訪問蘇俄，擔任翻譯，在斯大林格勒留影。

▼一九五四年春，做為中國政府代表團隨行記者團的一員，到瑞士探訪討論中南半島問題的會議，在日內瓦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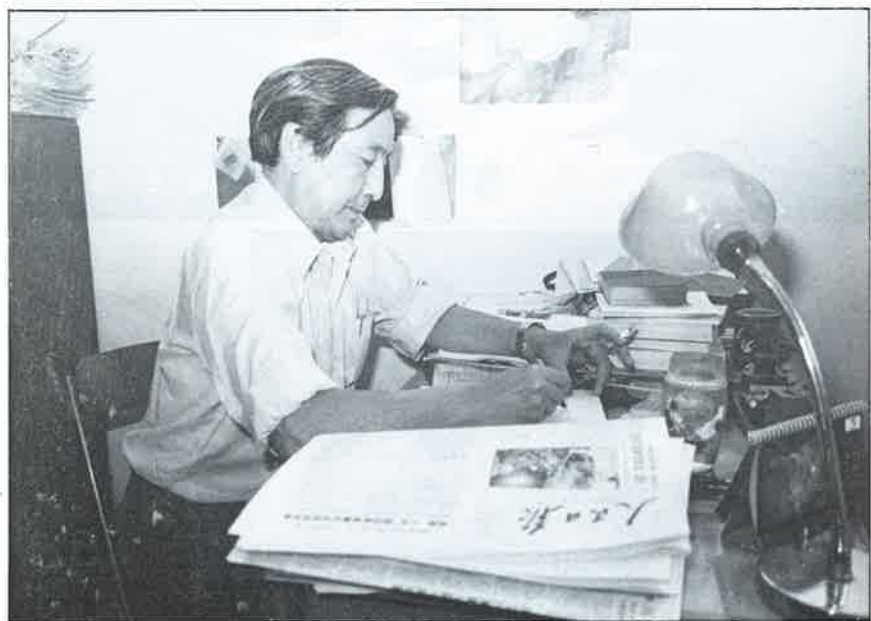


▲一次座談會後的閒談。



▲在家中和來訪的工人交談（一九八五年春）。

▼聽取來訪者的陳述。



▲一九八六年夏攝於〈人民日報社〉辦公室。



▲在一九八六年的一次座談會上。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參加黑龍江大學四十五周年校慶活動。



▲在一次秋日的旅途上。



▲一九八八年六月訪問法國時接受採訪。

▼一九八八年四月在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參加一項香港前途討論會。



▲與古華同訪西德法蘭克福的哥德故居，在哥德寫字枱前
留影（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七日）
▼與白樺（右一）、陳映真（後方）、聶華苓（右二）、
陳映真夫人（左一）合影於愛荷華大學。



▲一九八二年在洛杉磯中美作家會議上與陳若曦及詩人阿
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合影。
▼一九八二年與鄭愁予、陳幼石合影於美國麻省。



▲一九八五年四月與夫人朱洪在家中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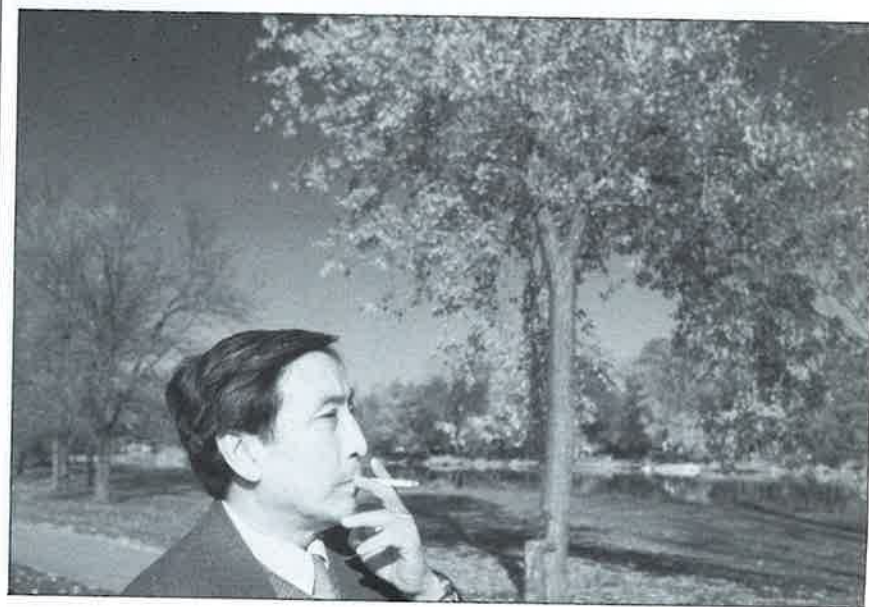


▲一九八六年夏愉閑弄孫圖（朱洪攝）。
▼與孫兒攝於家居。



▲與夫人朱洪攝於美國客寓。

▼一九八三年與夫人朱洪在舊金山碼頭留影。



▲一九八二年秋，在美國愛荷華。

目錄

前言

3

【第一章】暫短的夢 1

【第二章】不肯贖掉原罪 17

【第三章】尋找那缺少的東西，但沒有找到 35

【第四章】命運的預演 49

【第五章】我看見危機，同時走向自己的危機 63

【第六章】我墜入為百萬人設好的陷阱 87

【第七章】沒有牆壁的監牢 117

【第八章】靈魂的煎熬 129

【第九章】人性的消失 147

【第十章】回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167

【第十一章】初露獠牙 185

【第十二章】醉翁之意不在酒 201

【第十三章】我掀開了帷幕 217

【第十四章】這是很危險的 239

【第十五章】陰轉晴轉陰 277

【第十六章】在國外 301

【第十七章】艱難的職業 317

【第十八章】我和胡耀邦 335

【第十九章】適得其反 359

【後記】既是結束，又是開始 391



▲怡然（一九八七年二月，楊勁樺攝）。



前言

一個人走上什麼樣的生活道路，往往並不取決於自己——既不決定於他的天性，也不以他的願望為轉移。至少，在二十世紀動亂頻仍的中國是如此。

我生來是一個愛幻想、有幾分怯弱又不善社交的人。在正常環境下，我多半會成爲一個離群索居的詩人，或埋首古籍的學者。我的父母、我童年的伙伴和我本人，絕不會想到我在三十歲上捲入中國的政治漩渦，成爲全國聞名的政治罪人之一。更不會有人猜到，三十年之後，我會重蹈覆轍，第二次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在全中國遭到最劇烈的譴責和批判。

除了暫短的出國訪問外，我一直生活在中國；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漢人。然而漢人中有如我這樣際遇的人，卻又很少很少。我做了許多漢人都會去做的事，但我又確實做了一些一般漢人絕不會去做的事。而無論前者或後者，又都是中國的社會潮流驅使我去做的。我一生中的兩次政治悲劇，都發生在中國歷史的重要關頭。

很多中國人爲我的不幸感到悲哀和惋惜。我本人呢，卻覺得是一件幸事。我的第一次厄運，發生在一九五六一一九五七年歷史爲中國提供的第一次良機被錯過之時。我作爲百萬名右派分子之一，不過是較早地分享了幾億人一九五八年之後的厄運。我第二次遭難的一九八七年，中國已走上任何人無力扭轉的改革道路；中國命運的這一轉折，使我這個「受難者」非但沒有遭到什麼苦難，反而得到了我愧於接受的許多恩寵。因而此刻當我寫這幾行字時，我覺得自己是中國最幸運的一個人。

因而回首往事，我並無悔恨。我從生活中得到的東西，遠遠超出我所付出或我所失去的東西。那些被認爲或自認爲比我幸運得多的人，他們的墓誌銘上是不能刻下這一行字的：「長眠於此的

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應該說的話。」

這樣的中國人本來很多，並且也有過和我相似的經歷。我的幸運在於我活了下來，並且將活到二十世紀末，因而有機會看到光明終於在中國大地上升起。



第一章

暫短的夢

政治過早地闖入了我的心靈。我童年最早的記憶，是張作霖被謀殺的事。日本人爆炸張作霖的專車時，我只有三歲。皇姑屯離我所居住的瀋陽很近，曾引起極大的轟動，人們曾議論很久，我大約是聽到多次別人的追述才記住的。我曾把「專車」誤記為「磚車」，十幾歲以後才糾正過來。

另一個可怕的記憶則是我親眼所見了。四歲時，母親抱著我去看一起凶殺案的現場。我至今還清晰地記著在一座寬敞的院落裡並排擺列的五口大小不等的棺材，一律漆成黑色。那家主人是即將赴任的縣長，凶手深夜潛入那一排灰磚平房，手持斧頭，砍倒睡中驚起的主人後，又將他睡夢中的妻兒一個個砍死。據說凶手對這家人的財產一概未動，因而可以斷定是仇殺，這就使這起凶殺案更富戲劇性。我特別可憐睡臥在那三個小棺材中的孩子，想像他們睡在炕沿上的小小頭顱被砍斷時的慘景。

大約就在這一年，母親又抱我去看另一場熱鬧。被槍斃的人是一個三十幾歲的女人，據說是個女土匪。人們並不仇視她，而是以驚羨的口吻傳述她如何勇猛，雙手都會使槍。

我不敢斷定，中國人聚眾圍觀處決犯人的風習，是不是歷代統治者有意培養起來的。這對於「以儆效尤」自然是最有效的辦法。死囚在臨刑前遊街示眾，我想就是爲了警戒百姓必須作守法公民。三十年代初期，已經是日本佔領之下，我在哈爾濱曾幾次見到這種場面：一輛載有一名即將被處決的犯人的馬車在鬧市通衢上緩緩駛過，前後都有軍警簇擁。車上，在左右方各有一名警察挾持之下，一名壯年男子（往往都身強力壯）佇立車中，五花大綁，背後插一個紙標，上寫「××犯某某」，朱筆勾銷了犯人的姓名，表明這條生命的消失是經過合法程序的。我見過的死囚個個都挺胸而立，毫無懼色或愧疚，甚至怒目圓睜，傲視馬路兩側的觀衆，大有視死如歸的氣慨，並且

一路上不停地唱著我聽不懂的歌，間歇時便大罵當局。這是他們最後的呼聲。當時的統治者竟有這種氣量，允許犯人在死前的片刻公開發洩其憤怒，恐怕是五十年代以後的中國人所難以理解的。（到了六十年代，在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監獄面前竟出現一個難題：如何防止死囚在臨刑前發出呼聲，使中國人民對於「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信任發生動搖？發明出種種器械，直至割斷罪犯喉管這種最可靠的技術）。那馬車還隨時應死囚的指令停下來，有求必應，由沿途的商家贈予酒點或食物。

然而母親和她的同代人如此興致勃勃地去觀看他人的死亡，或許是出於對於死亡的神秘感和好奇。中國人生活中娛樂實在太少，只有很少人家有樂器，即使富裕人家，去劇場看戲也是件奢侈的事。留聲機和收音機則直至我十幾歲的三十年代，在中等以上人家也仍很少見。這種生活中真實的慘劇也許取代了舞台上的悲劇所起的作用。

中國的動亂，就這樣闖入我幼小的心靈。五歲時我第一次聽到炮聲，並體驗到死的恐懼。那已是在北滿，我寄居在外祖母家的時候。我們接連幾天躲避在地窖裡，不得不出來便溺的時候，舅舅指給我看窗紙上留下的斑斑彈痕。但事後我吃驚而且失望地聽到這次戰鬥並不是發生在中國人和入侵的日本人之間，原來在南山與北山上對壘的都是中國人。

那時我當然不會懂得，中國人內部之爭永遠要比反對外國人的抗爭熱鬧得多的。

遠在四歲以前，我就開始旅行了。父親在鐵路上工作，隨著他的出差、調動和全家的遷移、逃難，我便有了很多乘火車的機會。我乘過講究的二等臥車，乘過普通的三等車（即現在的「硬座」），也乘過裝載牲畜或貨物的所謂「瓦罐」（俄語音譯）車。即使和四十年後的中國孩子相比，

我的旅行機會也是最多的。但與人群的頻繁接觸並沒有去掉我的靦腆，不斷變換的車窗外的景物，卻使我更愛幻想了。

但是必須靠理性去解決的疑問，也開始闖入了我的生活。

我童年旅行的終點是哈爾濱。

哈爾濱是中國一個很特殊的城市。它是由中國內地（主要是山東省，少量是河北省）逃荒的農民和俄國人組成的。俄國貴族和商人及其後裔在原俄租界過著與革命前俄國一樣的生活；中國人則在簡陋、狹窄的空間裡繁衍著自己。張學良的統治是開明的，蔣介石國民黨的政治勢力剛剛開始進入，日本人就來了。

我本人就是山東省農民的後裔。祖父攜帶全家於二十世紀初越海逃荒而來。父親在應該上小學的時候幫助俄國人看孩子，學會俄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中國參戰而不出兵，卻派了大批勞工到俄國和法國助戰，父親就是其中一員。一九二一年歸國，便在中東鐵路擔任譯員。

貧困的農民遠走他鄉，也就切斷了自古以來的宗法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封建傳統。嶄新的環境，一望無際的肥沃原野，真正是「天空任鳥飛」，你能否立足和你能有多大發展，就全看你的本事和勇氣了。東北人，尤其是黑龍江省人，大都是這樣一些開拓者的後代，個人意識、奮鬥精神和勇氣都比留在本土的血親頑強了許多倍。哈爾濱市的居民又受到俄國與中國資本主義以及俄國進步文化的影響，自由氣氛更濃。

正是這種自由氣氛，使文化傳統遠不如關內各大城市的哈爾濱，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短短二、三年裡貢獻出十幾名全國聞名的作家。這是包括上海在內的中國任何一個城市未曾做到的，也是

哈爾濱其後五十年歷史中再未出現過的盛況。

父親從蘇聯帶回了俄國的自由主義，對於我後來的成長起了決定性作用。

我是父母的長子，並且生得比弟弟漂亮可愛，因而成為父母，特別是父親的寵兒。任何時候，甚至已經到快睡覺的時候了，只要我說一聲要吃「洋點心」，父親便會立即登上自行車，到很遠的地方去買來。父親還一心想把我培養成非凡人物，從兩歲起就教我認字。到五歲，我已能認二百多個漢字了。於是我被父母引為驕傲，在親友面前誇讚不已。然而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我從小就被從鄰居的孩子隔離開來，很少戶外活動。我的羞怯、懦弱和缺乏生活能力，就是這樣造成的。但父親也給了我足夠的機會去學會海闊天空地幻想。

姊姊劉放是最不幸的。她從很小便被母親當作料理家務的幫手使喚，又要不離左右地照應我，因而放棄了學習。她只比我年長三歲，卻像母親一樣疼愛我。她是我們兄弟姊妹四人中對家庭每個成員感情最深的。她就像前世欠下過債務一樣，把自己的幸福一塊一塊地拿來償還給全家老小每一個人，心甘情願地，只能得到很小的回報，甚至全無回報也毫無怨言。

從我有記憶之後不久，日本侵略者就佔領了中國的東北部，從此我便在異族統治下生活了十四年。

然而日本入侵前那短短的童年，在記憶中卻是很美麗的。那時我們住在距哈爾濱約二百公里遠的珠河縣（現改稱尚志縣）一面坡鎮。那是俄國人夏季休養地，小鎮綠樹叢叢，街道也很整潔。螞蟥河從青山下流過，河水清澈見底。我和姊姊常隨舅父去那裡釣魚，看舅父游泳。我們還常到野外採集草莓，給外祖父經營的菜園裡捉蔬菜上的蟲子，或者去果園裡搖動外祖父的杏樹、李樹，

驚喜地去撿拾搖下來的果子。我用小手扒開土地的表層，放進一朵摘來的月季花，然後蓋上一塊玻璃，再用土埋上。第二天早晨，我會跑到果園來，再把土扒開，掀掉玻璃，看月季花有什麼變化。我至今不明白為什麼要做這種傻「實驗」。這是我一生中僅有的幾個月，以正常人的身分生活在大自然中。二十幾年以後，我再次到中國農村，已經是一個從事勞動改造的罪人了。

那是張學良元帥開明統治的最後日子。一切都是寧靜而秩序井然的。但日本侵略者的魔影已經在我的生活中出現。那時我是一年級小學生，也和大同學一起，把家裡的日貨——三角尺、膠鞋等等，拿到校園，扔到火堆裡焚燒，看它們化為灰燼。我還和年齡相仿的同學組成小組，到鎮上的一家商店裡為關內水災地區的災民募捐。我必須先說幾句事先學好的話，請他們捐助；他們則覺得我很好玩，常常非讓我唱支歌不可。這些活動，儘管也是在老師指導下進行的，但我卻覺得是出於自己的自願。

不久，日本人就侵入了。張學良士兵奉蔣介石之命不得抵抗，紛紛逃散。一頂頂被扔棄到田野裡的嶄新的軍帽，綴著青天白日的帽徽，至今還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裡。

日本人強行購買中東路使父親失業了。幾年內家境就沒落到我付不起學費而必須輟學到街上賣瓜果的程度。我自尊心受到的傷害都是貧困造成的。當學校規定每個學生都必須穿黑皮鞋去參加一次活動時，我卻只能穿母親的女鞋，受到同學的奚落。十六歲的姊姊不得不去酒店當既受鄙視又受欺侮的女侍維持一家人的生活，更使我蒙受大羞辱。

「這個社會，為什麼有窮富之分呢？」——這是我頭腦中出現的第一個社會問題。父親告訴我蘇聯不是這樣，它便成為我嚮往的天國。但是我要在同周圍人們自由的競爭中為自己找到一條

擺脫貧困、不受輕侮的道路：我要奮鬥！我埋頭學習，省下午飯錢去租書、買書，興趣從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開始，很快就擴展到對於變化多端的世界形勢的了解。我十三歲時已能讀日本出版的雜誌，對歐洲戰雲密布憂心忡忡，對德蘇瓜分波蘭和蘇聯進軍芬蘭感到困惑不解；社會主義國家怎能欺凌弱小民族呢？

買不起新出版的日本刊物，我便到舊紙店的紙堆中去尋找。我的學校太古街小學旁邊有一條街，有很多舊紙商，我常常到那裡解開一捆捆或一袋袋的廢紙，一面擔心老闆的斥責，一面找尋只須二、三分錢就可買到一斤的讀物。一天，我打開一個麻袋，大吃一驚，原來裡面全是一級違禁品，中文的抗日書刊！又打開一袋，也是。我抑制著自己的驚喜，忖度自己的購買力和攜帶能力，買回半麻袋違禁品。

爲了不使父母驚恐，等他們入睡後，我點起一盞小油燈，躺在床上偷偷閱讀關內共產黨編印的《救亡日報》，國民黨的《國聞周刊》和東北抗日聯軍印行的《告同胞書》等等。透過慷慨激昂的文字傳出的民族危機呼號，使我的心震顫不已。連連幾個夜晚，我激動得淚流不止，不能入睡。

我頭腦的另一個部分，發育卻一直比別的孩子遲緩。從童年到青年，都有人說我傻。

許是由於我身上流著勞動農民的血液，幼年營養又好，身體的機能成熟很早。十二歲時我已有了男子的衝動。有一天，它使我吃了一驚，因爲在我一個伙伴的母親、一個比我至少年長一倍半的一個女人身旁，我第一次體驗到這種野性的欲望。但隨即忘記了它的存在。相鄰的孩子們課餘時常追逐年齡相仿的女孩子取樂，我以爲這是一種純粹的遊戲，追到某個她就以爲這就是跑道的終點了，不明白那小姑娘還佇立在那裡等個什麼。後來我才明白，別的男孩子人家是一種追獵，

到終點時（往往是在陰暗的門洞之類的地方）是要撫摸和親吻的。

我的綽號叫「劉大頭」，我的頭的確是很大，（至今，找到一頂能夠戴下去的帽子仍是一個難題）理髮師給我剪頭髮時常抱怨我不該只交兒童的半費。「大頭」在東北的語言裡又指不會算計因而常常吃虧上當的人。而頭顱大於常人，卻又被認爲是聰明的標誌。我被認爲兼有這兩個特點。同學們因我在生活上有些傻瓜笨拙而欺侮我，但又因我作文好而有求於我。

我生平受到的唯一一次當衆體罰，也是早熟的好奇和傻帶來的。那是上高小時候，一天，別的班上學生在做作業，一位女教師在講台上監視，同時和一位男教師低聲談天。我們班上無課，幾個男生鼓勵我闖進去來個惡作劇。平時相當靦腆的我，不知怎麼忽然勇敢起來，一個人拉開教室的門，大模大樣地走到兩位老師面前，嘻皮笑臉地問道：「你們說什麼悄悄話呢？能講給我聽聽嗎？」全班學生立時大嘩，女老師氣得臉剝白，拿起戒尺就在我的手心上連連打了六下。她很用力，我很疼，幾乎流出淚來。

沒有出鋒頭的意思。至今不懂我爲什麼那樣傻。

一種有生理依據的好奇心，並未因這次挫折而削弱。坐在松花江南岸觀賞落日，見對岸一對青年男女進入高高的草叢，我知道他們是幹什麼去了。在同年級的女生中，我心目中也有個對象，但我從不敢對她說一句話。在電車中，當有女生或年輕而美貌的女人在時，我便緊張起來，生怕她們不中我。但是看中了又怎麼樣呢？我只能又是害怕。這種好奇心有時竟強到這種程度：一年春節店舖休假，樓下商店的幾個店夥要去妓院，招呼我同往，我竟跟隨他們走到街口，忽然怕了，才跑回家來。

在母親和父親以爲我還聽不懂話的時候，我就記住他們常常誇我長得好看，兩隻大眼如何可愛了。但當別人也這樣誇我時，母親爲了表示謙虛，則要說兩句我的缺點。到姊姊已經和她的同伴悄悄談論我的容貌時，我男子的自尊已經成熟了。我應該知道自己對女性是有點誘惑力的，但我從來缺乏自信，女人越是美我就越是感到自卑。這種自我感覺，將追隨我一輩子。

這都是發生在十二、三多歲上的事。我野心勃勃，先是要做個著名京劇演員，後來又決定必須成爲一個大文豪。名演員自己動手畫將來演出時的海報，他的名字排在正中，三字成品字形，弟弟和另一人的姓名排在兩側，是配角。未來的大文豪又畫他將來衣錦還鄉時的場景：大街兩側樓房中，人們向他扔下雪花般的紙花。

距我家幾十步遠便是「新舞台」劇場。我當然買不起門票。我能冒險溜進去。平時比較膽怯的我，到幹自己真正認爲非做不可的事情時，膽子就大了。我還能裝做若無其事，因而不露聲色。我看戲很認真，一下子就把自己融入舞台上人物的中間去了。「六月雪」中寶娥、「逍遙津」中漢獻帝、「李陵碑」中楊繼業的命運都使我感動得淚流滿面。我想解開一個謎：演員們在舞台上那種神奇的動人魅力是從哪裡來的？我情不自禁地羨慕和學習起演員們來。我膽子越來越大，常常偷偷從側門溜進後台，看演員們的上裝和卸裝，想探明我內心的神秘感從何而來。我觀看最多的是女演員，她們幾乎人人都是我心中欽慕的對象。後來我對女人的審美標準之所以是東方式的，我想同少年時期京劇女演員的扮相很有關係。

我常常把一個女演員作爲自己假想的戀人。我小學四年級的女教師也曾是我傾慕的對象。我

又自卑，覺得自己不配。雖然並不十分自覺，但贏得女性的歡心也成了我發憤學習，作一個非凡人物的一種動力。爲了同時學習三種（俄、日、英）外語，我就不能不利用所有零碎時間。我日後不肯白白浪費十分鐘時間的習慣，是這時開始培養起來的。

一個晚上，我把一張凳子做爲桌子，放到燭數不高的室內僅有的一盞電燈下面，坐在一張小木凳上，開始我的寫作了。寫一個同樣冬天的夜晚，一個年輕的人力車夫在飄雪中行走著，步向一家賭場。他輸了。他接連地輸。爲了找到賭本，他去搶劫了，無意中殺死一個人。他被捕了。年邁的寡母失去唯一的依靠，悲痛欲絕。母親有權利索回自己的愛子，但社會也有權懲罰一個罪犯。怎麼辦？

我從未聽說哪裡發生過這樣一個真實的事件。純然虛構。唯一的依據是在我家居住的一帶，我見過許多受苦受難的人，我同情他們。

想不到它居然被發表了，還獲了三等獎。那是《大北新報》的短篇小說徵文，題目《母心》是編輯部出的。拿到二十元獎金，我便約好朋友李丹去飯館吃了一頓。記得我並不曾特別興奮，我甚至沒保留下那張值得紀念的報紙。

再過十七年，再過四十年，當我的作品兩次在全國引起注意、博得好評甚至發生爆炸性影響時，我的心情也同樣平靜。我至今不能理解這是爲什麼。我不是一個沒有虛榮心的人，但每聽到別人的讚揚，我都有幾分害羞，好像當之有愧。我覺得它們應當寫的更好。這是不是因爲我自信我以後會寫得更好呢？不知道。總之，作品發表之前，我總是擔心寫不好，發表後又覺得應該寫得更好。我羨慕那些自信心比我強得多的同行。

十四歲開始時的另一件大事，是我認識了當時在哈爾濱已小有名氣的青年作家關沫南。我和李丹是讀了他第一本短篇小說集《蹉跎》，喜歡上他的文風與魯迅相近而慕名登門的。他和溫成鈞的經歷相同，也在郵局工作。在他家，我第一次見到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書和他認真寫下的讀書筆記。從此，我成了他家的常客，加入了由他領導的由左翼青年作家和詩人組成的讀書會。這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外圍組織。

較早一些時候，我已經結識了也是這個讀書會骨幹的青年詩人溫成鈞。他也是在郵局工作，也是因家境貧寒，初中畢業後輟學的。是在他的鼓勵之下，我才動筆寫了第一個短篇的。

關沫南在二十歲上下就出了書，兩本書都是自費印行的，後來遭到禁止。五十年後，我們倒沒有了這種自由，自費出書是絕不允許的。這是不是日本侵略者故意裝出的一副姿態，表示「滿州國」是「滿州人」自己的國家呢？很多中國進步作家的書不僅可以從境外運入和隨便銷售，甚至還可以在「滿州國」公開翻印。巴金的《家》、《春》、《秋》在青年讀者中喚起的背叛舊中國和走向革命的作用是明顯的，居然也能在淪陷的東北印行。在美國影片放演幾年不再允許公映之後，德國和法國的影片還准許放映。我就看過法國攝製的「罪與罰」，這在十年後的中國也會禁演的。日本的書店裡始終可以買到馬克思的以及一些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他們還出過一本厚厚的叫做《抗日論》的書，收進中國政界首腦人物蔣介石等人反對日本侵略的演說和論文。在三十年代與四十年代相交時期，日本的刊物上固然充斥著宣揚法西斯論點的文章，但也經常有持相反論點，或報導世界真情的文章出現。看來，他們是把政治上直接危及自己統治的行動與言論，同意識形態問題區分開來的，雖然他們也不遺餘力地宣揚於他們有利的一套意識形態，主要是儒家思想。

一九三九年初，我進入中學，這已經是日本人侵後的第八年了。這時我才真正感覺到日本帝國主義對於教育的控制。連學校也不再稱「中學」，而稱為「國民高等學校」。

我是為獲取知識而來，但第一課卻是學算盤。以後每天早晨第一課，我們都端坐在教室，隨收音機中傳出的日語口令在算盤上打加減法。《孝經》和《論語》列為「國民道德」教育的重要課程。受過「五四」以來新文學薰陶的我，對於古文本身就有一種反感，而孔子著作中散發出來的教人循規蹈矩、安份守己、孝悌忠信的一套說教，從形式到內容都令我感到窒息。這同我從生活和從文學作品中學到並且嚮往的自由與叛逆精神完全背道而馳。教師照本宣科的死板的教學方法也令我厭煩。我不能忍受不斷重複而毫無新意的東西——那時我已開始在父親指導下自學俄語，當時的權威課本是《俄語津梁》，就因為課文老是重複「這是什麼？」「這是桌子。」「這是桌子嗎？」「是，那是桌子。」我就拋開那本教科書，寧願去讀連一半都看不懂的托爾斯泰所寫的故事，後來又嫌它們太簡單，而跳躍一大步，去生吞活剝高爾基的中篇《三人》了。

我們還必須接受日本教官指揮的軍訓，反反覆覆練習正步走，也十分枯燥。我們還必須穿同樣的衣服，其實與日本軍服相差無幾。必須推光頭。

我坐在教室的後排。實在無聊，有時偷看自己喜歡的書，有時竟和同座的同學擲骰子賭輸贏。校長也換了日本人，叫吉田。他穿一身軍裝，留一撮希特勒式的小鬍子，每天早晨站在教練台上向全校學生訓話，一派主子派頭。一天早晨，只因我站立姿勢隨便了一點，他竟命令我到台前跪下。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體驗屈辱的滋味。

我和四位要好的同學，這時都不願繼續在這個環境裡生活下去了。已經有一些同學去了北京。

北京也是在日本人佔領之下，但在那裡的學校可以比在哈爾濱學到更多的知識。我的朋友都可以靠父母資助，我則必須仰賴這時已經嫁人並定居到北京的姊姊的幫助，她慷慨地答允了我的要求。

姊姊嫁給一個大地主的兒子，從日本歸來的留學生，是出於愛情，但也提出一個條件：他應對我們一家人的生活，首先是我的學習給予資助。

日本統治下的北京，市民生活已很困難。姊姊必須節儉持家，因為除供我上學外，還要不時給父母一些接濟。平時住校，周末到姊姊家裡。怕我在學校伙食差，每星期一姊姊都要做些炸醬之類的東西讓我帶到學校去吃。第二年，物價進一步上漲，我常見姊姊發愁，便盡力節約自己的開支。那時我晚飯是在學校附近小館吃，每頓吃十二兩炒餅。後來我把飯量減到半斤。一天晚間在宿舍忽然失眠起來，這是前所未有的。仔細一想明白了——是因為肚子餓了。

上過一年半中學，我見姊姊家的經濟狀況再也支持不下去了，便決定休學。我住在姊姊家裡，每天按嚴格的時間表進行自習。每天一早起便坐到姊姊在客廳裡為我開關的一個角落，專心一意地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同時齊頭並進地攻三種外語——日語已可以用了，主要攻俄語和英語。

姊姊的婚姻並不幸福。丈夫這時已經開始嫖妓，甚至吸起鴉片，她屢勸不改。姊姊把我的天賦估計很高，以為我一定會成爲一個非凡人物。這時她發覺我左傾，要走一條獻身革命的道路了，也並不阻攔。後來我在天津開始革命生涯之後，大姐長時期爲我和我的同志們隱藏秘密書刊。當我的同志們須來往京津時，也時常給以接濟。她並不害怕什麼危險，而其實那是很危險的。

「是不是讓姊姊也走我的道路呢？」我想過這個問題，但立即否定了。這是一條很苦的道

路，甚至要付出生命。我不願使我親愛的姊姊付出犧牲。後來我曾後悔，覺得那時若使她走上革命道路，她也許會更幸福。然而再一細想，也未必。



第二章

不肯贖掉原罪

我心嚮往之的本來是上海，卻來到了北京。我讀過的當代中國作家的許多作品都是在那裡寫的，因而上海在我心中成了自由的象徵。正如我四十年後喜歡上紐約一樣，我愛從電影上看到那種熱熱鬧鬧、豐實多采而又變化多端的大都市生活。

北京卻正和上海相反。這裡一切都透露著周而復始的停滯。我討厭北京比比皆是灰牆，甚至對它小巷中的幽靜和鬧市的嘈雜我也同樣不抱好感，因為它們永遠代表著中國的過去，我似乎能聞到陳腐的氣味。我感到窒息。

然而北京也不喜歡我。

我既無力升學，又找不到一個可以糊口的職位。我不能老是自學。我產生了去解放區追隨共產黨抗日的願望，但找不到去那裡的途徑。到了一九四三年九月，我才能夠和我自幼的同學鄭邁一起來天津，有人答應從那裡把我們帶入解放區。但後來我們得知天津也需要人從事地下抗日鬥爭，便答應留了下來。我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天津抗日救國聯合會。為數不多的年在二十歲上下的、大部是未讀完高中的學生，便是這個組織的骨幹，這時還沒有一個是共產黨員，我們都必須自己混飯吃。

那是我為什麼沒有選擇國民黨而投靠了共產黨呢？並不是沒有另一種可能。從小學起最要好的五個同學，只有我一人是家境貧困的，其餘四人甚至可以歸為資產階級，然而幾年之內，竟有三人自願投入中共領導的地下工作，都成為共產黨員。四十年代初期，國民黨在我們心中的形象，並不比共產黨壞多少。我見到汪精衛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儘管知道這旗上端那個寫著「和平建國」的三角形黃布條已表明它是漢奸政權的旗幟，卻仍然站在它下面感動得熱淚盈眶，在北

京冒險偷聽重慶電台的廣播，更激動萬分，並不認為國民政府的聲音就不代表苦難中的祖國。然而我畢竟沒去西安參加戰幹團，雖然在姐夫的家裡不難找到這種機會。現在回想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對於青年人所具有的魅力。中國的苦難實在是太深重了，中國人對於改變自己奴隸地位的願望實在是太強烈了，因而是主張激烈、徹底、變革的思想，便越是富於吸引力。而國民黨卻始終拿不出一個綱領，一套口號使青年人熱血沸騰。

一九四三年冬天，天津的市民通過我們散發的傳單知道了「抗聯」這個組織的存在。這些傳單，有時從天津勸業商場（市中心一處很高的建築）向下撒，有時是在擁擠的有軌電車中把一疊傳單悄悄塞進車的門縫，行駛中的電車便會順風使傳單撒得很開。我參加的幾次行動，是趁黑夜把傳單貼到街旁牆上，或塞進人家的門下。有時情緒激動起來，我們就忘記安全，把傳單塞進行人手中，甚至打開貧民區居民的房門，逕直把傳單送到居室之內。經我提議，我還承擔了向日本僑民投遞日文傳單的工作。這項任務，整個過程由我一人包攬下來；我自己草擬傳單文稿，自己刻蠟版，由我從當時我在那裡工作的日本銀行偷出一種印有表格的紙張，自己油印，然後找一個晚上，把一張張傳單塞進日本僑民門下。

竟然沒有想到可能暴露和被捕，也沒有商議過一旦被捕，應該怎樣對付日、偽當局。在這種活動中，也幾乎沒有感到恐懼，心頭倒是充滿一種莊嚴感和因為冒險行動而感到的激動和喜悅。

這時倘若有人問我們爲了什麼目的聚集到一起，第一句回答就會是「爲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爲什麼要打倒它呢？並不是因爲我們很愛這個即使沒有日本人的中國，因爲它也是不自由的。

我參加革命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爲了解放自己，實現自我。我並不清楚這個「自我」是什麼，只不過有一種朦朦朧朧的感覺，好像我身上有一種什麼東西，雖然還不成熟，但有一天它會爆發出來，那時我便會做出別人做不到的事。從十幾歲到三十幾歲，我老是在爲這麼一個模糊的目標做準備，同時老是覺得自己不行，但將來卻會很「行」。我認真地從事我必須做的工作，同時不放棄一點可以用於學習的時間。

然而革命卻是從否定自我開始的。我們學會的第一個政治詞彙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它和「個人主義」是同義語。以後幾十年間從沒有人告訴我合理的、甚至應予鼓勵的個人利益到哪裡結束，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從哪裡開始。那時我們同志之間是友愛的，大敵當前造成的「同生死共患難」處境也造就了這種感情，因而沒有相互猜忌或傾軋。然而對待自己和自己的同志又都是很嚴格的，因爲彼此都有「原罪」，都必須經常進行無形的懺悔。這時我當然不會知道按照毛澤東主義，「小資產階級思想」只在知識分子身上才有，工人、農民出身的幹部天然地免疫，因而「思想改造」的任務便只能由中國知識分子像十字架般背負起來，直到每個人走墳墓。

我的問題，是「有點像俄國沒落的貴族」，並不是嚴厲的批判，甚至帶點同志式的戲謔。但是「不願去公共廁所，害怕那裡的臭味」以及一次長時間步行中我比別人更覺乾渴，卻是作爲缺點提出來的。我也承認，但心裡始終不解：我怎麼會像個俄國貴族呢？我的長相有點像俄國人倒是真的，但怎麼會「貴族」呢？我只能認定自己「工農化」倒是真的還差得很遠。還要到很久以後我才慢慢明白，這可能是由於我常常有幾分憂鬱。不知爲什麼，我這一生幾乎沒有一個時候對於我的環境或對於我自己完全滿意過，總覺得似乎少了點什麼我所需要的東西。

其實在奉獻上我並不落後於他人。我能完成一切交給我的任務。我刻過幾年毛澤東著作的蠟版。我親自撰寫和刻印向日本人宣傳反戰思想的傳單，張貼和投送抗日傳單。我的勇敢使自己都有些吃驚。我們的飲食之艱苦是我從未體驗過的：清水煮白菜加玉米麵的窩頭，有時因技巧太差，還是半生的。我也不覺其苦。

對於我們工作的對象，要求也很嚴格。那些人多是商人子弟，經過長時間的了解，反反覆覆地思量，仍不放心。所以幾年之中，「抗聯」的會員和會員中的黨員都發展很少。其時已是抗戰後期，國內外形勢於我們很有利，敵人的控制又相當鬆弛——他們把監視和懲辦的重點放到有利可圖的經濟犯上去了，因而我們是可以放開手發展的。

對於人缺乏信任，對待自己的同志缺乏寬容精神，這時就已經感覺得到了。

我們幾個年輕人，因為別無住處，暫時又沒有生活來源，最初就寄居在我們的一位同志楊昌炎家裡。這裡又是「抗聯」的活動中心。

主人的父親是一個大鹽商。他既要從經濟上接濟我們，又要承擔很大的政治風險，而中學生楊昌炎自然不會有獨立的經濟地位。我們卻全然不予理會。這樣，當我們的主人和同志在父母壓力下不得要求我們把居住和活動地點移到他處時，他的這個舉動就被認為是背叛了，從此變為路人。

在我們和楊昌炎的關係中，早有危機潛伏了。在我到達天津以後，在楊家免費食宿的光棍漢至少有三人，白天還有更多的人到此白吃白喝。在百物昂貴的一九四三年，這不是一筆很小的開支，此外每日來來往往到此聚會的抗聯成員有十來人，有時還有北京的地下工作者前來聯繫事情。

一個個都是學生打扮，大搖大擺，進步政治書籍甚至解放區的印刷品就放在書包裡。離這條糧店後街一里之遙，便是天津偽警察局。那些日偽特務恐怕只有中共特務百分之一的「除惡務盡」的熱忱和本領，也早已把我們這些小子一網打盡了。楊昌炎一家能冒風險准許我們在那裡活動半年之久，已經很不容易了。楊老先生對於他的長子和兒媳一定早有微辭，我們這些不請自來的房客也不是毫無察覺。但是以為第一，楊昌炎既已獻身革命，犧牲就必須是無條件的；第二，楊老先生既然是大鹽商，是剝削者，耗他一點不義之財，又有何不可？但問題還不僅僅在這裡。當我們發覺楊家父子關係因我們而緊張化時，並不設法去減輕他們負擔和減少給楊家帶來危險的可能，卻要求楊昌炎夫婦表現出更大的堅定性和自我犧牲精神。待他們經不住革命的這種考驗時，便把他視為叛徒。邁出這一步並不困難，因為日常的觀察早已發現楊昌炎有嚴重的問題：他曾在一天夜裡，大雨滂沱之中，一個人站在海河邊上朗讀詩句。這分明是小資產階級浪漫主義和狂熱性的表現。他曾喜愛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著作，要作個無政府主義者。這樣一個人最後背叛革命，是順理成章的。假如有人不這樣想，又怎樣呢？那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是階級立場出了問題！

離開楊家以後，我們四個單身漢遷到同一條街上一間木製小樓中居住（腳下是一條小街的出口）。十年以後，即中國已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這時作為一個小學的校長的區政協委員，他應該至少是愛國民主人士了。但當我們到他家作客時，不但仍然不覺得我們對過去的決裂負有責任，還念念不忘他當年的「背叛」，自視高他一等。

四人中間，除一名殘疾人外，三人分別、輪流有過短期的職業，靠這點收入和家在天津、家

境較為殷實的同志不時給予一點接濟維持生活。生活的困苦和不穩定，並不使人愁苦，反倒增添了生活的浪漫情調。我們的工作是傳播進步思想。分別對一些個別人或組成讀書會的幾個人進行工作，先是把進步的文學作品給他們看，然後組織對進步政治書籍的學習。這兩類書，絕大部分是抗戰前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出版的，現在仍然能成為共產黨反對日本和國民黨的思想武器（可見國民黨也和日本人一樣太不成熟了。既然執掌政權，有武力和特務在，為什麼就不能把報刊和出版印刷業牢牢控制起來，只准宣傳有利於自己的思想呢）。最後，見對象可靠和比較成熟了，我們才把解放區印刷或我們自己刻印的毛澤東著作拿出來。

一九四四年初春，我們那間光棍樓裡發生一個事件，使我大為震撼。

一個可憐的舞女引起了我們幾個光棍的同情。她姓蔣，幼時被拐賣到上海，受過很多虐待，後來流落到天津，以伴舞為生，常受人欺凌。終於找到一個可以委身的人——一個商人子弟，先是同居，後又嫁到他家。但那人的父母嫌她出身低賤，不肯承認這門婚事，她被逐出家門。我們四人出於同情，收留她暫住到我們的小樓裡。用一張床單把一個角落隔開，就是她的居室了。

這時我們四人中有三人早出晚歸，只有一個人因患肺病，休養在家。他是我們這個「抗聯」支部的主任G，比我年長兩歲，相互之間情同手足。蔣做為我們之中唯一的婦女，照顧病中的G，很是周到。一切都很自然。

忽然，我們被告知：G犯了嚴重錯誤，不能留在我們中間了。原來他病中與蔣產生感情，並發生了性關係。此外，他還向蔣透露了我們的政治身分。不久，G就去了北京，然後到晉察冀解放區去了。

沒有一條明文紀律，規定從事地下工作的人不能戀愛和結婚。也許，婚前性關係在那時已被認為是不道德的？我們接受了對G的處分決定，我還繼承了他的職務，但心中卻留著一個疑問：是否處分太重了呢？他和蔣之間發生的事，是我第一次在自己身邊有這樣的經歷。我能夠理解那是很自然的，既不覺其悖理，也不覺有什麼骯髒。我只有諒解和同情。

幾個月以後，我隨同四位同志一起跨越冀中解放區，到平漢路以東的阜平縣中共晉察冀分局城工部去接受任務。人間太少這樣的奇遇了：我們正在太行山中向西步行，忽然在一個小樹林中遇到了G！我又驚又喜，急忙走上前去握手，急切地問他別後情況。他說現在華北聯大學習。當我重回到同行者中時，完全出我意料，那位領導我們並主持懲辦了G的同志，竟疾言厲色地斥責我不該去見G！我愕然了。對待一個同志和友人，怎麼可以這樣無情呢？無論如何，G並不是敵人呀。

還要過很多年，我才得知G當時從天津的撤離是很慘的：並不是像我想的那樣由天津的組織介紹他去解放區。他是完全被逐出了組織，無依無靠，個人到北京重新找到門路隻身去解放區的。

這是我第一次對黨的決定發生抵觸，也是第一次暴露了我的人道主義感情同革命需要的矛盾。要到我身在解放區以後，這種矛盾才會頻頻出現。我不得不常常警戒自己必須同這種「資產階級」的感情疏遠，因為不然它就會使我同無產階級專政疏遠，而那是很危險的。我心中逐漸出現一條自我警戒線：不要輕易同情別人的悲哀與痛苦，這種同情和愛只能寄予整個被剝削階級，否則就容易犯錯誤。千萬不要輕信任何個人，而對於黨，則應該絕對信任。

就是在這次太行之行中，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我們住到阜平縣一個稱作西柏坡的山村。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的城市工作部就設在這裡。我們一到，就有人叮囑我們平時在村中活動都必須戴紗布做成的口罩，以免被他人認出。後來我們在村中見到許多年輕人也都帶著口罩。原來這時有許多人在北京、天津從事地下抗日活動的青年集聚在這裡，分別接受指示和訓練。爲了提防歸去後這些人中一旦有人被捕（同時也擔心這些人中現在就混有敵人的特務），不致使他人被出賣，才採取這個措施。

同行的三人中，有兩位是代表天津「抗聯」總部領導我們這幾個人的。我一直以爲他們早已是共產黨員，甚至可能是從解放區來到天津的老黨員。不知爲什麼，也許是因爲自認離黨員的條件還遠吧！我自己從來沒想到過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也並未想到在此停留期間可以提出這個要求。看來，同行的三人一直在等待我主動提出入黨申請，而我却遲遲沒有表示。最後他們才告訴我們已完成了入黨手續，問我有無此意。我自然表示願意入黨。這樣我便填寫了入黨申請書。

同行的三同志先我而走，我必須多留一些時候，一是等候入黨審批手續，同時也因爲城工部長劉仁有意派我到我的故鄉哈爾濱開展抗日工作，須和我談一次話。我的年齡正是「滿州國」服兵役的年齡，因而我若回哈爾濱，很可能被征入伍，因而劉仁放棄了派我去的打算。一天晚上爲我一個人舉行了在黨旗下宣誓的入黨儀式。我朗讀了入黨誓詞，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永不叛黨」。

第二天，我便踏上了歸途。行前，告訴我一句暗語：「我是余先生派來的」。我到天津後，要把這句話告訴我的上級，這才能證明我在西柏坡村真正加入了共產黨。

一九四五年三月，我穿著藍布大褂，走進天津的一家貴族學校——耀華中學。以我的初中畢業的學歷，我本應來此就學，然而我卻成了幾百個學生的教師。靠一張偽造的南京中央大學的畢

業文憑，我當上了地理教員。

我的實際年齡二十歲，比假文憑上的年齡足足少六歲。爲了顯得老一些，我常常點起一支煙來裝像兒。後來就上了癮。

我必須每天準備第二天的課程，否則就一句話也講不出來了。地理課一周只有二個課時，這就使我能夠把這個中學男生部六個年級十二個班都作爲我的講課對象了。高中畢業班的學生和我的年齡不相上下。

我發覺我雖然生性有幾分怯弱，但在課堂上並不怯場。若干年後我才明白這是由於我能把聽衆的注意力立時吸引到我身上來，促使我很快地進入角色。原來我是有一些講演才能的，而這種才能又和表演才能很近似。一個好演員和好教師都善於鎮住自己的觀衆和聽衆，使他們聚精會神地看你和聽你。這種素質，對於我今後爲共產黨爭取群衆和十餘年後、四十餘年後兩度散佈「反黨」的影響無疑都起了很大作用。無論我面前是幾十人、幾百人或幾千人，我都能夠使他們連續幾個小時鴉雀無聲地聽我演講。同時，也只有這樣，我才能情緒飽滿地講下去。會場上一個人打瞌睡或退場，都立即會破壞我的情緒。很多人給公衆講了一輩子話，還感覺不到台上台下之間的這種情緒交流，所以他們能把聽衆講得一個個走光。

學生們喜歡我的真誠、熱情和無拘無束。在這個管理極嚴、師生關係刻板的學校裡，我的到來顯然是帶進了一股新的氣流。我在課堂上講世界地理時過於坦露地宣傳進步的政治思想，大約也使他們既覺得新鮮，又驚奇我的大膽。

幾十年後我仍被人稱爲「嘴上不設崗」的人，從不善於矯飾和偽裝。二十歲時，我自然更爲

稚嫩。日本人統治的後期政治上相當鬆弛，我認為學生中不會有敵人的特務，並沒有猜錯。我的年輕、真誠和全無老師架子，立即換來了學生的信任感，而我又把這種親近看作對我的期待，於是便忘記我的使命是以教師的身分從事秘密工作，情不自禁地想把這個世界的真情告訴他們，學生的反應——聚精會神、屏氣斂聲又使我興致更濃。兩三個高中學生曾故意站起來提一些顯然是刁難我的問題，我也不看作政治上的敵意，以為是頑皮，一笑置之，照舊按既定方針講下去。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日本投降前不過幾天，我忽然接到從哈爾濱發來的電報：「母故速歸」。我像遭到雷殛一樣，木然良久。我絲毫沒有關於母親健康狀況的預感。怎麼辦呢？哈爾濱屬於「滿州國」，歸去須辦入境手續，而我又是一個有政治使命在身的人，還要經黨組織同意。況且，母親既已故去，我歸去又有何用？但是，住在青島的姊姊也接到噩耗，她決定和寄居她家的父親一起返鄉。

那天晚上，我痛哭了一場。記憶中的母親，總是滿面愁容。由於父親既缺乏生活能力，對家計又很少用心，全家的憂患便由母親承擔起來。五年前我到北京上學，母親送我到車站，便分手了。一九四三年這一次分手，她卻送我到車上。車開了，她沒有下車，一直拉著我的手，流著眼淚，乘了一站車才下去。現在回想，她似乎預感到那將是我們的訣別。

我不記得母親年輕時是什麼樣子。分手時她不過四十三歲，已經顯得很老。三十年後每當我見到四十幾歲的女子還很年輕而富有魅力時，我便會想到母親，她老得太早了。

日本投降以後，學校裡有了三青團組織。我的窗子幾次被石塊打破。三青團學生公然在課堂

上擦槍，有時甚至拿著棍棒追隨我身後，直接進行威脅。我不覺恐懼，因為眼見越來越多的學生站到共產黨一邊來了。

特務學生每天到天津市警備司令部密報我的形跡。終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初，我接到黨組織的命令：敵人即將進行大逮捕，我是主要對象之一，必須撤離。我丟下全部財產，只攜帶兩本托爾斯泰的小說的英譯本，匆匆離開校園。

在躲避在一個學生家閣樓裡的一個晚上，我和耀華中學的一個進步女學生相互傾吐了愛戀之情。我們站在窗前默默看著天上的明月，約定日後相會。沒有擁抱也沒有親吻。我本來早已成熟，不知是什麼力量約束著我，使我遲遲未能越過中國人古老道德規定的界限，雖然我並不是一個孔夫子的信徒。

按照黨組織的安排，我應該在兩個月之後再回到天津。那時華北的黨對於國共和談是抱著希望的，甚至還準備了與國民黨競選天津市長的人選。很難想像倘若國共兩黨真能在和平競爭中共存，或分別統治中國的半壁河山，中國會是什麼樣子，兩黨本身又會怎樣。我想，誰要吞併誰恐怕都是困難的，相互競爭和互相監督只能阻止或減緩黨的腐敗過程。後來的中外歷史也證明了和平土改並不是不可能的。那樣，幾千萬人將不致死於內外兩場戰爭（不算文化大革命）和六十年代的饑饉。而只要中國的經濟和文化能夠正常地發展，中國人口瘋狂大繁殖的災難也許就可以避免了。

然而中國歷史卻選擇了另一條路。

我決定到哈爾濱和久別的父親與姊姊一起度過暫短的假期。

哈爾濱這時已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森嚴的軍事管制，使蕭條的城市更顯得陌生，好像所有的窗和門都封閉起來了。這種景象似乎像徵著市民在心理上對於共產黨的猜疑和疏遠。他們在暗暗期待國民黨的到來。

回到哈爾濱，最令我震驚的便是關於蘇聯軍隊進入東北後犯下的姦淫中國婦女和搶劫等暴行的傳說。起初，我不肯相信——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出兵的目的又是爲了從日本人占領下解放中國人，這怎麼可能呢？然而那麼多的人都衆口一詞，有些人還目睹了蘇軍在哈爾濱的搶劫活動，這就不能不相信了。學生和市民們對於共產黨的疏遠和對蔣介石的出於正統觀念的崇拜和嚮往，這一點起了很大作用。我和哈爾濱本地的年輕共產黨員都爲此感到困窘。中共軍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爲什麼蘇共的軍隊竟如此野蠻而毫不顧及政治影響呢？一種解釋是：因蘇德戰爭中蘇聯損失慘重，兵源匱乏，進入東北境內的軍隊是從刑事重犯中募集的；第二種解釋是：蘇軍兵士把中國人當作了日本人。然而這些理由連我們自己都不能說服。

我冒稱自己是回鄉探親的北京大學學生，配合地方黨組織到青年中進行工作，以我的親身經歷揭露國民黨的腐敗和宣講共產黨是唯一能夠拯救中國的政治力量。

國民黨的統治從未到達過這個省份，共產黨的抗日軍隊和地下組織卻在日本佔領時期還活動過幾年。然而青年學生和市民們把國民黨視爲正統、崇拜蔣介石的觀念卻很頑固。

我又一次發現自己有演說家的才能。在「東北民主青年聯盟」成立大會上，我的演講使我贏得了最多的選票。由於我共產黨員的身分還留在天津，我只能作副主席。

我想，我演講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我的真誠。我真正相信國民黨已腐敗透頂。我和兩名共產黨員在天津耀華中學幾個月的工作就能使幾百名學生（他們中很多人是軍閥、漢奸和大官僚的孫男孫女，或商人的子女）改變政治態度，傾向共產黨或黨所領導的民主運動，使我對黨最終會在全中國取勝毫不懷疑。但是我在一九四六年哈爾濱的演講活動也遇到一個大難題：對於家喻戶曉並引起當地居民極大憤慨的紅軍一年以前的暴行，怎麼辦呢？必須使人們相信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好的，第一個執政的共產黨也是好的，然而它的軍隊卻對中國人進行搶劫和強姦！遇到這個問題我就只能搪塞了，唯一拿得出來的解釋是：那支軍隊是蘇聯的死囚，不能代表紅軍。這時我和我的聽衆還都不知道那些並非死囚的紅軍在東歐和德國做了些什麼。

我到哈爾濱不出十天，國共兩黨軍隊的全面內戰就開始了。我回天津的計劃已經告吹，地方黨委決定我留下來工作。我此後的職業也仍然是和與我年齡相仿的青年、學生打交道：當中學教導主任、青年幹部學校的輔導員，同時作「東北民青」和青年團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冬，我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對人的輕信，使我幾乎犯下一個大錯誤。有一天在街頭，我忽然見到一個自稱過去曾和我在中學同學的人，姓田。他正受失業之苦，表示要靠近共產黨。我輕率地介紹他參加大、中學生寒假補習班去學習，之後又介紹他到新華通訊社工作。這時正逢軍事形勢於我方不利，我軍準備撤出哈爾濱之時。田某爲保險起見，暗地與國民黨特務組織掛上鉤，而我還在相信他，把一本爲準備入黨的人而寫的小冊子交給他看。我爲此受到批評，但並不嚴厲。

我把我見到的所有人都當作好人予以輕信並傾吐衷腸而無任何戒備的毛病，此後也沒有改，但回顧幾十年生涯，我因輕信個人而上過的當並不很大，因輕信黨組織而遭受的損失卻不知要大出多少倍。

然而對於黨組織我又不是沒有懷疑的。一九四七年年初我參加哈爾濱郊區的土地改革。一進村，我們那個工作隊的隊長就下令把一個地主吊起來毒打，逼使他招認與土匪勾結、隱藏槍支，並要他交出浮財。那人說沒有，便打個不停，直至血肉模糊。這是我頭一次目睹人對人如此殘酷的場面。我沒有權力制止，只能躲開。徹底搜查的結果，並未找到槍支，也沒有浮財，只搜出一堆破破爛爛的舊棉花。那個所謂地主也很可憐，不過占有十幾畝土地。每個村莊都必須有一個可以作為鬥爭對象以激起農民仇恨的地主，他是這種需要的犧牲。

一個疑問將留在我心中久久不能解決：從理論上說，中國無地農民渴望得到土地是無庸置疑的。但是一方面，也確有一些地主是經幾十年的辛勤勞動，省吃儉用以自己的儲蓄購置了小片土地，同時貧農中也不乏遊手好閒因而一文莫名的人。和許多地方一樣，我們進行土改的地區，窮苦農民也須經過工作隊員反覆發動，苦苦勸說，才肯到大會上去訴苦和要求平分土地。當時，我們認為這是出於一種恐懼，擔心國民黨軍隊可能打過來，害怕遭到報復（這種報復確實是很殘酷的）。然而是否還有另一種可能：認為以暴力手段平分並非剝削致富者的財產是有背天理良心呢？

分地主浮財那一天，我參加了。那場面很像美國家庭的「車庫售貨」(garage sale)。幾家地主的服裝、日用品等擺在一排桌子上，最貴重的無非是皮襖、座鐘之類，甚至包括地主家庭最簡

單的日常生活必須品。事先已經議定，各家農民應該分到什麼東西，我們分別發放就是了。場上並沒有什麼歡慶氣氛。我的心情也不好，好像在做什麼虧心事。我又一次發覺自己缺乏黨所要求的「階級感情」。

我早就有一個想法：把地主的土地平分給農民也許是必要的。但浮財，特別是並非金銀財寶那一部分生活用品，似乎可以不分。土地畢竟是一種生產手段，而浮財則同作為人的地主及其家庭成員的個人生活有更密切的關係。一方面，為生活所必需，同時，有些物件為紀念品等等，還可能帶有很多個人感情色彩。我想馬克思倘若在世，他是不會同意這樣做的。

主管這次土改的領導幹部蔣南翔曾一再叮囑不許對地主動用肉刑，然而那個違背這條禁令的工作隊長也未受到任何懲罰。倘使他在這個村莊找不到一個鬥爭對象，打不開鬥爭的熱鬧局面，他就要被指責為「右傾」了。

來自延安的幹部把解放區的傳統帶進哈爾濱。艱苦樸素的作風和忘我工作的精神使人敬服。但是我隱約覺出他們帶來的那些在長期戰爭生活中形成的生活方式與倫理要求中，有一些與我格格不入的東西。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要求人們思想、生活方式和作風的一律化，我覺得這種氣氛是對的一種限制，內心裡暗暗抵制起來。

我從來不喜歡打扮，也無意誘惑漂亮的少女，但不知為什麼，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六年我青年時代的最後十年裡，我常常想穿一穿紅色的襯衫。這是不是對於單調環境的一種逆反心理呢？大家只能穿同一種色彩和同一種式樣的衣裳，這不僅是軍事生活留下的痕跡或苦行生活的傳統，而是表現了維持人們精神生活的統一和單一的要求。我本能地不喜歡這種要求。在青年幹部學校

工作時，有幾天我竟穿起一套父親的藍色西裝，與周圍的人顯得很不協調。倒是沒有人干涉我。但我對於別人受到的干涉表示不平。哈爾濱的夏天很熱，本地姑娘都穿裙子。由於參加了革命，女青年不能再穿裙子了，還得在襯衫外面再穿起幹部服來。太熱，就捲起袖子。有些延安來的人連這點都看不慣，我覺得就未免過分了。他們也看不慣我的作風，甚至還在會上批評過我不該走路、上下樓的時候都唱歌，說這是「小資產階級情調」。我照舊唱，而且一唱就唱到六十多歲。回顧那二十二年的政治囚徒生活，我還慶幸自己有這麼個習慣呢：經常低聲吟唱一定是排遣了我內心的許多悲哀和憂愁，並且在沒有自由的時候給了我一種自由感。

一九四六年七月在哈爾濱松花江畔舉辦的「青年之家」大約可以算作共產黨在大城市中取得政權後最早開展的青年工作。一個月以後，成立了東北民主青年聯盟，一年後才建立青年團。這些工作，我都參加了。那時，由於政權很不穩固，國民黨軍隨時可能打過來。哈爾濱的學生們又不願和中國共產黨靠近，充滿疑慮，所以我們必須充分考慮年輕人的興趣，儘量用歌詠、放電影、讀書、體育等活動把他們吸引過來。四六年冬舉辦的寒假學習班，是爲了進行政治教育，但也盡量運用討論的方式，允許各種不同意見表達出來，隨著政權的逐漸穩固，青年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更多的信賴，青年團的活動就越來越政治化，內部生活的民主就越來越少，青年團本身的官方色彩也就越來越重了。

伴隨全國解放，青年團和學生會就變成了黨的「工具」，它的活動方式與內容同共產黨幾乎沒有什麼差別。像全國人民一樣，青年們以入團爲榮，現在是由青年團選擇他們，而不是尋求他們的支持了，青年團組織的生命力從此便走向衰落。



第三章

尋找那缺少的東西，但沒有找到

不知道這是為什麼：打敗蔣介石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像日本投降那樣在我心中引起歡欣若狂的感情。是不是因為我從一九四六年起就在解放區生活，或者因為這場勝利早已是預料中的事呢？一九四八年冬我們從哈爾濱乘專車開入硝煙剛剛散去的瀋陽，已經提前體驗過這個勝利了。記得我在瀋陽車站上看到蓬頭垢面擁擠不堪並且肩扛手提著過重負荷的群眾時，曾猜想過：只要全國一解放，這一切很快就會改變，人們將變得更文明、衣著更整潔，那將是真正的旅行，也不必攜帶這麼多的東西了。後來的三十幾年每當我乘火車又見到車站的景象時都會嘲笑自己頭腦太簡單了。

這時，中國共產黨是以充滿自信，以百年來第一個趕走外國侵略者，和二十世紀以來第一個統一了龐大而複雜的中國的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在人民面前的。這種自信是以全國各階層數億人民對它的絕對信賴與擁護為基礎的。甚至使許多頑敵也望風披靡，心悅誠服。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我，也以為黨和人民的這種關係永遠不可能有什麼變化。

在各大城市裡，青年團幹部將有幾年時間忙於調查青年人在繼之而來的各種運動中的思想動向。目的不是據以調整、改變黨的政策或措施，而是批評扭轉群眾的各種錯誤思想，使他們更起勁地投身到黨所號召的各種行動中去。黨是領導者又是教育者，而人民是樂於接受它的教育和領導的。聽不到對於決策的異議，差異只不過是行動上積極性的高低。聽不到有人要求參與決策的呼聲。對於黨的正確性和黨的幹部對人民的忠誠是絕對信賴的。

的確，中國土地上的一切污垢和傷痕，似乎都是國民黨製造的；中國共產黨則一塵不染，兩袖清風；是正義、真理和光明的化身。

於是，在黨與人民之間便形成一種單向渠道：黨做出一個又一個決策，發出一個又一個號召，掀起一場又一場運動，人民這一邊則是聽取，服從，行動……既然如此，黨就非常繁忙，百務纏身，也就無暇去總結為什麼在自己的歷史上「左」的東西在造成災害之後仍常常得勢，來不及審視過去在一個村莊、一次戰鬥中之有效的那一套東西對於治理複雜、多變幾千倍的一個大國是否適用了。而它給自己提出的任務又是空前艱巨的——無視中外歷史上除蘇聯以外的一切管理社會的理論與制度，一切都另起爐灶。

一九五一年春我調到北京參加共青團中央正在創辦的報紙《中國青年報》的工作。

共和國的成立，使我面臨一個新的抉擇。多年來我一直把自己從事的工作看作爲中國的解放而從事的臨時性工作，現在可以按我的志願行事了。於是我選擇了報紙工作。作記者，是我十幾歲以來的志願。

一九五〇年冬，我隨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個代表團——中國青年代表團訪問蘇聯，我擔任翻譯。即將創辦的《中國青年報》和《中國少年報》需要學習蘇聯的經驗，於是我就爲「中國青年報」未來的總編輯張黎群和《中國少年報》籌辦人之一朱洪作了翻譯。我們認真聽取了蘇聯《共青團真理報》《少先隊真理報》主編與編輯部各部門負責人的介紹。這自然成爲我去《中國青年報》工作的一個極好機會。

我走進一個我十分熟悉的那類人的圈子。編輯部是由一些年輕的知識分子組成的，二十六歲的我已屬於年長者了。他們來自大學，是參加過反對國民黨的地下學運的。絕大部分人尙是獨身。幾十個人很快熟悉起來，說說笑笑，相互之間既無政治戒備，也無利害衝突。在爲那即將接踵而

來的政治運動而舉行的各種會議上，並沒有幾個人說出與中國共產黨不同的意見，但那多半並非由於恐懼，而是認爲黨不會錯，因而主動放棄了異議。這種狀態一直繼續到一九五六年。

伴隨著這張報紙的創刊，這個內戰戰火剛剛熄滅不久的中國，幾乎同時捲進了幾場鋪天蓋地、熱火朝天的狂熱的政治運動的浪潮。全國各個大小城鎮和鄉村同時爆發了抗美援朝運動和鎮壓反革命運動。這一邊，是無數十幾歲到二十多歲的青年男女熱烈報名參軍或加入軍校，那一邊，則是前國民黨軍政官員和特務跑到各地政府自首，交代自己的罪行。城鄉人民一面熱誠地捐獻錢、物支援抗美援朝戰爭，同時向政府檢舉他們認爲是隱匿的反革命分子的人，直至自己的父母。敲鑼打鼓歡送青年參軍和揭發鬥爭反革命分子與惡霸的大會小會同時進行。在人們毫無保留地擁護中共中央發起的這兩場運動的熱情中，不難看到對於中國終於贏得民族獨立的歡欣，和對於一個新世紀終於到來（其標誌是國民黨潰退前夕瘋狂的通貨膨脹終於被制止，人民生活普遍改善，社會治安逐步恢復等等）的感奮心情。人們在多大程度上把這一切歸功於中國共產黨，也就以同樣程度的信任和服從寄予新政權。

在我們編輯部裡，一面緊張地從事大家都相當生疏的編報業務，同時連續地把白日 and 晚間的時間用於開會，具體審查政治歷史上有可疑情況的同事。在全社會公開進行鎮反運動的同時，公職人員內部還開展了一個「忠誠老實」運動，每個人必須坦白交代自己歷史上不純潔的形跡。一天早晨，在我的辦公室裡卻發生了一件引起震動的事：坐在我對面辦公的一位我手下的編輯人員丁佛恩，忽然不見了。事先事後都無人向我說明逮捕的理由，我只風聞此人是一個「托派」。我知道他是從安徽來的，讀初中時便思想左傾，想隻身奔赴解放區，投奔共產黨。但這時一個友人介

紹他加入了一個自稱是共產黨的組織，據說其實是托派，冒充共產黨，因而他便成了托派。

丁給我留下的印象是沈默寡言、工作十分認真踏實，也有一定能力。我懷疑，既然是無意中誤入托派組織，若無反革命行動，是否算得上是個「托派」？但在那時政治警覺高低直接等於革命覺悟高低的氣氛中，我又懷疑自己是否太「右」，心想：此人的沈默寡言和常有憂容，落落寡合，我一向以為性格如此，是否就因為歷史上有不可告人之事呢？總之，沒有人認為一個人被秘密逮捕有什麼不正常。只要是「革命需要」，任何手段都是正當的。

這年三月，一輛當時極為罕見的豪華進口轎車有幾次開進我們報紙所在的團中央大院。聽說裡面坐著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大家都跑出去想一睹她的芳容。那時江青還很年輕，身材苗條，笑容可掬。她是負有毛的特殊使命來找當時任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歷史學家許立群的。許立群是著名才子，於中國歷史也頗有研究。不久，我們就得知江青來此的目的了。發起一場全國性批判電影《武訓傳》的那篇人民日報社論，就是由毛澤東授意經江青傳達，由許立群執筆的。

這部解放前夕由進步的編劇、導演和演員拍攝的電影，一部傳記片，本來是為讚頌清朝以行乞手段興學、為貧苦大眾獻身的農民武訓的偉大精神的。主人公既出身於勞動農民，宣揚的又是中國共產黨所提倡的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因而在幾大城市上演都很受歡迎，甚至獲得了中共高層文藝領導幹部的好評。誰也沒想到毛澤東竟認定它是一部有毒的影片，還成為一次全國性運動的批判目標。

我們看這部影片時，它已經是作為批判對象的反面教材了。然而武訓為使平民能受到教育而

寧願過苦行僧式行乞生活的精神，仍然感人落淚。當我讀到毛和他人批判文章中指責影片「污蔑農民革命鬥爭」，宣揚「被壓迫者的解放可以通過教育達到，並不須經過革命手段和暴力行動」等錯誤時，最初半信半疑，覺得似乎提得過重了。然而在自省中，又覺得這正表明自己一向階級鬥爭觀念不強；毛的高瞻遠矚，能從一個人的故事中看出有戰略性意義的根本性問題，令人敬服。

那時根本不會想到這場批判和同時進行的對幾部小說、劇本的「人性論」、「侮辱勞動人民」等問題的批判，會使一批作者、演員一蹶不振，幾十年停止創作生涯；使整個文藝界創作人員陷入驚悸，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個性和獨立思考，或停止創作，或盡力迎合中國共產黨的需要，為此不惜歪曲現實，以致使中國文藝事業日益衰落達二十餘年之久。

這年的七月一日，在北京市先農壇體育場召開了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周年的大會。細雨濛濛中在觀眾席上張開的大幅橫標，紅色顯得特別鮮艷，上寫「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心中忽然出現一個念頭：這話是不是說得太早了些？這種話似乎應該留給別人去說，而不是共產黨自誇自讚。我立即察覺這個念頭幾近叛逆，然而又不能說服自己接受這個口號。

我並不反對批判《武訓傳》，但看過電影後又覺得它即使有些缺點也並沒有說得那樣嚴重。至於小說《我們夫婦之間》，我沒讀過。作者蕭也牧就和我在同一個大院工作，我覺得他人很好，即使小說有錯誤，值得這樣連篇累牘地在全國範圍內批判嗎？過分了吧？我這時若能預見到蕭也牧其後的命運——「三反」運動中受批判、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被迫害而死，若能預見對這篇以及一系列作品的批判會給全國文藝界與思想界造成的嚴重後果，我就不會止於懷疑了。

我對政治生活的冷淡情緒和我對馬列主義理論的疏遠差不多發生在同時。我自幼理論興趣很

高，去蘇聯時發點零用錢，也買了一些這類書籍。我從這些書中看到，共產黨一經掌權，理論的使命就降低為解釋領袖的一本著作或一篇論文，從不提出新問題，很少有作者獨立的見解了。貧乏的內容和枯燥的詞句令我厭煩。我並不想作個理論家，但當我確認只有革命領袖方能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有所貢獻而我們一般人只能學習它和牢記它時，更覺索然無味了。

沒有任何決策需要我參與意見。沒有什麼大的問題要大家去探討和提出不同意見，一切都在上層決定了。我們的使命就是不停地聽和記，然後照辦。我感到寂寞了。沒有任何民間組織或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團體，全國社會生活事無巨細都由黨承包下來統管起來，個人的作用微不足道。

我剛剛結婚的妻子朱洪是政治積極分子。「三反」運動時我們到一個大禮堂開會，團中央數百名幹部齊集一堂。台上站著那位被批判的作家蕭也牧，是作為貪污分子批鬥的。朱洪和大家一起使勁喊「坦白交代」之類的口號。我問她：你手裡有多少罪證材料？原來只有內部傳達下來的一丁點兒疑點，要用眾人的壓力擠出一大堆來。

我個人生活裡這時發生一個關係到整個民族前程的問題。我和朱洪不想很快就生孩子。但政府的政策是不准避孕，禁止人工流產。一九五二年起市場上已無任何避孕藥品和工具出售。團中央機關一個工作人員年年生孩子，一概給補助，直到生下十一個，過度疲勞為止。毛澤東說社會主義不怕人多。我對人口問題最初還想得很少，但我和我的妻子經常處在她可能懷孕的恐懼之中，而城市裡像我們這樣不願生或不願多生的人是不不少的。這使我想到：為什麼沒有人聽聽我們的呼聲呢？

朱洪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去做人工流產，由於是不合法的，她不能在手術後休息。上海的女工

和北京的女知識分子中都發生因自己墮胎而死亡或殘廢的慘劇。

個人有多大自然自由來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呢？隨著政治愈益浸透到每人生活的幾乎每一個角落，個人的地位就不斷收縮，越來越渺小了。政治利益是以至高無上的、神聖不可侵犯的面目出現的，所以不容懷疑，不容討價還價，只能服從。我們在辦公室、在會場甚至在家裡最常聽到的字彙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對黨（連非黨員也是）不忠誠老實（既包括不清楚交代自己的歷史或家庭、社會關係中的問題，也包括不坦白自己頭腦中的錯誤思想），自然是最危險的個人主義。沒有入黨要求是落後的表現，要求入黨遲遲不成而情緒波動，也是個人主義。工作中的失誤、粗心、對於不感興趣的工作缺乏興趣、對於想不通的事情抱有異議等等，也是個人主義。想升學深造，為各種原因而不安心現在的工作，要求調離，甚至夫妻分居多年希望團聚，都屬於個人主義。反對資產階級思想是毛澤東在臨近全國解放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規定的戰略方針中重要的一條。每個人身上都有資產階級思想，主要又是個人主義。因而每個人都是有罪的，都必須以改造思想來贖罪。而由於「個人主義」囊括了全部個人利益，包括合理的、於革命有利的個人利益，所以思想改造又是沒有完結的。

這種思想改造熱高漲到什麼程度呢？團中央幼兒園裡一位女幹部，每星期六當她丈夫一週一次回來度假時，首先要他彙報這一週的思想，然後再過夫婦生活。這是個極端的例子，在我們中間傳為笑談，但其實我們不過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罷了。

從這時起，「把個人交給黨」，「把一切獻給黨」，「一切聽從黨安排」這些口號還要流行幾十年，沒有多少人懷疑過一個政黨有什麼權力向一般公民提出這種狂妄、蠻橫的要求，更沒有人識

破，這個對於共產黨而言是一種僭越、而對於人民則是一種侵犯、剝奪和侮辱的口號，竟然毫無阻礙的變成至少是大陸城市居民的道德準則，是一件多麼可怕的現實。當然，一定是有人像我一樣對這種宣傳感到不舒服甚至厭惡的，但是在那種政治氣氛中，又有誰願意或敢於說出來呢？黨的權威是那樣至高無上，而這種絕對權威卻只能通過代表黨的個人來實現。這些個人在執行改造他領導下的許許多多個人時自然無暇也無須改造自己，而他們的特殊地位恰恰對於養成最可怕的、最終會禍國殃民的個人主義是非常適宜的土壤。在共產黨掌權後只須幾年，這種幾十年也醫治不好的病症就會蔓延開來了。

保證黨的權威的在黨內是鐵的紀律。在戰爭中和地下鬥爭中長大的黨，從來是下級服從上級壓倒了少數服從多數，而上級也就只能是個人。我進入解放區以來常常懷疑的就是這種紀律，一個黨員對上級的服從是否應該有個界限呢？明明錯的，也要服從嗎？這種疑念不是無緣無故，而是覺察到上級並非總是正確的結果。大約是一九五三年，在《中國青年報》的編委會會議上不知怎麼討論起這個問題來，有人把可能發生的荒謬推到極點問道：「上級叫一個黨員去殺人，他也必須去殺嗎？」這時，我的一位老朋友、延安時期的老幹部竟然說出這種話來：「也要去殺！」我聽了既驚異，又覺得應是意料之中的事，因為我多年來已經感覺到「鐵的紀律」在實踐中能夠變為同它原來的意義全然相反的東西。但那時我還不知道，革命黨竟可以變成法西斯，而且就是從紀律這裏開始演變的。

這太可怕了。我不能預見幾年後的反右派運動中人們真的按照黨的領袖的意志去「殺人」——從政治上處決一百萬人，更料不到十幾年以後文化大革命中真刀真槍的大規模殺人。當時令

我感到驚恐的，是已經存在的現實：人們對於按照黨的領導的意圖推行的一切，全然接受，即使是對於自己命運的不合理的判決。一位二十歲的姑娘，編輯部人公認為很有才幹、並且肯定會長為一個好記者，僅由於戀愛中的過失——和一個已婚的幹部發生性關係而懷孕，被開除青年團團籍並被趕出了中國青年報。沒人提出異議，她本人也順從地走了。走得悄然無息，以為自己是犯了無臉見人的大罪。

人們不是不能料到，這將毀掉她的一生。但是即使我，也止於默默同情，卻仍然覺得她有罪。傳統的性道德觀念和黨的無情裁決配合得很是默契。

隨著「三反」「五反」運動的結束，政治運動暫告平息，舉國投入一九五三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我在編輯部分管青工部，而工業建設是全國重點，工作忙碌起來。

學習蘇聯的作法，我在報紙上連續報導青年工人和技術人員在生產和技術革新方面取得的成績，用以發動青年投身建設，組織社會主義競賽。報導中有許多機械工藝、技術詞彙和數字。對這些，我沒有多大興趣。

幾年來這張報紙（也不僅是這一家報紙）充斥版面的都是各種好消息——政治運動的進展，經濟領域的成就，各方面先進人物的英雄事跡，再就是解決青年人各種「思想問題」的講道理的文章，常是就青年人中一些十分瑣細的「錯誤認識」、「思想顧慮」做一番訓誡或說教，目的是引導他們接受黨的某一項政策或參加某一場運動。不知為什麼我對這種文章十分反感，但五十年代它卻非常走紅，竟成為流行一時的文體。

在報紙上看不見不同的意見，看不到對生活中除群眾的「錯誤思想」以外任何消極現象的報導。讀者只須知道黨和社會主義的成就，好像這才不致動搖對二者的信念；只須看英雄們的道德風貌，和傾聽各種訓誡，這才不致墮落。此外，不必關心和了解這個世界，自己身邊和個人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一切聽從黨安排」了。

報紙的單調、枯燥的面孔和單向宣傳，在有一點上卻是真實的：我們的生活也是如此。

我不滿於此，我要改變這種狀況。我試圖發過幾篇批評官僚主義和工業生產中嚴重浪費的稿件，通不過。這正是中國在各方面都以蘇為師的時期。我奇怪了：報紙也在學蘇聯，為什麼單單在公開開展批評和反官僚主義問題上卻學不得呢？這個疑問今後將煩擾我三十年，我將兩次為我的這種企圖付出僅次於死亡的代價。

用以後批判的語言，我這時已經開始「自我擴張」和「按個人的面目來改造黨」和「頑強地表現自己」了。我認為工人階級既然是「國家的主人」，就不應是生產的工具。他們應該「目光四射，關心和干預一切有損國家利益的事情」。我決定到生活中去尋找這樣的青年人，放在突出地位給以表彰。

我向記者們布置去尋找這種人。我在來稿中搜尋。我親自到天津市工廠和商店中去尋覓。結果是一場空。偶爾找到一個兩個，也都是有較多缺點的人。

直到一九五四年，我才終於在瀋陽找到了我心目中的英雄。

像每次我來到地方團委的青年工人部一樣，在瀋陽團市委，人們也照例向我介紹了一連串勞動模範的事跡。這種人是當時報紙上走紅的人物，改良一種刀具或機床的其他部件而使勞動效率

提高幾倍到幾十倍的勞動模範，我在我們報紙上就宣傳了很多。大約是對方覺察我聽得厭煩了，見我不再記錄，便不再說下去，但像是忽然想到一件有趣的事，他自己對自己笑了起來，說：「有一個怪人，原來也是勞動模範，現在卻不是了。想聽一聽嗎？」

我的精神立即振作起來，他便繼續說下去。

「這個人是車工，很聰明，常搞技術革新，多次受到獎勵。名叫楊有德。他的毛病是不太安份，愛管閒事，老愛指手劃腳。下工以後，常到別的車間轉遊。那時機械七廠正突擊製造朝鮮前線需要的一種礦車。楊有德閒下來就常到那兒去觀看操作情況。他說，礦車輪子的圓度不夠，怕要出問題。技術員不聽他的，繼續生產。果然沒多久，很多礦車被退回來了：輪子都破碎了。工廠生產風扇，他又去看，說扇葉的角度不對，人家還是不聽他的，不料又被他說中了。這種事發生了多起，每一次楊有德都得罪幾個人，於是他就成了不受歡迎的人物了。」

我決定去看看他。

楊有德二十五、六歲模樣，穿得乾乾淨淨，坐在廠部安全科的辦公室裡接待我。我心裡暗暗驚異：他為什麼不在車間了呢？他的相貌也使我意外：面色白晰，文質彬彬，根本不像個工人。尤其是那雙眼睛，很亮，但透露著憂愁和不安，很像是個神經質的人。原來他已被調離車間，現在成了專管技術安全的職員了。脫離體力勞動，這本來可以被看作一種提升。可楊有德並不愉快，他苦笑著說：「這樣，我就被拴在辦公室，不能走進車間挑毛病，幹部們就放心了。」

楊有德把我領到他家裡，一間進深很淺的小房間，牆上、桌上放滿了書，其中居然有一些日文技術書籍。床上放著一滿盆水，旁邊放著一條沒有疊好的被。楊有德見我不解的樣子，便解

釋說：「我是在試驗搞一種消聲器。」

有一個車間噪音太大，震耳欲聾。楊有德便找來許多技術書，決定自己設計一種消聲器。好些天來，他每晚把自己和一盆水蒙在被子裡，不斷敲鑼，觀測水面的波動，惹得他妻子很不耐煩。

這並不是廠長或科長交給他的任務。這無疑要耗去他很多業餘時間，失敗的可能性也許比成功的更大。是不是因為尋找、發現和創造的過程本身給他以很大樂趣呢？可能。但他又不是那種遨遊在科技世界裡的發明家。他不是車間主任，卻比主任更關心車間裡發生的事情；他不是廠長，但看見本廠出了很多廢品卻比廠長還焦急。爲了改進一種產品的質量，他改進設計，圖紙交上去，幾次都遺失了，仍然不顧別人的厭煩頻頻過問，直至產品有了改進。他常常在工廠門口拉住廠長，指出他講話和工作中的失誤。在幹部中間他成了不受歡迎的人，以致必須把他調到一個只有很少機會提意見的工作上去。最使領導人不滿的，還是他常常把不被接受的批評和建議投到報社去。

我寫了一篇通訊，希望楊的這些品質能在青年工人中普及開來。幾年以後我才認識到這是很難很難的。五十年代初期正是大批青年農民湧到工業部門之時。走進城市和工廠，能吃饱飯而且是細糧，又有固定的貨幣收入，他們就非常滿足了，生怕失去這個地位。要求具有這種意識而又文化不高、視野狹窄的人像楊有德那樣行動，是根本不可能的；又何況中國的政治環境不是助長而是限制和壓抑這種性格的發展呢！楊有德是個知識分子化了的工人，他甚至還懂一門外語。



第四章

命運的預演

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是我記憶中北京最炎熱的一個夏天。夜晚，小巷子中的居民都到街道上來露天過夜。不斷傳來行人中暑而死的消息。

我的生活中發生了一件大事，一個超級危險：我成了個反革命嫌疑！對我的審查就在這個夏天達到高峰。

事情是從我本人對於「反革命分子」缺乏警惕開始的。在我領導的青工部裡，有一位從上海復旦大學畢業的青年編輯朱志焱，他父親曾是國民黨中將，他本人也是肥頭大耳，一派武將的長相，到電影裡扮演一名國民黨將官是很合適的。他業務能力強，工作中點子多，也看不出什麼異常表現，我便把他看做為同志了。年初，黨委向我打招呼，說此人政治上可疑，使用上必須注意。我沒有表示反對，但也沒有真正重視。不久，第一機械工業部要開個什麼會，通知我們去取記者證，我就把朱派去了。他本應在上午回來，卻遲遲不見蹤影。原來他取記者證時同時取回一大包會議文件，自己跑到宿舍看去了。下午快下班時，他才到辦公室來。青工部的積極分子是從朱在文件上劃了些紅道道斷定他偷看了文件的。這時我發覺自己辦錯了事。我為自己辯解的理由是：我是讓他去取記者證的，誰知道那邊同時發了文件！心裡則仍然認為朱不是壞人：他若是為竊取機密而偷看文件，還會拿紅筆在那上邊亂劃嗎？

當我察覺對我的不信任時，我以為就是這件事引起的。肅反運動開始後，朱被隔離了，關在我當時居住的那幢紅樓的二層樓上。我每天進出自己的家，都要經過正對著樓梯的他那個房間。我知道秘密審訊還在進行。十年前我就聽到關於延安整風期間「疲勞轟炸」式連續審訊的傳說。我還見過一位由於這種審查而精神分裂、久治不癒的幹部。

每當我經過那間臨時囚室時，我的心情是複雜的。朱志焱真的是反革命嗎？我懷疑。但是我又不能完全不信肅反領導小組依據他們所掌握的材料而做出的判斷。對於這種審訊方法我不以為然，但倘若朱真的是個敵人，那麼爲了「革命的需要」就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了。

青工部當時有八名編輯，五名都不是黨員。我知道，朱和其餘四人確是不同，他並無加入共產黨的迫切要求，因而並不努力「靠攏組織」，做出進步的表現。在當時，有那種家庭成份的人，一般也根本不能入黨，所以也不奇怪。他有才，自信，不肯隨人俯仰，這就會使人認爲他對共產黨缺乏感情，懷有二心了。而那些積極要求入黨的人，就要像黨員一樣要求自己對黨組織堅信不疑，保持強烈的階級鬥爭觀念，因而對於朱的日常表現就不能不保持警覺。肅反運動一開始，這種狀況就加倍濃烈化了。

我的那個部裡，肅反工作是由一個姓丁的女黨員負責的，我和另一名黨員並不參與其事，肅反人員自成系統，照例也並不把有關情況告知我們。但我們可以參加揭發朱的問題的會議。大家一起湊材料：朱的平時表現有什麼可疑之處？由於朱這個人言行隨便，現在又用的是放大鏡，可疑跡象是不難找到的。比如，一九五四年夏季中國一些河流氾濫成災，北京雷雨連綿，朱就表示過嫌雨還下得不够，希望下得更多一些。這不就是敵意的流露麼！然而他的話當時是否可能有其他含義，比如說「天氣太悶，雨下透了就好受了」？還有：一個真正的敵人，他會毫不掩飾自己的敵意嗎？這就不予考慮了，也永遠不會有人在這種場合提出異議的。對於朱可能是反革命的最有力的論據，是每當胡耀邦到報社來，朱總要去跟胡的司機搭訕，以致和他混得很熟。朱還常常坐進胡的汽車。這是爲什麼？若不是企圖竊取機密或殺害胡耀邦，他會這樣做嗎？

這種討論，同時也是肅反人員觀察和測驗所有人對於肅反運動以及如朱這樣已斷定爲反革命分子的人的態度的機會。當時，我卻還沒有領會到這一點。

沒過多久，我便發覺自己也成了被懷疑和審查的對象。一些會議不讓我參加。一些文件不給我了。我以爲不過是懷疑我和朱的關係呢，這確是一個項目，但不是主要的。

忽然，有一天在一樓至二樓的環形樓梯靠牆的一側，張貼出我的兩篇未能獲准發表的文章的校樣，和我正在寫作中的一篇作品的初稿。這張牆報的標題是：「請看劉賓雁的反黨思想」。這是我的姓名第一次和「反黨」的字樣連在一起。我不免有些驚訝，頗感不快，但不知爲什麼，心中卻並無驚恐，相當鎮靜。

張貼出來供批判的有兩篇已發表的文章和一篇文章的草稿。我批評一些醫生缺乏人道主義感情和經濟幹部揮霍國家資財，文章的題目是〈冷〉，結尾的一句話是：

「果戈理的一個短篇裡寫過一個人清早上班時忽然發現他丟了鼻子。我們這裏，却確實有人每天早晨上班時只帶了工作證，卻把心遺忘在家裡。」

有一種感覺，在我心裡已存在很久，那就是：在中國的人際關係中，原來存在的那種正常感情好像逐漸淡薄了。

我最早感受到的冷酷，是醫生對病人的態度上。也許因爲這是各種職業中最人道的一種吧，從五十年代初期每聽到醫生的冷漠和不負責任給病人帶來的痛苦，我便很激動。一度想提議在所

有醫學院中設一些人文課程，主張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人無資格作醫生。現在，我把這個想法寫進了「冷」。其實遠在這篇文章寫成之前，「人道主義」和「人性論」已經被黨的宣傳機器，多次作為資產階級的敵對思想攻擊過了。每個人都是一個階級的代表，因而抽象的人性和抽象的、對所有人的愛是不存在的。

此文的罪名，是污蔑了社會主義。我們這裡既是社會主義社會，就應溫暖如春，人和人的關係必然是親如兄弟，怎麼會有什麼「冷」呢？

另一篇短文，更重要，因而問題也嚴重得多，題目是〈新的聲音〉。

「多少次，我想起這個人的眼光：他抬起泛紅的、激動的臉，閃光的眼睛像要吐出什麼東西。可是環視一下周圍的人，這雙眼睛又羞愧地垂下去了。」

這一剎那，我彷彿聽到一個聲音：不要搶先，別露鋒芒；別人未說，你又何必？就是這聲音，熄滅了那雙眼睛中的火光。」

這篇文章，是我幾年來尋找「敢於提出不同意見者」的過程引出的結果。我的動機寫得很清楚——「我們的建設事業頑強地提出它的要求：更大膽些，多說些新鮮的、有用的話！告訴我，是什麼東西在阻礙我前進？為什麼我聽到的聲音是那麼少和那麼微弱？」「大膽地走到生活的尖端，去發現新的問題，提出新的辦法，最好地實現黨提出的任務。寧肯要十個也許不完全正確，但有一定根據的新的意見，也不要一百個沒有錯誤，但是鸚鵡似的學舌。」這就有點不合潮流了。

我還批評了一種人：「一張永遠為別人微笑著的臉，眼睛謹慎地追隨著會議主席的面部的表情的變化，嘴裡隨時都準備著『是啊！』『對！』……」我不了解，這種人將長久地成為黨的寵兒，和那些「只願意說而不願意聽」的人結合在一起，在今後的中國歷史中將顯示其左右一切的力量。在張貼這張牆報之前，對我的審查是秘密進行的。編輯部大部份人不知道我出了什麼事，故仍然一如既往地說說笑笑。我曾以為，經過一番審查，會查明我沒有問題。這張牆報的張貼，表明「他們」對我的懷疑又有所加深。我向「反革命分子」的深淵又靠近了一大步。況且，我知道人們會相信張貼牆報的人而不會相信我，因而我會立即被孤立起來。我站在牆報前分析自己的心理反應，很是驚異：牆報上張貼出這些文章，是一種公開羞辱，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同時又是一種威脅，但是我的心情為什麼這樣平靜呢？

首先，我不相信我的日常言論和文章中的觀點是錯誤的。我有足夠的論據和任何人爭辯。其次，我覺得懷疑我是反革命分子是荒唐到極點的事。我同朱志焱的關係，他們也可查明。僅僅是時間問題而已。

我並不是一個自信心很強的人，但是這事件荒唐到如此地步——我，一個從我的所有親屬到我本人都未曾受到革命的任何傷害，我本人歷史上也沒有任何可以懷疑之處的人，我關於自己的歷史與現在的政治、思想狀況從無任何隱瞞，我為人事光明正大，怎麼會被懷疑為反革命分子呢？這是一個太大的誤會，因而不可能持續很久。但是，為了防止妻子為我擔驚受怕，我決定把我目前經歷的一切向她隱瞞起來，而我的隱瞞居然十分成功，她竟然絲毫沒有察覺。

幾天以後的一個早上，報社的秘書長找我談話。他像從來一樣和善地微笑著告知我：因工作

需要，我的工作需暫時變動一下，到總編室去工作，青工部主任的職務由他人接替。我心裡本來作了更壞的準備：他們不是一可能把我像朱志焱那樣關起來審訊。因而，工作調動要算是很客氣的措施了。青工部經常接觸工業建設方面的機密材料，還往往要和政府高級部門打交道，我既已被懷疑為敵人，自然要提防洩密，總編室則是報紙編輯的最後一個程序，只須看各部門已編好的稿件，並且發或不發什麼稿件並不由我一人作主，一個階級敵人從事破壞活動的機會自然要小得多。於是我回以同樣和善的微笑，回答說：好。第二天，我就到另一個辦公室去上班了。

這時，編委擴大會上對我的圍攻已經開始了。幾年來我在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或私下和朋友或同事的談話；我對社會現象和對文學與新聞的觀點，我發表或未發表的文章，都成為羅織我罪狀的依據。追查集中在一個問題上：你為什麼老是呼籲在報紙上揭露和批評我們的（黨的）錯誤和缺點？你為什麼還用這種思想去影響記者和編輯們，總是向他們談論陰暗面，並鼓動他們去寫它？目的何在？是不是仇視黨和社會主義？

事情還在朝更壞的方面發展。到八月間的一個晚上，團中央組織部長來參加會議，情況比先前又嚴峻得多了，不過我還是沒有緊張。在會議結尾，組織部長講了話。他的意見是帶有結論性的，他說：「根據幾個月來的審查，我們有根據提出一個問題：劉賓雁到底是一個什麼人？現在我們要重新考慮這個問題了。」很難說這是虛張聲勢的威脅。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反覆估量他這句話的意思。結論只能是：看來，他們認定我是反革命了。那晚，我入睡比平時遲了十幾分鐘。

在這之前一些時候，已經有人給我看過幾張照片，那是從我的筆跡寫的幾封信上拍下的。我的字很有特點，所以這些照片在編輯部中傳閱時，沒有一個人不是立即認定那是出自我的筆下。

奇怪得很，只有我本人，一下就看出這是別人的偽造。我也看出模仿的很像，但不是我寫的。後來得知，有幾封信是辱罵周恩來和胡耀邦的，有一封信指責因與胡風有牽連而受審查的總編輯為何不稱職，推荐劉賓雁擔任這家報紙的總編輯。

其實，這時公安部門已在立案審查另一個人了。也許是公安部門也在向報社的領導保密吧，所以才會有這種事發生：九月的一個晚上，繼續開我的會，這回，把許多張「我的」反革命信件複製件擺到桌上，大家傳看，也讓我看看。接著讓我表態。我淡然地說：「不是我寫的。相信有一天會真相大白。反正不是我寫的。」一位擔任秘書長職務的很好的同志半譏諷地勸我坦白招認，「罪證俱在，你怎麼會瞞混得過去呢？還是老老實實承認吧！」

這時大約是晚九時，會議已開了兩個多小時了。忽然，有人用力推開了門，一個女人被推得跌跌撞撞闖了進來，後面尾隨著兩位公安人員。我定睛一看，大吃一驚，那女人不是別人，竟是我手下的編輯J，總編輯的妻子，原來罪犯竟是負責我們部門肅反工作的積極分子！

J是解放前夕在上海入黨的一個大學生，大資本家的女兒。她給人的印象是粗粗辣辣，大大咧咧，沒有什麼心計。她沙啞的嗓音和簡樸的裝束又增強了這種印象。你不會提防她，也不會想到她會說謊，然而她卻最善於說謊。幾年間我一直相信她是中、法混血兒，還猜想過她的眼睛似乎有點像歐洲人。其實全是受她編造的家庭情況的影響。在肅反運動中，她總共陷害了青年報的十幾個人，把肅反人員捉弄得好苦。她很會模仿別人的字跡。她用我和朱志焱的筆跡寫匿名陷害信，都學得很像；而且為提防暴露，她還是用左手書寫的。

那時公安部門有蘇聯專家，很快就辨明那些信不是我本人的筆跡。至於怎麼懷疑到J的身上，

不得而知。J常常打發保母到遠離青年報社的鬧市去發信。可能是爲了取得更確切的罪證，派J到上海去出差。她在上海又繼續發出這種信，被當場捕獲了。

她爲什麼要這樣做？很多人說是出於階級仇恨，爲她的家庭向共產黨復仇，我始終不大相信，她丈夫被停止了總編輯的工作受審查，疑是「胡風分子」，這可能是激起她的仇恨的一個比較可信的原因。但是也並未定案呀。況且，她供認她是從三年前，即一九五二年就開始寫匿名信的。未必會是出於一種愛好吧？她的作案動機，於我始終是一個謎。

朱志焱也是無辜的，枉受了半年的罪，被解除了隔離。其餘受害者也一一解脫了。J被送上法庭，以反革命活動罪被判處了幾年徒刑。

一場聲勢浩大的肅反運動，在中國青年報竟未揪出一個暗藏的真正反革命分子，卻製造出一個新的反革命，而她還是這場肅反運動中備受信賴的積極分子，不然是沒有條件陷害許多好人的。多麼辛辣的諷刺！

然而有誰從這裡引出什麼教訓嗎？沒有。承認在全國存在「肅反運動的擴大化」，那麼爲什麼會發生？這種災害在共產黨內和它領導的地區爲什麼從三十年代起不斷重複地發生？要不要從法制上採取措施來杜絕這種災害？似乎並沒有人認真思考過這些問題。

就連受害者本人，也未必認真想過。

我只覺得黨委既然公開批判我，四、五個月時間的錯誤審查給我自尊造成的損失，他們就應該公開向我道歉。我等了又等，卻連向我個人私下道歉都沒有，使我很失望。

一九五四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時，曾大張旗鼓地宣傳過，人們印象不謂不深。

那年出生的許多孩子，就命名爲「小憲」嘛。然而當這部憲法並未真正貫徹，又遭到違背時，竟聽不到什麼反對的呼聲。當時黨內並沒有布置，說這個憲法是假的，不必認真對待。但是我這個二十九歲的共產黨員卻自發地認定憲法是裝樣子，給外國人和資產階級看的。我們根本不需要憲法。我們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夠了。況且，倘使真正實行起憲法來，未暴露的階級敵人就會也受到保護，那還怎麼進行階級鬥爭呢？

第二年發動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毛澤東親自對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私人信件做許多批註，公開大量刊載、出版，作爲這個「反革命集團」的罪證，使很多原以爲胡風等人僅僅是文藝思想問題的人確信他們是反革命了。我想，很多人大約都像我一樣，根本沒有想到毛澤東這樣做是犯了違憲罪——他侵犯了人家的通信自由！一個簡單的邏輯是：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對於階級敵人是不適用的。

但是另一個簡單的邏輯，雖然在生活中多次表現自己，卻一直不被人接受：憲法確能使少數壞人也受到保護，但沒有它，卻會有很多很多好人的權利受到侵犯甚至連生命都難以保住！這樣一個十分明確的真理，爲什麼竟長年被忽視呢？只能有一個解釋：只有普通人才會受到這種威脅，而執掌決策權力的人，是絕對安全的。

還要經過十一年春秋，在百萬名知識分子橫遭摧殘後幾年，歷史才來證明：執掌最高權力的人也是需要憲法保護的。劉少奇、彭德懷等開國元勳之死，應該是最有力的證明。在那場災難中，數以萬計的黨政領導人受到摧殘，許多人死於非命。當他們受到非人的侮辱與折磨時，也許會想到憲法和人權的可貴。他們中大部分人是活下來了。事過境遷，記憶是有選擇的，不會把當年所

有的體驗都保留下來。很可惜，在那些衰老的頭腦裏，被有選擇地保留下來的記憶，竟然是這樣一些東西：當年紅衛兵的兇狠批鬥，和自己當時關於他日一定要復仇雪恥並絕不許百姓造反的決心；關於五十年代以來享受過榮華富貴可能永遠喪失的恐懼，和將來一旦恢復權位必定要如何牢牢保住得而復失的一切的盤算；關於自己子女文革中吃的虧，和將來自己如何加倍補償他們以特權的決心。

我本人也似乎認定一九五五年所發生的一切不幸，都完全成為過去了。當一九五五年秋我重獲自由，奔赴三門峽採訪時，心情反比過去更好。好像剛剛發生過的那種事以後永遠不會重複了。爲什麼？有何根據？我竟未曾去想。似乎這場冤案之終於被推翻，倒證明了黨是更加可以信賴的了。

我也就沒有從這場虛驚中吸取任何教訓。既然我未被打成反革命，那麼對於我的「反黨」思想的批判也就不能成立了。我沒有看到這二者並不是一回事，有一天這張牆報還會再掛出來。

總之，我一點也沒有改變自己那些被批判的觀點。這年秋季，高高興興到河南和甘肅去採訪去了。在蘭州第一座黃河鐵路大橋工地上，我聽到一個事件，就像是按我的脚本排演出來的，最適宜於表達我蓄積已久的一個思想。

從十八歲參加地下抗日鬥爭起，我曾一次次推遲文學創作的打算。此時，一種前所未有的創作衝動在我心頭衝擊。我覺得我能說出前人和別人沒有說出的話；我覺得中國社會好像在期待我的這一篇作品，我必須用自己的筆刺破和掃蕩長期籠罩在中國上空的某種煙霧——它壓抑著人們的創造精神，並使人們的視野變得朦朧起來，把似是而非的東西看作真理。

我來到蘭州郊外的黃河岸邊，已是冬天，剛剛下過一場大雪。作爲《中國青年報》的記者，在黃河上建造第一座鋼拱橋這件事本身，就值得一寫。我的目的至多是再寫一寫建橋青工，想不到此行竟是我幾年新聞生涯中收穫最大的一次採訪。

橋樑工程隊副團委書記姓關，好像一見如故，極爲熱情地接待了我們。當天晚間，我們在既是他辦公室又是他的住室的簡陋土屋中談到深夜。他是一個有思想的人，觀察力很敏銳，一個夜晚的談話，涉及到橋樑隊的幾個人物和黃河大橋工程史上的一個戲劇性曲折，我一面細心地聽，鼓勵他繼續說下去，心中一面不斷歡呼：太好了！這些人，這個故事，爲我幾年來鬱積在心而無機會表達的思想提供了絕妙的載體！

橋樑隊長姓羅，是一個資歷較老，經驗豐富的造橋幹部。他居功守成，不思進取，工作中牢牢固守的原則是凡事要向上級請示，「多多領會領導意圖」，少拿主意，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由此造成的損失，他統統歸之於「缺乏經驗」。他的哲學是：無論犯了多少錯誤，付出多少不必付出的代價，「成績還是主要的」，「有了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就只須不犯錯誤便可」，「不犯錯誤，就是勝利！」因爲無論如何「橋還是造起來了！」青年工程師、三分隊長曾剛則是一個全然相反的人物。這是一個新型的工程師，關心、熱衷並善於組織工人和啓發他們的創造精神，力求以最高效率、最低成本造橋，有時不免要冒一點風險，這就和羅隊長必然發生了衝突。當曾剛不得不把爭端提到上級面前，寫信批評羅隊長時，衝突就更劇烈了。一九五四年秋季，洪水提前到來，羅隊長既無準備，又不採取應急措施，而是一味請示領導，以致貽誤時機，使鋼拱大橋上一個施工

中的橋墩被洪水沖垮。曾剛主持的另一座橋樑，則因積極想辦法，採取萬全的防險措施，同時科學地組織工人搶修，和洪水搶時間，終於把橋墩修出水面。結果，受到懲罰的卻是曾剛，他的罪名是「缺乏組織性紀律性」，他被調離橋樑隊，去水泥廠工作了。羅隊長保住了官職，繼續「步步緊跟領導意圖」，追求「不犯錯誤」的「勝利」。



第五章

我看見危機，同時走向自己的危機

一九五六年三月，我又一次陪同人民日報社長鄧拓出國，到華沙參加國際新聞工作者協會的理事會。途經莫斯科時，我會到高爾基文化公園一帶走了走。這是斯大林死後的第三個春天了。早春天氣，那年暖得很早，街頭已見少女們穿上春裝了。望著春風吹拂着少女身上絲綢般輕飄飄的白色風衣，彷彿是政治春天的信號，我覺得莫斯科的氣氛已經輕鬆得多了。這時，我還不知道克里姆林宮裏正在開着蘇共二十次黨代表大會。

華沙的氣氛就顯得低沉一些了。不知是否同貝魯特剛剛逝世有關。商店的櫥窗裏擺着他的相片，上面掛著黑紅二色的絲帶。市內已見不到戰爭留下的廢墟。蘇聯援建的華沙文化宮，造型風格酷似莫斯科大學，和四周的建築不大協調。

鄧拓早已是聞名於中國新聞界的才子。他出身福建省的書香門第，十一歲起便能賦詩。抗戰期間曾任晉察冀邊區的《晉察冀日報》主編。我是在一九五四年才和他有個人交往的。因為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年間我曾陪蘇聯青年代表團走了大半個中國，並為他們的多場演講作翻譯，北京的知識分子和幹部覺得我口譯很好，對我印象頗深。我可能有一點口譯的才能，那是一種緊張的工作，因為有幾個過程——理解、記憶、重新組織必須同時在你頭腦中進行。我年輕，認真，並且有過講課和演講的多年經驗，因而比較善於表達，大約也起了一定作用。一九五四年春，蘇聯《真理報》總編輯謝皮洛夫(Shapiro)邀請《人民日報》派出一個代表團赴蘇訪問，鄧拓便想到我，請我擔任翻譯。

以鄧拓的資歷、地位和才氣，他仍然保持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風度是不容易的。這使我敢於向他提出不便向不熟悉的長者提出的問題。在莫斯科的旅館裏，有一次我請他解答我的一個疑問：

朝鮮戰爭究竟是南朝鮮先開火，還是北朝鮮先動手的？他毫不猶豫地作了答覆。他的坦率和不顧及可能不利於他的後果，當時使我頗為感動。

他也不向我隱瞞他心裏的煩惱。有一次，我向他談起《人民日報》編得不好——黨政領導機關的文件太多，很少見到關於中國下層實情的報導和人民群眾的呼聲，根本沒有對領導機關的批評。他同意我的看法，表示他自己也不喜歡他主編的這張報紙。爲什麼不能辦得更好呢？鄧拓向我坦露了他的苦衷：「蘇聯的《真理報》，總編輯向來都是政治局委員，比如布哈林，現在的謝皮洛夫。我呢，連個中央委員都不是。政府的部長很多人都是中央委員，他們每個人都可以批條子，讓《人民日報》發表他們的講話、文章或會議報導，我明知那些東西都是讀者最不喜歡的，可是我拒絕得了嗎？」

還要經過很久以後，我才能明白，鄧拓的這些話不僅僅是因為不能較為獨立地辦報引起的，這裏還有一個知識分子在黨內的地位問題。在兩年以後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鄧拓依然未能進入中委，連資歷比他更老的周揚，主管文藝和意識形態工作歷史最久，這方面黨內再無修養比他更高的人物，也是始終連個中宣部長都當不上，到一九八二年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才被選爲中委。按工作需要和他個人能力，早該是政治局委員了。

這次訪蘇的新聞代表團，除《人民日報》的幾位編委外，還網羅了中國幾大省市報紙的總編輯。後來成爲「四人幫」一員的張春橋，此時是上海《解放日報》總編，也在其中。此行主要目的是向《真理報》學習經驗。時間表排得很滿，每日上、下午各一場，由《真理報》各部門主任介紹工作經驗，主要翻譯是我。

代表團的成員們大都認真對待這些經驗，準備歸國後用到自己的報紙上去。鄧拓看來却並不滿足。顯然，憑多年辦中國黨報的經驗，他並不認爲蘇聯的一套經驗很完美。他在思考更深一層的問題：報紙的使命，它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是什麼？他企圖尋找另外的道路，因此，他委託我去向蘇聯人打聽，能否找到西方國家新聞學的理論書籍，然而遺憾得很，沒有，一本也沒有。兩年以後到波蘭，鄧拓又一次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我本以爲在這個更靠近西方，比較自由化的國家裏，鄧拓的需要應該得到滿足了。但四處搜尋的結果，竟然也大失所望。

這時，波蘭的新聞界已在發生劇烈的變化，鄧拓和我在會議之暇訪問了《工人論壇報》和《華沙生活報》編輯部，聽到的情況是令人興奮的。哥穆爾卡放寬了新聞自由，報刊對奉行多年的蘇聯式新聞制度有了一些突破，對於黨和政府工作中錯誤、缺點的批評更大膽了，不再把報導限制在狹窄的行政、經濟領域，而是把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收入視野，在這些問題上許多非正統的觀點也公開表露了。對於西方社會狀況，開始了客觀的真實報導，不再局限於「失業、罷工與犯罪」了。黨中央機關報《工人論壇報》上竟設了一個專欄，定期報導資本主義各國科學技術的新成就。僅這一小小突破就令我驚訝。在中國的報紙上，這也是絕不能允許的。

我走進華沙街頭的閱報室，窗明几淨，也相當寬敞。報架上陳列著多種外國報紙，任何市民可以自由選閱。不但有外國共產黨的《人道報》、《團結報》等，還有《泰晤士報》、《世界報》、《先驅論壇報》等我們歷來視爲反動的報紙。文化和思想上的開放之大膽，超出我的想像。那時我沒有想到，再過三十年，中國仍未能邁出這一步。

我們在記者俱樂部就餐。會議的後期，常見一些波蘭同行竊竊私語，面露掩蓋不住的喜色。

有時還見到他們在悄悄傳交一個大信封。後來才知道，那就是赫魯曉夫關於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波蘭的同行向我簡要介紹了很多這本文件的內容，我為斯大林的暴行震駭不已。

會後，我們參觀了幾個城市。一個晚上，在但澤港（戰後稱做格但斯克）的海員俱樂部我見到一個年紀不輕的波蘭女人，面前放著一杯咖啡，獨坐在那裏久久不走。我猜想她在等待著外國海員顧客。中國也將向更多的外國商船開放。長時在海上航行的海員，停泊時不會不去尋歡作樂的，但以中國在兩性問題上的嚴格戒律，非但政府不會允許娼妓的存在，老百姓也不會准許的。怎麼辦呢？我認為只能讓外國海員規規矩矩在中國海港過點禁慾生活了。這時和以後一段時間，蘇聯在這方面的限制也比較嚴格。記得就在這一年秋天，《文學報》還刊載過一首詩，批評波蘭的姑娘為一支口紅或一雙絲襪而出賣自己的貞操。但是不出幾年，六十年代初期的蘇聯報紙上已透露蘇聯有賣淫現象了。

「社會主義制度下不會有、也不准有賣淫行為」這條不成文的法則，當時在我頭腦中還很牢固。

從波蘭返國途中，《真理報》請鄧拓到莫斯科郊區休養，我則受V·奧維奇金之邀，到庫爾斯克他的家中作客。

這時，距斯大林逝世三年，蘇聯已經發生一些變化。文學界的新潮流——主張作家寫生活中的陰暗面和干預生活的潮流已經興起。走在最前面的是奧維奇金。他從三十年代起開始寫作，但並不多產，也沒多大名氣。斯大林逝世後，從一九五三年他發表批評蘇聯農業政策的特寫《區裏的日常生活》起，一舉成為蘇聯最引人注目的作家。

接連幾天，白日，奧維奇金在他的書房裏用打字機寫作，我則坐在他的客廳裏閱讀他收到的各地讀者來信。很多信，是斯大林時代冤案受害者向作家傾訴自己的悲慘遭遇的。另一些，則是揭露農村和城市裏的各種弊端，希望奧維奇金去採寫的。讀者們為他近幾年的作品向他表示感謝，敬佩他的勇氣，勉勵他繼續寫下去。我被讀者對作家的這種感情深深打動了。來信之多，我也印象很深。

每天晚飯後，我便和應奧氏之邀而來的庫爾斯克市的作家們交談，有時是和奧維奇金長談。他對中國的情況仍然十分關注，對我們的國家有很深的感情。

一九五四年秋季，我曾陪同他和一群蘇聯的新聞工作者走遍大半個中國，為他們作翻譯。在我同他會面以前，已經讀了他一九三〇年代至一九五三年所寫的主要作品。他在蘇聯實現農業集體化後不久，就公開揭示了農村中的重大弊端。在他戰爭時期所寫的一部中篇小說《致以前線的敬禮！》裏，他通過一個負傷返鄉休養的蘇軍戰士寫給前線戰友的信件，對於農村幹部依恃特權為非作歹和代替出征的丈夫成為農村主要勞力的蘇聯農婦的艱重負擔，作了痛心疾首的揭露。斯大林死後，奧維奇金成為蘇聯文學新潮流「反對粉飾現實，大膽干預生活」的帶頭人。他的第一篇特寫《區裏的平常日子》（中譯本書名為《區裏的日常生活》）揭露了蘇聯農村體制與農業政策的弊病長年來對於農村發展的破壞，刻劃了後來成為蘇聯通用代名詞的一個區委書記——官僚主義者，在全國引起轟動。從此，他的特寫幾次在《真理報》的顯要位置全文刊載。我聽到一個傳說：一九五三年當蘇共中央召開九月全會通過改革農業政策的重要決議前後，赫魯曉夫看到奧維奇金的作品，曾驚奇地對參與決策的幾個人說：「怪呀，這個人怎麼就像參加了我們的討論呢？」

他寫的這些，正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啊！」

奧維奇金本人的外貌與風度就像個農民。他長期生活在蘇聯農民中間，以致對中國的農民也懷有深厚感情。他為中國人民肩負的沈重歷史遺產和生產力的落後而嘆息，而當我陪他參觀四川成都郊區一個農業合作社，他聽到我們在農村分配上的工分制時又如獲至寶，認為這種分配制度可以刺激中國農民的勞動積極性，不致如蘇聯農民那樣陷入長期萎靡與痛苦的一個保證，認為對今日蘇聯也有價值。

一九五六年訪問他時，我意外地聽到他對於赫魯曉夫對他的冷淡的不滿。他說他寫過幾封長信給赫魯曉夫，提出蘇聯社會改革的方案，包括把區一級農村工作的幹部的工資與農業生產收益掛鉤的建議，但赫魯曉夫却一個字也沒有答覆！像赫魯曉夫這樣一個改革家對於在蘇聯社會有巨大影響的作家，態度居然也如此傲慢無禮，我感到驚訝。

「難道在我們這類社會主義國家裏，黨政領導人就不需要聽聽作家的聲音嗎？」我不解。

他送我到庫爾斯克車站。臨別時他緊緊擁抱我，還掉了眼淚。不會是因為預感到這竟是我们們的訣別吧！

在北京機場，我的青工部的兩位編輯迎接了我。許是因為當時出國還是一件大事，方規定了這種禮儀？或是由於我的幹部級別已達到一定水平？總之我對於這種禮遇式而非自發性的歡迎，感到大不舒服。朱志焱一如去年此時（那時我們兩人還都沒有挨整），看不到一點無辜受難半年的痕跡。樓靜波興奮地告訴我：「在橋樑工地上」發表了，反應非常熱烈，一片讚揚。《人民文學》

主編秦兆陽還特地為這篇作品寫了按語，向讀者推薦。

我並未期待它會產生這樣大的效果。我自然很高興，但也頗鎮靜，並不覺得有什麼了不起。後來當我又聽到更多的讚美聲時，反覺得有愧了，因為自知我至少在文字表達能力上是有弱點的。也可能是由於在我心中，我把目光投向了未來，想著我的下一篇作品。

這種狀況，二十三年之後又重新發生一次。我也不明白這是一種什麼心理。是小時便有的那種自卑嗎？

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團中央機要室去看赫魯曉夫的那個報告。規定必須是十三級以上的黨員幹部方允許閱讀，我這時剛剛晉升一級。那時還不知道，從此我也躋身於「高級幹部」之列了。

在我的一生中，再沒有第二個事件令我這樣震驚過！我讀着赫魯曉夫關於二十年前那幾起大屠殺的敘述，激動得幾乎顫抖起來，我為那些無辜的革命元勳和將領的慘遭殺害，悲痛得流下熱淚。仔細讀了兩遍之後，我心中的很多事改變了原來的樣子。

原來蘇聯給我留下的印象總是不那麼晴朗和輕快，並不是它常常被冰雪和烏雲所籠罩而造成的，而是由於蘇聯人長期生活在壓抑和某種恐懼之中。從一九四九年起，那些被安排來對我們歡迎的青年男女，那些陪同我們工作、相互已經發生感情的青年翻譯，為什麼相別時一概不肯給我們留下通信地址呢？原來是他們還未從父輩慘死的記憶中甦醒，唯恐同外國人的交往會使自己有一天被疑為敵人的間諜而慘遭不測。原來對德戰爭初期蘇聯遭受的慘重損失並不是不可避免的。我對俄國歷史上代又一代精英為了從沙皇的黑暗專制下解放俄羅斯而前仆後繼付出的沉重

代價是比較熟悉的，因而對於革命後斯大林的血洗就越發難以理解和不能容忍。而這個暴君多年來竟被推到至高無上、全世界共產黨人都必須頂禮膜拜的位置。

不久，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件，繼之又是「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讀過後，我覺得不滿足，因為對斯大林沒有給予充分的否定。對於毛澤東後來多次講過，並至今決定著中國共產黨對斯大林與對蘇聯那段歷史評價的所謂「三七開」，即斯大林有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的提法，我始終不以為然。

同時，對斯大林犯下的罪惡又始終不許公開，我也是不同意的。赫魯曉夫的報告對於全世界大部分地區早已不再是秘密，在中國（還有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却還是國家級機密，絕大部分共產黨的幹部對於影響蘇聯和各國共產黨深重的那一段歷史完全無知。一年以後中國有的大學生從《紐約時報》上譯介它，仍然是一個罪過。這是為什麼呢？林希翎因為從胡耀邦秘書的手中借得這個「秘密文件」傳播了其內容，而使那位秘書被打成右派；這也是林成為右派的一個原因。

是出於什麼動機，基於何種政治需要才這樣做的呢？我當時未去細想。其效果倒是很快就察覺到了。很多黨員，包括黨內知識分子，只知赫魯曉夫否定了斯大林，却不知否定了什麼，同時又見中國共產黨人並未採取同樣態度，從而懷疑赫魯曉夫，甚至視之為異端。一九五七年夏季，當電台廣播蘇聯處置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反黨集團的新聞時，《中國青年報》的黨員們大都反對赫魯曉夫而同情被處置的反黨集團。這種反應的一致性，使我一驚，因為他們對於蘇聯黨內鬥爭的實情知之甚少。這時我是站在赫魯曉夫一邊的，我想，這和我讀過他的秘密報告不會沒有關係。不久，傳來西方各國共產黨內許多黨員退黨的消息。這個動向和赫魯曉夫推行的一套新的國內外

政策後來統統被視為「修正主義」。這種思想，能夠在二十年中深入中國人心，大約和中國人依然視斯大林的一套為正統，甚至把斯大林看作傑出的革命領袖與馬克思主義者，自然是分不開的。到八十年代中期，斯大林的巨幅畫像依然屹立在天安門廣場，外國人認為是一大怪事，而中國人却習以為常。

這和另一些情況是矛盾的：毛澤東對斯大林從來不抱好感。斯大林曾多次干涉中國革命和黨的內部事務；他長期懷疑毛澤東是個民族主義者；毛澤東一九五〇年訪蘇時他曾故意輕慢；中國解放後他的對華政策中又有明顯的大國沙文主義傾向。此外，尤其奇怪的是斯大林死後毛澤東想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徹底否定斯大林對他十分有利的，然而他却始終不肯。箇中奧妙，他的深謀遠慮，也許只有到中國人徹底認識毛澤東以後才能了解。

我本來是自幼崇拜蘇聯，奉蘇聯為正統的。赫魯曉夫的報告粉碎了我對於斯大林的迷信。那年夏季，我聽到毛澤東「論十大關係」講話的黨內傳達，在此之前，毛已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學術發展方針。但是這修改後的方針，給文藝界的自由，主要仍然限於形式與風格上的多樣化，比斯大林時代蘇聯人所享有的創作自由還差一截呢，因而我的反應相當平淡。《論十大關係》則對於斯大林經濟思想的一系列重大原則做了根本修正，甚至完全顛倒，例如工業與農業的關係、重工業與輕工業的關係等，故使人耳目一新。毛澤東對於斯大林權威的蔑視和大膽創造的精神，令我敬佩，他的威信在我心中立即大大增長起來。我不無自豪地並且相當激動地認為：中國終於找到了自己的一條路，而毛澤東不愧為天才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領袖。

然而與此同時，我的目光又盯着蘇聯所發生的一切，那裏的「解凍」事實上也走在中國的前

面。我訂了蘇聯幾種文學刊物與報紙，密切注視蘇聯文學界發生的變革。我和蘇聯知識界一樣為《新世界》發表的杜金采夫的長篇小說《不僅是靠著麵包》喝采，並大力向中國推薦。有趣的是它不久後在蘇聯就成了禁書，而中國倒正在翻譯。待到中國出書時，則反右派運動已經開始，故只印行了區區一千冊，作為「內部資料」靜臥在為數有限的圖書館裏，中國的讀者、甚至專業作家，三十年後還大都不知道此書的存在。

二十年後，當人們結束了長達十年的動亂後，撫今追昔，都懷念一九五六年，認為那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好的一年，甚至稱之為「黃金時代」，只要如果不發生一年以後的反右派運動，中國就會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了。

這一年確實是生機盎然。中國共產黨充滿自信。從年初起，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出乎意料地順利完成，幾乎未遇到資本家的任何抵抗。毛澤東批評和糾正了前一年農村工作的右傾保守後，高級農業合作社全面推開——取消了農民按投入初級社土地、牲畜與農具分得紅利的制度，從而使農民告別了私有制。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建設以更大規模和更高的速度鋪開了。這一切，表明我們將比原先的預料更快地建成社會主義。

一九五六年無論對於中國或對於我個人，都是極其重要的一年。它本來很可能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這是曾經孕育着巨大希望的一年，同時，最終導致大悲劇的那些危機也在這一年顯露出來。

從這年年初起，全國城鎮熱氣騰騰，敲鑼打鼓走上街頭歡慶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

完成。一月十四日我的一篇報導在《中國青年報》頭版發表，第一句話就是「今天，北京前門外的一個資本家爬上梯子，摘掉他自己商號的牌匾。那是幾十年前他自己掛上去的。」通訊的結尾轉錄了幾個資本家的詩，對於自己終於不再是資本家表示衷心的喜悅。我當時認為資本主義在中國被和平地消滅，是一大創舉。我甚至想寫一本書，書名是《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消亡》。

我忽略了兩個重要事實（我並不是不知道）：資本家個個都知道，既然毛澤東決定要出此一舉，又有誰能阻擋得了？為什麼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呢？第二，共產黨的江山還長著呢！「資本家子女」，這頂帽子將禍及幾代，莫如損失幾個錢，消災禳禍，把子孫後代的階級成份改過來。

資本主義雖然不好，少了它又好像還不行。「三大改造」（農業、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還沒完成呢，那年夏季，北京的豬肉價格便開始上漲，雞蛋在國營商店裏也缺貨了。全國各地輕工業品和手工藝品的很多品種從商店中消失了。中國在解放後七年，第一次出現了新生的乞丐。

那是我在這年七月赴哈爾濱採訪的旅途上發現的。

在長春車站餐廳裏，見到一個年輕人躲在門內屏風後向餐廳裡探頭探腦。我吃罷飯，付了帳走開時，便見那相貌相當清秀的青年人緩緩走向餐桌，和十年後中國多處見到的乞丐不同，他斯文而靦腆地取走了我剩下的飯菜。我不禁一驚：原來是個乞丐！建國以來，乞丐早已消失，怎麼會有新生的乞丐出現呢？我等他吃完我的殘羹剩飯，走過去和他搭訕起來。他是從安徽省的農村來的，家鄉去年收購糧食過頭，高級合作化又使一些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下降，因而出現糧荒，他是到東北逃荒來的。

六月，哈爾濱的初夏，這裏應該是很美的。但是幾年不見，哈爾濱變了很多，它本來的特色更加黯淡了。保留俄國特色最多的中央大街，原來各色各樣的俄國招牌，幾乎一律塗上了紅色油漆，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表示這些商店現在都變成社會主義的了。在夏日陽光下，油漆紅得分外刺眼，也使這種單調令人更難忍耐。

街上行人中，外國人很少見了。赫魯曉夫取消了斯大林時代的禁令，一九四五年後加入蘇聯國籍的俄僑，可以回國了，也可自由選擇其他國籍，只要那裏允許入境。許多俄國人選擇了有親戚可以投奔的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美國等國。只有極少數孤寡的人，不再願更換環境，而留下來不走。

街上行人的衣着，色彩鮮艷多了。哈爾濱是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加以這裏受俄國文化的影響，姑娘們本來就善於打扮，因而一九五六年黨所提倡的衣着多樣化在這裏實現得最早。同八年前我離去時相比，物質生活也明顯地有所改善。飯館和酒店中，每天傍晚都有很多青年聚集在一起豪飲啤酒。

但是我仍然覺得這個城市缺少點什麼東西。或者說，一九四六年我返回哈爾濱時那個戒嚴時期的某種氣味還繼續保留著。它是過於寧靜和過於秩序井然了。中央大街上牌匾的一片紅，是帶有象徵意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生活，全都在黨的控制之下。這裏有兩張日報，編輯們自己都討厭它們每天重複着同一種聲音。

一九三九年，在這個已被日本人占領八年的城市裏，關沫南還可以自費出版了兩本小說集，現在作家們都沒有這種自由了。黨把社會生活的每個毛孔都管了起來，不給民間私人活動留下任

何空隙。

哈爾濱已從一個只有少許輕工業的商業城市，變成一個擁有龐大重工業的城市，十年間人口從八十萬猛增一倍。但是比工業和人口增長更快的，則是黨委和政府的官員。十六年前我離開這裏時，市政府的全部機構只占據一幢不大的二層樓，官員人數我想不會超過二百人。現在，人口增長為那時的四倍，政府人員却增加到三千七百餘人。加上黨、團、工會等機構，則達五千餘人。如果把各基層組織中的專職幹部也計算在內，數字就會更加驚人。這裏還未把公安部門的四千餘名幹、警包括在內。

黨政機關的過於龐大，已經引起注意，幾年前精簡過一次，未見成效。我到這個城市時，又一次在設法精簡，但遇到很大阻力，各部、局的領導幹部都以爲自己的部門是不可缺少的，也都過慣了比較輕鬆的上層生活，不願到更加忙碌、辛苦的下層去。

這種努力，還將繼續進行三十年，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政機關的部門將越來越多，官員的數目也越發膨脹，並且級別也越升越高。

弊病已相當明顯。分工越細、人員越多，辦事效率反而越低，那時我已聽到一種評價：「管事的人越多，辦事的人越少。」這是因爲：當下級機關必須在更多的上級機關的指揮下工作時，它們的自主、能動性就越少；而上層機構的相互重疊，又使它們儘管都可以發號施令，各自承擔的責任却減輕了。對於這種狀態的非議——「一杯茶、一支烟，一張報紙過一天」，這時已經出現。

全國都把注意力放到工業上，主要又是重工業。一九五六年是一個高峯，從中央到基層廠礦與建設工地，都照例熱衷於速度，它的標誌就是產值。工人的熱情仍然很高，也仍然很聽話。爲

了完成計劃，常常必須連續加班加點；有些青年工人甚至不經領導同意，偷偷加班幹活。同時，業餘時間還必須參加各種會議，定為制度的文化學習也不能缺課。疲勞，過度疲勞是普遍的。這就使工傷事故增多了。

你必須知道工人們的生活情況，才能充分估計工人能保持這種勞動積極性是多麼不易。哈爾濱的物價指數那幾年每年上升將近百分之十五，而工人的工資却已有幾年沒有提高。拿二、三級工的工資而做的四、五級工的工作的事，相當普遍。幾年收入不變，甚至臨時工幹了七年仍不能轉正，工人們就只能不斷壓低自己的飲食水準了。有些人只能吃糧而不能吃菜。一九五六年是中國全國衣飾開禁（並無禁令，而是隨戰時傳統延續下來的風習，穿得越樸素，才越「進步」）的一年，到處穿起花衣服和裙子，但哈爾濱的青年女工有些人却必須積蓄幾個月才能買一塊花布。

像勞動力必須由國家統一調撥，原材料必須統一分配一樣，工資和獎金的分配也是企業不能完全自主的。但是這裡有一點不同，企業在提高職工的工資上權限受到限制，要壓低工資却是可以自主的。企業的工作成效，以上繳國家利潤的多少為定，壓低職工工資，便可降低產品成本，企業領導人就可以上繳更多利潤，從而博得上司的好評。

但是當我聽到團市委的朋友告訴我下述情況時，我仍然不免感到震驚：「我們成天對青年工人講，他們是國家的主人，應該發揮主人翁精神，但是在一些工廠裏，工人根本不把工廠看作自己的。已經出現多起工人盜竊工廠物資的情況。當然，這也是因為他們生活太困難了。工人很有意見，但是市委派出的工作組，甚至省委派出的工作組找他們，他們都不肯談。見到北京來的人，他們才肯談。」顯然這是由於市委、省委的人已經多次使他們失望——說了也不解決問題。我沒

料到，共產黨在這個城市掌權不過十年，已經開始失去工人們的信任。

我住到蘇聯援建的哈爾濱電機廠採訪。為了廣泛了解工人的意見，我採取了一個可能會激惱工廠領導人的做法：在食堂門口貼一個告示：「中國青年報記者劉賓雁到此採訪，住工廠招待所二二一房間。歡迎青年職工們來談。」

這種作法顯然有點越出常規。共產黨講究「通過組織」，記者去一處採訪，也要由黨委、工廠行政或團委來安排由什麼人和他們見面。張貼這種告示，就會被看作蔑視「組織」的權威，且有越過它們發動工人傾吐對「組織」不滿之嫌。一年以後，它果然成為我的一條罪狀。

幾天中間，到住處找我反映意見的總共也不過二十幾人，而這家工廠有職工近萬人。他們的不滿，用三十年後的眼光看，也都是些小事：工作安排不當，或沒有固定工作；評工資級別上不公平；住房分配上厚此薄彼……等等。

一個姓梁的青年工人，是代表很多人來找的。他話說得很慢，人也顯得很老實。若非出於無奈，是不會找人訴苦的，更不會這樣激動。他說：「我們也是人，可是他們不把我们當人看待。從技工學校畢業都兩年了——這種人工廠裏有二百多，可是到今天也沒有正式工作，老是打雜。甚至去做清潔工。我們去找幹部：工廠明明不需要這麼多人，讓我們到遼寧去行不行？那邊工廠缺很多人。不行，寧願讓我們閒得發慌。理由是：把你們放走了，萬一明年工廠的生產任務擴大了，我們到哪兒去找人？可若是不擴大呢？我們這些活人成了貨物了，長期儲備在倉庫裏。沒有固定工作，提級就沒有我們的份兒，什麼都耽誤了，比如結婚……」

可見，當時群眾與黨的領導之間的矛盾，並不嚴重。但是從我在全市了解到的情況後，已經

出現一些值得嚴密注意的跡象。一位工人告訴我：「過去出點事，總以為是階級敵人的破壞；現在一聽說出了事，馬上就責怪說：這些領導幹部是怎麼搞的！」

然而這種矛盾，它們給人們造成的不幸和在人們內心引起的苦惱，却很少有機會傳達出來。就連已經躋身領導幹部圈子的局長、處長們，都很難有說話的機會，一般市民更不待言了。奇怪的是：從上到下，各種會議却多得成災。會議很多，怎麼還沒有說話的機會呢？一是由於這種會議多是傳達和貫徹從中央以下各級領導的決定或指示的，二是即令會議的性質和內容應該包括人們各抒己見，但多年形成的風習和氣氛已經使人們不敢或不願意提出不同的意見，尤其是批評上級的意見了；甚至反映領導人不喜歡聽到的情況，也需要鼓起一些勇氣。至於工人們必須參加的會，則主要是接受上面有關生產的指示，再就是接受政治思想教育。

隨着抗美援朝戰爭的結束和階級鬥爭的淡化，對於前些年頗見成效的政治宣傳鼓動，工人們已經比較淡漠了。同時，工人們做為人的各種需要與欲望也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然而物質生活的改善却很遲緩。哈爾濱市雖也建了一些新住宅，數量很少，要七級以上的工人才能分到，青年工人幾乎沒有這麼高級別的。男青年找配偶很難，很多人必須跑回一千多里以外的家鄉去找，也很難。有了戀愛對象，又愁沒有住房。於是，發生婚前性關係以至女方懷孕的就多了起來，而老工人舊道德意識很強，這些青年就成為嘲諷和譴責的現象。所有這些現象，都很容易地被納入「資產階級思想」範疇。青年人想轉入條件較好的工廠，甚至想報考中專或大學這一類合理需要，總之對於個人有利、於社會也無損的種種要求，都被看做「鬧個人主義」，作為教育或批評的對象。至於對領導人工作中錯誤的正當不滿與批評，則往往要受到更無情的壓制。

這年秋季我到南方兩省的採訪，又證實了我在哈爾濱看到的那些弊端是全國普遍存在的。在長沙市，我走進中共湖南省委的大院，大吃一驚：一個省委機構，何須建起這麼多大樓！對照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是太奢侈了嗎？況且，究竟有多少事非由這麼多官員來管不可呢？當我走進主管工業部門的辦公室，我對湖南工業情況所提的幾乎所有問題都得不到回答時，我對那些幢辦公樓的存在就更加懷疑了。

在基層，這種「把中國的全部事情都管起來」的「黨的領導」的更大弊病——使代表這種「黨的領導」的幹部與群眾逐漸疏遠和對立起來，已經暴露出來了。在長沙，我聽說一個手工業合作社的青年黨員領導幹部王松源工作很出色，便去採訪。作為一個人，他確實很好——工作勤奮，肯吃大苦，有魄力，也有一定組織能力。但由於「上邊」下達給合作社的生產任務已到了它的人力、設備等無力承擔的程度，而從生產、政治工作到工人生活中的各種困難和工人之間的糾紛，都必須由王松源一人去解決，就使他疲於奔命了。他就是黨，而黨必須掌管一切，因而他必須說很多話。我採訪時看他累得疲憊不堪的樣子，聽着他啞啞的聲音，見他不時因頭痛而面部抽搐，很不忍增添他的疲勞。後來了解到這個不久前還是個手工業工人的人由於各個領導部門的強行要求的任務必須按時完成，他本人的能力和精力又實在應付不了繁多的事務和難以實現的生產任務，脾氣變得暴躁起來。他無力抗爭，也不認為自己應該去與「黨的領導」抗爭，但他個人作為另一級「黨的領導」却可以不顧工人的困難和不滿而向他們發號施令，向他們發洩自己心裡的火氣，於是他變了，他不再是工人們喜歡與擁戴的人了。我只好放棄原先把他作為一個先進人物報導的計劃。

我好像目睹了一個可怕的过程，當時還沒有認識到這將會給共產黨造成致命的傷害。

我走訪了湖南與湖北的幾個「社會主義改造」中由個體手工業者奉命組織起來的合作社。到處都是令人不愉快的場景：脫離市場而經由國營商業部門統一訂貨和供應原材料以後，市場上商品的花色品種大大減少了，手工業者的收入也明顯下降。人們之間不再有競爭，一切聽命於國家和依賴於國家，他們生產上的活力便逐漸呆滯了，不求有所作為而變得懶惰了。「社會主義改造」後他們的任何不滿都將不再是指向作為業主的自己，而是針對「黨的領導」了。然而他們卻又無權表達這種不滿。

我又到湖北西部山區恩施去和那裏交通運輸的主要力量——卡車司機生活了一段時間。看到和聽到的又是普遍的疲勞、工資過低、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難無人予以關懷和解決。

在哈爾濱和在南方目睹的一切，促使我更迫切地提出改革中國報紙的問題。波蘭新聞界的改革浪潮，使我更加確信我幾年來改變中國報紙現狀的主張是正確的。我決定親自去推動中國新聞界的改革。北起哈爾濱，南到湖北的恩施縣，這一年我每到一處，都要向新聞界介紹波蘭的新聞工作者如何介入生活，大膽地展開對於黨和社會生活陰暗面的揭露，推動波蘭民主化的進程。每場講演，都使本來就對自己的報紙現狀十分不滿的記者、編輯受到鼓舞。

當《人民文學》主編秦兆陽向我索取新作時，我便決定概括中國新聞界的現狀，寫一篇非紀實性的特寫，宣揚自己的新聞觀點。這年夏、秋《人民文學》雜誌發表了我的第二篇特寫《本報內部消息》。一個城市的黨報，在故步自封、唯領導之命是從而又作風蠻橫的總編輯的領導下，在一個過早衰老、明哲保身的總編室主任的經營下，辦得遠離生活，索然無味。年輕的記者編輯們

試圖改變辦報方針，終歸無效。一天，當實行新制度——報紙不再主要靠公費訂閱而須向群眾零售時，終於暴露了危機：幾乎沒有人想看這張報紙，它沒有讀者！

由於這篇作品更尖銳，觸及了「黨的領導」的要害，實際上是提出了言論自由的問題，反響比《在橋樑工地上》要強烈得多，反對者也多了。

《在橋樑工地上》是一九四二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解放區作家的主要任務是「歌頌光明」而不是「暴露黑暗」以來第一篇批判共產黨本身問題的作品，因而儘管調子相當溫和，仍然喚起全國注意。《本報內部消息》中的批判就尖銳得多，它提出了新聞制度必須改革的問題（三十三年後的今天，中國的這一問題仍未真正解決），因而引起更大震動。尤其在新聞界，可以說它在每家報紙、電台的編輯部裏都引起了震動，鼓勵許許多多新聞工作者投身到新聞現狀的改革中來。

這兩篇作品，使我一舉成為中國文壇的名人，被視為「革新者」。這一年全國幹部普遍提級，我成為行政十三級幹部，從而進入了「高幹」的行列。在評定「高級知識分子」時，我又成為《中國青年報》唯一的「高知」。我到處聽到的都是祝賀與讚揚。這一切，固然使我高興，但我的生活方式，除了外出採訪開始乘「軟臥」、吸高級香烟外，幾乎沒有發生什麼變化。我有用不完的收入，但外出採訪，我仍然到最普通的飯館吃北方食品中最廉價的飯菜。我甚至從未買過原裝的瓶酒，仍然以喝九角錢一斤的散裝白酒為滿足。

我把相當於我每月工薪一半的錢，按月寄給大姊。她的丈夫在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中自殺後，她以一個小學教員的微薄薪水，難以養活五個孩子。她的長女早已住在我家。後來，我和在北京

當外科醫生的弟弟又把她第二個女兒接到北京來上學。我幾乎從來沒有孝敬過過早去世的母親，就讓我在姊姊身上彌補這個遺憾吧。姊姊曾為這一家人的生計獻出她的青春和她的幸福。

每聽到別人讚揚我，我心裡都感到羞愧。三十一歲已不年輕。無論作為一個記者或作家，我都缺乏很多知識。一九五四年一位蘇聯朋友送我的一本書，不時在提醒我：一個蘇聯中學生必讀的某些世界名著，你還沒讀過呢！讀過的又怎樣？我讀得最多的是俄國和法國十九世紀一些作家的作品。那都是作為一個普通的讀者去讀的。很多作品不再讀一遍，就很難吸收到你寫作上所需要的東西。文學之外，我還必須讀很多哲學、歷史學方面的著作。還有每周我必定要從國際書店抱回的新書呢？在《中國青年報》我是有名的愛看書的人。甚至在開編委會時，當我對某人的發言不感興趣時，我也會偷偷地或公開地打開一本書。我知道會有人說我閑話，但對不起，顧不得那麼許多了，時間實在太少。

蘇聯的「解凍」，也使中國的政治氣候溫暖起來。斯大林逝世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失去了一個領袖。這對於中國以後二十年政局也產生了影響。毛澤東在這一年提出在文化思想界推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自由化方針，和他《論十大關係》的講話，都表明他要帶領中國走一條不同於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

文學界曾長期禁錮於只准「為政治服務」和「寫工農兵」和謳歌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鬥爭與建設成就，現在有些鬆動了。繼我的《在橋樑工地上》之後，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引起了轟動。他刻畫的一個人物——黨區委裏的那個革命意志衰退的官僚劉世吾，

將進入中國當代文學人物的永久性畫廊。作家們開始寫對現實批判性的作品了，私人生活也開始成為描寫對象。

共和國成立後三十年間唯一一個自由化季節降臨到新聞界。報紙上出現了批評和揭露。報導取向開始擴及到政治生活以外群眾所關心的社會領域，新聞主題增多了。

然而這一切都短暫。這年秋季波蘭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使中國緊張起來。對於自由化本來就心懷不滿的黨內保守人士開始吹起冷風。一九五七年一月同時發生兩件事：劇作家陳共通等四人在《人民日報》頭版顯要位置發表一封信，驚呼文學創作已走上邪路，必須回到舊秩序上來。在《中國青年報》編輯部舉辦了一次座談會，討論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目的是很明顯的：開會前給每人發了一份剛從印刷廠拿來的王實味寫的散文《野百合花》作參考。它一九四二年被判定為反革命「毒草」，作者因而喪命。

我參加了這次討論會，默默聽着與會者——報紙的總編輯、出版社的社長、團中央宣傳部部長和中共東四區委副書記（王蒙就在那裏工作，小說寫的就是那裏發生的事情）等人的高見：「不真實」。「是向黨進攻」。「心裏的感情比寫出來的還要狠」。「危害性超過了王實味，與蔣介石和匈牙利的裴多非俱樂部相近」。「是挑撥與煽動人們起來反黨」。

會議接近尾聲時，《中國青年報》總編室主任提出一個倡儀：《本報內部消息》也可以討論討論嘛。那是我寫的特寫，揭露黨把報紙變成了非報紙從而使自己和報紙一起脫離了群眾。我寫了一個總編室主任，是個革命意志衰退的黨幹部。今天發言的這位總編室主任懷疑我是以他為原型的，故此在發言中含蓄地指責我說：「一個人對同志應該與人為善。」

記得我似乎沒有發言。我已把自己的意見寫成文章，發表在三月號的《文藝學習》雜誌上了。我爲王蒙辯護，文章的題目是〈這是無情却有情〉，意思就是：批評這個黨和這個社會的弊端的人，並不是出於惡意或仇恨，正因為愛之愈深，才責之愈切。

我在爲王蒙辯護的文章裏，批評那幾位攻擊一九五六年以來的文學作品「寫壞人壞事的多，寫好人好事的少」以致使讀者對中國現狀「不滿和失望」的觀點，認爲王蒙的這一類小說絕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舉出我親自過問過的一個案件爲例——福建省一個供銷合作社的年輕女打字員章含鳴遭到合作社副主任的長期侮辱、迫害，三十幾次到中共地委告狀，直到北京上訪，仍然不能伸張冤屈。還說明生活中的矛盾已經比戰爭和階級鬥爭時期複雜得多，文學應該幫助讀者去認識生活和參與鬥爭。那個供銷社有幾十個人在副主任的威脅下參與污蔑、審訊章含鳴。後來章含鳴雖然恢復了名譽，但犯罪分子李副主任並未受到懲罰。應該使這些人，包括那些雖未參與迫害、但在事件發展過程中保持沉默的人看到自己的道義責任。王蒙成功地塑造了劉世吾這樣一種人物，使一些與劉有同樣缺點或同樣身分的人不悅，但「與其埋怨作家擾亂了自己的安寧，倒不如去責備那擾亂了作家安寧的東西」。

這兩件事很重要，說明毛澤東尚未發出信號，已經有人自發地要搞一場反右派運動那樣的事情了。不出一年，我和王蒙果然都被定爲右派分子。



第六章

我墜入爲百萬人設好的陷阱

我不記得在這以前或以後我的一生中有過如此歡欣和振奮的時刻。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使他在心目中的威望升到了最高點。在《中國青年報》的記者和編輯中間，反應也同樣熱烈。好像中國歷史上一個新紀元即將開始了。

主題是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他的講話，等於是宣告階級鬥爭的時代已經基本結束，人民內部矛盾（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也列入此類）則上升到主要地位；而在這一類矛盾中，又主要是黨與群眾之間的矛盾。這就等於說：必須把黨放在一個接受監督的地位；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也應成為經常的頭等大事。毛澤東還鄭重宣告教條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重申雙百方針；主張開展批評，老幹部也不能拒絕批評。對於建國以來第一次出現（也許是引起重視）的一系列罷工罷課事件，他反對鎮壓和壓服，認為首先應克服官僚主義。

用現在共產黨的語言來說，這就等於是毛澤東親自出面宣布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當時我們的感覺是如此。我後悔我不該把最高國務會議的那張票給了我的副手，失去親逢這一盛舉的機會。

毛澤東所說的話，大體上也就是長期來鬱結在我心中未講出的話。聽了毛的講話，我心中幾年來逐漸增長的對於黨內特權現象、官僚主義與保守傾向的憂慮煙消雲散了。北京的空氣和知識分子的心情頓然發生了變化，從天空到土地都顯得可愛多了。因為毛澤東實際上又是在提倡擴大民主，在意識形態領域實行自由化，這樣，我這個在新聞與文學領域工作的人就可以大有作爲了。

第二個月，我到哈爾濱和長春採訪。一個情況使我驚異：地方黨委對於毛澤東的講話的態度與知識分子迥異，他們抱等待和觀望態度，並不急於行動。哈爾濱市委還在大力批判資產階級思

想，市書記並且說官僚主義也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所以反對資產階級也就反對了官僚主義。他還在繼續壓制報紙上對於黨的幹部特權現象的批評。

另一件我難以理解的事是對毛澤東的態度與意圖竟有兩種全然不同的理解。三月間哈爾濱與長春都在傳達毛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參加過這次會議的人，有的認為毛的講話是要在全國反「左」，反教條主義，另一些人則以為不然。毛在講話中批評了一月初在《人民日報》發表反對文學藝術自由化的陳其通等人。但後一種人卻認為這種批評並不是反對他們的意見，不過是嫌他們動作太早、太笨拙了。

三十一年後我重讀毛關於兩類矛盾的講話（不是經過大修改的公開版本，而是當時的記錄），才發現我們當年只注意了它的主要論點，而忽略了隱藏在講話中的另一方面的東西。比如他儘管對斯大林的教條主義很不客氣，但仍堅持對他「三七開」；他把民主貶低為一種手段，並且認為「大民主」只能用來對付敵人，同時不承認資產階級國家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他並未承認一九四九——一九五七年中國共產黨的工作有什麼重大錯誤，認為肅反和反對胡風集團的運動並無失誤，甚至比其他國家的黨好得多——「蘇聯太左，匈牙利太右」，「我們」則只是歷史上犯過「左」的錯誤。他兩次批評電影評論家鍾葉①，認為鍾關於電影界嚴重問題的文章是「否定一切」，「台灣很喜歡」。他對於知識分子的偏見並沒改變，他在承認共產黨幹部文化水平不高，會犯錯誤之後，立即

①著名電影評論家與理論家，他發表於一九五六年年底的論文《電影的鐘鼓》對於解放後教條主義的束縛造成中國電影業的衰落提出銳利的批評，他後來因此被打成右派分子。但事實上那篇文章却是應周揚的要求，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寫成的。反右運動後對鍾施加野蠻壓力，不准他洩露這一秘密。

補充說「文化高的也不見得不犯錯誤，知識分子犯起來就厲害得多」。後來他還說過「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就要出問題」。

年輕、天真而輕信的我們，都沒有識破毛澤東的這些固有觀點並沒有改變，而他現在宣告要解決的問題，其實就是在這些觀點指導下造成的。這些導致一九五七年那種局面的基本觀點並無變化，而只是改變了方法和策略。批評教條主義於毛澤東無損，那筆賬是算到斯大林頭上的，毛則是以革新者的姿態出現的。看來他所說的教條主義指的也就是中國共產黨盲目學習蘇聯那一套東西，而並不包括生硬貫徹毛本人的教條。可以看出，他並不以為他本人和中共中央本身有什麼錯誤。他洋洋自得要以他的「論十大關係」、雙百方針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些新思想、新政策來樹立自己在中國的更高權威和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袖地位。他對鍾惦樂的一篇僅僅批評電影業不景氣的文章如此計較，用最嚴厲的詞句譴責鍾，就表明他是容不得別人對建國八年來共產黨的成績提出一點懷疑、否定和批評。

而我們這些傻瓜對這一切竟視而不見，這就難怪我們要落入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個政治陷阱了。

我很依戀我的家，所以每次出差或出國之後，總不願很快就再離開北京。這一年春天也是如此，從東北歸來已是四月下旬，我一時不想離去了。

一件大事使我改變了主意。編委會上社長張黎群傳達劉少奇的一個指示：上海永大紗廠女工罷工，《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應予報導。

從一九五五年全廠工人熱烈擁護公私合營，歡迎共產黨幹部入廠當公方代表，到全廠大多數工人舉行罷工，把黨的幹部軟禁起來作為人質，只經歷了兩年時間。

這是一次很有趣的試驗：把私有制度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公私合營實即公有）以後，生產下降，由盈利轉為虧損了。工人們對於自己公有制的工廠所享有的管理權利，反倒不如它為資本家所有的時期了。任命的是不能稱職的、工人們不喜歡的幹部，「選舉」的是他們不信任的工會主席。黨、團、工會攪成一股繩，一心抓生產，不管工人死活。工人既怕黨支部，又罵黨支部。黨不再是「光榮、偉大、正確的」黨，而變成「拍馬黨」、「拉攏黨」了。這是因為黨只發展兩種人入黨：聽話而不說話的人，並無入黨要求因而不起作用、為分享執政黨的利益而巴結幹部鑽進黨內的人。前一種人幫不了黨的忙，而且紛紛退了黨；後一種人則只能害黨。黨員中也有好的，願意為工人的合理要求說話，卻遭到領導的申斥，被認為「黨性不強」。同時工人又認為黨員們應對各種不合理的事情負責，罵他們是「白鼻頭」，把他們當作工賊。在工資、借款、評級、困難補助、競賽評獎等方面，都厚此薄彼。工人的困難無人過問，甚至有的工人被生活困難所迫要自殺了，工會仍然不管。一個洗澡用水的問題就不知喊了多久。寫了許多信給黨的區委和報社，一概石沈大海。

工人們比黨幹部更擔心工廠的倒閉。幹部可以調轉工作，工人卻要失去飯碗。黨員不能代表工人，便有一位非黨員、會計丁喜康成了工人的代表。他被指為罷工的罪魁禍首。資本家當權時，他因主動監督其非法活動和為工人謀利益，被資方稱為「神經病」。現在共產黨的幹部也因同樣原因罵他「神經病」。丁喜康本是個孤兒，一九四九年第一個加入工會，也要求過加入共產黨。他像

罷工歷來被認為是用來反對資產階級的手段，因而工人一旦對共產黨的政府或廠長罷起工來，就是很不體面的事了，同時也很危險，因為它等於把黨的錯誤公開暴露在人民面前，並且以如此激烈的方式！所以，共產黨的報紙竟可以報導在自己領導的地區裡反對共產黨幹部的罷工，這個決定表明黨中央既有充分的自信糾正引起這起罷工的錯誤，也有勇氣在全國範圍內克服破壞黨與群眾關係的那些黨的弊端。我為此興奮異常。當這次採訪任務又落到我的頭上時，我更是喜出望外！我決定和本報駐上海記者陳伯鴻一起儘快起程，奔赴上海。

到了上海，我和伯鴻一頭就栽到永大紗廠。我們必須按時發出關於這起罷工事件的報導。比起這篇必定會轟動一時的報導來，推動我埋頭於這個工廠的更重要的動機，是我對於某些黨組織這幾年是如何從工人一致擁護的先鋒隊蛻變成他們憎惡的對象這個過程懷有極大的興趣。

在報紙上的各界「鳴放」會上，對共產黨的批評已經開始。我覺得一個清算「左」的錯誤、糾正黨內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大好時機已經到來，中國進步的速度必將加快。接連幾個夜晚，我興奮得難以入睡。有時剛剛入睡又醒來，頭腦裡的思潮此起彼伏，如波濤洶湧，不可遏止。我常幾次披衣起床，在燈下疾書。一個諷刺風派文人的短篇小說，一篇寫新聞記者的現時境況與應有地位的散文以及給《中國青年報》的關於上海鳴放情況的報告等，都是這樣寫出來的。

永大紗廠是個只有二百來人的小廠。我和陳伯鴻作了半個多月的調查，和許多工人、各種政治態度的黨員與幹部、群眾、領袖分別談話。我們認為這個工廠黨組織的危機對於喚醒全黨警醒，痛切正視執政黨所面臨的危險是極有意義的。

同資本家鬥爭時不怕恐嚇和危險一樣，現在「一個人對付一個組織」、「與黨團組織處於宣戰狀態」了。

工廠黨總支認為這個問題在哪裡呢？「由於國際形勢（！）的影響，廠內思想狀態紊亂。對工人的政治思想工作須加強。」「應在職員中揭發經常散布謬論、公開傳播反動意識者（只有一個丁喜康），使之在群眾中孤立。」「黨團組織必須服從行政、支持行政，搞好生產。」

在這種態勢下，除了罷工喚起高層領導與社會輿論注意這家工廠的危急狀態，還有什麼辦法呢？

幾個月以後，中國歷史進入另一個時期，從此罷工事實上變成非法的了。永大紗廠這種危機將在幾百上千個工廠發生，但再也不會擾亂各層領導的安寧，因為一般不再採取罷工形式，而表現為不聲不響的持久怠工了。講究實際利害的資產階級懂得這種怠工比罷工可怕得多，注重裝潢和喜愛安寧的無產階級政黨卻寧願讓工人怠工，因為它不致擾亂社會表面上的安定，又不會給黨和社會主義以及崇高美麗的原則丟醜。但這將是無聲的腐爛……

每天我只有很少的時間看報紙，但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樣急於看到當天的報紙。我不能看得很細，往往只能看看標題，這已足夠使我感覺到上海前所未有的氣氛了。人們在重新思考很多問題。從經濟生活、文化生活到政治制度，那些抑制着人們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妨礙社會發展的各種現象，通過各界人士的鳴放在報紙上公開化了。生活本來應該更可愛些，人們的心情本來可以更快活些，人與人的關係完全可以更和諧、更親密些，然而沒有。黨的政策僵硬，黨的很多幹部從公僕逐漸向享有特權的官僚的轉化，黨的領導幹部對非黨群眾特別是知識分子的

宗派主義情緒，把它同人民隔離開來。沒有一種力量能制止這種傾向的發展。作為社會輿論工具的報紙第一次有可能把人民的不滿、顧慮和渴望表達出來。

我注意觀察街上行人和車中乘客的表情。《文匯報》、《新民晚報》和《新聞日報》的讀者激增，幾年來沉睡在人們心中的政治激情被喚醒了，一向被認為只能由執政者去決定的許多問題，開始成為他們思索和議論的中心。

顯然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這種新的趨勢。有人覺得他們賴以安身立命因而堅信其不可動搖的東西受到了威脅，在那裡冷冷地觀望。社會底層開始了動盪，蓄積已久的不滿可能會以意料不到的形式迸發出來。

上海電台的青年記者王浣芳再三請我到那裡講話，我很是猶豫。這時已接近五月下旬，從上海市領導人講話的調子裡，從某些幹部陰鬱的面孔和對我缺乏善意的面孔裡，我多少覺察到一些不妙的迹象，不願讓那些人從我的講話中抓到什麼把柄。但我又很想到據說是鬥爭相當尖銳、複雜的上海電台去做些調查和採訪，那裡的青年編輯、記者的盛情又很難推卻，於是我便住到那裡去了。

大約有一百多人參加的座談會氣氛很熱烈。我講了自己這幾年在新聞工作中的經歷和思考的問題，也介紹了波蘭新聞改革的情況。大家提出很多問題，我一一回答了。

我一向的、也是今後也難改掉的毛病又犯了：在回答問題中間，我並不是不清醒的，我的理智不停地提醒我必須謹慎，不可大意，但我的感情又很難抑制，不願說假話，不願敷衍搪塞。一位同志問到《中國青年報》近年來在開展批評中遇到的阻力是什麼時，我已意識到這會引出與黨

中央和某些高級領導幹部有關而不宜公開的情況，我必須注意迴避，但我還是吐露了真情，說道：「我們報社的遭遇是複雜的。最可怕的阻力不是別的，而是黨內保守力量，特別是黨內權威人士的保守力量，以各種方式干擾你。」我僅僅沒有說出那些高幹的名字而已。但我接著又說團中央書記胡耀邦不屬於保守派，但他不占優勢，因而團中央也不能支持我們。下面的問題是：黨中央對於鳴放、整風的決心如何，我更加謹慎了，先說了一句：「毛主席是沒有問題的，他的決心很大。」我若到此打住就好了，但我又覺得這不完全，因而是個不真實的答案。我想起三月以來我在幾個城市看到的省、市委領導人對於毛澤東的決策的抵制，想起毛本人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過「高級幹部十個有九個不贊成百家爭鳴，或是不太通。真正通的是少數」，這麼重要的事怎能不說呢，於是我沉吟片刻之後又遲遲疑疑地補充說：「……但是黨中央別的人嘛，還要走著瞧，黨內一批高級幹部是整風的阻力。」這時，本可就此打住，但我又禁不住會場上那許多友好的、全神貫注和對我充滿期待的目光的引誘，於是又放開思想的閘門，滔滔講了下去：

「過去聽毛主席說黨內高幹十個有九個是反對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還覺得可能是誇張。其實一細想，我們報紙幾年來遇到的阻力就是這些人。他們處於特殊地位，動不得。報紙批評最高只能到政府的部長，已經很難。劉少奇日前說封建等級制要剷除，我現在仍然不很樂觀。最需要監督的人卻不可能受到監督。」

「特權階級，從工廠到中央，已經形成。有人自己不願意成為特權階級分子，但把他往那個位置上一擺，他慢慢就變過去了。」

我的講話還沒結束，傳過來一個條子，上寫「看見你，我就想：這就是我一直在找的那個人！可否給我一點時間……」

散會後走過來一位漂亮的婦女。她約我單獨一談。我們後來在近處的一家咖啡館裡長談幾個小時。她一面不住流淚，一面傾訴她丈夫、著名文學理論家何滿子的不幸遭遇——一九五五年被無辜地定為胡風集團分子坐牢，解放後並不真正平反，全家人備嘗痛苦……我只能安慰她，勤她等待。

幾個月後她等來的卻是夫婦雙雙被打成右派，她曾向之求助的這位記者也成了他們的難友。在這天的座談會上，我還說過這樣的話：「不能低估黨內保守派的力量，但也不要低估我們的力量。他們會利用他們的渠道製造空氣，朝有利於他們的方向去扭轉最高領導人的決策，我們也可以製造空氣——通過我們的筆把真實情況告訴中央。毛主席每天都看《文匯報》，下情可以上達……」

在我說這些話時，上海的局勢已經不穩。後來的幾天，工廠裡的騷動繼續擴大，一週中罷工迭起，達到每天有三十、四十起工人去市委請願的規模。公私合營工廠中已有五名公方代表被打傷。市委發出緊急指示，限十天之內把工人安定下來，報紙上已停止了關於鳴放的報導。聽說市委書記柯慶施已專程飛往北京向毛澤東報告請示。又聽說毛澤東將於六月一日就這一問題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講話。我猜想柯慶施一定會是勸說毛澤東煞車，那一來中國大好的民主化形勢必將逆轉。我憂心忡忡，五月廿五日晚間，我便在上海電台的地下室寓所裡起草一封信，企圖以直接向

毛澤東進諫來阻止局勢的逆轉。

「中共中央辦公廳

請盡速轉交

敬愛的

毛主席：

我是中共黨員，中國青年報的記者。幾年來跑過東北、西北、中南各省市，黨內與社會生活中的不正常現象時常引起我的憂慮。我衷心擁護擴大民主生活與整風的方針，對它寄予很大希望。一位古羅馬的哲人說過：『爲了取火，免不了生烟。聰明人滅烟而取火，傻瓜則把火與烟一起撲滅。』這種傻瓜在我們黨內是有人在的，至於連煮飯的火也畏懼的，自然也不乏其人。您一定知道黨內那種保守勢力必然要對這一方針加以抵抗，希望您無論如何不要輕信這種人的意見以及他們所反映的情況，他們不僅不能代表群眾，甚至也遠遠不能代表黨。上海的情況固然有不健康的地方，但整個說來是非常好的。

請您注意：

- 一、黨內高級幹部中，一個特權階層已經形成。他們已完全脫離了黨組織與群眾的監督，成爲新的貴族……
- 二、在多數工礦企業中，黨的組織處於渙散狀態。東北一些工廠中，黨員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機關中，黨內健康力量不得伸張，占優勢的仍然是教條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思想。有

些機關黨員領導幹部政治熱情衰退……者竟達三分之一以上……

三、黨內比較高級的幹部中，存在『變色龍』。這種人劃不到三大主義的任何一類中去。他們永遠『正確』，十分安全，這次整風也未必整得到他們的頭上。

關於黨與群眾關係的普遍惡化，就無須寫了。

寫了這許多您一定早已了解到的情況，無非是出於一種憂慮：在上海和哈爾濱與一些負責幹部接觸中，深感某些人的感情與中央和群眾的感情之差異已到了多麼危險的程度，而這些人在掌權，他們是『勢力』，他們有最大的發言權……黨組織與群眾的意見是非常非常難發生作用的。需要中央採取措施。」

其實並不需要，對他施加影響，毛澤東早已胸有成竹，並且布置妥當了。我的命運也在十幾天前就被他決定了。我關於上海鳴放情況的第一篇報導（上海在沉思中）於五月十二日見報，毛澤東看了，就作了批示：「看來，有的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亂。」

這個「亂」字份量很重。他的意思是我要在中國煽起匈牙利式的暴亂。他怎麼會看得這樣重呢？那通訊主要篇幅寫的是黨對文藝的領導問題：「爲什麼反動統治時期上海是全國出人出書出戲最多的所在，解放後反而有點蕭條了呢？」這個問題當然是令人不愉快的，然而更使毛澤東惱火的大約是臨近文章結尾的一段：「上海的放，還僅僅是開始。值得注意的是許多人還不肯說話，有人儘管說了幾次仍未暢所欲言。怕『釣魚』、怕滙報、怕檢討是主要顧慮，也有人仍然懷疑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人們注意看一些黨內負責幹部的動向，現在的印象是：他們參加會，不說話，

沒表情，也不知打的是什麼主意！這種顧慮與過去黨的領導某些反覆無常的表現是分不開的。……」

毛澤東一定認為我這段文字有挑動知識分子與黨對抗之意，同時，也因為我不小心洩露了天機。其實我若稍有一點心計，那「不說話、沒表情」早就應該引起我警惕，我就不會寫這篇通訊了。

四月末我到上海的第二天，便到中共上海市委報到。接待我的是宣傳部副部長周而復。我認為他本應有一點笑容。我介紹了自己和我的來意。他始終沒有表情。我只當他就是這麼個人；或者因為他的創作道路與我不同，不喜歡我寫的那類東西。十來天後，我又在作家茶社會見了當時並無顯赫地位但因毛澤東讚揚過他的一篇文章而小有名氣的評論家姚文元。他也是沒有表情。我向他打聽上海文學界鳴放的情況，他守口如瓶。這是一次極不愉快的會面，桌上的茶點一點都沒動，就分手了。

我實在是太痴，也太相信毛澤東了，因而根本不會猜疑上海和全國正熱熱鬧鬧展開的鳴放不過是他一手制定的「引蛇出洞」的政治大陰謀，一個大陷阱正在我腳下張著大嘴呢。不過，按照毛澤東的組織原則，這個只透露給黨內極少數人的機密，姚文元也不該知道，他的級別比我低得多。

寫完致毛澤東的信幾天之後，我便動身返回北京了。我的心被不祥的預感所籠罩，一片黯然。在回北京去的列車上，我看到了五月卅一日《人民日報》上對人民大學教授葛佩琦的揭發。報導說他曾是國民黨的高級軍官，出於對共產黨的仇恨，在鳴放會議上對黨惡毒攻擊，並宣稱他

要殺共產黨員。我初次見到如此露骨地表示對黨的仇恨的言說，吃了一驚，但並未懷疑。

這篇報導的作者，即謊言的製造家，為毛澤東立下一功。高佩琦的言論為反右派鬥爭提供了有力的證據。二十餘年後才真相大白：葛佩琦是位資格很老的共產黨員，是共產黨派進國民黨軍隊負有特殊使命的。他根本沒說過要殺共產黨的話。他原話的大意是：他曾親眼見過國民黨如何取得政權和如何垮台。他現在看到共產黨內一些幹部的腐敗很痛心，擔心共產黨會重蹈國民黨的覆轍。

這時，我確信有一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利用了鳴放向黨進攻，企圖取而代之。發動一場反右派運動也許不無道理。但我為因此而可能發生的大逆轉會使中國失去走上一條新路的機會而憂慮萬分。我根本沒想到我會成為這場運動的犧牲品。但也不是毫無顧慮。我回憶自己在上海的言行，覺得五月二十一日在上海電台座談會上的講話可能有一點問題。

回到北京，在青年報的小環境裏看不出明顯的變化，但我的心情很是煩躁。我不希望、也不許自己相信形勢會發生逆轉，但我又不能不覺察到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這時上邊尚未明令煞車，還在鼓勵繼續鳴放，我便決定沿著我選定的路繼續走下去。

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就一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盧郁文在民革中央擴大會議上發言後收到一封匿名恐嚇信一事，向全國發出第一個信號，從這封恐嚇信「是對於廣大人民的一個警告」，表明「階級鬥爭並未熄滅」，右派分子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兩天以後，這家報紙又發出社論〈工人階級說話了〉，正式發出號召，擊退「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這篇社論說在兩篇社論之間的兩天裡（實際上從第一篇社論到達讀者手

中到第二篇的寫作，只有一天的時間）「北京、上海、天津、瀋陽、鞍山等地的許多職工紛紛舉行座談會，憤怒地譴責極少數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可見，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全國爲之震動。接下來報紙上便連篇累牘地揭發民主黨派頭面人物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這些人雖然曾反對過國民黨，但一九四九年以後他們因未分享中國共產黨所掌握的權力而有所不滿，是可以想見的。報紙宣傳中又揭發了他們的「陰謀活動」，比如「章、羅聯盟」等等。因而，我也認爲這些人很可能真正可以算作右派分子。然而即使如此，我覺得他們的有些意見，如儲安平所指出的中共視中國爲自己的「黨天下」的問題，也不無道理。隨著報紙上所揭發和批判的人的增多，我原先的憂慮越來越重了：這個運動繼續搞下去，會使我曾寄予很大希望的民主浪潮被扼殺，中國又會回到一九五六年前的狀態中去。

同時，我也隱隱感到：我和與我持相同觀點的黨員，也將被這場運動波及。我不相信那些黨員和我會被定爲右派分子。但想起一月間那次討論王蒙作品的會議，又覺得追究我們言論、作品中問題的責任，也是很可能的。

我的心情非常煩躁。可怕的大火正在我面前燃燒，火勢越來越猛，它可能把去年以來政治空氣中出現的自由和希望統統燒光！怎麼辦呢？所有報紙已被一種意見佔據，政治氣氛已不允許我公開宣揚自己的政見。

編輯部中年輕的編輯、記者也和我一樣焦灼不安。他們找我商議怎麼辦。一種強烈的危機感，顯然使我們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我和幾位黨員決定召開黨支部大會，繼續發動黨員鳴放。

我是幾個月前被選爲編輯部第二黨支部書記的。副書記——一位年輕的女編輯也主張開會。

於是，在六月下旬的一個晚上，支部大會便在大會議室中召開了。

發言的人並不踴躍。顯然，反右運動已經使一些人不敢講話。這種氣氛反而刺激了我，使我更大膽了，把反右運動可能帶來的於我不利的後果置於不顧。我起來鼓勵大家講話了：「不必顧慮，我們是在按毛主席的要求整風。我知道，黨內有人反對，有人害怕聽不同的意見，而這正是我們必須整風的原因。再聽任官僚主義和特權現象發展下去，這個黨就危險了！我們黨員都不敢討論黨的問題，黨外的人又怎麼敢提意見？」

我的話起了作用。幾個黨員對於肅反中青年報黨委的錯誤提出批評。那些本身當時就受到不公平審查的人發言時心情很激動。有一位平時比我嚴謹得多的黨員也對黨內生活缺乏民主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使我稍感意外。

會議結束時，我以爲這就完了。不料幾名黨員認爲應使這次會議對全報社的鳴放和整風起一下推動作用，主張把會議紀要寫成簡報貼出去，也有人認爲不妥。我猶豫片刻，贊成了前一種意見。這種作法是反常的，又是一次冒險。

幾天以後，胡耀邦（當時共青團中央總書記）到編輯部來聽取意見，我又毫無保留地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和質問。

在距離我不幸的日子只有幾天光景的黨小組會上，我提出了一個疑問：「現在把我搞糊塗了：左和右怎麼分界：主張進步、反對保守和反對官僚主義的人應該是左派，現在倒成了右派了；反對變革、主張維持現狀的人反而成了左派，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這個顛倒，到八〇年代也未糾正。

這是我在黨內的最後一次發言。可以問心無愧的是我入黨以來從未隱瞞過自己的政治觀點，也從不搞陰謀詭計。

七月八日晚間，在大飯廳召開報社全體人員大會。我和平時一樣拿著扇子去了。黨委書記余世光主持會議，團中央一個書記也來了。黨委書記說：「反右派鬥爭已經進行一個時候了，揪出來一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有人說我們團中央系統，我們青年報社沒有右派。究竟有沒有呢？」接著他大聲宣告：「有！劉賓雁就是一個！」

我的心頓時一沉，好像停止了跳動。這是真實的嗎？我是否在夢中？——有幾秒鐘我確實感到似在雲端。但我立刻冷靜下來，確認一個從未遇到的巨大危險正在向我逼近。我知道它意味著什麼，但我不相信它會成為現實。這一定是個誤會！——一定是我們政治生活中的哪一個環節上出了問題。我怎麼會是敵人呢？

不僅我，場內絕大多數人都為之愕然。顯然是事先佈置好的幾個積極分子相繼發言，憤怒譴責我的反黨言論。第二個站起來發言的，是印刷廠的一個工人，身材高大。他表示贊同黨委書記的觀點，說：「劉賓雁這個人從來就不像個黨員！他的氣味就不對！」我有點吃驚，兩天以前我們全家在王府井街口上碰見過他，那時他還十分熱情，非要給我的孩子拍一張照片不可呢。再一想，也不怪，這些最先發言的人一定是事先佈置的……。幾位事先毫無精神準備，思想傾向與我一致的人，也起來講了話。他們很難唱出足夠高的調子，有人甚至在批評我的錯誤之後還說了我兩句好話，引起「左」派的不滿。

最後，輪到我發言了。

我緩緩站起來——因為我坐在會場的左前方邊上，全場的人都轉向了我。我壓住內心的衝動，從容地說：「這個會不僅對於我，對很多人都很突然，因為大家一向並不認為我是這樣一個人。我有缺點和錯誤，但我能是章伯鈞、羅隆基那樣的右派分子嗎？」我對會上一些人的指責作了反駁：「有些與事實不符。說我寫的全是批評稿，是故意找共產黨的毛病，是這樣嗎？我是出於一種憂慮才寫這些稿件的，並不是為了拆共產黨的台。」我知道，按常規，明天報紙就會把這件事報導出來，那就更難挽回了。於是我又說：「希望不要急於見報。」

有一個什麼人站出來，喊道：「不要聽他的，不要上他的當！」但這個積極分子的意見並未被採納，報導還是推遲了幾天。

直至散會，我也不相信我的命運就這樣被決定了。我仍然相信會有人聽我證明我不是一個右派，而那一定是駁不倒的。我擔心的是妻子。我沒有用目光去尋找她，但我知道她在場，她受到的震驚一定不下於我。我應該安慰她。

我走出會場時，沒有一個人同我說話。只有朱洪在門外等著我。我對她說：「今天晚上我就去團中央書記處找羅毅（負責這次運動的書記）。」她同意，鼓勵我說：「不要擔心，一定會搞清楚的。」

我騎上自行車，直奔關東店羅毅的住所。此人曾是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年中國青年訪蘇代表團成員，因而我們彼此早就認識。他和顏悅色地接待了我，彷彿一個小時以前那件大事根本沒發生過一樣。我坦誠地表達了我的態度：你們弄錯了，我根本不可能是個右派。我請他們審查我的全部言行，然後再做出結論。羅毅始終面帶笑容，告訴我不要急，要相信黨組織，不會冤枉一

個好人，一切都曾得到妥善處理。我相信了他的話，心情平靜下來。

這要經過將近十年，我才得知我的政治命運早在五月間就已由毛澤東決定了，任何人已無力改變。羅毅的那番話，純粹是爲了安撫我。

從羅毅家出來，已是半夜。沒走多遠，就碰見朱洪，她正在找我。我問她爲什麼要來，她說，有一位朋友告誡她注意規勸我冷靜，千萬不要走自絕的路，她這才著了急，生怕我今晚出事。我笑了，心想這怎麼可能？既然我根本不可能是右派，他們怎麼能把我定爲右派呢？

接下來是一次又一次的會議，討論我的問題。會是小型的，仍然在青年報二樓的那間大會議室開——一九五五年爲了把我定爲反革命分子，曾多次在那裡批判我。

……

我認爲，這是給我機會爲自己辯護。我認定：只要我把自已全部真實情況向黨組織攤開，他們就會認清我不是一個敵對分子。於是我把近二年自己全部的想法和言行毫無保留地做了報告，甚至詳細到我在何時見過什麼人，相互交談了什麼。十幾名與會者耐心地聽完了我的敘述。

朱洪並未向我談起她應該做什麼，但我們想到一起來了。她把我給她寫的一些信交給了黨支部。幾年以後我才見到被退回的這些信件，其中有一封是我在湖北採訪時寫的，朱洪還特地用紅筆勾出我在信中寫的關於匈牙利事件的一些話——我見到中國報紙報導匈牙利暴亂分子把公安人員吊死在電線桿上的暴行，在信中表示了我的憤慨。

人們靜靜地、耐心地聽我講了足足兩個半天。他們並不打斷我的話，但我誠懇的態度，我列舉大量足以證明我非但不是敵人，並且是一心想使中國的事情辦好的事實，實際上並沒有起任何

作用。參加會的是編委會、黨委會的成員和幾個部主任共十幾人，當然都是黨員，真正認定或亟欲把我定爲右派者，至多不超過二、三人。其中一半以上的人（編輯部的大多數人亦是如此）實際上對於開展反右運動並沒有想通。從總編輯張黎群起，至少有五、六個人這時還正在爲自己一年來的言論可能招來的懲罰忐忑不安。但任何人都不能表明自己真實的政治態度——除了少數幾個死心塌地「緊跟」黨中央的人以外。

對我的坦誠的自白的反應一概是「不老實」、「美化自己」、「必須坦白交代」等等。

我承認在上海期間所寫的文章和講的話，可能有過頭的地方，可能被黨外右派所利用，但我入黨以來的全部言論和行動難道還不足以證明我從來沒有反對過社會主義和黨嗎？再說，在入黨以前我已具有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信念，我個人的成長、我今天所擁有的一切——從物質條件到名望，無不是黨所給予的，我的全家人都從一九四九年的解放得到了好處，我爲什麼要反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呢？這難道還不足以證明我不是也不可能黨的敵人嗎？

和九年後的文革不同，沒有人拍桌子瞪眼，大聲恫嚇，喊口號或制止我發言，更未對我施加人身侮辱。人們心平氣和地批判我、質問我，我也可以繼續爲自己辯護。然而在「和風細雨」（這是毛對整風運動所應採取方式的指示）的後面，却是不可理喻的武斷和強詞奪理。

這時，全國所有報紙上都是鋪天蓋地的對於各種對黨、對社會主義「心懷仇恨」的右派分子的批判，和「工農大眾」以及「進步知識分子」對右派的揭發和聲討。聲勢之大，爲十幾年來任何政治運動所未有。我的事情也已見報，《中國青年報》每天從頭版起不間斷地刊載揭批我的報導與文章。

青年報院內，拉起幾條繩子，掛上越來越多揭批我的大字報。編輯部內所有的人，特別是那些曾持有與我相同或類似觀點的人，都不能不表明態度，與劉賓雁「劃清界限」。

當《人民日報》發表〈工人階級說話了〉的社論時，我知道上海當時至少有三十家工廠的工人在罷工——那絕不是爲了表示擁護黨中央。再說，中國的工人中有幾個人真正理解中國知識分子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分歧並自覺地站到黨的一方的呢？然而從現在報紙上連篇累牘的報導看，全國工人群眾都站到中共一方視右派爲死敵了！

我心裡對這一套宣傳手法是很清楚的，因爲十幾年來我就是幹這個的。我甚至能夠明白，爲什麼我當年在天津拜爲義母的一字不識的老太太也在《中國青年報》上寫文章批判我——那顯然是出於其他考慮。然而儘管如此，這種強大的政治攻勢——全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的這種輿論優勢，以及在我的單位裡一個人也不敢和我說話這種氣氛，仍然不能不使我感到孤立。

於是，我的自信開始動搖了。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像自己迄今所想的那樣正確。我當然不是沒有缺點的，而所有缺點都可以習慣地歸結爲「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我入黨時，難道純粹是爲了中國人民和全人類的解放嗎？難道一點爲個人的動機都沒有嗎？當然不是。我的目的之一，是爲了爭取一個對個人也更加自由的環境，來發展自己的才能。我的寫作，難道一點爲個人名利的念頭都沒有嗎？當然也不是……

會議已舉行多次，進展很慢，因爲我始終不能承認我有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的目的。你說我的某些言行客觀上不自覺助長了右派進攻黨的聲勢，可以。說我因此就是反黨分子，我不能接受。這時，對方搬出毛主席的教導。他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說過：不能離

開效果看動機，「我們是動機與效果統一論者」。既然如此，你劉賓雁又怎能例外呢？

我想不通。動機在我心中，難道還會有人比我更了解我想過些什麼嗎？

在北京城的另一角，一個北京新聞界對右派分子的批判會議也在進行。那是在北京日報樓上的禮堂裡召開的。兩個月以前我參加過一次，那時我還不是右派。那次會專批《大公報》社長非黨人士王芸生。據說後來被認爲應屬於被保護之列，所以未定爲右派。

那次會議的休息時間，我遇到《人民日報》社長鄧拓。我和他沒有說很多話，從他的臉色，我猜想他也在爲這場運動而憂慮。五月間在上海，我曾寄過一篇文章給他，沒發表。他把文章退還給了我。那是一篇爲中國記者缺乏應有的地位鳴不平的文字。按照常規，鄧拓應該把它交給青年報的黨組織或中央宣傳部，這可以證明他對黨忠誠。然而他却沒有交，而是交還給了我本人。

現在「新聞座談會」的對象輪到我了。禮堂大廳裡擺了幾排桌子，座位仍然不夠，會場顯得很擁擠。

仍然是我發言檢討自己，衆人批判我的錯誤，只不過規模、範圍擴大了幾十倍。

正如一個人已注定要在水中沉沒，却還計較一塊石頭會碰痛自己，我對一個青年女人的發言頗感不快。她是《北京日報》的團委書記。大約一年以前，她曾請我去給北京日報的團員和青年講演。現在她站起來，聲嘶力竭地揭發批判我，用詞很重。我心想：明明是你死乞白賴請我，我謝絕再三之後才勉強去的，怎麼現在說我「費盡心機尋找機會，到北京日報向青年放毒」呢？真是豈有此理！我甚至暗暗發誓，從今以後無論什麼人邀請，我再也不做任何講演了！可見，我這時並未想到今後再也不會有人請我去做講演了。

當我剛走進會場，我覺察到似乎有一種像波浪的東西從門口向整個會場掃來——人們好像被什麼驚動了。散會之後我才得知，有一個人從這棟建築的樓上墜樓而死——顯然，他是特意選定了開會之前，特意選定了這個地點——他最後的身形掃過會場的窗子！

威學毅原是北京學生中的地下黨員，解放初期因「個人主義」錯誤而被開除黨籍。一九五六年到《中國青年報》在我領導的部門工作。由於那一年的政治氣氛很好，他受到的黨籍處分也可能糾正，他工作很賣力，出了很多的點子。由於與我思想一致，過從較密，又寫過讚揚我的作品的文章，我被指為右派後，他精神很是緊張，以為他也難逃厄運，便決定以他的一死為中國即將喪失的大好良機殉葬了。

威學毅在北京並無親人，他被匆匆火化了。他前次到我家夜談時忘掉的一件西服上衣却依然掛在我臥室的牆上。它在那裡懸掛了很久，直至我的政治命運被最後決定以後。

黨為了表明它意志的堅決和權力的不可抵抗，在威學毅死後追定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我四十年代的好友，天才的劇作家與小說家范政也被打為右派，這時沒有死，但在一九六八年文革高峯中，即劃為右派十年之後第二次遭受迫害與侮辱時，憤然自盡。他死得更慘：臥軌身亡，屍分三段。

在中國青年報內，對我的批判繼續進行。繼我之後，一個又一個編輯或記者被指為右派。有的人昨天還在批判我，今天就從會場上消失，到另一個會場去接受別人的批判了。這張右派分子名單上的不幸者逐漸增加到十七個人。所有的人罪過都比我輕得多。最後一個是畫家路西坤，他

僅僅是由於不服從調動到外省工作，態度比較頑強，也成為右派分子。

假如我不是右派，那麼中國青年報所有這十六個人就都夠不上右派。甚至團中央各單位總共一百餘名右派分子中的任何人，罪惡也不及我嚴重。我因自己那兩篇特寫，以及一九五六年以來在多處所作的講演，已在中國新聞界、文學界和共青团系統產生很大政治影響。很多人視我為社會的先驅，很多青年人願步我後塵（其中很多人由於寫了類似的作品，或僅僅說了我的某一篇文章「好」，或對於把我定為右派表示反對或懷疑而自己也被告定為右派）。反右派運動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必定是有了必須打擊的對象，才會有必要發動這場運動。我若不是右派，這場運動至少在團中央系統就落空了。不是我錯，就是毛主席他錯了。而他是不可能錯的。即使錯了，也是不會承認和糾正的。總之，我的命運已不可更改。既然如此，沒完沒了地開這種會，消耗精神，徒費唇舌，又有什麼意義呢？

「我應該找到一些理由使自己屈服。」我決定認命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但又要盡量使自己心悅誠服。

現在事情卡在「動機」的問題上，必須在這裡突破。別人的批判說服不了我，我苦苦思索了幾天，終於找到了判決自己死刑的理由。在一次會議上，我說我終於明白了我為什麼會是一個右派分子。「我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毒已經很久，因而我的頭腦已徹底被資產階級思想腐蝕。我行為和言論的動機，只能來源於頭腦；既然頭腦已經爛掉，又怎麼可能有好的動機呢？可能正好相反，我認為好的，恰恰是壞的。」說這些話時，我如釋重負。聽眾也似乎鬆了一口氣。

然而事情尚未完結。主持會議並在決定我政治命運上起重要作用的黨委副書記，本來是我從

一九四六年就相識的人。但在氣質和性格上我倆正好相反，因而從無往來。他又猜疑我的《本報內部消息》中所寫的馬文元是以他為原型，所以對我頗有看法。此刻，他平時就少有一絲笑容的臉變得更加嚴峻，向我提出一個問題：「你應該交代在你這許多反黨罪行後面的政治野心！」我吃了一驚。這不僅是逼我進一步退却，而且簡直是跡近陷害了。他要我承認我有意推翻共產黨的統治！這也太離譜了！我嚴詞表明我根本沒有任何政治野心。

會議在這個問題上又僵持了兩天。我不肯做任何讓步，而他也不肯放棄他的「假設」。我暗暗猜測，他為什麼一定要我承認有政治野心呢？這裡一定有什麼名堂——一定是出於對我具體處理上的某種需要。

話題自然而被引到究竟什麼叫政治野心上來。「你一言一行總不會沒有什麼目的吧？」某位與會者說。我答曰：「當然有。從總體上說，我企圖以自己的思想去影響別人；我會力圖使他人接受我的觀點。」

「對！這就是政治野心！」黨委副書記說。我表示懷疑，因為如此說來，每個宣教者——教士、教師和宣傳家，從孔夫子算起，就都是野心家了。他自然不肯接受我的論點。為這麼一個詞，開了兩天會了，真煩人！我知道，他也是在奉命辦事，何必同他為難呢！於是把心一橫：去他的！說政治野心就算是他媽政治野心！反正脖子上這一刀是躲不掉了，還管流血多少幹什麼？這樣，便在「以自己思想影響他人」這個限程度上，我承認了自己有政治野心。

作業到此結束，彼此都感到輕鬆。從此再無人打擾，我每天按時上班，獨自一人在自己的辦公室讀書，讓別人去料理我的後事。

結論是在半年之後做出來的。

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我在三千餘字的結論一式五份上分別簽了字，同意政治死刑判決。心情出奇地平靜。

我犯的罪共有六條。一、猖狂地攻擊黨中央和黨的各級領導，誣毀醜化黨的幹部，誣毀黨的政治生活；二、否定黨領導的文化藝術事業成就；三、誣毀肅反政策和社會主義民主集中制，說「人權受踐踏，人的尊嚴受侮辱」，四、反對黨對報紙的領導，竭力想把中國青年報引向資產階級方向；五、否定黨領導青年工作的成績，反對黨對青年進行思想教育；六、鳴放期間興風作浪，進行一系列猖狂反黨活動。

最後一條罪狀裡，包括我在上海給毛澤東寫那封信。結論中是這樣寫的：「他生怕停止鳴放，連夜寫信給毛主席，狂妄地企圖以他的思想影響毛主席。」

這封信足以證明，我這六條反黨罪狀都是在他老人家號召下，忠實地按他的吩咐照辦的。三十一年以後，當我開始寫這本書時，翻閱當年文件，才在一個關於右派分子如何分類的規定中發現，「有政治野心」是定「極右分子」的一個條件。難怪那位黨委副書記當年那麼認真呢！我被定為右派的事在報紙上公開後，曾收到哈爾濱一個中學生的來信，寫道：「假如你是個右派，毛澤東就是最大的右派。」信上寫了真名實姓。我為他的大膽吃驚，覺得他言之有理。然而，偉大領袖難道能犯錯誤嗎？

幾個月以後，我得知我的「長姊如母」的姊姊、小學教員劉放，因為我鳴不平也被打成右派，且是「極右分子」，我非常痛苦。

得知我的厄運，我的朋友蘇聯作家瓦連欽·奧維奇金(Valentine Ovechkin)來信表示驚訝和憤怒，認為我和丁玲絕不會反對社會主義。我連忙寫信勸說，表示我雖然主觀上並不想反黨反社會主義，但客觀上和黨外右派分子站到一起攻擊了黨；我已想通了，望他放棄這個觀點。他仍然不通。這時，蘇聯的《文學報》發表了關於我的報導，奧維奇金大為惱火，來信告訴我，他已寫信向這家報紙抗議，決定與它決裂。

一個有趣的插曲是：對於一九五六年以來中國自由化與民主化的動向，蘇聯持懷疑態度，擔心中國會走上修正主義道路，很少轉發中國的這方面消息。但反右運動一開始，他們來勁了，連篇累牘地報導中國開倒車。這和幾年以後中國對於赫魯曉夫推行的改革所持的冷淡猜疑態度，後來確認那一套是修正主義相對照，就很有意思。

奧維奇金仍然堅持他的看法，和我的通信繼續到我下鄉勞動後的一九五八年九月。後來忽然沒有消息了。我還以為他是因與一個中國右派通信受到批評和制止呢。到一九六二年我才得悉真相，他為我的事曾給中共中央寫信為我鳴不平，惹得周恩來大發雷霆。這正是我最擔心的事。據說，正是這封信，使我的右派帽子遲遲不能摘掉。中國人都會猜到中共中央會怎麼想：這一定是劉賓雁唆使俄國人為他說情。

若干年以後我才對於這場運動的全貌有了更多的了解。現在官方數字是總共打了五十五萬右派，實則超出一百萬人。真正有見諸報章的言論者，不會超出一百人。領導號召之下在會議上的發言，私下閒談中的片言隻語，日記或信件上的一兩句話，都足以劃為右派。還有很多人則是並無任何言論的，只因上面規定了一個百分比，必須湊足這個數目（往往按慣例還要爭取超過，以

表明領導這個工作的人之忠誠和幹練），也被以各種手段定為右派，比如在反右高峯已過，很多人為了「靠近組織」或奉命「滙報」思想，寫到自己對某一右派的某一觀點曾有過共鳴，或對反右派運動曾有過懷疑，現在糾正了。這種一閃之念就可作為定右派的依據。更荒謬的則是連這種「言論」或念頭也沒有的人會被指為「由於對黨仇恨或不滿，才守口如瓶」，也夠當一回右派的。

掌權的人藉此機會傷害無辜以謀私利者，也不在少數。一些人當了二十多年右派，弄得妻離子散，到一九七九年給右派平反時一查，根本沒經過必辦的手續，只是檔案中塞了一個條子，因而並未定為右派。我在河南省羅山縣還見過這樣的事：一個小學校長看中了一位體育教員的漂亮的妻子，弄不到手，把那教員打成右派，逼得夫婦離婚，那女人就被他占有了。

在批判和追查我的最初的會議上，我曾表示過一種憂慮：「希望黨中央不要因為一個人被定為右派而無視他的合理的批評。否則，我擔心全國會出現普遍沉默的局面，後果將不堪設想。」

不幸被我言中了。反右派運動給中國和中國共產黨造成的傷害是致命的。從此，知識分子和幹部將只有很少數人有勇氣對黨和政府提出批評。黨組織腐敗的傾向、黨中央和毛澤東錯誤的決策，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將暢行無阻。黨內與全社會的民主將不是逐步擴大而是不斷縮小，直至實行法西斯專政。繼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人為的經濟大災害而來的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人為的政治浩劫，將使中國遠遠落在世界中等國家之後，並在一九七六年以後漫長的時間裡繼續咀嚼苦果，為每一步緩緩的前進，付出昂貴的代價。而所有這一切，都是來源於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的反右派鬥爭。

中國一經喪失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歷史提供的良機，便將再三地錯過這種機會。

一百萬知識分子及其家族被投入黑暗的深淵，這個損失是可以計量的。六億人民的大國一旦走入歧途，它遭受的以及它給世界帶來的損失，則是永遠無法計量的。



第七章

沒有牆壁的監牢

人是太能適應環境的變化了。昨天我還紅得發紫，是到處聽到讚揚和看到笑臉的「時代先驅」，今天却忽然變成臭不可聞的人民公敵。我和我的全家遭到奇恥大辱，又看不見有什麼可能從這種地獄般的苦境中解脫出來。而我居然沒想到去死！

我曾經那樣愛過的世界，忽然變得陌生了。陽光是黯淡的。一切歡聲笑語都好像離我很遠。我沒有想到去死，直到十年以後。是什麼力量使我還有興趣活下去呢？是妻子依然如故的愛？是我愛之如命的兒子和女兒？都是。但是還有一個更強大的力量促使我活下來：我並不認為這次失敗會是永久的；我少年時代那個不因家貧和失學而甘屈人下的頑強的上進心，現在演變成同樣頑強的一種心理：我承認自己失敗了，但我不認為它是永久的；有朝一日我仍然能獲得我失去的一切，甚至我還會寫出比一九五六年那些東西更高的作品！

我曾擁有的一切都被剝奪或不予承認了——資歷、能力、職位、待遇，直至任何一個人都享有的從事適合自己條件的最普通的工作的機會。真的變得一無所有了。還要更壞：全民公認的罪名的恥辱要背在我和我妻子兒女的身上，永世不能解脫。留下來的只有這條命（皇恩浩蕩，比斯大林慈善多了），這赤條條的軀體，然而也是被染黑了的。

《中國青年報》編輯部一百餘人中定為右派分子的十七人，一九五八年三月和「好同志」一起到山西省平順縣去勞動。那裡是太行山區，就勞動的艱重和生活水平之低下而言，是農村中的農村。

當載着我們一夥人的一輛卡車緩緩登上太行山時，天空一片昏暗，雪花靜靜地落在面無表情、像石雕像般一動也不動的人們身上。一年以前的此時此刻，這些人還在為毛澤東關於民主化的諾言

而歡欣鼓舞，心懷壯志，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和勇氣潛入生活深處，上下求索，以爲自己將大有作爲。現在卻默默地被送往流放地——變成一堆任人擺佈的肌體，圍坐在卡車車廂的四面面面相對，卻又並不真正看着對方，他們的靈魂將在那裡被緩緩地扼殺。一個個都木然漠然，好像連感覺都已不復存在。我們中間一些人，去年還是無話不談的知己，現在，在漫長的旅途中卻沒有一個人願意說一句話。大家在默默地向自己那有過追求、愛情和關於幸福的幻想的過去告別，同時對於即將開始的未來感到一片茫然。表面上每個人都已向命運屈服，承認了自己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但是，我以自己的狀況來付度，又覺得他們也並未真正服輸。我是十五人中「罪惡」最深重的一個，既然連我在內心深處都不認爲自己是右派，這些「罪行」和我相比簡直是微不足道的人怎麼會認定自己是罪人呢？

這時，我曾設想，假如一小時後有一個黨中央派來的人向我們宣布，反右派鬥爭搞得過頭了，大家可以爲自己辯解，這些人一定會一無例外地站起來，爭先恐後地訴說自己的冤屈。

一年前的這個時候，這些人都是政治生活中最活躍的分子，現在則成了一具具僵屍。坐在我對面和身邊的，有幾個人曾是最好的朋友。現在我們遭到同一種不幸，然而它並未使我們靠得更近，反而彼此疏遠了。我不相信有一個人真正認爲自己被劃爲右派是罪有應得，心中沒有一點委屈。然而在這個時刻，每個人對另一個遭難的人都說不上有什麼同情或愛。我們此刻的目的是改造自己，這就必須憎惡自己，也憎惡和自己相同的人。

這個春天值得歷史家仔細記載。幾十萬名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優秀分子正在奔赴思想改造的營地（很多被定爲右派又定爲反革命分子的人則是被押送勞改營），許多人將在那裡找到一塊墓地。

同時，反右派鬥爭並未停息，還要有幾十萬人跟隨我們走來。

三十一年後追憶往事，我懷疑：毛澤東真的認爲有那麼多人反對自己嗎？同共產黨發動的任何一次政治運動相比，對右派分子的打擊是最凶狠、最殘酷的，這是爲什麼？卑微的我都預感到這場運動將使六億人萬馬齊喑，難道毛澤東竟料不到反右運動會帶來全民的沉默嗎？

也許這正是毛澤東所要達到的目的？至少從效果來看是如此。繼一九五七年對於知識分子的大鎮壓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一九五八年對於全國農民的大剝奪。

此時坐在卡車上的十七個人，倘若不是已經定爲政治罪犯，在即將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必定是最勇敢的反對派。

我和三名右派，被分到平順縣的羊井底村。另有幾名「好同志」，也到這兒勞動，他們是爲了鍛鍊和提高。

羊井底村的男女老少都跑出來，好奇地觀看這批北京來的幹部。一眼望去，好像滿山上都站滿了人。仔細看去，原來他們是站在一個個窯洞門外，而窯洞是依黃土山樑的地勢一層層地建上去的。

作爲一種寬厚，起初不宣佈我們這些人的政治身分，但很快農民們就猜出我們是政治罪人了。奇怪的是他們和城市裡的人不同，並不對我們表示輕蔑和疏遠，甚至還更親切些。不久我就明白了這是爲什麼。我的房東劉二孩對我說，這個村子抗日戰爭時期就有一個爲人很好的村幹部遭人誣陷，被槍斃了。他把我們也看作受冤屈的人。「就是因爲說了共產黨不愛聽的真話嘛」。

農村的勞動我連見都未見過。活了三十二年，從未幹過體力勞動。這裡的田地全是梯田，春

天要把種籽、肥料和抗旱點種的水全都肩挑到山上去，秋天再把收下來的一切全部挑下來。農民心疼和可憐我們，讓我們從三、五十斤重的東西挑起，我仍然搖搖擺擺大出洋相。但到秋收時我便能挑起一百五十斤重的玉米健步如飛，肩不離擔走五里路了。

除非摔死一隻山羊，長年不見葷腥，連油都很少見。最初我看着那些從材料到做法都很生疏的食品，簡直難以下嚥。但農民們對能吃飽肚子已相當滿足。他們都是從河南省林縣逃荒到這裡來的。幾代人的汗水把貧瘠的山地改造成抗旱能力很強的「海綿田」。大批果樹掛果後，一九五七年每個勞動日的收入已達八角錢，以當時的幣值，已經很高了。一九五六年從初級社轉為高級合作社，並不是農民自願，但也都接受了。我們去的那年春天，家家有餘糧，戶戶有存款。農民們窮怕了，捨不得花錢。

預期一九五八年農民的每個勞動日值將猛增到一元五角。這是完全能夠實現的，如果偉大領袖不發動一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話。

倘若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代我們這些人能預知我們將戴着「右派」帽子（摘掉之後仍然被視為「摘帽右派」）度過二十一年痛苦的歲月，我懷疑這十五人中能有幾個人會願意繼續活下去。當一九五八年初團中央一位秘書長到火車站上送行時說我們必須準備在農村中度過三年至五年時間時，我已經覺得長得難以忍受。而後來實際上我在這種同妻子兒女相隔離狀態下在農村勞動了十三年！當然最大的痛苦還不在這裡。每個右派分子身上都印着無形的卻又是人人得而見之的烙印，他們將比刑事犯罪分子更受蔑視與賤視。我們是地地道道的「不可接觸者」。

更令我不能接受的是反右期間對於我以及其他人的「獨立思考」的批判。一個人不能用自己

的頭腦去分辨是非，只能按某一個黨的領導幹部的意見來說話和行動，這還是人的生活嗎？下鄉不久，見到《北京日報》上一篇社論，標題是《共產黨員必須是黨的馴服工具》，我更加惶惑了。按照當時的政治習慣，對於黨員的要求也就是對於全民的要求，也便是對我的要求。中國人已經過於馴服、過於循規蹈矩而缺乏獨立精神了。我設想自己怎樣作為「馴服工具」度過一生，那將是何等蒼白、無聊的日子！我預先感覺到這種痛苦，並為今後痛苦的一生而痛苦不已。

剛下放時，我會認為右派問題既已作了結論，那麼這一切都已經成為過去了。犯了錯誤，受到嚴厲的懲罰，這就夠了。錯誤已經成為歷史，從今我只不過是一個犯過錯誤、不再是共產黨員的幹部而已，在其餘方面我和其他幹部一樣。

在下鄉後召開的第一次右派小組會上，我流露了這個觀點，立即遭到負責我們思想改造的「好同志」的嚴詞訓斥：「你還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呢！」我這才知道不僅要在農村長期勞動，而且還要戴着一頂政治敵人的「帽子」勞動。

毛澤東確是比斯大林高明得多。何必把反對自己的人統統殺掉呢？給以嚴懲，又戴上「帽子」，他們若繼續「作惡」，那麼還有一個「勞動教養」乃至判刑後的「勞動改造」等着他呢。當年若像斯大林那樣把政敵和地主富農以及反革命分子都殺光，四年以後那個「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又到哪裡去找鬥爭對象呢？八年以後發動文化大革命，也就找不到「地富反壞右」這些特別能喚起革命義憤的靶子了，紅衛兵也就沒法用肉刑和滿門問斬的劍刀來訓練革命膽魄了。

「帽子」還有個效用，就是在右派中造成一種競爭態勢。從一九五九年起每年都摘掉一小批人的右派帽子，不斷促使那些一心想早日摘掉帽子而又摘不掉的右派必須戴罪立功。這就把這支政敵隊伍分化瓦解了。最有效的立功方法是告密，揭發同夥的罪行，而果然就有一些右派從勞改的第一天起便向管理人員打小報告揭發或陷害同難者了。

我們這十七名右派之間，更常見的是在定期舉行的右派會議上相互批判「改造態度不好」、「堅持反黨立場不改」等等，這對於加重「帽子」本身已經給人們心理上造成的負罪感是很有效的。

這是很滑稽的事，然而當時卻是很嚴肅地進行着。滑稽的是彼此都是右派，即共產黨的敵人和政治賤民，批評別人的時候用是卻是共產黨員的標準。那被批評者自我檢討時，也以這種標準衡量自己。這是指批評或自我批評的標尺。至於結論則無不同右派分子的身分相聯繫，往往就是「對自己的罪行認識不夠」、「缺乏脫胎換骨的改造決心」，或者更厲害些：「和黨對抗，還想恢復失去的天堂！」

我是這些人中罪惡最重、右派類別最高的，自然經常是批評的重點。我的自我批評也必須比別人更痛烈。我當然也要批評別人，同樣毫不客氣。這種會往往一開就是幾天。每個人都很認真，並無虛應故事或弄虛做假的情況。當然，希望自己的表現能使黨滿意的動機人皆有之，這就使批評的火力和自我批評的沉痛性更強。散會之後，又是同命相憐、相濡以沫的難友，毫不妨碍彼此的友誼。

人就是這樣複雜的生物，連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都不能完全扼殺這些已經認罪並不斷誠惶誠恐地在贖罪的人的良知。當他們心中征討自我的戰鼓稍停之時，往往會有另一種鼓點輕敲起：你真的有罪嗎？你不一定全錯吧？對你的批判未見得全對嘛！

我帶了很多書到鄉下來。足有三塊磚頭厚的三卷《別林斯基全集》和同樣厚度的四卷《俄羅斯作家論文學勞動》，在中國都還沒有譯本。我想從這些書中尋找一個問題的答案：是不是無產階級革命一成功，文學的使命就全然變了，只許歌功頌德而不再需要批判精神了呢？由此可見我對於自己已經簽名認罪的右派結論中主要罪狀之一是並不服氣的。

我的這種屈服，在很大程度上是爲了早日贏得一個與他人平等的地位，即摘掉右派帽子，恢復正常工作。這樣，方能解除我所愛的妻子和兒女所受的牽連，多少贖回一些我的罪咎。

也因爲我是這群右派中罪惡最大的一個，我自知恢復正常人地位要比他們艱難很多倍。

但是事實上我又並沒有真正這樣做下去。在心中隱秘的王國裡，我依然不甘屈服，不接受失敗，相信有一天還會成爲一個佼佼者。我在艱重的一日勞動之後還常常就着一盞油燈苦讀《戰爭與和平》，找尋托爾斯泰成功的秘密。我仍然繼續打開通向世界的第三面窗子，這一年我利用田頭休息時間背完了一本《英日字典》。

破壞我思想改造的主要罪人，不是我常常被批判的「缺乏老老實實的改造態度」，而是既把我定爲罪人又要求我進行思想改造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本身。它在這一年裡犯下的錯誤，不斷證明着我並沒有全錯，甚至全然沒錯！

從上邊層層下達的「高指標」，引起務實的農民們極大的反感。擴大玉米種植面積和大量引進白薯以及深翻地和密植等，都是違反農民意願強迫實行的。人民公社化進一步剝奪了農民家庭生

活中的自由——必須到公共食堂吃飯，不許種自留地。每天勞動不再記工分，幹多幹少報酬相同。我的房東劉二孩被分配從事理髮專業，於是他的窩洞便成了一個小型俱樂部。晚間收工回來，我一面靠在牆上讀《戰爭與和平》，一面聽着農民們（現在已稱「社員」了）議論政策的是非。他們根本不避諱我，對於共產黨的政策，大發牢騷，大肆嘲弄。有一次他們甚至讓我代寫一封抗議信。

荒謬絕倫的事不斷在我眼前發生。這個山村沒有任何地下、地表水源，卻想在街中心造一個噴泉。人都沒有肉吃，卻要在黃土崗上挖出幾個窩洞，建動物園養獅子老虎！好好的梯田，必須廢棄掉，在上邊建造小「萬壽山」。這是因為毛澤東關於中國農業的未來有一指示：三分之一農田可以休耕，三分之一可以種植菓樹，只須用三分之一種糧。過於虔誠的信徒提前實行了。我自然也成為這些工程的建設者。

接下來就是把全部勞力投入高爐煉鐵的創舉，任令豐收的玉米被丟在地裡無人收割。上百萬斤的白薯也爛掉了。

年終，人們敲鑼打鼓地去參加慶祝人民公社化的全公社大會，每個勞力領回一個紅紙包。回到家來打開一看：人民幣一元正，這就是全年勞動得到的報酬！

那天晚上，二孩（我同一窩洞的伙伴和房東）又拿出他的帳本（上面記着他給人理髮的次數），在油燈下翻看着，嘆息着。他早就懷疑這本帳可能白記，不會兌現的，我多次勸說過他。望着他沮喪的面孔和呆滯的眼光，我心裡很難過。

這天夜裡我躺在炕上不能入睡。外面刮起風。「這是不是中國農民的嘆息呢？」我想。

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中國農村大動盪的三年，我分別在山西和山東的三個縣份的農村中度過。親自目睹和體驗了毛澤東企圖使中國一步登天，超過英、美，使中國和他自己奪得世界冠軍的偉大創舉如何把中國農村從生機勃勃變為死氣沉沉。人民公社化好像抽乾了人民的骨髓，而繼之而來的大饑饉又熬乾了他們的肚腸，直至奪走數以千萬計的生命（主要是農民）。

一九六〇年早春，當我步入第三年勞動改造的場地——山東省高唐縣的一個村莊時，正值狂風呼嘯、黃沙漫天，村裡村外不見人影，路上到處是糞肥無人拾撿，家家的院落凌亂不堪，無人清掃。「好像進了一座鬼城，」我想道，「農民連過日子的心都沒有了！」

一九五九年，半飢半飽的農民已經普遍運用中國人唯一的合法鬥爭手段——怠工（還要繼續運用三十年的）來表達自己的憤怒和抗議了。每天上、下午集體出工到地頭，總要坐下來閒聊半個小時。開始幹活後，也常常一起停下來，手拄着鋤頭（或鋤頭）、下巴倚在手上，再一次地閑聊大半天。到中間休息時，點起烟袋一歇又是個把小時。中國的時間就是這樣白白溜走的，而全民的倦怠、冷漠和鬱悶，也就逐漸使中國人的人種不斷退化到以聽命和依賴（行政當局）為常態、以無所作為為樂事、視積極進取者為異類的地步了。

我所在的山東是中國餓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下放幹部也普遍因飢餓而浮腫。盜竊活動的大浪潮（主要是農民盜竊屬於「公家」即國家和集體的財物），明顯地是被剝奪了一切的農民對於「國家」的報復。

三年饑饉也給中國帶來一點好處：除死掉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全世界死去的人數更多的人

口以外，活下來的人也餓得無心做愛了。偶爾也有女人懷孕，但不久後月經又來了。農村把這叫「化胎」，實則是因為缺乏營養，子宮已無力吸附胎兒，自行墮胎了。

我餓得雙腿浮腫，邁過一個田坎都很吃力。「吃」佔有了我的幾乎全部思維，並擠掉了廉恥感。我偷吃過地裡半生不熟的西紅柿。當我身上只有幾兩糧票和幾角錢時，拉着糞車走過北京市街，我幾經鬥爭，仍然抑制不住去買一丁點兒點心吃的欲望。而我明明知道由於我沒有工資收入，不能像別人家經常或偶爾買些高價食品給孩子吃，我的幾口點心等於是從我孩子的嘴裡摳出來的。

我體驗到：從人性跨入獸性，並沒有多少距離，只須邁出一步……

中國共產黨開始退讓了。全國城鄉的大饑饉和成千萬人死於非命，迫使當政者不得不接受比較符合中國農業水平和農民意願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和自負盈虧，以及包產到戶）政策。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也有所放鬆。在為一九五九年因批評毛的錯誤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人甄別平反之時，右派分子的平反問題也一度提上日程。在試驗新政策的省份安徽，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右派真的被平反了。但此事被毛澤東查知，作出斬釘截鐵的指示：「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不存在甄別平反問題。」於是便全面煞車。經領導授意而寫了平反申辯材料的人，一概被視為「企圖翻案」而陷入更惡劣的境遇。



第八章

靈魂的煎熬

中國有一句古詩，「每逢佳節倍思親」。春節又是中國人一年裏最重要的節日。一九五九年我們這些右派分子的春節，是在比「倍思親」痛苦得多的心情下度過的。下放幹部中非右派的「好同志」在春節前一概返回北京去和家人團聚了。分散在相距很遠的幾個村莊的右派們，在除夕的晚上思念的不僅是遠在他方的親人，而是各種憂思愁緒一古腦兒襲向每個人的心頭。這不是一般的分離，而是在近乎犯人的身分下與家人的被迫分離，已有一年之久了。妻子和孩子兒今天是什麼心境？他們一定是同樣思念著我，而我對他們是有罪的。妻子一定會強打精神，掩飾自己心中的悲苦，強作歡顏，想方設法驅散籠罩在家中和孩子們心頭的愁雲。這是一個淒淒慘慘的春節。放眼望去，還要有多少個春節會在這種狀態下度過呢？一片迷茫。

憨厚慷慨的劉二孩，已經用他僅有的白麵做過幾次拉麵了。今天他體念我的心情，又把最後一點麵粉和了起來，包一頓羊肉胡蘿蔔餡的餃子，作為我們的年夜飯。還弄來一點酒。他不停地和我說笑，我也很想不負他的苦心，但實在裝不出歡快的樣子。

黨把我放到右派中的右派——極右分子的地位，使我每月的生活費連維持個人生活都很困難，並以大量公開的詆毀使我在全國臭名昭著。這，在有一點上倒使我受惠匪淺。這使我和一般右派不同，對自己的未來可以不抱多少幻想。我認定自己是不可能再恢復失去的一切了。這使我把自己擺在和農民同等的地位。不僅現在，而且包括將來。故此，在「大躍進」初期，當我看到報紙上的吹噓，說中國幾年以後全國農民平均能吃到多少肉、多少牛奶和多少水果時，我默默地想，這就是我將來能得到的份額了。我逐漸習慣於和農民一樣地感受外界發生的事情。我和他們一樣對取消工分制以及收入一年不如一年感到不滿，一樣為今年豐收的糧食丟在田裏不收卻夜夜

加班大煉鋼鐵感到心疼，一樣爲實行「放開肚皮吃飽飯」的公共食堂製造成的浪費不滿，一樣爲眼看就要到來的糧荒感到憂慮。

我已經能完全聽懂他們的方言，他們也能理解我的言語了。我的右派身分不僅不使他們疏遠我，反而使我獲得他們的同情，待我如自己人，因而在我面前他們無所不談，甚至開男女之間的大膽玩笑。我這才知道，這裡的兩性關係，並不受中國傳統禮教的多少約束，大家並不以婚外性關係爲恥。

春節後不久，突然接到通知，右派分子也可以回北京了。我們喜出望外，老鄉們也都爲我們高興，却又有些難捨難分。出我意料，竟有那麼多人到我的密洞裏爲我送行，人人還都帶些禮物來——一包包煮好的雞蛋，這時已是比較珍貴的東西了。我爲這種深情感動得落下淚來。

在北京暫時的假期裏，我們並未休閒，而是像一支剛剛從戰場上撤下來的士兵一樣，來一次休整即訓練。要回顧一年來勞動改造中的收穫和問題，訂出下一步思想改造的計劃。

這種活動，我們在山區平順縣已經進行過一次，以後還要每隔一段時期就再來一次。先是每個人自己說一遍，然後由衆人進行批評，包括揭發他本人沒有說出來的事情。不能說人們是不真誠的，然而又不能說沒有演戲的成分。若從總體上說，則這種事情本身就是完全虛偽的。坐在這裏自責又互責的罪人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製造的最大奇冤：明明是出於愛國之心，並且是在黨的主席毛澤東誘導之下說了話，而且是說了正確的話，不算有功倒也罷了，怎麼倒成了千古罪人，成了人人得而恥笑和踐踏的賤民了呢？現在，這些因真言獲罪的人又必須「爲了革命的需要」而說假話了。每個人都變成雙重人格，內心深處並不認爲自己真

錯（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的人爲大災難就證實我們對了。反右運動使全國緘口，毛澤東才有可能倒行逆施），卻必須口口聲聲認定自己是罪人，而且永遠贖不清罪，必須「老老實實繼續改造」。每個人咒罵自己和批評別人的調子都不能比別人低，不然「改造態度」本身就是個問題。有人會在檢討自己時激動得流下淚來，然而若有化學試劑能夠分析那淚水的成份，就有興趣了：一半是由於自己其實爲個人的不幸和冤屈難過；四分之一是由於急於摘掉右派帽子而看來一時無望；四分之一是真實的悔罪和痛苦，這是作爲另一個角色所流出的淚水。

其他的右派應該爲有我這個右派在他們中間而感到慶幸。因爲我永遠是罪人中的罪人，是他們中的重點人物，也理所當然地是每一年改造表現最差、離改造目標最遠的一個。因而在會議上佔去的時間總是幾倍於他人。我也當之無愧，毫無委屈和不滿。因爲還在一九五七年我就認清了一條真理：和我言論的質量與所造成的影響相比，他們其實都算不上右派。這是毛澤東鑄成的一個大錯：不是他和他的戰友們把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就是他太缺乏自信。倘使他僅把幾人或幾十人而不是一百萬入定爲右派，那場運動的荒謬性就不至於過於明顯，他也不至於樹敵過多。

總之，這道算題現在應該反過來演算了：既然每個右派都承認自己認罪仍然不足，改造態度不夠良好，那麼我就必須把自己的不足和不良加碼一倍或幾倍。既然大家都說對於個人未來還抱有幻想，我也就得照樣加碼，雖然我的幻想小得多。既然人人都自認爲在勞動和生活中缺乏艱苦精神，我自然更是這樣……

每個人都真正進入了角色，不能說大家在說假話。儘管用的老是那一套政治詞彙，但仍然能

使被批評者難受一大陣子。可是我仍然堅持一九五八年的一個猜測：一旦有一位領導幹部進來宣布：對不起，一九五七年把你們搞錯了，現在決定平反……我相信這十七個人不會有一個人猶豫，立即會爭先恐後地鳴冤叫屈，要求平反。真正會猶豫的也許又是只有我一個人。

一九五七年對我的批評，只有一條我至今記得很牢，說明當時受傷很重。

我和兩個右派朋友一起到幼兒園去看自己的孩子。我的兩個孩子出來了，站立在我一左一右。我多麼想擁抱他們——我的寶貝！我日夜思念不止的兒女！但是我驚呆了：一向非常活潑的兒子女兒這都是都呆呆的，眼睛都不肯望我，說不清是對我的疏遠，還是懼怕。我的淚水一下止不住傾瀉出來——一時百感交集，覺得我這個父親對不住他們，他們一定受了不少歧視……

在右派自我批判會上，有人揭出這個事實，質問我那時為什麼哭？是什麼感情？是不是出於對黨的仇恨！

我不願回答這個問題。我覺得那個人向我心中扎了一刀。我心裏憤怒地高呼：難道我們這些人都成了野獸嗎！！

我知道我的厄運會株連我所有的親屬，首先是我的妻子和兩個孩子。但究竟他們受到了什麼痛苦和多大痛苦，我恐怕永遠也難以了解清楚。在暫短的相聚中，朱洪自然不會告訴我這些事，擔心會影響我的情緒，妨礙我的思想改造。兩個孩子過於幼小，他們只能在長大以後回憶自己的童年時才能懂得受到過什麼痛楚，以及為什麼。

老實說，雖然我像所有右派一樣必須不斷在檢討中承認自己對黨「犯下了罪行」，其實我認為只有在我的妻子孩兒面前我才是真正的罪人。他們是無辜的，憑什麼蒙受本應由我本人承擔的痛

苦和損失？

中國畢竟有了進步，不再「禍及九族」，「滿門抄斬」了，但是，精神上綿延不絕的痛苦和壓力呢？知識分子和黨政官員，無論黨內黨外，一般對共產黨都十分信任，願意效忠，幾乎沒有什麼人不在爭取入黨。入黨固然是上升所不可缺少的一個條件，但不想當官的人也不甘落後，因為從五十年代初期起已經形成一個輿論環境：作一個共產黨員是無上光榮的，而長期不能入黨則標誌著一個人政治上的落後，好像對子女都欠了一筆債。這就是連許多過去的民主人士也一心靠攏中國共產黨，生前來不及的話，死後也要爭取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的原因。有些知識分子給黨支部月月寫思想匯報，年年寫入黨申請，以致獲得一個黨員的稱號本身成為了奮鬥目標。現在看來相當荒唐，然而這卻是現實。一般農民或工人沒有入黨這個政治需要，在對待我們這種人的態度上就保留了較多的人性，可以同情，甚至幫助和保護。有了入黨要求的幹部和知識份子就不同了，不能放過這種落井下石以表示自己進步的機會，或者，至少也要提防旁人說自己和右派「劃不清界線」。正是這種政治氣氛，使右派及其親人受到更大的壓力。

偏巧我的妻子又是一個進取心和自尊心都很強的人。便在五十年代初期她就開始申請入黨，但是由於黨十分重視階級成分和海外關係，她的入黨問題一再拖延。我成了右派以後，此事便絕無希望了。然而她對自己政治和思想上的要求，却仍然比別人、甚至比黨員更嚴格。這就是說：她必須比別人更多地去奉獻自己，又要比一般右派的妻子承受更多的精神痛苦。

當時她已是《中國少年報》的中層幹部，而這一層幹部中幾乎所有人都是黨員。以她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精神，完全可以承擔更重的責任，然而我卻斷送了她的前程。

我給她帶來的更大的痛苦，也許是她必須常常被要求揭發我的「罪行」和我的思想動向。她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暴露出來的對我的同情，將是她永遠清洗不掉的一大過錯：「與階級敵人劃不清界限」。爲了表明她糾正了這個過錯，她必須更多更激烈地揭發我批判我，而她是愛我並且了解我的，怎麼能滿足那些人的要求呢？

我又不是一般的右派。右派分子在報章上公開受到批判的是極少數，而像我這樣在《中國青年報》上被連篇累牘批判一個多月的更是極少數。我的臭名遠揚，自然要分攤到我的妻子身上。一般右派，不過降幾級工資，我則全部工資都不發了，這又使我的家庭在經濟上也比一般右派困難得多。

上述這些，雖是意料中事，但在三年勞改中，常常使我心膽欲裂。

我體會到，當一個人的厄運給愛他的人造成痛苦時，他本人的痛苦並沒有減去一半，而是兩個人的痛苦都加大了一倍。

從一九六一年春天開始，右派們都被安排到機關農場勞動。

農場分給幾名右派的任務是進北京城裏去運糞到農場作肥料。第一天下午，我們每人拖上一輛上面裝有一個大木箱的雙輪車！徒步行十五公里，進入北京東直門，這時已近傍晚了。我們把糞車放在報社院內，回家過夜。第二天清晨，再拖著糞車到報社以及附近的宿舍院內，打開化糞池，一勺勺把糞尿裝進木箱，然後拖著大約六百斤重的車子，徒步行回農場。

掏糞向來被看作最低等的工作，儘管在這個人人爲飢餓發愁的年代，誰都明白肥料的意義。

最低等的公民從事最低等的勞動也是理所當然，因而並不會太使我難堪，但每次回家，我身上總染著糞臭，連我自己都聞得出來，我怕朱洪會討厭——她的嗅覺又特別靈敏。我一進家門，就換一身衣服，但總覺得臭味仍留在身上。

然而她好像根本感覺不出我衣服上的味道。似乎也不是故意掩飾。我想她對於我能多回幾次家還是高興的。兒子女兒放學回來，家裏多了一個爸爸，而且是那樣愛他們的爸爸，氣氛就歡樂多了。

我慢慢知道了一點真情。一九五七年前存下的僅有的一千餘元存款已經用完。現在全靠朱洪一個人的月薪養活我以外的五口之家——我姊姊的兩個女兒也都住在我家，上中學。我父親那邊，逢年過節也需要有些接濟。朱洪必須杜絕一切可以節省的開支，生活十分拮据。四個孩子的衣服，必須不斷地以大改小，以舊翻新，又要使他們的穿著不至於太寒酸。這樣，我們家那架縫紉機就不得不天天運轉，每晚答答地響個不停。當它終於停下的時候，朱洪的手還不能停，她又再給全家六口人補襪子了。她本來在工作上就是不甘人後的，現在她加倍工作，加班，生病不去看，仍然不足以贏得常人應受到的尊重和信任。如果我完全喪失了與人平等的地位，她至少也失去了一半。深夜，當孩子們入睡後，她一定常常爲對我的違心的批判或遭到的冷言冷語暗自哭泣。

當她低頭補襪子時，我見她不時抬起一隻手去揩眼角，這是淚囊出了毛病。我不在這幾年，她流過多少眼淚？我姊姊也有這個病，也是她丈夫造成的。那是另一個時代的事，只不過是夫婦之間的感情問題。而我這個丈夫給妻子帶來的卻是政治上的壓力，衆人的鄙視，經濟的窘困，以及所有這些條件之改變的遙遙無期！

朱洪還必須用她的雙手去解決大饑荒給我們家造成的特殊困難。那時凡有中等以上收入的人家，總要去買些高價點心和糖果以補充日常配給的不足。我的鄰人每隔幾天便要到自由市場上買一條羊腿。而我們家卻只能靠一般市民的定量配給。每到星期天吃早飯時，朱洪便把這個月每人半斤的低級點心平分給每人一塊，最後多出的一塊總要放在我的面前——因為我是從事體力勞動的。我實在難以下嚥。

她從不疾言厲色地對待孩子。但是有一次她卻把大洪打了，因為他被同學攔攔，拿走了放在桌上的錢去買高價糖。她也知道，孩子是因為餓，敵不過周圍小朋友吃高價糖果的誘惑，她並不是捨不得那五塊錢，儘管那也是一筆可觀的開銷。我出事之後，她對兩個孩子的管教特別嚴格，多半是爲了使他們將來不像我這樣「犯錯誤」。

她一定後悔和自責過。男孩子已經爲自己的父親受到凌辱了。我只偶然聽到一次——大洪和院子裏的孩子大聲爭吵，那孩子拿出最銳利的武器：「你爸爸是右派！」這一聲喊叫，有效地制服了我的兒子，我再也聽不到大洪的聲音了。

一九六一年秋季，右派的勞動改造終於完結，可以回報社工作了。

我被分到國際部資料組，工作是從報紙上剪貼需要保存的資料，分類歸檔，兼管借閱。同時，外文報刊也由我管理，還不時需要我從俄、日、英文報刊上摘譯一些文章，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

因經濟危機帶來的政治氣氛的鬆弛，這時正繼續發展，因而在我們這些尚未摘帽和已經摘帽

的右派同「好同志」之間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了。一個人開始把另一個人當作人看待，而不過分計較他身上的政治標籤。兩位摘了帽子的右派被任命爲部門的副主任，其中一位後來甚至被評爲勞動模範，他的大照片竟然被懸掛在團中央的禮堂裏。國際部的人稱我「老劉」，相互可以說說笑笑，甚至有兩位女編輯還請我教她們俄文。

不過這也會帶來於我不利的結果。他們有時會忘記我仍然是個戴著帽子的右派，也把我叫去參加本來我不應參加的會議。會議進行中間，政治感官比較敏銳的人會忽然發現這麼一個異己分子在場，於是便大喝一聲：「劉賓雁！退出會場！」我便在幾十人或上百人的衆目睽睽之下，十分狼狽地匆匆溜走。此時那種如蒙大恥的心理，我記得很清楚。在每日每時處於賤民地位幾年之後，一個人居然還會不能習慣於當衆忍受羞辱！人之所以異於禽獸，此乎？

朱洪不說，我也不說，彼此心照不宣地盼望著給我摘掉右派帽子那一天的到來。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卅一日下班時，我在樓梯口看到一張不大的告示，上寫：根據團中央黨委會決定，從即日起，給以下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我的心急劇地跳起來，以最快的速度讀完這張名單——心幾乎要跳出咽喉，我又重讀一遍——沒有！所有尚未摘掉帽子的人都名列其中，唯獨沒有我！

這張紙像是一團火，我被它燒灼得匆忙逃離。我昏昏沉沉地走出辦公樓大門，走出院落，走過我已經走過無數次的街道，但我不知道自己在走向何方。

我怎能走進那個家門呢？我怎樣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告訴我的妻子呢？她等待我結束賤民的身分已經四年有餘。到昨天爲止，還是十二個人戴著右派帽子，而現在只有我一個了。她身上的壓

力一天之間無異於增大了十一倍。我怎麼向她交代，用什麼話來安慰她呢。

對於這個局面，我和她都是沒有準備的。團中央和《中國青年報》的領導幹部中有不止一個人表示過我在思想改造中還是好的，並且還暗示過我的右派帽子不要太久就可以摘掉。

此時此刻，我若能得知全國各地有數以萬計的右派還要到一九七八甚至一九七九年才能摘掉帽子，我的心情就不會這樣懊喪了。然而在一九六一年最後的一個晚上，我心中卻只有一個念頭：中國青年報社內只有我一個人是右派了！

這個念頭伴隨我很久很久。並且我始終不知道為什麼。我找過《中國青年報》黨委和團中央的一位書記，他們都不正面回答我的問題：為什麼我不能摘掉右派帽子？

每天深夜二時或三時，我會一下子醒來，再也不能入睡，頭腦裏出現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只有我，仍然是個右派！接下去想到的便是我身邊的妻子，另一個房間裏酣睡著的我的兒女。從四年前起，我已經對不起他們；而今後，我的罪過將越來越重。

我明知道這是一個我找不出答案、看不到出路的問題，然而我又無法甩掉它。

我開始脫髮了，一片一片地脫髮。醫好了一塊禿斑，另一塊又禿了。

白天，我照常工作，默默地剪貼一張又一張的報紙，默默地去代替國際部的編輯們從事分配下來的勞動任務。他們有時有放不下的工作，有時並沒有。反正我是一個現成的勞力，只有我一個人不能拒絕任何指令。一九六三年的一天，我在這種勞動中負傷，幾乎瞎掉一隻眼睛。

一九六二年年初起，中國政局出現一點轉機。當時，我並不知道一月底黨中央召開了七千人

大會，毛澤東為形勢所迫，不得不承認他對於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大饑荒負有責任；也不知道北京黨內十七級以上幹部輪流脫離工作，整天開會，回顧一九五八年以來黨的工作中的失誤和提出批評意見。

我是在一次我的右派身分僥倖被別人忽略，被叫去聽一個重要會議的錄音的時候，偶然聽到陳毅在廣州戲劇座談會上的講話，得知政治氣候大變化的。他說以後將不再對文藝工作者戴帽子，打棍子，有問題可以自由討論，也將不再稱知識分子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了。他諷刺地宣稱：從現在起，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脫資產階級之帽，加無產階級之冕。

我興奮不已。不久，《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題為《文藝要為全國人民服務》，不再提「為工農兵服務」了。《人民文學》刊載了王蒙的一個短篇，《中國青年報》又發表了方之的一個短篇《出山》。兩個人都曾是右派，顯然已經摘掉帽子。然而這也已然是一種寬鬆景象。

方之的小說很有力度，反響很好，我也很喜歡。其實我是在大家議論這篇小說時才深知他曾是右派的。我開始付度自己的未來了。一旦我也摘掉右派帽子，是不是也可以繼續寫作呢？左思右想，最後黯然放棄了這個指望。我這個名字太臭了。從不給我摘帽子看，我原先的想法——我是右派中的右派，是想對了。一定還會對我另眼看待的。

那麼，難道我就如此下去，以剪貼報紙和翻譯些無足輕重的小稿了此一生嗎？當然不！

我心中那一小塊「資產階級王國」仍然很頑強。不，不能屈服於逆境，一定要有所作為。我要使我的妻子和兒女有一天為我感到驕傲。我將以此補償這些年給他們帶來的災難。

不是讓我管外文報刊嗎？我有意訂了很多份蘇聯的報紙。這是一個我比較熟悉的國家，赫魯

曉夫又正在那裏執行變革。讓我來研究蘇聯吧。我相信自己能有所發現。

其實我的野心並不以此為滿足。那時歌唱家劉淑芳很走紅，她的歌聲確實頗有魅力。有一天從廣播中又聽到她的歌聲。忽然，從我內心深處，完全無意識地，有一個欲望逐漸膨脹起來，充滿我的所有血管。我好像要大聲喊出一句話來：「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寫出一部震撼全國的作品！」這個欲望使我自己都吃了一驚。我想，即使可能，那也是很遙遠的。

大約是一九六二年的一天早晨，當我又一次見到北京街上重新出現了炸油餅的油鍋時，心想：這次饑荒過去得還算快。朱洪幾次出差回來，都帶來些好消息：各地食品的供應明顯緩和了。

這也就是毛澤東決定再一次收緊政治局面，把中國投入另一場「階級鬥爭」的時候。後來中國人摸出一條規律來：「剛剛吃上一碗飽飯，就又要折騰了！」

在意識形態領域，叫做「反對修正主義」，主要是指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蘇聯。在農村，則叫「四清」，在城市裏叫「五反」。其實是又一次反對所謂的資產階級。這個階級不是七年前消滅了嗎？不夠，人們頭腦裡還有，而且「三年困難時期」又使這種東西氾濫起來了。

我的右派身分又一次被忘記，因而又僥倖聽到一次關於發動五反運動的文件，其中列舉「資產階級進攻」的事例中，有一件事引起我注意：北京市宣武區的兩個女青年，高中畢業後找不到職業，集合幾個青年人辦了一個膽印社，維持生活。這種事竟被指為「搞地下黑工廠，企圖復辟資本主義」。顯然，至少那兩位女青年不會有好下場了。會後我反覆思索：你那個社會主義不靈，不能人人就業，人家自力謀生找碗飯吃，這無論如何算不上「復辟資本主義」！這幾個青年人也太

冤枉了。

然而我並未繼續思索下去。我與外界已經隔離了幾年。報紙上連篇累牘的批判蘇聯的文章也似乎不無道理。關於雷鋒、王杰、焦裕祿^①等先進人物的宣傳已掀起全國性的熱潮。這兩起宣傳，目的都是要使中國人「革命化」，放棄一切對個人物質享受的追求。在精神生活中拒絕一切非無產階級的中外遺產，人人都要做清心寡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苦行僧，用政治塞滿生活的每一個毛孔。

我相信和接受了這個宣傳。真得佩服毛澤東，他最了解中國人，知道只要把人們心中「政治」、「革命」、「階級鬥爭」這幾根弦絀得緊緊的，他們就會接受一切來自他的思想庫中的口號。而報紙是推行這一套策略最有力的工具。

我心中並不是完全沒有懷疑。這時，報紙上關於農村的報導中，常常說中國各地農民在如何

①雷鋒，湖南一個貧窮家的孩子，六〇年代初期是瀋陽軍區某部的一個汽車兵。一九六三年起被軍隊和黨的宣傳部看中，成為解放後最大規模的一起學習先進人物運動的宣傳對象。著重號召全國人民學習的是：他對於共產黨感恩戴德和絕對效忠的精神；他對毛澤東的無條件崇拜和追隨——「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做」；生活上的極端節儉。學雷鋒運動對於收攏當時大陸已開始渙散的人心、樹立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和開展瘋狂的文化大革命，都是重要而有效的準備。王杰，一次軍事訓練中手榴彈提前爆炸，為掩護其他士兵而犧牲自己的一名士兵，也是毛澤東的忠誠信徒，他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後來成為深入全國民心的名言。焦裕祿是河南省蘭考縣的中共縣委書記，為改變該縣農民的窮困狀態和惡劣的自然環境，他長期帶病工作至死。一九六五年，他也是被作為效忠毛澤東路線的先進人物在全國廣泛宣傳的。

「爲革命而種田」。我有些納悶了：我曾在農村生活四年，離開那裡才不過二年。那時農民還在怠工，連過日子的心思都沒有，怎麼這麼快就都成了革命者呢？

但我又一次沒有深思下去。

「興天理，滅人欲」，毛澤東一定從宋明理學那裏得到了重要的啓示。當人們把人的最基本的慾望都看成邪惡，卻又不可能把慾望撲滅得乾乾淨淨的時候，也就會成爲政治蠱惑最現成的對象了。一九六二年春節，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第一次春節晚會。無非是女人打扮得漂亮了一點，燈光也許稍暗了一點，一位至今仍健在的富於政治敏感的詩人，一下子來了政治靈感，趕忙給毛澤東寫一封信，說作協已經「修」了。毛立即利用這個機會，大筆一揮，寫了重要批示，由舞會一下拔高到政治，指出中國作家們「已經到了裴多菲俱樂部的邊緣」，眼看就要變成反革命了。由此便開展了一次全國文藝界的反修運動，一直延續到文革。

其實，毛澤東並不怕文藝界有幾個人「亂搞男女關係」。令他憂慮的是大饑饉使他的個人威信有所動搖，而大學生和知識份子中的離心傾向而又在發展。他把道德問題直接引伸到政治，目的是爲了加強他對於中共和中國的控制。

一九六四年初，報社一位副總編輯調到《中國青年》雜誌的前夕，我找他談了一次話。兩年來我一直爲一個問題苦惱：究竟由於什麼原因，我的右派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

他大約被我的誠懇打動了，向我透露了真情：「你的問題，非但不是報社所能解決的，連團中央也決定不了。事情卡在黨中央書記處「那裏！」他沒有再往細處說。

我這才恍然大悟：我的右派帽子摘不掉，全然不是由於我個人的原因，那麼大約是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一批罪大惡極的右派有一個名單，一概不能摘掉帽子了？

我的童年好友告訴我另一個消息：一九五八年蘇聯作家奧維奇金曾給周恩來寫過一封信，認爲我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定錯了，要求給我平反。周看過信，勃然大怒。按中國人的邏輯，他立即會推想奧維奇金是應我之請而寫這封信。

這正是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我最怕奧維奇金會做出來的事。我曾再三向他表明我已接受了黨的這個決定。他一定以爲我在信中寫的是違心的話。他太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了，不要說是他，即使是赫魯曉夫寫信，也只能是幫倒忙。

從一九五八年奧維奇金突然中止與我通信看，由這種說法是比較可靠的。多半是周恩來把這件事通告了蘇共中央，奧維奇金遭到了黨內批評。兩種說法不同，卻也並不矛盾。我既屬於罪大惡極的右派，又發生了一九五八年的事故，因而被列入特殊人物的名單，是完全可能的。

一九六六年二月的一天，團中央一位書記到報社來開會。散場時我們相遇，他向我透露，我的右派問題可能會在近期解決。

當晚我把這個消息告訴朱洪。我們期待這一天實在太久了。這是近九年來我們最興奮的一個晚上。夜深時，朱洪說：「可憐我們的兩個孩子，受了多少苦！等你問題真解決了，我們再生一個孩子，給他取名叫『新』——一切都重新開始，讓他不再委屈！」

這一年我四十一歲，已經覺得很老了。但三月間真正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以後，我陡然覺得自己年輕起來。

當我幾年來第一次揣著報社的介紹信，迎著春風，騎車馳過北京的大街小巷奔赴國際關係研究所去查閱資料時，心中說不出的暢快，彷彿感覺得出長期沉睡在我血管裏的一種什麼力量正在甦醒，正在膨脹……

其實，我不過是恢復了正常人的身分而已，何況還並不完全——我仍然不過是一個「摘帽右派」。即使把一九五七年以來這段歷史全部抹去，我也仍然沒有恢復黨員的身分。而在這個時代的中國，一個非黨員也是被看作一個不完整的人的。有什麼值得那麼高興呢！人啊，你是太易於滿足的動物！

然而我是既高興又滿足。那年報社組織到頤和園春遊，正逢我妹妹從瀋陽出差來京，於是我們一家人都去了。在春日的陽光下，我覺得兩個孩子笑得分外可愛，朱洪臉上的陰霾也一掃而光，我的心好像在歡唱。那一天我們拍了許多照片，想留住這明媚的春光。

然而，春光也太短暫了！

我哪裏知道，命運把我輕輕托起，只是爲了把我捧得更重！



第九章

人性的消失

一場新的打擊正悄悄準備著。

每天晚上，我下班回家以後，坐在我對面桌子前辦公的一個女共產黨員便打開我從不上鎖的抽屜，拿出我下鄉期間的三本日記，盡情地摘抄。一九六六年六月初的一天早上，我便在樓道上看到一滿牆的大字報，標題是「右派分子劉賓雁反黨野心不死」。我日記中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的記載，本是當時意欲克服的「錯誤思想」，統統變成我攻擊中國共產黨的言論了。

我愕然良久，因為我絲毫沒有精神準備。這次襲擊，比一九五七年那次來得還要突然，因為那一次我至少還略有不祥的預感。而這一次，從一九六五年便開始了的攻勢是集中在吳晗、鄧拓等人身上，無論多麼富於想像力的人也不會想到九年前便已中止其政治生命、再無從事任何政治活動和發表言論的權利的人，會成為這場文化大革命的首批對象。況且，這個人僅僅三個月前，剛剛被權威方面認為已經是個改惡從善的人，才給他摘掉右派帽子的。

我自然知道這絕不是個別盲動分子的自發舉動，而是經過領導指揮和充分策劃的。我只是不能理解，也堅信自己毫無錯處。大字報上巧加摘引的都是我當年日記中極力要糾正的思想，早已成為過去。「這種手法未免太卑鄙了！」我想。然而我只能硬著頭皮準備接受黨的鐵拳，我毫無自衛能力。

看過不久以後造反派大字報中揭發出來的材料，我才明白這是一起陰謀。毛澤東這次發動文化大革命，和往常不同。因中央的頭頭摸不著他的意圖，但預感到自己可能遭殃，於是便決定抓一批人來轉移鬥爭目標。在青年報內部，當權派經過嚴密籌劃，擬定了一個十五人的名單，作為

第一批打擊對象。這些人都是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已經打擊或準備打擊而尚未完成的人。我和一九五七年的副總編輯鍾沛璋（他於一九五八年被定為右派，一九六〇年就已摘掉帽子，）首當其衝。

一九五七年以後，我以為自己已經降到一個人可能降落的最低點，政治境況絕不會再壞了。這個幻想在一九六六年六月的幾天中便被粉碎了。

我立即又一次被同人們隔離開來。在我辦公室對面的房間裏，國際部的編輯們在研究對我的鬥爭策略。我東邊的辦公室裏，則有一張又一張進一步揭露、批判我的大字報在書寫中。

我明知道自己沒有任何過錯可言，然而緊張的氣氛使我預感到這一次對我的打擊來勢之猛將超過九年前那一場運動。權力越是非正義，便愈是猙獰。我雖然堅信我的無辜，但對面辦公室裏正在排演的閃電和雷鳴，仍使我忐忑不安。我明知大字報只能是連篇謊言，但它聲勢之猛畢竟會使一些人相信，隔壁那抄寫中的大字報的紙張窸窣之聲仍令我聽來不免心悸。

他們終於叫我去接受審訊了。為了表明我已不再是同事，從此呼喚我的名字時，音量都要加重幾倍。

最熟悉的辦公室裏坐著最熟悉的七個人，只不過七張面孔全然變了。七個法官，一個被告。他們坐在各自的寫字枱前，我一人站立在辦公室中央。主審者劉祖禹的經歷和政治性格，使我斷定他將是對我最凶的一個，因為這場運動是他又一次表現自己和贏得領導重用的機會。幾年來他的面孔和聲音總是隨著政治空氣的變動而變換的。果然，他的第一個動作是猛擊桌面，同時大聲喊道：

「劉賓雁！你必須脫去偽裝，老老實實交代你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新罪行！」

我這時倒相當鎮靜了，回答說：「一九五七年之後，我再也沒有這種罪行。不然，三個月前，團中央也不會摘掉我的右派帽子。」

這時是一位女將拍桌子了，聲音尖利到聲帶將被撕裂的程度：「右派分子劉賓雁！你放聰明些！你以為我們不了解你嗎？你休想朦朧混過關，我們對你的罪行一清二楚！」

我說：「你們早就認為我應該摘掉右派帽子了。不經你們同意，團中央是不會作出那個決定的。」我心裏暗暗奇怪，這個女人怎麼一下子變成凶神惡煞的樣子？她和主審者不同，並不是政治上很積極的人。我們同住一個院子，平時也是客客氣氣的，她並沒有特別表現一下的必要嘛，怎麼今天像有殺子之仇般地對我咬牙切齒呢？

她更加凶了：「你休要狡辯！給你摘掉帽子，是有人包庇的結果。在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裏，你再堅持反動立場，必定要粉身碎骨！」

七個人一個個都聲色俱厲。另一位也一反常態，幾乎每叫喊一聲都要跳起來，我理解，是因為她丈夫也是右派，她本人積極要求入黨，但家庭成份不好，所以必須表現積極。那個身材高大的編輯兼畫家姜某，是因為母親曾在美國留學，離婚的父親背景也比較複雜些，表現激烈些也是可以理解的。倒是新從部隊調來不久、平時給人印象似乎比較「左」的年輕婦女，並不這樣猙獰可怕。同是前右派妻子的另一位婦女，也溫和得多。

他們既拿不出任何事實，也講不出什麼道理，但我仍然不能不是敵人，他們不能不是絕對正確。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優點。最後，「勒令」我必須遵守幾條紀律，繼續交代反動言行，

便放我走了。

接著，命令我交出三本日記，抄走我四年來積累的有關蘇聯的資料，又派二人到我家中抄走我的所有信件和五十年代以來所有筆記本。事先，我已偷偷撕掉幾頁可能被他們用來攻擊我的記載。同時，關於我的一些大字報繼續張貼出來。沒有任何事實，都是虛張聲勢，咒罵和恫嚇。

六六年八月的一天，正式宣布給我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監督勞動。地點仍然是九年前第一次宣布我為右派的那個大飯廳。那時有我妻子在廳眾席中，這一次則除妻子外，還有我十三歲的兒子在場，他是和小朋友偶然到這裡看熱鬧的。兩次，我都因親人與我一起蒙受羞辱而感到加倍痛苦。

雖然我從一開始就成了這次大革命的專政對象，但我對它的興趣可與我的身分很不相稱。我不喜歡它在意識形態上那副極左的面孔，但是它反對官僚主義、黨內特權階層和腐敗現象，卻使我覺得這未嘗不是中國的一個機會。我雖然已被取消了參加大革命的權力，仍躍躍欲試，很想寫幾張大字報和參加一個組織。但這是不可能的。

這正是北京市大街小巷「批四舊」鬧得最凶的時候，我已失去直接觀察這非凡景象的機會，只能在吃午飯時從印刷廠的工人們的議論中聽到。紅衛兵把所有歷史上曾是官僚、地主、資本家、清皇族、漢奸、妓院老闆等等，總之有過劣跡但早已受過清算和懲罰的人，以及對新政權始終效忠，但如今被視為「三名三高」的修正主義精神貴族——名演員、名作家、名畫家等人拖出住宅，掛上牌子，下跪的下跪，遊街的遊街。這些人自然被抄了家，所有金銀珠寶、名人字畫等等都被洗劫一空。很多人經不起人身侮辱或烈日下無休止的折磨而告別人世。一位工人問著另一位工人：

「到護城河去了嗎？好些死屍，把河水都堵了！」

我十三歲的兒子也被捲進這場浪潮。他為了證明自己夠當一個紅衛兵，首先要革老子的命。在同伴的慫恿下，他做了一個當時「五類分子」大都要佩戴在胸前的黑胸章，上寫「右派分子劉賓雁」，準備叫我佩戴。但他終於未能壓抑自己的天性和衝破父子之情，不忍對我下手，而僅僅在我們家門上貼了一個條子：「劉賓雁，你必須老老實實，按時上班回家，不許亂說亂動！」

十二歲的女兒小雁，加入了街道上孩子自發組織的紅衛兵，戴上紅袖章，高興了幾天。一天晚上我回到家中，見她一人坐在床邊流淚。我問她怎麼啦。她嗚嗚咽咽說了幾個字，我聽不清，再問她時，才明白她說的是「把我撤了！」自然是因為父親是右派，所以不讓她當紅衛兵了。我和她一起傷心，雖然明知那個袖章並沒有什麼價值。

對我的衝擊，即時並且以幾乎同樣的力度波及到朱洪。她先是保持沉默，抵制了幾日，終於不得不屈從《中國少年報》內部人們的壓力，寫了一張大字報，要我坦白交代我的罪行。那當然只能是空洞無力的。

我父親是在我摘去帽子後一段時間來北京的，沒想到沒有幾天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我們把一切瞞著他。他因患白內障，也許看不清我和朱洪故作鎮定的虛偽笑容。後來因為我又一次被停發工資而造成經濟窘迫，使我不得不送他回家。

總之，這個家庭剛剛見過三個月陽光，現在又被罩在愁雲慘霧下。

《中國青年報》和《中國少年報》的編輯、記者及印刷廠的工人很快就分成了兩派——以工

人爲主的「造反兵團」和以編輯爲主的「星火燎原」，互相鬥了起來。這時，他們一致鬥爭的主要對象已是「走資派」，對我們這些早已被打倒過的人已無大興趣。這樣，我便有了較多自由。每天打掃完樓道和廁所，便騎上自行車到王府井大街看大字報，買各地造反派印行的小報。

雖然從文革一開始我就又一次成爲政治囚徒，我對於從批判《海瑞罷官》、《二月提綱》以來推行的老一套極左的意識形態及政治路線有強烈的反感，但文革的某些方面卻在我內心深處引起共鳴，喚起我很大的興趣。

這年夏、秋季，一群又一群的紅衛兵衝進報社院子，在揪鬥走資派的同時，也往往找我去陪鬥。我不願意受到凌辱，有時便躲到我的資料室裏，把門反鎖上。我從面向院子的窗內，偷偷向外窺探。這些年輕人並不都是粗暴的。他們常常把總編輯和副總編輯圍住，同他們講理和辯論。他們的那種無視權威的批判精神和叛逆精神，喚起我對自己青少年時代的回憶。我就是這樣走到共產黨一邊來的。然而十幾年來，共產黨卻以各種手段熄滅了這種革命精神，終於使自己成爲這種精神反對的對象！

毛的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造反有理」的號召，把文革初期全國各處被當權派按過去政治運動的習慣手法當作第一批對象打擊的人解放出來。這些人大都是多年來或因有不同政見、或因家庭成分不好或其他原因而備受壓制的人。各地以風暴般的勢頭成立起來的各種政治組織和自發創辦的各種報刊，使人們自一九四九年來第一次享有了有限的政治自由和言論自由。這也是我自少年時代以來所嚮往的局面。它們都打著「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旗號，但是在按毛的號召反對「走資派」的同時，他們也是在反對毛推行多年的壓制和打擊民主力量、保護黨內

特權分子的路線。在各地大字報和各種小字報上，揭露了黨的各種錯誤和黨內的各種黑暗現象。一些黨的機密文件和毛的內部講話被公布出來。中國人民第一次有機會了解黨內的真相，黨的神聖外衣被掀掉了。各地都有一些右派起來要求翻案，甚至成立了自己的組織，辦起了自己的報紙。我密切注意各地形勢的發展。我爲右派之子、高中學生遇羅克所寫的批判唯成份論的文章叫好，又爲他的慘遭殺害而悲哀。各地派別之間的武鬥使我憂慮。王力、關鋒和戚本禹的得勢與垮台的背景是什麼？我很想了解究竟。老實說，我對於上層鬥爭，對於那些被打倒的老幹部的命運並不太十分關心，我關心的是這場文化大革命中群眾有了空前的民主權利以後，中國的政治生活將發生什麼變化？我猜想並且希望這將會帶來中國的民主化。

然而我看到的卻是中國的群眾有了一點民主權利以後，立即分裂成兩派或三派，相互火併起來。雙方在政治傾向上小有差異，但熱衷於奪取權力和不擇手段地壓倒對方則是一致的，也同樣狂熱地把忠誠於毛澤東引爲最大光榮。軍隊的介入和支持一派壓倒另一派，自然起了決定性作用，但拿槍的中國人顯然是充分地依靠和利用了不拿槍的中國人固有的心理性格上的劣根性。大混亂和大屠殺，儘管我所知道的無論就規模或殘酷程度上都遠遠不是最嚴重的，但已足夠使我震駭不已了。

我曾久久地找不到對一個問題的答案：這些從未見過法西斯分子是什麼樣子、也無機會間接了解殘酷虐待同類的事實與情景的青少年們，他們那種冷酷無情的心腸和那些慘無人道的手段是從哪裏學來的呢？……沒有別的來源，只能是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在各種形式的宣傳和實踐中受到的感染和訓練。

然而當一九六八年六月我被勒令不許回家，必須在牛棚接受政治審查時，文化大革命已被牢牢控制在軍隊手中。很像一九五七年反右，許多群眾組織中真正意欲使中國走上另一條道路的先進分子，這時已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失去了自由，甚至被判處長期徒刑。

牛棚裏本來就關著兩類人——五十年代以來受到政治打擊或壓抑的人，以及施加這種打擊和壓抑、甚至靠這些而上升的當權派。歷史是很會開玩笑的。我們一起勞動，一起被像牲畜一樣吆喝著走過街道前往會場去接受批鬥，一起在每人一張的小桌子上寫交代和檢討，每日早晚一起站在毛的像前「請罪」，一起被勒令背誦毛的語錄，而當背錯了時，又平等地遭受訓斥或罰站。然而我們分明是兩個營壘裏的人。

現在這兩類人又被分為兩類：每晚可以回家和不准回家的。我除了是沒有改造好的右派外，還被懷疑為叛徒和蘇聯的特務。

這年冬天，我的心情很壞。中國已陷入不同派別的軍隊和群眾組織的一團混戰之中。許多優秀青年死於武鬥或刑訊。看不到這個國家的希望在哪裏。我個人的前程更是一片黑暗。一九五八——一九六六年我曾認定我的政治處境已壞到不可再壞，現在卻連人身自由都喪失了，必須忍受痛苦得多的凌辱。

我的身體極度虛弱，夜不成寐，體重下降了十幾公斤。

每天早晨我都要去打掃《中國少年報》編輯部的紅樓。我常常信步走到樓頂，放眼向東眺望，那是我家的所在。是霧？是烟？濛濛中什麼也看不見。我非常想念孩子。兒子和女兒在我被宣布隔離審查的那個雨夜給我送行李，女兒哭得淚流滿面，大約以為我再也不能和他們團聚了。現在

他們在哪裏？在想什麼？我的妻子（她每天就在我腳下的這幢樓裏工作），你還相信我是無辜的嗎？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想到要死。前十年，我是在為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的希望下生活下來的。現在生活既無任何樂趣可言，也再無希望。然而，我捨不掉妻子、兒女。一旦不清不白地死去，反而會加重妻子兒女的負擔。牛棚裏的兩個人都會想走這條絕路，一個跌殘了腿，一個摔掉了滿口的牙齒。於是，我放棄了棄絕人世的念頭。

一九六九年四月，爲了去五七幹校，給了我七天自由，回家去備辦行裝。

久別後的團聚本來應該是歡樂的，但在我的家裏卻充滿了悲悽。查了將近一年，我是不是一個有罪的叛徒，是不是一個蘇聯特務，還沒有弄清。這時中國正在經歷二十年來政治空氣濃厚到令人窒息的時期。一個可能是敵人、但同時又可能不是的丈夫和父親突然在家中出現，一種難以言狀的複雜情緒便使我和孩子們頓時拘束起來。他們顯得更大了，但房間卻顯得空落落的。

最爲難的是朱洪。她對我的政治面目雖然也許還是半信半疑，畢竟更成熟些。她應該教孩子以什麼態度對待這個父親呢？很難辦。我知道，現在再同女兒告別，她不會像九個月以前那麼痛哭了。

朱洪怕大洪在這鬧烘烘的混亂環境裏學壞，決定帶他到幹校去，女兒則留在北京繼續上中學。要準備三個人的四季行裝，但財力已經捉襟見肘，即使像朱洪這樣經過十幾年艱難生活的人，現在也發愁了。不得不把我們結婚時做的藍布褥子拆開，用這些布做棉衣。

離開北京的最後一刻鐘，掌權的左派工人和編輯還要對我們這些假想敵人的自尊和感情來一次踐踏。「專政對象」坐在車廂的一頭。我的兒子爲了傳達一句母親的話，走到我的身邊，立刻被申斥回去。列車已經要開動了，左派們忽然靈機一動，把這些罪人叫下車去，在月台上列隊，以訓斥的口吻訓話。這種話我已聽過多次，這一回卻特別難受，因爲這也是對於我們家屬的折磨——他們正從車窗和站台上觀望。

五七幹校設在河南省信陽地區的潢川縣，原是牧草茂盛之地，現在要費很大力氣改變爲稻田。一千餘幹部薪水照發，從事極原始的手工勞動，效率遠遠低於收入只及他們幾分之一的農工。這是毛澤東爲了使幹部「鍛鍊思想」而付出的「學費」。而他又明確表示過這些「舊時代」受過「舊教育」的人不能再用了。

「走資派」一批批離開牛棚，在文革前夕他們爲保護自己而列入黑名單的我們這些人卻依然是「專政對象」。我常常和妻子、兒子在勞動中或走路時不期而遇，卻不能說話。

幹校的學員們一面勞動，一面繼續追索新的階級敵人。他們同時還必須對於已經揪出的階級敵人繼續批鬥。理由總是找得到的。我讀馬恩全集或魯迅的作品，可以批鬥一次：爲什麼不學毛的著作？爲什麼要讀日本版的？我在閒聊時隨口說了一句：「人類真無能，連蚊子也制不住！」又爲一場批鬥會提供了主題：「這是對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攻擊！毛主席教導我們：人民，只有人民……」

這種行動，帶有表演性質。批鬥我，我不能拒絕參加，叫我低頭，我不能不低。但讓我回答

問題時，我卻只能說我的真實想法。於是，斥罵一通，喊幾句「階級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之類的口號，階級鬥爭的儀式便宣告結束。我已被剝奪了一切，除了動用肉刑外，已再找不出新的懲罰辦法。

算來我被錯劃爲右派的二十二年裏，有十五年是以「階級敵人」身分在被專政的狀態下度過的。比起死於非命、長期坐牢、妻離子散的人來，我是個幸運者。我受到的損失，除二十二年人生最美好的時光外，就是長期賤民地位造成的壓抑心情給我身體和精神帶來的損害。回顧那段生涯，分析我的心態，我發現：我並非每時每刻都想著自己的非人地位，這是不可能的。但可怕的是在潛意識裏，有一塊沈重的石頭無時不壓在我的心上，無論我在做什麼或想什麼，它都在我意識的底層撞擊著，無聲地叫喚著：你是任人侮蔑的賤民！你對妻子孩兒有罪！你今生今世永無翻身之日！

我從未挨過打，沒受過任何肉刑或體罰。但我深信，人格受到的侮辱要比皮肉之苦痛苦得多，留下的傷痕也更重。即使在我這個狹小的生活圈子裡，也能感受到一場倒行逆施的政治運動如何把人性中最卑鄙骯髒的東西釋放出來，使邪惡暢行無阻。

我靈魂得到暫短的休息，是當我和農民一起生活的時候。他們待人，不看政治標籤。他們對不幸者的同情，常使我感動得流下眼淚。

一回到知識分子中間，情況就變了。文革中間對我的傷害最重的，並不是軍代表，也不是造反組織的頭頭，而是一個知識分子，一個讀完兩次大學的編輯和畫家姜××。他把我作爲一個發洩精神虐待慾的對象。有幾個利用假期來幹校探親的孩子和我同住一個宿舍。一次他們問我：科

幻小說現在不准讀了，將來還能讀嗎？我說大概可以。當晚，姜某人就自發地在我的房間裏主持一次批鬥會，說我「散佈修正主義毒害青少年」。我見幾個孩子捉弄一隻貓，放到火爐下面烤，就制止他們說：不要虐待動物。姜某得知，又來到宿舍開一次批鬥會，質問我：「你說『虐待』兩個字是什麼意思？是不是說革命群眾虐待了你？」可見，他是教唆那些孩子監視我的一言一行向他報告的。他還挑唆另一個孩子把墨汁潑在我的新蚊帳上，在我床上寫下擦不掉的侮辱我的口號。

此人相貌堂堂，身材魁梧。這是我第一次明白切不可以貌取人，因為巨大的身軀中有時會隱藏著一個渺小的靈魂。

在那種境遇中，一個笑容，幾句關切，都會傳來一陣溫馨，使枯乾的心得到一些滋潤。當我經濟上最拮据的時候，有一天勞動歸來，收回晾出的被子時，忽有一張紙幣從被套裡落在地上。是一張嶄新的十元人民幣。真是喜出望外！前些時我到縣裏看病，還必須向人借五元錢呢。絕不會是我自己的錢。什麼人會偷偷把錢插在我的被頭裏呢？一起住牛棚的難友一猜就猜到我妻子頭上。想必是朱洪知道我入不敷出，又不便親自送錢給我，便悄悄塞到的我被子裏的。直到十七年後我忽然想起這件事，問起朱洪，才知道那張十元人民幣並不是她給我的。那麼是誰呢？能夠是誰呢？除同住牛棚的人外，我幾乎沒有一個朋友！在那種階級鬥爭熱火朝天、人與人之間互不猜疑和仇恨已很難得的情況下，誰會對一個過去並無深交又遭到普遍蔑視的罪人突發善心，冒著風險來給予資助呢？至今仍是一個謎。我願對那位中國人致以深深的祝福。

終於，一九七二年秋，軍代表宣布了我的審查已經結束，我既不是「叛徒」，又不是「蘇聯

特務」，恢復一九六六年時的結論。然而即使這樣的一個結論，也推遲了一年宣布。因為我的同事們爲了表現他們有鮮明的階級立場，在明知我的一切問題都已審查清楚，幹校「最高權威」的軍代表也主張我可以「解放」的情況下，聲言我對自己的錯誤檢查「不深刻」，堅決反對我走出「牛棚」，使我推遲一年恢復自由。

星迴斗轉，逝去了六年時光。我又回到一九六六年三月至六月的那種政治狀態，卻連當時那種在報社管管資料的工作權利都很難復得了。所有的前右派、前歷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等等，都將在「五七」幹校繼續留下去，直至所有的「好同志」全部分配工作和離去以後，誰也說不清將來會不會賜給自己一個工作機會，以及那將是一種什麼工作。在所有這些人中間，我又將是最後的一個。有一點卻是可以斷言的：「摘帽右派」這個政治標籤將伴隨我一生直至死亡。我不會被准許重新寫作。即使我將來會有一個工作機會，那也將是不需要我對中國的任何大事表示態度的一種職業。

然而奇怪得很，一走出牛棚，我的政治興趣和理論興趣就高漲起來。也許只有我十四、五歲時對於世界狀況和中國問題的強烈好奇，可以同這時相比。那時正是盛夏季節，大別山腳的這塊盆地直至深夜還酷熱難熬。每天晚飯後，我便在集體宿舍中，自己的一張小小木桌前坐下來，拿出放大鏡，一行行地讀起被認爲是最枯燥的書來。我到馬克思、恩格斯、黑格爾、普列哈諾夫和列寧的著作中尋找困擾著我的問題的答案。中國究竟是怎樣落到這步田地的？毛澤東的錯誤在哪裏？林彪、康生、江青等人又有什麼責任？中國怎樣才能走出這個火坑？林彪和江青、張春橋的

理論同毛澤東的學說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

不出一個小時，汗水便浸濕我的全部衣衫——實際上只是一條短褲。我走到戶外，讓晚風把汗水吹乾，再回來繼續攻讀。這個房間住著十幾個人，這時都在下棋或打撲克。只有一位年輕的編輯和我在讀書。而他卻是一個前程遠大、雄心勃勃的共產黨員。

一九七五年，我們這些幹校最後一批極特殊的學員，被准許不時回到北京自行尋找工作機會。這時，我好像從將近二十年的政治冬眠中甦醒過來，對中國的一切都很好奇。

我騎著我那輛一九五二年分期付款購置的破舊的匈牙利自行車，每天晚上不停地在北京城裏到處跑，就像我是受了什麼人僱用的密探般收集各路小道消息。這時候小道消息很多，我常常覺得中國似乎又面臨一個歷史轉機，因而興奮不已。在學大寨會議上，鄧小平和江青發生爭辯，鄧小平態度還很硬。美國一位女作者維特克所寫的《江青傳》給鄧小平這邊的人提供了攻擊她的機會，毛澤東為此可能和江青決裂。萬里先後到河南鄭州和江蘇徐州，大刀濶斧地解決了少數造反派頭頭製造的鐵路運輸中斷事件，嚴懲了肇事者……因過分熱衷於搜集新聞，一天中午我險些送掉性命——騎到十字路口拐彎時忘記舉手示意，被後面駛來的一輛小卡車把我撞出很遠，臉上流血不止。萬幸，只撞壞了一顆門牙。

終於，那年九月，得到最後一條小道消息：幾天前江青在大寨講話，說「主席」最近對她很表同情，她在長期沉默之後又一次破口大罵，這次是說「政治局裏有宋江」，她要和他鬥爭到底。完了，毛澤東又和她站到一起去了。接下來就是顯然以鄧小平一方為打擊目標的「反擊右傾翻案風」。我的心情沮喪到極點，就好像我是鄧小平的幕僚一樣。

我在悲憤的心情下度過了一個冬天。周恩來逝世引起人們的異乎尋常的自發的悼念活動，又在我心中燃起希冀的火星。我懂得，這是人們借機表達對於文革和毛澤東路線的不滿。四月二日，我來到天安門廣場，觀看具有歷史意義的盛況：來自全國各地的人，主要是男女青年，把花圈堆滿烈士紀念碑下。我在擁擠不堪的人群中尋找空隙，看張貼得密密麻麻的悼念周恩來和抒發感時憂世之情的詩詞與散文。不斷有自願者站到高處舉著喇叭一遍遍朗誦詩詞，讓擠不進去閱讀的人轉抄。影射攻擊江青、張春橋等人的詩篇前面，讀者和聽眾特別多。有人在廣場上向圍聽的群眾發表演說。我在心中暗暗叫好，讚賞這些年輕人的勇敢和激情，同時不無一點感傷情緒，覺得自己老了，為一九五七年被鑄定的命運使我再也不能和他們站在一起而難過。

顯然，這種行動是官員所反對的，這是中國人自己第一次自己的、而不是經由中國共產黨發動的群眾運動，又是對於這個黨公然表示蔑視的公開抗議。這標誌著二十七年來中國人民第一次大覺醒。批鄧搞不下去，遭到普遍的抵制，又使我從另一面看到了中國的生機：毛澤東二十多年來發起過多次政治運動，很多人並不是一開始就想得通的，但還是都跟著他一擁而上了。現在他又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他還活著，然而這一次卻不靈了！我認定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機的開始。北京的公共汽車上司機敢和售票員一起公開高聲嘲罵江青，什麼時候有過這種事呢？

若不是朱洪再三告誡我，我會天天都到天安門流連忘返。傳說秘密警察在那裏拍照和錄相，我這種政治身分的人自然是可能遭到危險的。

四月五日，毛澤東終於決定讓軍警和北京市民兵對天安門前的群眾進行武裝鎮壓，一時震驚

全國。

我這時已回到幹校。我在極度悲憤的心情中度過了四月。在一次又一次要求大家對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和批鄧運動表態的會議上，我總是使自己排在最後一個，這才能到散會為止保持沉默。然而我又必須準備一篇盡量繞開主題的發言，或抄上二段《紅旗》的文章，到不得不講話時應付一下。

這個黑暗的時代到幾時才能完結？中國將以什麼方式走出這場已經持續十年之久的災難？——我絞盡腦汁去苦苦苦想。爲了得到一點啓示，我用幾個月時間讀完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當然一無所獲。

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宣佈時，我正在幹校，和大家一起正襟危坐聽電台廣播。我沒有流淚，心中默默想著的是：你可——死了！你終於死了！再不死去中國就要崩潰了。據我後來了解，那時像我一樣缺少悲痛感情的人很多，心裏想的也大體一樣。

一個月以後，傳來四人幫垮台的消息。知道這件事會發生，卻沒想到和毛澤東的死挨得這樣近。

我以爲這會是普天同慶的大事。在小組會上談感想，說到四人幫製造的這場大災難時，我爲那些付出了生命的人難過得流淚了。

不久我才發覺很多黨員特別是支部書記之類的人一直保持著沉默。好像在觀望在等待著什麼。還聽說我們小組的黨幹部把我的發言匯報給支部，被當作一種「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加以密切注意。

原來這時中國正在經歷一個微妙的時期：一些人不相信四人幫會真就垮台了，而四人幫分子也確是在準備發動一起政變，因而一些黨員在靜靜觀望不是沒有道理的。繼續把一個十年前就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當作階級敵人予以監視，也不奇怪。九個月以後新華社向全國播發一篇《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題目是《評反革命兩面派姚文元》。在這篇文章裏，把我稱爲「右派分子劉賓雁」，等於又一次推翻一九六六年給我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決定。爲我尋找工作而奔走的老朋友對我說：「這篇文章一登，你找工作就更困難了。」

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每十年就要在全國範圍內批判我一次。一九五七年是第一次。一九六七年五月姚文元的長文《評反革命的兩面派周揚》，又把周揚一九五六年如何重視「右派分子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作爲他的一條罪狀開列出來。過了十年，也是在五月，一篇批判姚文元的文章居然又要由我來作陪，也是因爲姚文元當年對我的作品「曾給以很高評價」！

這時我還沒想到再過十年這種事還會又發生一次。



第十章

回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一九七八年秋季，北京又一次盛傳「右派分子」的命運可能有一個變化，並且可能會平反。一九七二年有過一個傳說，後來證實是謠言。這一次呢？幾個月間，這成為我們「右派分子」間最熱門的話題。

我以為這是可能的，但不相信會給所有的人平反。而只要留下百分之十的人，我便會是其中的一個，因為我是毛澤東決定的，而且屬於當年在全國影響最大的少數人之一，給我平反，就幾乎等於否定整個反右派運動，而這又會是對於毛澤東的否定。現在為時尚早。

但我也像更有希望平反的人一樣關注著事態的發展。聽到中共中央有了一個「五五號文件」，寫著只對少數當年「結論做錯了的」給予「改正」。但又傳說文件裡寫是這樣寫，實際上「改正」的面會很大。我們知道黨內反對給右派分子平反的人一定很多，文件那樣寫完全可能是為了免得引起大的阻力。但我對於自己的事仍不敢樂觀，卻又暗暗抱著希望。

到一九七九年初，傳來可靠消息：我的事也要平反。我想，這一定是當時任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為我說了話。

一月廿四日，我到《中國青年報》辦了手續，記得那是一個普通的冬日，而北京的冬天多是晴天，故也並不覺得那一天特別晴朗。這一天值得記住，是因為過了整整八年以後，也是在這一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向全國宣佈第二次開除我的黨籍。

心情自然是有幾分興奮的。本來應該歡欣若狂，因為可以說所有的「右派」都不曾料想過有一天會徹底平反。毛澤東死去的時候，至少是我，仍然沒往一九五七年的事可能翻案這上面動過念頭。在幾個月的期待中，已經把這時應有的歡欣給提前支取和用掉了。

真正感到興奮，是二月間我去到上海的時候。受《中國青年報》的委託，我去採訪一個人。曹天予屬於我的下一代，一九五七年不過是個初中生，卻也成了一個沒戴帽子的「小右派」。上大學時又被打成「反動學生」，送進勞改營。文革時期又成了「現行反革命」，至今仍在「管制」之中。年近四十，還不是幹部、學生，又不是工人、農民，靠老母養活著。而他卻是個天份極高的人：早年愛文學、後來攻讀美學、哲學，都有出色成績。在勞改營中，他自知以自己的政治身分不宜再從事與社會有關的學科的研究了，便攻讀起高能物理來，一直堅持至今。在他幫助下，妹妹南薇考上了中國科學院的研究生，因為全靠自學，在報刊上受到廣泛表揚。而哥哥如今還在苦難中。

我仔細了解了曹天予的半生苦難。但由於北京大學不肯糾正他「反動學生」那一案，上海一時也不能給他的「現行反革命」平反，便不能公開報導，我只能把他的冤情寫在《中國青年報》的內參上。這對於他後來處境的改善，起了一點作用。

我重新獲得政治權利後採訪的第一個人竟是這樣一個受難比我更重更久的人，帶有一點象徵意義：今後我注定將是這一類人的代言人。同時，曹天予的平反至今還受到重重阻礙，也使我保持警覺：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的覆滅，還遠遠不是中國問題的解決。

關鍵在於中國共產黨本身一九五七年以來變了很多。在這個黨裡面，有許許多多我不能稱之為「同志」的人。那麼我回到這個黨裡又有什麼意義呢？改造它！

在中國，沒有一個黨員身分很難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我還同時恢復了一個較高級別的幹部的身分，這也可以使我今後的發言有較大的分量。

三月十六日，我第一次走進一九五九年就已建成的最高殿堂——人民大會堂。一萬餘人聚集在這裡聆聽鄧小平的一個報告。

這是鄧小平第一次講「四項基本原則」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大家都明白，這是對去冬以來知識分子中的思想解放運動的一次煞車。年初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許多中青年理論家（為首的便是一九八一年以後陸續被罷黜、被開除出黨的王若水、郭羅基、阮銘、李洪林、張顯揚等人）對於毛澤東個人迷信的批判和對於二十餘年來錯誤理論的清算，也就此中止了。

「四項基本原則」從提出的第一天起就使很多人莫名其妙：這四個中國人最熟悉不過的政治概念，同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以前推行了十幾年、文革期間又以它們為名把中國推入黑暗深淵的那一套，連措詞都大同小異的四個「念念不忘」，究竟有什麼不同呢？沒有一位政治家做過解釋，而它們後來居然被寫到憲法裡去！

現在回過頭從將近十年的實踐來看，「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只能有一個理由：它表明這個領導集團企圖把中國的改革嚴格限制在經濟領域，絕不觸動舊的政治制度和舊的一套意識形態。至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其效用則是在任何時候對於任何危及既得利益集團及其意識形態的思想或行為給以懲罰。一九八一年以來已經在全國範圍內以這個名義進行了三次大掃蕩。作家、記者、詩人、教育家、哲學家、經濟學家、編輯、政治家，一概未能倖免。

他們是在進行一場新的試驗，在經濟生活領域實行高度自由化的同時，在政治和思想領域堅持四個不改：沒有民主與自由的社會主義，大權獨攬，不受監督的黨的領導，沒有人民參與、對人民不承擔責任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毛澤東式的「馬列主義」。

效果人人得而見之：一、經濟改革障礙重重，許多在改革中走在前面的企業家和政治家被保守派拉下馬來；二、貪污、盜竊、受賄、走私、偷稅漏稅等現象氾濫全國；高級幹部及其子女憑藉特權，利用經濟改革提供的機會大發橫財，成為最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

一九七九年五月一個燦爛的日子，我來到哈爾濱。像上海一樣，我離開這個家鄉城市已二十二年了。也像上海一樣，市街和建築幾乎沒有什麼變化，人卻明顯地增多了。處處是擁擠、嘈雜的人群。

我記憶中那美麗的、帶有東正教風味的哈爾濱車站不見了。代替它的是一幢難看的、被煤煙薰得烏黑的方形建築。這是一九五八「大躍進」的紀念，那時要拋棄一切洋的東西，並且好大喜功，要把車站建得大大的，後來又因財力枯竭，只建成一半。

正對車站的高地上，哈爾濱的重要名勝之一、東正教的全木製的國人俗稱為「喇嘛台」的教堂，也不見了。這是文化大革命的紀念，是反「蘇修」和反宗教的綜合結果。

但很快我就將親自體驗到文革留下的另一種紀念物的滋味。

我是來參加黑龍江省青年創作積極分子會議的。會名很彆扭，是沿用一九五六、一九六五年兩次全國青年作家會議的叫法。漢語中凡帶「家」字的稱呼都顯得身份很高，有貴族味道，「成名成家」又是最可恨的資產階級思想，故取此稱。

大約是由於哈爾濱的許多人還記得我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在這裡有過一些影響，所以輪到我發言的那一天，會場上坐得特別滿。這是我二十二年來頭一次以講演者而不是以罪人的身分站立

在二、三百名公眾面前，是我恢復政治權利後的第一次演講，故心情頗為激動。

哈爾濱初夏的陽光灑滿這間窗明几淨的會議室。人們全神貫注，以友好的和期待的眼光給我鼓勵。我不能讓大家失望，要用我自己的語言講出我自己的思想：要給他們一點前所未知的東西。我按事先擬好的提綱講了起來。

這時，中共中央對於文化大革命還沒有表明態度，因而還不能議論它的是非。我似乎沒有想到這一點，一上來就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像我們這樣自己動手、並且以革命的名義，為自己造成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場巨大災難和這樣嚴重的倒退，我們付出的代價在人類史上是空前的。然而由於有一種社會力量（不止於是什麼「思潮」，而是鐵一般的物質力量）卻並不願意去正視這段歷史和引出教訓，因而我們還要繼續付出代價。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災難呢？我回顧歷史，指出幾個矛盾，中國共產黨是重視人的因素、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至少從理論上、口號上是如此，然而在中國，人卻又最受忽視，連人的自由和幸福這類詞彙都成為禁忌，以致作為一種報復，現在中國人對於公共事宜最冷淡，號稱國家和企業主人的工人，勞動中最懶散。中國共產黨又最重視意識形態，所謂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然而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長年停滯，幾乎沒有任何成果可言；中國人的道德水準降到最低點。正是在毛澤東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之後，一次又一次運動把數以十萬、百萬計的無辜者打成階級敵人。越是抓階級鬥爭，敵人不是少了，反倒是越打越多。……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呢？

我僅僅從認識的角度，把原因歸結為我們不了解自己的社會，幾十年間把認識中國社會這樣一項艱巨複雜的任務委託給了一個人——毛澤東去完成了。而在這中間，中國又出現了一種社會

勢力，他們不願意了解真實的中國，正如馬克思所說，「理解是多麼可怕，當理解者從它得不到好處的時候」。

我還講到人道主義（這在五年之後仍然是中國的一個禁區），講到毛澤東在這裡違背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講的話；他不是擴大，而是不斷縮小人的自由……

我知道我講話的時候有錄音，像以後幾年一樣，我總是把自由的度數估計得較實際上能夠享有的更多些，不以爲我講的話會帶來什麼危險，所以並不在意。聽衆却比我警覺得多，他們一面不斷爲我鼓掌，一面又不停地盯著在我一左一右坐著的一男一女，覺得他們賣力地記錄我的講話，可能不懷好意。我也注意到他們在記錄，卻以爲這兩人讚賞我的講話，要從中學學習點什麼呢。

果然，當天晚上，省文聯的負責人就神色緊張地來到我的房間告訴我：白天的會一散，坐在旁邊的一男一女兩位團省委副書記就跑到樓下（黨的省委書記們正在那裡開會）把我給告了，說我在講話中攻擊了毛主席，還攻擊了大慶。

我愕然。驚訝的是我覺得我今天的講話已經相當溫和，既未貶損毛澤東，更未攻擊什麼大慶，此話從何說起呢？同時也有些緊張——這是我「右派」問題改正後頭一次遇到這種局面，而我的心態中二十二年賤民生活留下的自卑自貶的意識此時一下子又冒了出來，似乎我仍在「五七」幹校的牛棚之中，任何人都可以抓住我一句話便召開一次批鬥會。

仔細追憶我的講話，才明白：我對於二十幾年來歷史、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任何批判，都可以認定爲對於毛澤東的批判，至於大慶，原來是一個誤會。我在講話中批判了一個口號「八小時內拚命幹，八小時外做貢獻！」認爲人畢竟是人而不是生產工具，應該有他的個人生活。這口號

是我在農村時看到的，故以爲是「學大寨」的口號，而大寨這時已經可以批評了，卻不知它是大慶提出的口號，而大慶此時卻仍然是一個碰不得的聖物。

二十八年前由毛澤東親自樹立起來的全國學習的榜樣，大慶油田，神聖到什麼程度呢？黑龍江省的黨、政、工會、共青團和婦聯，書記或主席中必有一個副職是大慶來的幹部。今天坐在我左方、後來去告密的那個團省委男性副書記張某，就是大慶來的。他最早不過是個油田的臨時工，由臨時工而變成正式工，又變成幹部，後來又成爲油田的團委書記，再提擢爲一個省的團委副書記，這絕非一般工人所能企及，也不是全靠工作能力就能達到的。在每個提升環節上都需要一套逢迎巴結和政治上的「革命」即「左」的表現。那位女團省委副書記，也走過同樣的路。他們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惠者。現在，我在黑龍江省的出現，給他們提供了又一次立功請賞的機會。

說是省委要審查我講話的錄音帶，還要把這錄音帶複製一份送往北京，自然首先請黨中央裡那位大慶的創始人審聽。我講的話構不成什麼罪名，但是知道那裡正在進行一場中國究竟要改革還是要走六〇年代老路的劇烈鬥爭，擔心保守派會小題大作，向胡耀邦施加壓力，因此心情悶悶不樂。明天外地的客人將去遊覽黑省的名勝鏡泊湖，我決定放棄這次旅遊。

第二天，我便被與會的青年作家們包圍起來。他們聽到我被告密的消息，一個個憤憤不平，要去找那兩個告密者辯論。女詩人林子甚至說：「他們若要把你重新打成右派，我要把右派帽子搶過來戴！」

帽子是不能由別人代領的，但話題卻由此引到「如果有人非要再發動一次反右派運動不可，將出現什麼局面？」這個問題上來。

我說：「有三種可能。一是大家仍然必須參加各種批鬥右派的會議，但拒不發言，以沉默相抵制；第二種可能是根本不去開會，給他來個冷場；最後一種可能，是會有人跳上台去同搞右派運動的人辯論。歷史將一步步接近第三種可能。」

我一面說，心裡一面懷疑：我是不是又把事情估計得太樂觀了？

我的估計並不很準確。但兩年以後、四年和八年以後發生的類似反右派的運動中，確是出現了大體相似的局面。

發生在距哈爾濱五十公里的賓縣的那起建國以來全國最大的集團貪污案，此時早已不是新聞。它於一九七八年八月被破獲，報紙、電台和電視台已不止一次地向全國和世界報導過。但我總覺得隱藏在這起事件背後的許多有價值的東西尚未披露出來。同時，對於我與之隔離了二十餘年的這個社會，我懷有很強的好奇心：它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變化？我覺得文化大革命給中國造成的創傷遠遠沒有充分揭示出來；對於已經知曉的那個部分，我們的認識也遠遠不夠深刻。

兩件事使我最終決定去採訪這個案件：以主犯王守信為首的十一名在押人犯，全都是中共黨員！王守信雖已被捕，名聲還不臭，賓縣有些人還懷念她，仍親暱地稱她為「老王太太」，而在揭發她和破獲此案中有功的人，也不香，甚至有人還不敢承認自己寫過檢舉信。我想：其中必有許多奧妙，揭開它們對於人們認識文化大革命後的中國社會與中國共產黨會是有用的。

接待我們的第一個人，是賓縣縣委書記梁維玲，一位四十歲上下的女人。她談了一個晚上，一是解釋她和王守信雖是隔壁鄰居，卻從未同她有經濟上的瓜葛；二是縣委在破獲此案上起了主

要作用，對於松花江地區專員公署（賓縣政府的上一級政府）的人搶功，表示極為不滿。

我很失望，因為這都不是我所需要的東西。要到半年以後，當梁維玲成為我的政治對手時，我才明白：即使一級共產黨黨委犯了嚴重失職的錯誤時，也不宜公開批評；倘若批評，也必須同時對於它的功績給以足夠的讚揚。

然而當時我的興趣却在另一個地方：一起創紀錄的大貪污案件，何以會發生在共產黨執政的三十三年之後？也就是說：為什麼在毛澤東倡導下進行了長期階級鬥爭和多次政治運動之後，壞人反而比三十三年前有了更大的自由？我要追尋的是造成這種現象的歷史的和社會的原因。

這就不能把目光局限在這起貪污案件上。幸運得很，從第二天早上起，第一個到招待所找我的人，就把我的注意力引向賓縣廣闊的社會生活。

劉忠厚，這個年近五十、模樣很像農民的人，絕不會令人猜到會是一個「桃色事件」的主人公。他是賓縣酒廠的廠長。一九七七年春季的一次打擊經濟犯罪的運動中，他被當作一個重點罪犯監禁起來（照例不必經過司法程序）。而縣政府派出的工作組追查的重點卻是他的「男女關係」問題，認定他和由他介紹到酒廠工作的他的侄女之間發生了兩性關係。私設公堂審訊他，同時派出警車，到鄰縣去拘捕已經調到那裡工作的那位姑娘。分別進行逼供，還動用了肉刑。劉忠厚矢口否認，便把他的房間密密封死，盛夏天氣不透風，還在室內噴灑「六六六」殺蟲粉，企圖毒死他。同時，又費盡心機找一個人出假證，說曾見到劉與他侄女在郊外野合；找另一人證明那女人曾把私生子託他寄養。

其實劉忠厚之所以遭此橫禍，恰好是因為他有一次偶然碰到另一個人在郊外與女人野合。也是該他倒楣，那個人另一次與一個女人在室內發生婚外性關係，也被他撞見了。劉忠厚與那人並無私怨，也並未去張揚此人這些隱私，但那人卻擔心他會把自己的醜事洩露出去，或告發到上級。這人偏偏又不是個普通人物，而是一個權限遠遠超出其職位的縣政府工業科長。「先下手為強」，他便動用權力，對劉忠厚下了毒手。

劉忠厚來找我時，當年給他捏造的幾條罪狀都已查明是虛。他已重享自由，但遲遲不給他恢復名譽。阻撓者仍然是那個科長。

找我的人很多。早晨一起床，飯前就要接待一起人。上午再見一人或二人。下午、晚上也排得滿滿的。賓縣成了我了解中國社會的一本書，每一位來客都是書的一頁。無論是傾訴冤情，或揭露政治生活中的腐敗，提供與王守信案直接有關的材料，都引起我的興趣，因為對於長期被封閉的我，一切都是新鮮的。

我走訪了縣委、縣政府的主要官員。我還到縣檔案館，看了十幾年來黨委常委會議的全部記錄。

我終於弄清了王守信這個一字不識的女人何以會成為賓縣政壇上的顯要人物和何以能貪污四十餘萬元巨款的來龍去脈。

這裡是中國共產黨在東北最早的基地，以陳雲為首的中共中央東北局一九四五年就在賓縣辦公。土改最早，因而貧僱農掌權也最早。封建關係僅在土地所有制上被廢除了，卻又在權力過於

集中的黨的領導體制和由黨的官員一手把持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制度中借屍還魂。頻繁的政治運動中人與人的傾軋毒化了人們之間的正常關係。為了在權力階梯中上升或為保護自己，出現了各種派系，文化大革命中又出現了新的派系。主導人們行爲的不再是道德規範或「革命理想」，而是一己或本集團的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計劃經濟」僅僅使國家的資金與物資歸少數當權者所掌握，而他們在用之於建設時卻只謀求本地就業問題的解決和字面上財政收入的增加，而根本不計經濟效益，以致賓縣的十三家國營工廠有十二家長年虧損，並且使全縣燃料的短缺日益嚴重。王守信就是以從省主管部門為本縣爭得較多的煤炭而贏得顯要地位的。王守信利用經濟破壞造成的消費品特別是食品的匱乏，以餽贈和行賄手段收買上級和本縣的官員，形成一種這個國家所特有的物資與權力之間的交換：她把名義上屬於「全民所有」而實際上由她隨意支配的煤炭和各種緊缺的食品無償地送給一些官員，官員則以手中名義上屬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力保護她的違法行爲，提供貪污的條件。共產黨忙於掌管政府和社會的所有事務，卻聽任黨組織本身日甚一日地腐敗下去……

我在《人妖之間》中揭開了這個由權力、宗派關係和權力與財富的交換組成的「關係網」，描述了賓縣縣委一屆又一屆書記（一縣的最高權威）可能做出的兩種選擇：兩任書記曾和這個「網」較量，最後都失敗了；另一些則同它相妥協，保住了官職，卻要違背其良心。

我在這篇文章的最後告訴讀者在這種社會勢力面前，什麼社會主義、黨的領導等等，即「四項基本原則」，早已無影無蹤了。

在我很小的時候，不止一個大人看過我的手掌，都爲我掌紋之多而吃驚，並且都預言說：「這個孩子將來操心的事會比常人多得多。」

許是天命所定，但更重要的大約還是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我長期與社會隔絕，因而命運驟變的我像是從冷藏箱裡走了出來，好像突然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對一切都覺得新鮮。這二十二年間中國社會和中國共產黨內發生的惡變，長期生活其中的人會習以爲常，甚至覺得無法改變，我卻對許多事感到驚異，不可理解，不能忍受。一九七九年夏季我在哈爾濱和賓縣的所見所聞，在我心中留下深深的痕跡：中國社會和中國共產黨已染上嚴重的病患！毛澤東的錯誤路線已經把這個社會和這個黨推向與毛的旗幟上所書寫所許諾的那個目標全然相反的境地。

在黑龍江這個地多人稀、土地的肥沃冠於全國的省分，農民竟窮困得買不起一張炕蓆，買不起做一缸醬用的鹽，有些村莊甚至窮到穿不上禦寒的衣服！

這種「社會主義」非但沒消滅階級，反而滋生了許多新的寄生蟲；「公有制」名存實亡。一首在東北流傳很廣的「順口溜」對農村的階級關係有這樣的描繪：

一等人是書記，
祖祖輩輩有出息；
二等人是隊長，
吃了上場有下場；
三等人是隊委，

親戚朋友跟著美；
四等人是會計，
營私舞弊很容易；
五等人是保管員；
五谷雜糧吃不完；
六等人是出納員，
手中常有零用錢；
七等人是外交，
遊遊逛逛還報銷；
八等人是駕駛員，
一年四季不下田；
九等人是「屯不錯兒」^①，
大事小情炕頭坐；
十等人是社員，
肉狗的活兒幹不完！

①「屯不錯兒」：黑龍江方言，指村中年長而又因與政權、宗族中首腦人物關係密切，因而在調解村民糾紛上有一定權威的人。

這幅圖畫，帶有象徵意義，它在不同程度上概括了整個社會：每個人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中，都從他掌管的權力中撈到一些好處，而在權力階梯最底層的普通羣衆，則只能得到社會財富經過層層剝削後的可憐的餘額。

我發現一種可以稱之爲「社會返祖現象」的東西。極端的貧困竟然使奴隸社會中的某些東西復甦了。由於分配救濟糧（或「返銷糧」^②）的權限握在一個村的黨支部書記手裡，而糧食的有無、多少是一家人生死攸關的問題，於是在一些地方，這些支部書記就可以任意指定任何青年婦女陪他睡覺。這是封建社會中也不能容許的。

毛澤東的倒行逆施，已經把他高舉的旗幟上所書寫的「四項基本原則」變成了與其字面意義相反的東西。「黨的領導」聽任少數人把「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謀求私利和鎮壓異己的手段，文化大革命無非使這種剝削和壓迫達到登峯造極和毫不掩飾的程度，四人幫的覆滅並未使這一切終止。

甚至像共產黨省委這樣的僅次於中央的高級權力機構，也往往無力解決一個小小工廠中幹部公然掠奪國家資財或一個警察霸佔民女這樣的小小事件。人民又完全被排除在外，無力進引任何干預。

在黨和政府中，多數人自然還是清廉的，但他們對於制止以權謀私和侵犯人權的壞人根本無能爲力，因爲後一種人都受到上一級某些人的庇護。貪贓枉法現象因而愈益嚴重，不可收拾。一

②無論農業收成如何，農民必須繳公糧，到口糧吃完時，再經政府批准去買回一部分糧食，稱爲「返銷糧」。

批又一批善於整人害人、玩弄權術、阿諛奉承和虛誇成績的人上升了。

各級官員中也不乏正直而又有膽識的人，但他們往往沒有好下場。哈爾濱一位知識分子、在市政府一個局中擔任科長的人告訴我：「總結二十餘年的教訓，一個人在這個社會中若想生活得順當而不遭打擊，一是千萬不能說與上司不同的意見，二是尤其不能說出比上司高明的意見。」

這段話令我不寒而慄。他確是道出了一個要害。然而在這種狀態下，一個社會除了倒退，還能有別的出路嗎？

《人妖之間》就是這次賓縣之行的結果，它在全國引起的震撼之大，是空前的。《人民文學》是中國最大的文學刊物，那時發行量是一四〇餘萬份。一九七九年九月號刊載我這篇作品的一期，由於人人要看，所以無論圖書館的或個人訂閱的，都被人們借走，每次以幾小時計，連續傳閱，直至被磨搓得不像樣子爲止。在有些工廠和學校，由於大家都急於先睹爲快，而雜誌只有一份，於是便在下班、放學之後不回家，集聚起來，由一人朗讀。

多家報紙轉載了它。一些地方電台廣播了它。

一九七九年中國的文學作品第一次走進普通人的生活，成爲很多人生活裡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大部分小說或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悲劇，或揭示現實中影響千百萬人命運的矛盾，因而受到從知識分子到普通青年勞動者的歡迎。但是直接描述、分析共產黨組織的腐敗和社會的嚴重病患，並且寫的就是仍然發生在眼前的現象，又是紀實性的，《人妖之間》是第一篇。它回答了千百萬人心中的焦慮並急於理解的問題。很多讀者在來信中說：「你寫的雖是賓縣，但就像寫的就是我」

們這裡發生的事一樣。」

賓縣縣委和黑龍江省省委的反應也很強烈，只是性質完全相反罷了。

賓縣書記梁維玲在各種會議上暴跳如雷，咬牙切齒地咒罵我，寫信給省委攻擊我，又親自向省委書記哭訴她的委屈。省委則站到縣委的一邊，向黨中央控告我。

理由是什麼呢？「粉碎『四人幫』以來，賓縣形勢大好，『人妖之間』在幹部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造成思想混亂，破壞安定團結，使縣委無法工作下去了。」再一個，就是說我寫的東西「嚴重失實」！

既然是一篇充滿錯誤的文章，賓縣人就不難識破，那就該和縣委站到一起共同聲討其作者，怎麼倒使一貫正確、並且連續執政三十四年的共產黨縣委「無法工作下去」了呢？

但是中共中央沒有表示態度。我那次被告發的講話，也沒有受到中央的指摘。我把這看作默許。

這年夏季到冬季，我在黑龍江省、遼寧省和北京市作了十幾次演講，平均每場聽眾在千人以上。我繼續揭露和分析毛澤東的錯誤給中國造成的危害，呼籲清除左傾機會主義的流毒，指出政治災害不同於自然災害（比如地震），它並不隨其結束而停止其存在。它留下的不僅是廢墟，還有一種因這場災害而獲益的社會、政治勢力。絕不可低估這種力量今天在發生、和今後仍然會繼續發生的破壞中國社會進步的作用。



第十一章

初露猙獰

一九七九年年底召開的中華全國作協第三次代表大會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代表們回顧了五十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界飽經患難、滿目瘡痍的歷史，肯定了一九七七年以來選定的新路。一九五七年以來沉默了二十餘年的作家，當時曾是青年而如今已成中年的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是近二年文壇上最活躍、作品最引人注目的一群。他們在這次作家代表大會上也是衆所矚目的中心。

我也在大會上作了發言。我講到從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期的體驗中引出的一條教訓：「當時我看到農民的願望是一個，而上級和報紙宣傳的卻是另一個，彷彿世界上同時存在兩個真理。心裡不斷鬥爭，很是痛苦。後來才明白：當這兩種東西發生矛盾的時候，我們應該毫不猶豫地站在人民的一邊，因為歷史已經證明，黨是犯過錯誤並會繼續犯錯誤的，而人民，就其總體而言，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代表了歷史前進的方向。」我提醒大家：幾千年的封建主義傳統、貧困和愚昧仍然是「左」的路線的基礎，而既得利益者仍然要頑強地反對變革，企圖把中國拉回到老路上去。我說：我們這個時代最需要的仍然是對於涉及人民命運的重大問題予以關注的文學。我決定在自選定的道路上走下去。困難是有的，甚至還有危險，但我已經想過了：單是我今年發表的那篇論文，已經足夠打我一次右派了；寫一篇是打一次，寫一百篇也不過是打一次右派，既然如此，為什麼不繼續寫下去呢？

我最後這一段話，引起的掌聲和笑聲特別多。我前一晚上本來是熬夜準備了講稿的。上台講了幾句，就把講稿甩開，信口講起來了。這時不再因這是一個莊嚴的大會而有所顧慮，也不去想有人會抓把柄，精神完全進入自由狀態，一片真誠，講的又是自己二十餘年來的真實體驗，因而效果較好。

一九七九年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八年為止政治氣氛最好的一年，所以也是我公開演講最多的一年。我會到五個省市做了不下十五次講演，有六次是在不同的大學。講演的錄音帶被翻製，傳播很廣。

但是，在另一些人看來，我的這些講話則等於是挑戰。他們對於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還記得很牢，卻不是追悔自己當年把許多人打成政治死囚的罪過，而是手裡發癢，一見知識分子享有了較多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便想重新拿起當年打過人的那根棒子。此時仍然擔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不久前就威嚇過：「我們是不想再搞一次反右派運動的，但是如果有人逼我們去做，我們也只好再來一次。」

白樺、王若望、王蒙、丁玲和我，這些當年的「右派」，都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作了發言。大會選出的理事和理事會選出的中國作家協會領導機構中，有多人是當年的「右派」。

三次作代會（亦即第四次文代會，二者是同時、同地召開的）剛剛結束，從北京到外省就刮起一陣冷風。政界和文學界一些保守派人士散佈一種論調：「作代會開成了右派翻天的會！」「只許右派發言，不給我們講話的機會！」「還把右派都選進作家協會領導班子去了！」

發言機會是均等的。本來已把一些老作家按他們本人的要求列入發言者名單，但他們又不肯講了，因為看到大會的那種氣氛，人們不會有耐心去聽他們要講的那些東西。

這是他們被冷落的開始。他們還將繼續被冷落所激怒。有些人的作品將一再被文學刊物退回，而在六十年代，那些刊物曾多方設法爭取發表他們的作品。於是有些人便以為是這批右派（大部份是中年作家）佔去了本應屬於他們的地盤。他們不能理解，讀者脫離了他們，是由於他們脫離

了時代。

文藝界是在胡耀邦的直接領導之下的，他自然要承受巨大的壓力。

這時，有兩個劇本成為兩派力量爭議的焦點。

青年劇作沙葉新寫的《騙子》（或《假如我是真的》）是一部諷刺劇，寫一個冒稱自己是某中央高幹子弟的人在上海招搖撞騙，暢通無阻，備受優遇，直至弄到一個願意做他妻子的人。最後敗露了，被送上法庭。此劇一九七九年已在上海、北京的有些外省上演，因爭議很大，一般作為「內部」演出，不向一般觀眾售票。作者已做了多次修改，仍不能為反對者接受。電影劇本《在社會的檔案裡》揭露一個高級軍事人員和生活的腐敗——父子一同霸佔一名少女。反對這個劇本的勢頭更大，主要來自軍方。

胡耀邦決定一月中開一次戲劇座談會時，還是政治空氣比較好的一九七九年年末。到會議開幕時，已經變了。到胡耀邦在會上講話的前一星期，他還準備公開表示這兩個劇本再做些修改是可以上演和拍攝的，但是到講話的前兩天，他忽然改變了態度。人們認為這是遭到強大壓力的結果。

就在這同時，我也成了攻擊的目標。

一九八〇年一月初，我正準備作為《人民日報》的記者到四川省進行第一次採訪時，一位老朋友神色緊張地跑到我家，告訴我一個壞消息：「胡耀邦把你批了！」接著，又有幾位友人也傳來這個消息。

胡耀邦當時雖然還不過是中宣部部長，但在人們心目中已是高舉思想解放大旗、最堅決地推

行三中全會路線的，僅次於鄧小平的黨內領袖人物。因此，他竟會批評我，這個消息就使人們感到雙重地意外：莫非胡耀邦也變了嗎？

幾個來源傳來同一個消息，我自然不能不信。進步力量在三次作代會上取得勝利給我帶來的歡欣心情，不免有些黯淡。經過多方了解，方弄清事情的原委。

原來是在中宣部一次例會上，據說是一個高級黨校的女幹部首先指責我，說我到人民大學演講時，爲林希翎鳴冤叫屈。在胡耀邦做總結發言時，中組部的一個副部長忽然插話說：「有的人，右派問題給他改正了，他說他不是共產黨員。他說，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共產黨不如國民黨，大陸不如台灣，他要到美國去。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劉賓雁！」

這時胡耀邦沒有理會他，繼續講完自己的話。可能是他覺得既然有兩個人在會上提出劉賓雁的問題（他不會不明白，這不是偶然的，而且不是衝著劉一個人來的），他不能不有所表示，便最後講了這麼幾句話：「劉賓雁這個人我了解。一九五七年定他右派，我是不同意的，去年給他改正，我是贊成的。但是這個人也有毛病。」

朋友們坐下來分析這段話，放心了：胡的話分明是保護嘛。

幾年以後我回過頭再玩味這段話，又覺得還不僅是給我以保護。他的意思是：劉賓雁這個人沒有大的錯誤；二十二年前我支持他，現在我依然支持。如果說他有問題，那問題也不會超過你們這些攻擊他的人。他在衆人面前公開做這種對我沒有多少保留的支持，這是第一次。

但是我知道我應該謹慎，不給我們的對手以機會來攻擊我，以至於和我站在一起的同志們。所以我和朱洪喬定：此次入川，一次公開演講也不做。想不到這個決定竟和四川省文聯領導人的決

定不謀而合。他們聽說我要去四川，已經做了部署：「本省決不給劉賓雁提供講壇！」彼此契合，皆大歡喜。

春節我沒有返京，想利用這個假期採訪成都一位在皮鞋製造工藝上寫了第一本教材的老人。四川省皮鞋工業歷史悠久，這位老人是三代製鞋工人與技師。使我動心的是，他是在文革期間連工作權利都被剝奪、生活十分困難的情況下自力、自費在業餘時間從事這項工作的。我和他約好大年初一去他家長談。

他不在，他的妻子和長子彬彬有禮地接待我，說是主人被一個親戚拉走了，事先並未約會。我信以爲真，便向這母子二人了解他這些年的經歷。時近中午，主人仍未歸來，我便告辭。長子無論如何要陪我去，還非要把我送到錦江賓館不可。我以爲他待客是過於殷勤了，豈不知他是懷著負疚心情這樣做的。在路上，他對我說了實話：他父親是聽人說我這個人已受到批判，將受到嚴厲懲處，怕連累自己而故意躲出去的。

我的可疑身分並未澄清，這位青年甚至也未同他父親商議和得到允許，他爲什麼會把實情告知我呢？他大可不必。想來，只能是由於我的一片真誠感動了他們母子二人，他們從我的聲容舉止中斷定我不可能是個壞人。

那位老人後來也追悔此事，每次到北京都要到我家看我，還帶上禮物。可惜從此就再無會面的機會了。

後來我才得知：一九八〇年春季，關於我的政治謠言已傳遍很多省份，說我已隔離調查，或曰被逐出北京，或曰被開除出黨。

這是第一次謠言高峯。以後每一年或每隔一年，都會有類似的謠言生起，直至一九八七年一月它變為現實。

中國的政治氣候，也以相同的頻度忽熱忽冷。我能夠成為它的溫度計，應該引為榮幸。

在北京等著我的，則不是一般的謠言了，我一到《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就把我找到辦公室，問我：「你在四川做了幾次講演？」「一次也沒有。」「有人說你有一次講演，大學生遞條子發問：『我們能不能上街遊行？』你回答說：『當然可以啦。北京人民大學的學生去年不是上街了嗎？』」很像是真有其事。我說絕無此事，可以調查。

原來親自跑到《人民日報》向胡績偉誣告我的，又是那個中組部副部長！我與此人素昧平生。若無此機緣，我甚至不知道他文革前曾任遼寧省鞍山市市委書記。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他何以要死死揪住我不放呢？這個謠言是他本人捏造，抑或是四川省提供的呢？他是出於自發，還是某人或某個勢力授意來詆毀我呢？

我沒有去追究此事，後來也就淡忘了。還要過上二、三年，我才會覺察到，那些人並沒有淡忘，並且一直張大著眼睛盯住我。他們本能地發覺我是異類，會對他們構成一種威脅。我寫的文章，我在各地講話的記錄，我揭露和鞭撻過的那些黨委和個人所寫的控告信，一些志願告密者關於我言論與行動的信件，都被妥善地保管起來，以備不時之需。但是我認為：我所寫和所講的一切，都是對於這個黨有利的。鄧小平會理解我。中紀委也一定會支持我，因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它應該做的。它會認識到，我是和它在一條戰線上戰鬥著。

一九八〇年春天這次寒潮，來得很猛，是一年前那一次無可比擬的，但仍然是同「四項基本原則」相連。

這個春季，全國各地出現了一種奇異的政治局面，一方面，鄧小平主持下制訂的三中全會的主要決策——如農村的生產責任制、平反冤假錯案等等，在多數省份還遭到頑強的抵制；而另一方面，用來抵制這些政策的思想武器竟又是鄧小平本人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

在那些仍在四人幫幫派勢力或保守派人物掌握的地區，「四項基本原則」的宣傳搞得最紅火。各縣和各工廠之間互派宣傳車隊，車旁張貼大幅標語，車上敲鑼打鼓，大喇叭震耳欲聾地高呼口號或朗讀有關「四項基本原則」的文件。行人們目瞪口呆，以為又一次文化大革命到來了。「左」派們如此歡欣鼓舞，是因為他們認為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要取消三中全會制訂的一套政策，回到老路上去。

「左派」的猖獗並未使我退縮，反倒激怒了我。我不認為他們在中央會有代言人。我決定繼續自行其是，去摸一摸他們的老窩。由於這一年黨中央領導人曾一再告誡黨內要警惕文革的後患——當心四人幫的幫派分子借實行幹部年輕化之機鑽到黨政領導機構中來，我就更加自信揭露這種政治勢力，定會得到中央的支持。

一九八〇年七月，我和《人民日報》特約記者李春光來到山東省沂南縣。我的故鄉臨沂縣，現在是沂南縣所屬地區的中心。這是我第一次回到我的祖父攜帶全家於二十世紀初期由此出發向東北逃荒的地方。七十年過去了，有三十一年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度過的，然而這裡依然是那樣貧窮。農民仍然在向外逃荒、行乞，主要去向仍然是黑龍江省。

十三年前「奪權」鬥爭中取勝的一個派別，現在仍然執掌者各級政權。勝利者永遠是正確的。文革期中許多人死於他們發動的武鬥，許多人被監禁、被施肉刑，饒倖不死的話，又被定為政治罪犯，連同他們的家人一起受屈辱，得不到正常的工作機會賴以謀生。文革結束後，這掌權的一派又借「清查」四人幫分子之機，發起了又一次鎮壓與迫害的運動，把自己的政治對手重新收拾一次，手段和上一次同樣橫暴而殘酷，又整死很多人。

無論是文革期間或文革後四年的當時，農民像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一樣順從地接受同是以共產黨、也同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實行的法西斯統治。表面看來，它們確實沒有多大不同。人們照舊按上邊指定的名單選舉人民代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照舊按各級黨委推薦的名單鼓掌批准各級政府的主要官員。平時，照樣聽從上邊指派的黨支部書記的命令到田裏勞動，然後到年底領取不夠餬口的糧食和往往還不夠買口糧的一點現金作為一年辛苦的報酬。

官員們則比文革以前更大膽、更貪婪地剝奪農民了。由於他們在山東省委有大人物做後台，同時又以為新的黨中央不要多久就會下台，因而有恃無恐，甚至膽敢公開地攻擊和謾罵鄧小平和胡耀邦。他們瘋狂地抵制三中全會以來的新政策，不准許在農村實行生產責任制。

這種情況使我激憤萬分。我和李春光寫了一篇不長的報導，刊登在《新觀察》的雜誌上。

山東省「左派」和四人幫幫派分子對我的仇恨竟瘋狂到不怕暴露其反對鄧小平的政治面目，把我和鄧小平放到一起來攻擊。在一封以「沂南縣上訪團」名義寫的匿名信裏，竟說我是「在某些大人物的授意和指使下」、「爲了討好某些權貴的歡心」而到沂南採訪，目的是「置沂南縣於死地」。說我「有一部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歷史」，現在又「賣身投靠，成了納吉、復辟狂們推

行復辟倒退路線的鷹犬」。說我「爲某些人所賞識，爲那條復辟倒退路線張目」。「現在某些人的所作所爲，使中國歷史上的王莽、梁冀、董卓、李林甫、秦檜、賈似道、魏忠賢^①這些鼎鼎大名的人都自愧弗如了。權奸不除，國無寧日！」

這裏所指的納吉，是指在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一度擔任總統而最後被殺害的伊姆雷·納吉，中國人都很熟悉，在四人幫批鄧時期中納吉的名字被用來暗喻鄧小平，誣指鄧小平是叛徒。至於「大人物」、「權貴」、「復辟狂」、「權奸」等等，也都是指黨內改革派的領袖鄧小平和胡耀邦等人。

這是一封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匿名信。人民日報社把它送給了公安部，公安部又責成山東省公安廳追查。然而山東省公安廳竟至今按兵不動，可見黨內兩派勢力鬥爭之劇烈。

在這封匿名信裏，作者還創造了一條桃色新聞，說我誘惑了沂南縣委招待所一個年輕的女服務員，和她睡了覺，還使她懷了孕。所幸此行我和李春光白天在一起採訪，晚上同住一間寢室，否則倒會有口難辯了。

把政治罪行和道德墮落連在一起，歷來是把一個人搞不倒也搞臭的有效武器。不知爲什麼，這一回沒有奏效。

這年八月，我又一次來到遼寧省省會瀋陽市。我是被一個未了的願望引到這裡來的。從一九七九年春季起，因反對文革和毛澤東而被處死的女英雄張志新的動人的形象，一直撞擊著我的心。那年夏季，由於許多文人雲集瀋陽採寫張志新事件，我擱置了寫她的打算。但從哈爾濱返回北京

① 王莽等人是中國漢朝到明朝歷史上最著名的奸臣宰相，曾蒙蔽或要挾皇帝、陷害忠良乃至篡奪皇位。

途經瀋陽時，我仍然小事停留，閱讀了她的一部分案卷，也走訪了一些張志新生前的同事。那時一些關於張志新的文章已然發表，却沒有一篇是令人滿意的。我萌發了一個意念：張志新本人已死去，她的幾十本日記也被毀掉了。文革和毛澤東還是禁區，但張志新事件不是一個個人的悲劇。我是否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寫——張志新周圍的人，他們在七十年代的政治條件下，由於各自不同的原因，往往並不一定出於惡意，如何把張志新一步步推向刑場？寫由於一九四九年以來鑄成的各種政治條件，張志新這樣一個人之死是必不可免的。……這對於幫助中國人反省三十年歷史和清算毛澤東錯誤會是有益的。

於是，我又一次埋頭到史料裏。我重新閱讀張志新死亡之路的記載——對於她的歷次審訊的記錄。

然而活著的人不斷打擾我在死者身上進行的工作。有人還在詆毀這位女英雄。在張志新被處死上犯有嚴重罪行的人，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個，都未遭到懲罰。而老詩人謝挺宇由於在報紙上透露張志新在行刑前曾被割斷喉管以防止她在刑前呼口號，倒好像犯了什麼不可饒恕的罪孽，遭到官方人士狠狠的咒罵與威脅。這些人中，很多還就是文革以來公安、司法部門的官員。

這個現象，使我把目光轉移到文革時期的罪人身上來。遼寧省是江青一夥為政變進行組織上的準備做得最徹底的一個省。四人幫骨幹分子李伯秋招認：一旦江青上台，遼寧省縣委書記以上的幹部都不必更換了。我很想知道，這些人現況如何？

遼寧也是追查四人幫分子最認真的省份。省紀委又一次要求各地「補漏」，就是把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清查運動中漏網的和犯有凶殺和打砸搶罪行的人再來一次檢查。全省各地、市的有

關幹部來瀋陽匯報，我去聽了三天的會，大為震驚：在文革時期被害或被迫自殺者達到幾十幾百人的縣份和工廠裏，竟然查不出一個凶手！很多文革期間罪行不少的人，現在居然還擔任著黨委組織部長、政府公安局長、人事局長這樣重要的職位！連省委組織部、省黨報《遼寧日報》和鞍山這樣重要城市的市委組織部裏都有這樣的人！

相反，當年反對林彪、四人幫而受盡迫害折磨的人，現在卻仍然得不到平反，繼續受到壓制。我坐不住了，闔上張志新的檔案，我到省紀委等機關和城市負責清查工作的幹部那裏去調查。瀋陽的老友和從文革至今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也來向我提供情況。

和山東省一樣，遼寧省也是文革中的一派掌權。這一派是受到軍隊支持的極左派，工人居多。奇怪的是：這一派當年是反對中共中央東北局和省委主要官員最激烈的，如今那些官員在北京、遼寧都恢復了舉足輕重的要職，卻不來支持、救援當年曾為保護他們而遭到殘酷打擊、至今不得翻身的另一派人（以知識分子為主）。

我逐漸弄清了一個道理：文革的發生與結束，都有一個不同於任何政變、動亂和革命的特點。林彪、四人幫雖然是反革命，但「親自發動和領導」這場文革的毛澤東則不是。文革中製造「十年浩劫」的雖然是中共中央領導人，當時的各級政權——「革委會」雖然也全都是或全部是中共幹部和黨員，但結束文革的也是中共中央領導人、各級黨委和政府。大部份原先的官員依然繼續留任，他們中間很多是「三朝元老」——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後，一貫擔任著黨的領導職務。再看文革中得到晉升的官員，大部也是文革前就任職的，因而文革初期一度受四人幫迫害而不久就擔任領導職務、執行四人幫的一套政策的老幹部，既同在北京任要職的過去的老上級、老同事

心心相印，又和文革中犯有各種罪行的中、下層幹部之間有政治上的共同利害與感情上互有恩惠的重重關係。一九七九年我在賓縣看到的是經濟上的關係網，現在我又在遼寧看到政治上的關係網。就在這種關係網的作用下，遼寧省文革中有嚴重問題的幹部，有的被悄悄調往外省、外市，逃脫了審查；有的僅僅失去原先的職務；另一些則繼續做官，繼續壓制當年反對過他們的人。在政治關係網和經濟關係網相重疊的網絡上，濫用權力、非法貪占國家財產、侵犯人權的現象，正在以比文革時還要猖獗的勢頭在發展。

無辜受害者不斷呼籲求救，仗義執言者連續揭發檢舉，但因現行體制下檢察院和法院不能受理黨的官員失職、瀆職等案件，黨的紀檢委則受到同級黨委的控制，因而即使是願意主持公道，懲辦邪惡的清正官員，也只能扼腕嘆嘆。那些濫權或腐敗的官員，則能肆無忌憚地打擊報復敢於反對他們的人。

遼寧省的經濟改革是進展很快的。報紙上充斥著這方面的喜報。我懷疑在政治上潛伏著危機、社會上不正現象得不到制止的情況下，經濟改革的成果能否真正為人民所有！

於是，我寫了一篇報告文學〈好人啊，你不該這樣軟弱〉，把這些問題揭出來。此外，我還寫成了另兩篇報告文學：〈艱難的起飛〉和〈在罪人的背後〉。

這個夏天我是多產的。我高高興興返回北京。但不久，就接二連三地聽到遼寧省委向我發來的憤怒的指責和攻擊。我所寫的每一篇關於遼寧的報導（除了「遼寧省開始編寫文化大革命史」的消息以外）都是有嚴重錯誤的，無一不造成惡劣的後果。

我的失誤在哪裏呢？我不能不細細反省了。

〈艱難的起飛〉裏所寫的丹東市銳意改革、成效卓著的輕工業局長李日升，遼寧省發過一百餘篇讚揚他的報導。我不過是寫了一點他遇到的困難和阻力。這就涉及到別人，恰好那又是一位「三朝元老」，文革時是、現在仍是市委副書記，上下左右有各種關係。我去採訪時，他即將退休，人人都說他不稱職，又因他兒子強占民房使一名婦女自殺的消息傳遍全城，引起公憤。我的文章一發表，他一下子成了香餠餠。又是到碼頭歡迎貴賓，又是人代會上主席台，還到電台發表講話。顯然這都是一種示威，是表明不承認我的文章。我去丹東的前一日，李日升在民意測驗中獲票百分之七十以上，正準備提拔重用。文章一發，他沒戲了，還成了審查對象，一個又一個調查組派到他所在單位。我所寫的他的成績，被中共丹東市委一一推翻。

我都有些懷疑了：是不是我上了當，李日升真的對我弄虛作假了？要到兩年後，中央輕工部副部長到丹東經過長時間調查後向全國介紹了李日升的經驗，才使我心中一塊石頭落地。我對李日升的讚揚，竟成為對他的狠狠一擊，直到四年後他才緩過勁來，終於被提拔為遼寧省輕工廳的廳長。

〈在罪人的背後〉寫一個農村女青年王廣香因就業安排受到不公正對待，長期上訪無效。負有直接責任的一個官員非但不糾正錯誤，還對她又打又罵。王廣香為發洩怨恨，用炸藥包炸毀了那人房屋的一角。這篇文章就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向全國發出警報：由於受害者被長期壓制，官民之間的小矛盾常常會演變為對抗性衝突，造成社會動亂！

對她的審訊，驚動了本縣數千名農民前來旁聽。後來以「作案時精神已失常」為由，撤銷了

對王廣香原判的三年徒刑。但那個有罪的官員也被悄悄釋放了。

這篇報導收到八千餘封讀者來信，是《人民日報》創刊二十八年來反應最強烈的第二篇報導。這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警惕決策者必須加強法制建設，否則後患無窮。

王廣香這類含冤幾年、十幾年、幾十年的上訪者，現時雲集北京。我隱隱感到他們的哀鳴和嘆息有一天會變為怒吼。他們中間有些人把刊有〈在罪人的背後〉的那張一九八〇年八月的報紙揣在懷裏一直幾年，不時拿出來讀一讀，使希望的火苗不致熄滅。

然而這篇文章裡提出的問題，七年之後也不會得到解決。七年後，王廣香式的炸藥已投向了行駛中的旅客列車，投向了中央政府的公安部和毛澤東紀念堂。許許多多的王廣香變成了縱火犯、殺人犯和自焚者……。



第十二章

醉翁之意不在酒

當鄧小平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一次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我曾以為這也許並不代表鄧的真實思想，他不過是爲了安撫黨內保守派，說說罷了。

我是太天真了。就在一九八一年四月，一場震動全國的批判作家白樺的影片《苦戀》的運動，就是軍方在這兩個口號之下發動起來的。由《解放軍報》首先發難，刊登了批判《苦戀》的評論員文章。連北京市郊的農民一看這篇文章，都嗅出氣味不正，說：「怎麼又批《海瑞罷官》啦！」，意思是「又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了！」一些作家則覺得似乎一場反右派運動又到了眼前。

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是兩年前發表的，當時並未引起注意。按這個劇本拍成的電影，改名《太陽與人》，這時正在北京內部放映。其實，這部影片已經按照胡耀邦的意見，正在長春電影製片廠內修改。某位軍方官員用「借看」的名義，把未經修改的電影弄出來在北京內部放映。內部放映是什麼意思，大家心中有數，文革前一系列準備公開批判的影片，都是事先經過內部放映的。但是，既然這部作品在社會上尚未發生影響，甚至在文藝界中都不爲人知，有什麼理由和必要發動全國性的批判呢？

這是中國政界慣演的一種戲劇。雙方主要人物心裡都很清楚，但從不公開亮相，公布自己的政綱，當衆展開爭辯。進攻的一方不以政治綱領的形式公然要求維護毛澤東時代的整套理論與政策，因爲那就會一下子暴露他們要把中國拉向後退和篡奪權力的野心。本來是政治主張的根本分歧，卻要事先從對一部文藝作品的批判上做輿論準備，然後一步步把矛頭引向自己的政敵。

但是運動一開始，就不太順利。儘管《解放軍報》和「左」派們搞得熱鬧，《人民日報》卻按兵不動。到了五月，胡耀邦便叫暫停，讓不同意見的各方都「冷一冷」。而不久後，鄧小平又講了

話，重啓戰端，並且把批判的鋒芒擴及王若水、郭羅基等理論界人士；七月間又在中海召開有各省市文教書記與宣傳部長以及北京市文化思想界名流參加的「思想戰線座談會」。可靠人士方面傳出了「等著吧，十月起反右派運動就要開始了！」的預告，更加增添了緊張的氣氛。黨中央在批《苦戀》的態度上並不一致，但作家和藝術家們除個別人外，都不敢明確地對這場從批判白樺開始的第一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表示抗議。在就這個主題舉行的討論會上，「左」派作家、理論家氣勢汹汹地進攻，並且顯然是有準備的。跟白樺同一營壘的理論家、作家們則軟弱得多，全然處於守勢，且是倉卒應戰，相互間並無聯繫。

早就有人向我透露：白樺之後，下一個攻擊目標就是我，批判文章都已寫好了。我不得不謹慎從事。在《人民日報》記者部的會議上，有幾個政治上「左」的和比較靈敏的人發言擁護批判白樺運動，我和另一些人則保持沉默。但分成兩個黨小組開會時，就出現了十分有趣的場面：我所在的黨小組，由支部書記主持，她的開場白是《解放軍報》的調子。這時一位老記者率先發言說：「我實在不懂，黨風腐敗已到這步田地，這才是最危險的。放着這個不反，倒來反起什麼自由化來了！就算《苦戀》有點問題，有什麼了不起？何況根本沒有上演！」他這一帶頭，我再說話責任就輕得多了。我們倆一講，其他黨員也都說了真話，沒有一個是贊成《解放軍報》的。隔壁的那個黨小組就全然相反，主持會的人一講，無人唱反調，結果一致贊成批判白樺。簡直像兩個不同的政黨一樣！

事後我才得知，這時有一位地位相當顯要的大員正在歐洲訪問。他到西德時，把留學生的骨幹召集到一起鄭重宣布：「你們要做好準備，今年秋天，國內要開展第二次反右派運動。」

這話可不是說着玩的。更不可能是他個人的估計。

現在回想那年七月間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那麼高規格、大規模的「思想戰線座談會」，所為何來？若不是爲了發動一個什麼運動，何必如此興師動衆？分成許多小組開會，每組每日都有會議簡報，但與會者不能看。這是違反常規的，顯然是爲了使各組之間不致溝通開會的情況。這又是爲什麼？只有一份簡報發給每人一份，那是小說家姚雪垠的發言。他是批判《苦戀》最勇敢、最凶狠的一個。

開了三天會，沒有任何結果。無非是由大家肯定了黨中央的一個判斷：這幾年「思想戰線的領導渙散軟弱」。當然是指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及其代表人物過於手軟了。可以理解爲對於胡耀邦的間接批評，也包括對領導文藝工作的周揚的批評。

反右派運動沒有搞成。但「軟弱渙散」這個調子定了下來，給「左」派今後的進攻和各省收拾理論家、作家和記者提供了論據。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向來缺乏同權威鬥爭的勇氣。這場運動使膽小怕事的人更加謹慎，社會使命感本來就不強的作家、藝術家更有理由逃避現實了。有的走向象牙之塔，同時眼睛又盯着諾貝爾獎金；有的則走上商業化道路。

外界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國共產黨不同於所有其他執政的共產黨的一個特點：中共對於意識形態的重識和對於人民思想的控制，比其他國家的共產黨要強烈得多，也有效得多。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土生土長，經過長期艱苦奮鬥才取得政權，並是百年來第一個趕走外國侵略者的政治力量。五十年代初期，它在愛國、清廉、體念人民疾苦和維護社會道德（如一進北京就取締妓院）

等方面，又迎合了中國人的傳統道德觀念，因而享有任何朝代統治者所未能獲得的道義威信。這是它重要的政治資本。中國人傳統中對於文字與語言的魔力之重視與誇大，以及道德治國的傳統和「文字獄」的歷史，也為中共實行思想統治提供了有力條件。

這裡，外界又流傳著一種誤解，以為中共是爲了把自己信奉的一套意識形態強加於群眾，才實行思想控制的。這確是它幾十年來的實踐，但並非其目的。其真正的目的絕非是使人口成爲馬克思主義（哪怕是斯大林式的假馬克思主義）的信徒，而是要使人成爲沒有任何思想、並且不具思維習慣與思維能力的馴服工具。換言之，他們是企圖消滅人們頭腦中的理性，同時又把個人的自我意識、表達和發展自我以及改變世界的欲望，窒息在萌芽狀態中。這就是說，要創造出一種全無獨立思維、又無發展自成欲望（某些動物性欲望可以保留——因為也難全然消滅掉）的一種最易統治與駕馭的動物。

這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集團多年來推行「思想改造」、「反對資本主義」、「反對個人主義」、「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鬥私批修」、「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運動的最終目的。正是在這裡，鄧小平和毛澤東全無區別。

對人的才智的愚鈍化、白痴化和對於人的創造精神的窒殺，在我的家鄉黑龍江省效果特別明顯。那是一片開拓者的土地，居民向來以大膽和豪邁著稱。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短短一、二年內，哈爾濱竟貢獻出十幾名全國聞名的作家。其後，在日本統治的十餘年中，也還有一些作家出現。但一九四九年以後，則有三十年之久那裡沒有生長起一個作家！

一九八三年我在黑龍江省，又有新的發現。

一九八三年夏，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易人。那位爲了〈人妖之間〉一文而跟我糾纏不休的省委書記楊易辰終因長年抵制經濟改革而下台。

一九八〇年起，黑省大興安嶺地區到北京來找我的人幾乎踏平了我的門檻。那裡的貪官污吏和違法亂紀分子在掠奪國家資財和侵犯人權方面野蠻到無法無天的地步，成爲我心目中中國最黑暗的一角。只因我和黑龍江省委的關係這些年一直很僵，我去大興安嶺採訪，很難得到他們的合作，故此我雖允諾多次，卻一直拖延下來。現在省委書記換了人，全國範圍的整黨又即將開始，也許他們能改變對我的態度？況且，既然大興安嶺的人連年到北京上訪，他們遲早也必須解決那裡的問題。或許省委會派出個調查組，我來配合它活動？……

按常規，我必須向省委報到。我在哈爾濱的北方大廈中坐等數日，好幾個熱心朋友幫我去聯絡，然而省委宣傳部長竟然不敢見我。他是我在〈人妖之間〉中表揚過的賓縣兩個縣委書記之一。那時他正遭楊易辰冷遇，現在則受到新任第一書記的重用。他對我避而不見，顯然是爲了避嫌，而從他不願使書記猜疑他和我有什麼密切關係中，已可窺知這位新書記對我的態度了。

我決定改變西去大興安嶺的計劃，轉而向東，來到位居中國東北角的最後一個城市。那裡政治上的腐敗給經濟造成的損失特別明顯——數以幾千萬斤計的糧食不斷發生霉爛，我想用這些事實發出一個強有力的信號：政治制度再不改革，經濟改革的成果也將會被葬送！

途中，我又被另一個題材所吸引。一個濃眉重鬚的彪形大漢傳貴的一生經歷，雄辯地揭示出毛澤東的錯誤路線曾如何長期壓抑和扼殺著人們身上的活力和智慧，從而使中國陷入不能自拔的

停滯與倒退的泥淖。普通農民傳貴會拒絕過毛澤東急於推展的農業合作化政策，棄農做工，因為他覺察到那種平均主義的政策會使勤人變懶、能人吃虧，造出一個懶人的天堂。他等著施展他超人才智的機會。而當他後來被推上生產隊長職位後，靠他的組織才能、經濟眼光與魄力，竟在一年之內使那裡農民的收入增長了十倍！但繼之而來的便是無窮的干擾與破壞，「搞資本主義」的罪名一直跟在他的腳步後面。直至被認為經濟犯罪分子而送進監獄。出獄後他被推舉為生產大隊的隊長，他又在一年之內使幾個窮得出奇的村莊收入增加了幾倍。然而新老敵手仍然糾纏著他，他隨時都可能再次入獄……

但是受到壓抑而不能發展的還不僅是傳貴一個人，而是很多很多人。傳貴有一次跟他的政敵辯論時激憤地說：

「你們這股勢力，在下頭也有點基礎，那就是你們在台上整好人、整勤勞的人，執行那條左的路線那二十多年培養起來的那些混日子的人。你們把很多很多好人給毀了，所以黑通現在才找不出『楊大先生』那樣的好人來。也許是我眼睛瞎了，我在黑通就找不到突出的人。不論幹什麼事，要選拔出一個能人來，費死勁了。隊長、會計、出納，就老是這麼二十四塊坯，上下倒換。明知他護小頭，私心重，想不用，可是硬是找不出個人才來代替他。連找個打更的都難。有什麼高標準？無非是到點上班，晚上不睡覺，誰來拿啥不裝老好人送禮罷了。上回南磚想用個打更的，掂量來掂量去就找不到一個人。咱們這是四千人的大隊呀。想找個給十來個人做大鍋飯的廚子，也就是一天做三回大餅子、饅頭、大白菜大蘿蔔的吧。醞釀來醞釀去，也是找不着。後來找了個姓紀的，一月七十元工資。這人做完飯往那兒一坐，啥活手不伸。門外十步遠就是菜窖，裡頭裝

的白菜蘿蔔。把窖門子蓋一蓋，別讓菜凍了行不行？不行。把一窖菜全凍壞了，他一點不心疼。這事他連想都不想。那塊兒東房山頭有個廁所，是原來老王頭用木頭修的，乾乾淨淨。那兩天下大雪，你拿個條帚出來劃拉劃拉行不行？他不動彈。路封住了，就在牆根上拉滿了屎尿。他一天幹什麼呢？到處扯雞巴蛋，這兒一嘴那兒一舌頭，裡外挑撥是非。……

我喜歡傳貴的粗獷、豪邁的性格。他的命運引起我無限感慨：中國普通勞動者身上雄厚的活力曾被窒息三十年之久！

這次採訪是為時最長的一次。七月盛夏我穿著短褲和短袖襯衫出發，三個月後歸來時已不得不借一身冬裝了。途經哈爾濱，我聽到一個壞消息……

一九八三年十月，我結束在東北的採訪，歸途在哈爾濱小停，一位好朋友悄悄告訴我：大事不好！鄧小平在二中全會上號召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了！

我深感意外，大惑不解。即使僅就我這次採訪中了解到的黨組織的嚴重腐敗和難以療治的情況，也應該全力以赴地去整黨呀，怎麼又像一九五七年那樣矛頭一轉，衝着知識分子來了呢？那位友人把筆記本打開給我看。二中全會本是討論在全國開展整黨的會議，而鄧小平的講話只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說整黨，卻用了三分之二大談反對精神污染！這是為什麼呢？

我必須儘早回北京，了解事情的原委。我縮短了在哈爾濱的停留時間，我取消了原定去瀋陽講演的計劃——估計在這種形勢下遼寧省作家協會分會也不敢請我講了。

北京是一片肅殺之氣。《人民日報》大院裡，人們的表情和氣氛是如臨大敵，凶多吉少的樣子。

這次和二年半前批白樺那次不同，是鄧小平親自下令，非同小可。有人已噤若寒蟬。我在院內遇見編輯部一個部門負責人，便向他打聽這是怎麼回事，他不敢回答，反問於我，我說：「我剛從外地回來，能知道什麼。不過我想，最多無非是再來一次反右派運動罷了。但是現在要想再給誰戴上一頂右派帽子，怕也未必辦得到！你說呢？」想不到他的回答竟是：「那可也不見得啣。」

又遇到王若水，他的心情很不好。我說：「看吧，搞不下去的。」他因為在這次運動中首當其衝，不如我冷靜，也不樂觀，說：「也很難說，權力在他們手裡呀。」

幾天後，我從報紙上看到王震的講話。他講了兩次，都說到「黨校在整黨中要把理論教學隊伍認真清理，決不允許那些堅持反對黨、危害黨的分混入和留在裡面，也決不允許黨校的教員打着『研究理論』的幌子，進行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活動」。這就等於是說理論家中有階級敵人，理論上的錯誤不是學術問題，而是敵人故意進行的破壞活動了。

聽了胡喬木和鄧力群幾次講話的傳達。他們的調子比鄧小平更激烈。攻擊的矛頭主要是指向周揚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上的報告中關於異化和人道主義的部份。王若水參加了這個報告的起草，並且幾年來一直是「左派」攻擊的對象，所以也和周揚一起被放到被告席上。

胡喬木說：「精神污染是個現實政治問題。周揚關於異化問題的論點，可以成為持不同政見者和反對派的政治綱領。按照這個異化論，我們國家就沒有自由，也沒有消滅剝削。他說在我們的社會裡『勞動者不能決定自己產品的分配……受到壓抑』『強制的分工下不能從事創造性勞動』，這是反動的煽動，是顛倒黑白！」

鄧力群說：「黑龍江省那兩篇論異化的文章，是以異化問題為掩飾的反革命文章。王若水這

個人在一九七九年理論務虛會上就全面、集中地批判毛澤東，他懷疑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認為毛澤東個人品質惡劣。最近，他又批毛澤東的『一窮二白』。反正他一有機會就批毛。他經常說要防止公僕變成主人，以權謀私，騎在人民頭上；人民之子成逆子，政府成老爺，不受人民控制。他把一部分人引伸為整個政府，看作是我們的主要危險。……非法組織沿用這個提法，煽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王若水大講人的價值，說『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抽掉馬克思觀點的具體歷史規定，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提供理論依據。」

為什麼不准提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異化呢？他們的全部論據無非是：馬克思沒有說過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異化，他只說過資本主義社會有異化！我在內心裡不無嘲諷地說：馬克思沒說過的事情多着呢！你們奉為至高無上的「偉大領袖」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諸如「農村包圍城市」之類，馬克思哪一年說過？當年發動文化大革命，也沒事先翻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吧？

討論「清除精神污染」的會議，比批白樺的會還冷清。兩年前那起運動，「左派」還敢於出來打破會場的靜默，公開表示擁護。後來這些人在群眾中名聲都不大好，也沒撈到什麼勝利果實。所以這一次他們聰明一些了，開會也不發言，靜觀這場運動會不會也像批白樺那次似的夭折，如果不一到一定時機再站出來還不遲。

這次批判運動一開始就遇到一個障礙：它是借一個抽象的理論概念「異化」而發起攻勢的，而偏巧這個詞兒不要說普通百姓，就連許多多知識分子也鬧不懂，甚至從來沒見過。這就給對於「清污」想不通、但既是鄧小平提出的就不好表示反對意見的人提供一個機會，迂迴地抵制它，《人民日報》記者部每一次開會，一位老記者都要第一個發言，每次發言他都要說：「這個『異

化」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我就從來沒讀過談異化問題的文章。是不是請什麼人來先給我們講一講它是什麼，然後我們才好批判。」

有些地方，真的請學者來講了。那時工會正在開全國代表大會，大會上應該表明對「清污」運動的態度，這就非批判「異化論」不可了。可是代表們一概不懂「異化」是什麼意思。於是只好先學習「異化」，請專家講授。可是這麼一講，就出了問題：關於二十餘年來好端端一個共產黨怎麼會出了個林彪和四人幫，毛澤東怎麼會從一個革命領袖變成民族罪人，共產黨內何以出現了這麼多腐敗分子……等等問題，人們正找不著原因呢，聽過異化理論，一下開了竅，覺得它正好可以解釋這些問題。

批判異化的政治家和理論家們，對於共產黨內和按共產黨的設計建造起來的中國社會中出現的許多他們自己也不能不承認的許多問題，若能拿出一個解釋來就好了。他們拿不出任何能令人信服的解釋，卻要來批判只有它能夠提供解釋的異化論！

在學習「異化」概念中間，另一個疑問也變得更加尖銳了：不管你叫不叫它異化，共產黨一些幹部和組織變成了同黨的性質與政策完全對立的危害人民的力量了。這也就是二中全会要發動的整黨必須解決的問題，怎麼一下子冒出個「精神污染」來了呢？現在又把「清污」放到第一位！不是說黨風問題是執政黨的生死存亡問題嗎？難道「生死存亡問題」不比這個重要得多嗎？

還從來沒有一次運動所要反對的對象這麼廣泛過。從最抽象的異化、人道主義理論到人們的日常思想與生活方式中同毛澤東多年來提倡的道德相違背的東西——凡不符合排除一切享樂的苦行主義、排除一切個人利益與欲念的集體主義甚至排斥西方影響的民族主義的東西，統統列為「精

神污染」。堂堂首都的黨市委領導機關門外張貼出告示：凡留披肩長髮、裙子過短、褲子過瘦和塗抹胭脂的人，不得入內。你就可以想見在外省和底層，會出現怎樣的混亂了。

「清污」運動必不可免地在全國各方面都引起大震動。本來人們對於共產黨政策的穩定性就信任不足。不僅搞文化的人，搞經濟的人也是提心吊膽，怕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要取締個體經濟和禁止僱工了，甚至把自己定為資產階級，那就幾輩人都翻不了身了。批判白樺時已使他們驚慌過一陣，現在由鄧小平親自發起的聲勢浩大得多的「清污」運動很像又要來一次文化大革命（那次動亂不也是從意識形態上反資反修開始的嗎），更使他們膽戰心驚，覺得自己危在旦夕了。

中國的領導層對下屬的動向比過去敏感多了。胡耀邦、趙紫陽等人趕忙去找鄧小平，面陳利害，力主「清污」不能破壞經濟改革。國外輿論界的非議一定也起了重要作用。大約十一月初，就傳來了指示：農村中不搞「情污」運動。一周以後，又公開報導：經濟領域不搞「清污」。後來又宣佈科技界也不搞「清污」。

總共不過二十七天，這場短命的運動就夭折了。

「清污」的反動者硬說這次運動沒有死人，這是說謊。僅就我所知，就有一个人死去。這個消息是一位女青年到我辦公室來直接告訴我的。「清污」一開始，黑龍江省牡丹江養馬場的一個政工幹部就把那裏的女青年們召集到一起開會，讓每個人交代講究穿著打扮的動機。有一位姑娘這方面表現更突出些，便成為批判的重點。她想不通，又無處講理，就服DDV自盡了。

「左派」發動「清污」在北京取得的唯一一個重要成果，是改變了《人民日報》的領導班子。十月三十日是個星期天，忽然通告全體黨員上午九時要來開緊急會議。我事先已知道將要發生什

麼事，便按時到會，仔細記下了會議的情況。

胡喬木面色蒼白，似乎有些激動——他們終於勝利了。他宣佈中央書記處十天前的決定：同意胡績偉辭去人民日報社長職務，把副總編輯王若水調離人民日報。實即撤職。他還宣佈：中央機關的整黨從此開始。我心中冷笑：真有意思！整黨從反腐敗、反倒退最堅決的人民日報開始！胡和王的罪過是「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沒有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不是無意的，偶然的，也不是短時間的。關鍵的問題是中央提出堅持四個基本原則後，胡和王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在很長時期是不積極的」。「他們對於十年內亂引起的結果抱悲觀態度」。

胡喬木着重批評了胡績偉的一次講話，說他把報紙的人民性擺在比黨性更高的位置。胡績偉根據共產黨中央不斷犯錯誤而黨報也跟着擴大這些錯誤的歷史教訓，提出黨報應代表人民對黨實行監督。胡喬木說：「他實質上把黨報與黨中央的關係顛倒過來了，……人民並不都是舜堯，人民犯了錯誤怎麼辦？……這流露了他對黨不信任、對前途缺乏信心的情緒。」

不知是真是假，胡喬木愛動感情，這次講話有兩處他又用了哭腔，都是在責難胡績偉和王若水錯怪了黨的地方。

他講完話，居然還有不少人鼓了掌，我感到詫異，以為《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人，都跟我一樣呢。

我沒有鼓掌。我覺得這是很陰暗的一天，雖然天空是晴朗的。

鄧力群始終微笑着。他們是有理由高興的。一九七八年以來，《人民日報》始終是他們推行極左和倒退那一套東西的障礙。新華社是跟他們跑的，北京的其他報紙也跟着，有的還很積極。只

有《人民日報》巋然不動。

不過也許他們高興的早了一點。胡喬木這一天講話中說「需要整頓理論、文藝的領導班子，數量相當多」。他們只來得及「整頓」了一個《人民日報》，幾天後形勢就有了變化，不能繼續「整頓」下去了。原想拿掉周揚，沒有成功。決定解散中國社科院的馬列主義研究所，也失敗了。



第十三章

我掀開了帷幕

整黨是一九八四年初正式開始的。

整黨給很多人帶來些希望。或者說，幾年來社會上的和黨內的愈益嚴重的弊端使人們憂慮、憤慨，他們把解決的希望一直放在整黨上，而現在它終於開始了。

其實我有很多理由對這個整黨不抱多少希望。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的運動，應該說已經是對於這個黨的第一步整頓。然而在山東，這場運動變成一九六七年起奪權上台的一派政治人物在迫害另一派政治人物十年之後的又一次大規模迫害運動，許多地方這種迫害所採取的手段及其殘酷性，不啻於又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在遼寧則是重新上台的「老幹部」以各種手段包庇作惡多端的四人幫幫派分子。一九八〇年頒佈「黨內生活準則」，要求完全執行，應該說整黨已經開始。「準則」裡對於高級幹部不准享有特權，黨員不得以權謀私等，都有明確規定，但四年來這些現象反而愈演愈烈。去年中紀委大張聲勢，發表告全黨的公開信，要求黨員幹部退出多佔的住房，繼之又發佈指令，限期自報超額居住面積，結果變成一場笑話。在哈爾濱，老朋友向我講起不少各級領導幹部多佔甚至搶佔高級住宅的事，又告訴我：「至今沒有查出和收回一個人的超標準住房！」我問這是為什麼，他回答說：「道理很簡單。上一級領導幹部不敢去追究下一級，因為人家馬上會反問他：『你呢？』他佔得更多。」

在我的每個筆記本上和我家裡、辦公室裡堆積的上萬封讀者來信裡，都可以找到大量例證，述說著許多人按照黨中央的指示同貪污受賄、欺壓公民的人進行鬥爭，得不到保護和支持而碰得頭破血流的事情。

然而我的天真和樂觀，仍然使我常常忘掉了這一切，也忘記了我本人身心上的累累傷痕。這

幾年我所揭露的問題，無一不是共產黨歷來聲稱必須解決的問題，也是此次整黨的對象。那麼爲什麼我的日子卻一年比一年更難過呢？爲什麼當我遭到那些省委攻擊甚至誹謗之時，聽不見黨中央對我的句句鼓勵呢？

胡耀邦也屬於共產黨內的天真派。這年年初，他對《人民日報》做出指示說：「整黨就要像個整黨的樣子。今後三年整黨期中，《人民日報》要表揚一萬，揭露三千。」

我粗算一下，一年要發一千篇揭露性報導，那麼平均就是每日三篇！這是前所未有的事！看來還是大有幹頭。

我並非不知，別說表揚一萬，就是表揚十萬也易如反掌。批評可就難了。前幾年胡耀邦也說過《人民日報》上正、反面報導可以各佔七十%和三十%，而實際上批評揭露性報導平均從未超過三%，就遭到上、下夾擊，《人民日報》就頂不住了。這次胡耀邦的指示，也如關於整黨的決定一樣，並無具體、可靠的保證。但我仍然認爲既然總書記有言在先，還是可以信賴的。形勢不同於過去了，畢竟還是要整黨嘛！

一九八四年一月，北方最寒冷的時候，我來到西安市。這一年，我總共三次來到西安。我從未在一年裡兩次來到過同一個地方。

對於我西安之行的主要目標，我起初是沒有多大興趣的。一個陳年老案，戰爭時期發生的一個農民和中國共產黨中央之間的債務糾紛，對了解將近四十年後的中國，這個題材已無現實意義，而在我的檔案堆裡和筆記本上有很多熱氣騰騰、涉及到幾千萬人命運的重大現實題材等著我去採

訪呢。

我本不想接受這個項目。但是事件的主人公郭建英由他長子陪同到我的辦公室一坐，立即喚起我極大的同情。幾十年在黃土高原上風吹日曬的勞苦生活，把這位七十餘歲老農民的臉變成絳色，不再褪去。他無言地、木然地端坐在那裡，由他兒子講述他悲苦的一生。我立即想到歌劇「白毛女」中的楊白勞，那個曾使幾億中國人爲他、爲中國農民的悲慘命運痛哭流涕的老農民。他的面部沒有表情，卻在無聲地控訴著那些無情的手。

他家鄉那個小村莊，窮到這種程度：某一家人哪頓飯炒菜用了油，全村都香噴噴的。光靠全家每人一畝地難以爲生，郭建英年輕時便幹起人力運輸來：受商人的委託，把一些日用雜貨從西安肩挑到商縣，賺幾個辛苦錢。後來他自己經營起一個小小鋪面，賣些草鞋、木碗、香烟之類的東西，仍然是自己跑西安採買和肩挑。國民黨的苛捐雜稅把這麼個小生意也逼黃了。

一九四六年夏秋之交，李先念的部隊從大別山突圍北上到陝南，被胡宗南的軍隊團團包圍在山上，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只能向老百姓求救了。郭建英在村中算是比較殷實的一戶，便被請到山上去洽談。他出於對國民黨的憎恨，又見新四軍的士兵在寒風中瑟縮的可憐情景，便答應去籌款支援，甚至把自己身上一條夾褲也脫下來送給了士兵。他連夜趕到西安，憑自己誠實可靠的信用八方求借，弄到一千三百萬法幣，裝在背篋裡，加上偽裝，長途跋涉到山中交給了新四軍五師。他借款的數目比那一帶的財主人家都高出一倍以上。

五師的首腦人物給郭建英寫了借條，告他隨時可以到陝甘寧邊區找政府主席林伯渠領取。可是這時國民黨已偵知郭建英「接濟共匪」，開始追捕。郭建英只好攜妻帶子逃奔山中，流落到西安。

他繼續以商販和運輸爲生，同時再向他人借錢，償還舊債。爲了向錢莊借款時（利息較低）作抵押之用，他在西安市購下一個磚房院落。

一九四九年解放後，郭建英有意討還政府欠他的債。那時共產黨也確實償還了戰爭時期欠下的許多債務——錢和實物。這時郭建英已是蘭州運輸公司的職員。一次在填寫履歷表時他順便寫了一下當年借錢給新四軍的事，想不到立即遭到譴責：「你還想向共產黨討債！他本來就有些膽怯，因爲解放前夕他已小有資產：除房產外，他還是半輛卡車的主人。現在卡車雖早已歸公，他仍怕把他定爲資產階級分子。從此他就不敢再提此事了，默默地獨自繼續爲共產黨償還債務。」

一九五八年在「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之後，又把他的房屋歸公。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更殘酷的迫害到來了：一家人掃地出門，到冬季還穿著單衣。原因只有一個：郭建英當年曾借錢給共產黨。邏輯是這樣的——一九六六年前：「你既然有那麼多錢出借，一定是個資本家！」一九六六年以後：「你既然是資本家，怎能借錢給共產黨的好心腸？一定是個政治騙子！」

這時郭建英已有六個子女，每月工資只有五十幾元。抄家後就更加艱難了。

但是更使郭建英夫婦痛苦的，是他們給子女留下的政治負擔。因爲是「資本家」又是「騙子」，全家人成了賤民，子女到處受到歧視與侮辱，升學、婚姻、就業都遇到障礙，小兒子在驚嚇和欺壓之下得了精神病。

從一九七二年起，母親開始爲子女的命運奔走了。一雙纏足，又沒受過教育，也沒在社會上活動過，兩眼漆黑，不知找誰是好。還捨不得幾個車錢，只能步行。到處是冷眼，常常要在森嚴的大門外佇立很久，才得到一個純屬搪塞性的回答，叫她去找另一個衙門。於是她就再繼續跋涉，

去尋找另一次推諉……

到了一九八三年，母親再也走不動了，老漢心臟病也加重了，夫婦隨時都可能去世，那麼子女就永遠不得翻身了。這時才決定非來北京不可了。致李先念的一封信經由一九四六年當時的陝南軍區政委汪鋒轉呈上去，國家主席批示西安市委要改善郭建英一家的境況。但是市委書記何承華頂著不辦。汪鋒到西安催促，何承華非但不理，反倒採取了對郭家新的迫害行動——讓法院作出無理判決，強佔屬於郭家的空地興建樓房。郭家不服，便野蠻地動用武力強行拘捕。

這時，他們找到了我。

但是我最先發表的關於西安的報導，寫的卻不是郭建英事件。

在一位年輕的業餘記者袁春乾合作下，我發現了一個奇蹟般保留下來的古董——在西安市一家醫院裡，幾乎原封不動地保存著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締造下來的政治氣氛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文革中奪權的人依然是醫院的領導。那時被毆打致殘的高級醫生仍然隨時受到當年打手的威嚇：「將來我還要打你！被「專政」多年的人至今得不到平反，甚至連恢復原來工作的正當權益也仍舊被剝奪。知識分子、專家的生活條件極其惡劣。」

於是我和那位業餘記者合作，寫成了一篇不長的通訊：〈白衣下的污垢〉。這是我迄今所寫的報導中容量最大的一篇。短短的一篇通訊中，我寫了陝西省的一個縮影。這種人與人之間駭人聽聞的荒唐的關係，這種善惡與是非的顛倒，在文革過去八年之後至今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於西安市與陝西省的許多角落，是令人震驚的。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那天清晨播送了這篇通訊的摘要，立即震撼了西安市，人們紛紛去搶購當天的《人民日報》。份數有限，而大家又先睹為快，便不斷轉手，再三提價，最後賣到二元五角多錢一份，較原價提高了三十餘倍。順應市場需求，機伶的人開動了複印機，單篇文章的複印件賣到八角多錢一張。

這是因為它是建國以來三十五年間第一篇揭露西安市政治問題的報導，而且切中要害。同時，人們的一個誤解也起了作用。我在報導中有兩處寫有「陝北老鄉」的字樣。我在西安了解到所謂的「陝北幫」的幹部把持陝西省黨政大權，是這個省長期保守、落後和「左」的一套猖獗的重要原因。我有意指出那家醫院的頭頭和包庇他的上級是「陝北老鄉」，確是想摸摸老虎的屁股。但讀者們卻以為我了解內情，發出一個信號，透露中央要來解決「陝北幫」的問題了，因而特別振奮。其實沒有這回事。

在中國的其他省分，鄉土關係、親族關係與裙帶關係結成的宗派，在政治角逐中也居重要地位。但在陝西，由於它的古老和落後，鄉土感情在政治鬥爭中的凝聚與排外作用就尤為劇烈，省委書記就說過：「不知為啥，我聽陝北人說話，心裡就熱烘烘的。」因而陝北人盤據要津者最多，連西安市的警察，也大部分都是陝北人。

陝北屬於中國最貧窮愚昧，自然條件很差的地區，而那裡又是長征以後中國最重要的革命根據地。陝北幹部老資格的多，同時他們受教育也最少，地理上遠離沿海商品經濟發達地區造成的眼界狹窄與思想保守也更嚴重。人們對我解釋陝北幹部為什麼最易保守時說：他們祖祖輩輩住窖洞，連像樣的房子都少見。全國解放後他們一進入西安，看見有這麼多樓房和汽車，便非常滿足

了，以為這和共產主義也差不到哪兒去了。決定一切的大權又握在他們手裡，生活又遠遠優於普通人，就更加心滿意足了。他們還把這一切都看作是他們鬥爭得來的果實，以功臣自居，不能理解文化和科學技術在創造現代文化中的作用，也就不能重視知識分子，而是把知識分子看成無足輕重的人，卻又覺得對自己的權威是一種潛在的威脅，因而動輒加以猜忌、排斥和打擊。

就在這個陝北人的世界，這個漢民族的發源地，我對中國問題的認識有了一個飛躍。

這當然也是因為我所享有的一點特殊條件。六年來無論在北京或外地，找我長談的人都很多。我的筆記本上常有不成形狀的字迹，都是我疲於接待，與客人交談到深夜，控制不住瞌睡時作的記錄。

但是，我這一生，還從來沒有像在西安市度過的這一個月裡這樣繁忙過。從普通市民、工人到局、處、科級幹部甚至前任的省、市領導幹部，很多人都欲和我一談。最後竟出現了這樣的場面：在我的住室裡，同時坐著兩個人或兩起人，我和一人或一起人談，另一位或另一起人等著。在賓館的大廳，則另有二、三人等著。我為人們等我的時間太長而不安，不得不幾次出去道歉，並告慰他們說：「快了，大約再過四十分鐘（或二十分鐘）就可以了。」我無法到餐廳去吃飯，就由等我談話的人到街上買來或從家裏拿來午餐或晚餐，一面吃一面聽別人談話。

到我離去時，火車開動之後我才發覺怎麼喉嚨疼起來了？一摸，原來是扁桃腺發炎。我一生裡這塊地方還從未發過炎。

我得到的報償也是空前的。

發生在西安的很多怪事在中國其他地方也不是不可能發生，但不會搞得這樣極端和徹底。二

十年前胡耀邦在這裡碰到的事，在別的省他也可能碰到，但他不會像在陝西那樣被搞得一敗塗地，險些被整死。

我在西安時，仍不斷聽到人們懷著尊敬和同情說起胡耀邦一九六四年在陝西的經歷。

這一年三下西安，使我弄通了一個至為重要的問題。

一九六四年胡耀邦到陝西走馬上任，擔任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書記。那時全國農村「四清」運動已經展開。「左」的傾向本來就是普遍的，因為毛澤東說過全國農村的大部政權「不在我們手裡」，這次運動就更加酷烈。然而陝西的殘酷和野蠻又更甚一層。胡耀邦到西安市附近的長安縣視察，看到許多農村基層幹部被監禁，被用肉刑逼供，大為震驚，七天內匆匆跑了八個縣，下了幾條禁令，像滅火一樣制止胡作非為。由此就得罪了西北局的第一書記、陝北人劉瀾濤，胡耀邦遭到嚴酷的批判。直至他病重去北戴河養病，西安的缺席審判仍在繼續。二十年來，由於派系力量的作用，當年批判胡耀邦並已證明是錯誤的那些人，始終受到重用，同情和為胡耀邦辯護因而屬於正確一方的人，則始終受到貶低和排斥。

也許會有人發生疑問：這二十年中不是隔著一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嗎？是的，這正是我受到啓迪之處。文革時西安也分為兩派。但運動初期起主導作用的和文革中間以及文革後真正吃香以至至今掌權的，並不是「造反派」和紅衛兵，而是文革前就受到上峯賞識的那些政工幹部、「左」派。

我引出一個結論：在共產黨內，凡為人正直、富於人道主義感情、文化較高、善於獨立思考而又敢於直言的人，往往也是能力較強的人，都難免遭到打擊或冷遇；而那些通曉權術、見風轉

舵、在整人害人上心狠手辣的人，往往也是滿足現狀不思進取的人，即使平庸無能，也能官運亨通。

在這個號稱「中華民族（實為漢族）的搖籃」的陝西省，漢族的古老傳統通過農民的習性注入中國共產黨血液中去的东西，比其他省份更為濃重。陝北又是中共取得全國政權前最主要的根據地，有一批二十年代就捲入農民武裝鬥爭的共產黨老幹部，他們的文化、理論素養同其革命資歷賦予他們的高貴身份和極高權柄很不相稱。然而（這一點和其他地區一樣）權力和地位造成的幻覺，却使他們的自信與做出決策時的隨意性和他們的真實能力相距很遠。這些農民出身的幹部，屬於中共黨裡掌握政權最早的幹部，也是戰爭經歷較長的人，因而他們在黨內最早享有不受侵犯的特權。而權力的甜頭、農民群眾的馴順可欺與戰爭生活造成的對殘酷手段習以為常的心理，又使他們在權力鬥爭中更無所顧忌。鄉親、親屬、長期共事的上下級關係等造成的派系關係和意識，也較他處為重。

就在這次「四清」中，發生一起至今人們還常常憶起的案子。一個人因仇隙或為表現自己「革命」而加害了另一個人，這是司空見慣的事。但是如此離奇的陷害就少見了：「四清」工作隊中的一個女幹部一天早上見一隻母雞從鄰院啼叫著飛進她住的院落，屁股上滴著鮮血。她的想像力如此豐富，竟然由此斷定是住在鄰院的工作隊一名男幹部姦污了這隻母雞！而且這件事竟發展為一起刑事案件，那男人還被西安市中級法院判了很重的徒刑，後來竟屈死在獄中！十四年以後，全國平反冤假錯案，中共西安市委書記陳元方，認定這是一起冤案，主張平反，而當年製造這冤

案的中級法院的兩個院長竟仍然認為自己正確，頂住不改。這個事件又被與陳元方對立的一派政治勢力用來攻擊他，竟成為導致陳元方等幾個領導幹部被迫下台的一個因素！

這個所謂「姦雞案」貫穿了三個歷史時期。郭建英要求共產黨償還借款案則貫穿了四個歷史時期。我到西安市接觸到的不少事件，使我進一步明白了：文化大革命並不是一個突發事件，今天仍在阻礙中國社會進步，使許多中國人陷入不幸與痛苦的那些因素並不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遺毒」，它們有悠久的歷史。

一月下旬的一個晚上，一個名叫顧來根的人走進我的房間。五短身材，相貌端莊，顯得質樸可親。感冒造成的沙啞，使他聽來真率的言談又增添了可信性。

倘使我事先不是對這個人已有相當了解，便一定會認為他是一個好人。

不用他介紹，我已知道他的身世。上海人，孤兒，家境貧寒的工人，五十年代到西安一個集體所有制的建築單位當工人，後來又成了做共青团工作的政工幹部。現在房地局工作。

在郭建英事件中，他兩次扮演過重要角色。一九七〇年，他非法佔用屬於郭家的土地，為一個科長建造一個講究的四合院。幾年前拆除了它，又要在這塊地皮上造一幢住宅樓。郭家據理反對，他便仗仗經他收買的審判員作出的判決，動用警察和他請來的打手，對郭家老老少少施加暴力，強行拆除郭家在自己土地上建起的臨時住處，造成一起轟動一時的事件。

從顧來根在我面前的表現看，他就全然是另一種人。據他說那是一起陷害，他冤屈。我不再問了。我看過他的檔案。

還要過幾個月，我才能了解到顧來根這個人對於我認識中國這幾十年歷史的意義。他純粹是文革前已推行十幾年的那個「社會主義」的產兒。「社會主義」改造把郭建英等很多守法公民的房產變成由西安市房管局管下的「全民所有」的財產，這個「社會主義」又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只准公民生育却基本上不建住宅。於是房產的價值便與人口增長成正比而增長，房地局的權力和這種權力帶來的好處也成倍地增長起來。假如這些房產留在私人手裡，房主不過靠它們得到一些房租，而當它們變成「公有」財產，落入代表「社會主義國家」管理「全民財產」的房地局幹部之手以後，人民要付出的就遠不只是房租了。根據可靠的記載，顧來根和他的一夥在文革期間多次用住房換取槍枝彈藥發動武鬥。在「全民所有」的房屋裡設置黑牢，私設公堂，殘酷拷打從「戰場」上抓來的另一派俘虜。顧來根用他手裡的四萬多元房租給打手們發工資，過花天酒地的生活。

「社會主義」用一隻手造成住宅恐慌，用另一隻手按照「階級路線」提拔重用顧來根這樣的流氓，讓他們去利用住宅恐慌大撈私利。顧來根既善於花言巧語哄騙人，又擅長以各種手段刁難、欺壓人，所以成了西安事件逼迫「拆遷戶」動遷的第一號能手。同時，他手裡掌握一大批供拆遷戶用的新舊住宅，他從私相授受中得到無窮的好處。在郭建英一案上，他就用房子收買了兩級法院的審判員、律師、公安局的官員和出證者。

還在火車上，我就聽到西安市一位幹部說：「在西安，兩個人吵架時一方若罵對方『你是國民黨！』另一個人常會還口說：『你比國民黨還壞，你是房地局！』」我很驚訝。

在西安看到的很多於人民、於共產黨都十分不利的事，使我產生了一個疑問：幹這些事的都是共產黨幹部；然而即使共產黨的死敵，所作所為也不過如此吧！

和文革時期相比，總算有了一點進步，不再把反對或威脅自己的人抓起來或殺掉了。現在採取的是另一種方式：免掉你的職務，不給你事情幹，工資却照發。凡屬宿敵，或不肯同流合污，對多行不義的領導有所不滿，或按照中共的政策行事而違背上司旨意者，多成了西安街頭的閒人，幾年幾年地沒有工作。

能力越強，工作越是出色的人，越難立足，因為你不是那些蠅營苟苟之輩的同類。當壓制、刁難都不奏效時，就採取陷害手段，有人甚至連生命都受到威脅，致使西安市知識分子外流的數量驚人。

在郭建英事件上，共產黨分成了兩派。

副市長李庭弼主持的調查組，認為郭建英是好人，對共產黨有功。一九五八年把他的房子收歸公有是有錯誤的。應償還共產黨欠他的債務，歸還他的房子。

市委書記何承華委託秘書長李天順主持的調查，所得出的結論則完全相反。

李庭弼和何承華都是有將近四十年黨齡的共產黨領導幹部。他們不可能當面辯論，我却分別聽取了他們各自的主張。

市委調查組也不能不承認郭建英三十八年前確實借給新四軍一大筆錢，但認為那不是自願的，而是共產黨的軍隊綁了郭建英的票，他是被迫交出款項的。還認為郭建英可能是個壞人，一個被國民黨殺害的共產黨幹部是他出賣的。這還不夠，爲了不退還郭建英的房產，還要設法證明他是個資本家。爲此，就把他祖父當年一度有過的房產，算到他頭上，又把他本人不同時期有過的財產累計到一起。還要重新肯定一九五八年那次估算郭建英出租房屋面積的錯誤作法是正確的。

——把院落的過道，把郭建英自己居住的房屋和無償借給親友住的房屋統統算進出租面積。

我想起一九四六年國民黨追緝下郭建英一家逃到山上，他的一個兒子在逃亡途中病死。一家人逃到國民黨統治下的西安，倖免於難。國民黨政府是由於郭建英「接濟共匪」、做了有害於它的事而欲置之於死地的。現在，以何承華爲代表的共產黨政權是曾經受過郭建英的恩惠的，在三十八年來已經兩次恩將仇報，把郭家逼入絕境之後，爲什麼現在還要再一次把業已年邁病危的郭建英夫婦逼上死路，使其子女永世不得翻身呢？這不是在做國民黨未能完成的事嗎？

然而市委書記何承華絕不是有意和國民黨配合，爲他們效勞，這倒是可以肯定的。他不過是同理論上的共產黨員相比身上少了一點東西又多了另一點東西而已。二十多年前，他就辦過一件國民黨或共產黨的任何敵人已不得要辦成的事：由於他虛誇成績——糧食產量而又隱瞞災情（周恩來電訊甘肅是否需要中央撥糧救濟，何承華答曰：「這裏的農民連油餅都吃不完呢！」），六十年代初期那場大饑饉中，甘肅省七百萬居民中有將近一百萬人活活餓死了。他來見我時，我特別仔細地看了看他那雙手。因爲有一位畫家告訴我，甘肅省饑饉最嚴重的一九六〇年，他曾在蘭州最豪華的賓館寧臥莊坐等這位省委書記幾個小時。何承華在跳舞呢。舞會散了以後，何承華才來接見他。畫家望著那雙又白又嫩的手，心中湧起極強烈的厭惡和憤怒，因爲他知道在寧臥莊外有千千萬萬的飢民嗷嗷待斃。

何承華對待郭建英一家人的感情不會比對甘肅省飢民更冷淡。償還郭家的債務，不需他出一分錢。但自從郭建英到北京申訴他的冤情那時起，他就成了何承華的仇敵。發生在西安市的任何錯誤，於何書記都是不體面的。因此郭建英雖然並未控告何承華，何承華却認定郭是告了他的狀。

證明自己正確和永遠正確，對於一個共產黨領導幹部是很重要的。於是何承華就需要找到依據證明郭建英是錯誤的，這並不難，他手底下的人領會他的意圖，便去賣力蒐集和製造證據。

但是也很難說另一個原因是否更加重要：一九六〇年——六一年，何承華在甘肅闖下大禍後，北京派去收拾殘局的的就是現在主持解決郭建英一案的汪鋒！當年汪鋒把何承華貶職為縣委書記，何不認為這是自己罪有應得，反看作汪鋒對他的一箭之仇，牢記在心。現在不是報仇的大好時機嗎？你越是坐鎮西安，我越是要讓你雙手空空返回北京！

社會上還有一些志願者前來效勞。郭建英的院子裡有幾家房客，三十年來在「階級鬥爭」中靠以郭家人為靶子表現自己「革命」而撈到了好處。姓魏的本是國民黨的士兵被俘虜過來的，現在已成了居民委員會主任，多年來利用這個基層政權整治郭建英一家。郭家的孩子要想獲得一個餬口的工作，必須先把戶口轉到別處。還有個張家、楊家，都從監視郭家人的行動然後告密寫誣告信和提供假證中得到了好處。前面寫過的那個以手中的房產權力稱霸的顧來根，自然也成為市委書記何承華的盟友。

在所有這些事件裡，充當打擊好人、破壞生產和阻礙中共政策貫徹的角色的，固然也有反對改革、堅持「左」的一套的人，但他們的主要動機還是為了維護和發展本人或自己這個幫派的利益。「左」的口號不過是用來掩飾其極卑鄙的目的罷了。

遠的不說，從胡耀邦六十年代中期在陝西遭難到現在，「左派」始終得勢。當年在反對胡耀邦的鬥爭中賣過力的許多「左派」，經文革到如今，在三個歷史時期中始終是吃香、走紅的，而當年同胡耀邦站在一起的人，如果未被打倒，也至今還關在冷宮裏。前文說到的前西安市委書記，陳

元方，六十年代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秘書長，胡耀邦被缺席審判時，他曾把會議簡報寄給在北戴河療養的胡耀邦，因而遭到打擊。十九年後，僥倖能在一九七九年被起用，兩三年光景又被打下去了。而身為黨的總書記的胡耀邦竟無力保護。

如此說來，我們對於共產黨歷史上「左派」與所謂右派之間的鬥爭的概念，就要做些修正了。兩種思想體系之間的衝突，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持兩種不同政治信念的人之間的鬥爭，而是以堅持人民利益、科學態度與人道主義的人為一方，和以維護或奪取政治、經濟權益而不惜破壞社會利益、為此而常常打起「左」的旗號的實用主義者、政客、政治權術家以及投機分子為一方之間的鬥爭。而後一種人的長期得勢，怎能不使這個黨走上錯誤道路而難以自拔，直至使它的性質發生變化呢！

我在西安採訪，後來寫成報告文學的幾個事件，還有許許多多我粗粗了解過和讀者來信中揭露的事件，都訴說著駭人聽聞的是非功過的顛倒。女工程師唐安華費盡心血、忍受多種刁難而在利用短纖維石綿紡紗上創造出一套新工藝，却成為西安石綿製品廠廠長、黨委書記殘酷打擊的對象，以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人格尊嚴常遭侮辱。原因就是她出於公正不肯參與欺騙國家的勾當，又揭發了廠內的種種黑暗。省廣播電台黨委委託兩名黨員幹部追查一起貪污案，結果貪污分子被包庇下來，而兩位認真辦案的人員却成了審查對象，只因那貪污分子是省委一位大員的親戚，又買通了本單位的領導。自行車工廠廠長韋浩一舉扭轉了該廠長期虧損的局面，使產品從長期積壓變為供不應求，只因不聽主管工業的副市長的錯誤指示，而副市長的妻子又同一位省裡的大員關係密切，便硬被拉下馬來，接受無盡無休的審查，長期失去工作權利，而自行車廠則一落千丈，

債務成山……

在西安度過的一個月，在過度疲勞之外我還常常感到窒息般的痛苦。這個市所歸屬的陝西省，一九七六年就會以志丹縣幹部殘暴侵犯人權一案令我震驚，現在仍是舊的冤案累累不得平反，新的冤案又不斷製造出來。西安的工業生產不是在上升，而是倒退：成本增高，利率下降。（直至三年後我第二次被開除出黨，又有一起震動全國的冤案被製造出來，那是由一位省長直接插手的，被害者改革有功，反淪落為全國通緝的在逃犯。）我覺得西安市似被愁雲慘霧所籠罩，壓得人喘不過氣來，而驅散它的勁風却不知何時才能吹來。

以郭建英事件為主題的〈三十八年是與非〉，我三月中就完稿了。人民日報社的領導，知道它會觸怒陝西省委領導人，不敢立即發表，要等待時機。一直等了五個月，到八月底才刊載出來，這篇五千字的通訊並沒有批評陝西省委，更未批評中共中央，只不過點名批評了西安市委書記何承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它竟引起了我五年記者生涯中的最大一場風波。

九月間我正在四川省成都市採訪，人民日報社社長的一個電話把我調回北京。我知道是那篇文章引起了問題，但在路上心情很是平靜。由於有西安市兩個調查組的大量材料為依據，又有房地局內外很多公正的同志提供情況，我相信事實不會有出入。

在西安時就有人向我提出忠告：陝北幫的勢力大得很，觸犯它的人難有好下場。看來這幫人確是神通廣大。過去我的文章得罪的都是省委，固然也間接地使中央的某些人感到不悅，但從未形成這樣大的壓力。我回北京後聽到的頭一個消息是：〈三十八年是與非〉引起的反對聲浪，使

中共中央書記處已有一個來月無法正常工作了。首當其衝的自然就是胡耀邦。

局勢嚴重到這種程度：胡耀邦不得不出面批評我了。在《人民日報》全體編輯的大會上傳達了這個批評：劉賓雁沒有接受一九五七年的教訓。劉不要再當記者了，還是去當作家吧。編輯部的人們聽後譁然，認為這個批評是不公道的。

那麼我的文章究竟有什麼錯誤呢？對作品內容提不出任何指摘，唯一的問題是審閱手續的疏漏。中央早有規定：公開批評省會的書記，須經中央批准。然而我是作者，並不知道有這條規定，所以責任應歸總編室，而副總編輯也已承担了責任，那麼我還有什麼錯誤呢？不行。為了緩和陝西方面的不滿，一位政治局委員兼書記處書記特地擬就了一份黨中央、人民日報與陝西省委三方面代表的會談紀要，裡面特別指出劉賓雁犯有嚴重錯誤，應予追究。真是到了「不殺劉賓雁，不足以平官憤」的地步了！

我應該感覺到局勢不妙了。這分明是一個嚴重信號：倘若僅僅是陝西省委書記或中央個別領導人不滿意我，那就與過去無異，胡耀邦不會受到這樣大的壓力。此次一定是有若干個政治局委員以上的老人，包括我因觸動黑龍江、遼寧、山東的問題而對我早有不滿的人，對我忍無可忍了。但是我仍然並不緊張，無意檢討，更不想懸崖勒馬，改弦更張。這大概同我沒有任何官職，連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都不是很有關係，我不必害怕會失去什麼既得權益，也不想撈到那些東西。

起初，我覺得胡耀邦並不真心想讓我離開人民日報，不過是說說給反對我的人聽聽罷了。但後來一位政治局委員找我談話時又重申了「不作記者」的意思，我想是認真的了。可是幾乎與此同時，人民日報領導人又催我趕快寫文章登在報上，以便闢謠，因為陝西省正傳說我已離開人民

日報。於是十月十三日的人民日報上就同時刊出了我的兩篇報導，中共中央也就未再有人提出我的去留問題。

這年年末到一九八五年年初，北京召開了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上出現了兩個意外事件。

本來，胡喬木和鄧力群在很早以前就行動起來，企圖把已經擴大的文學創作自由收回來，把作家們引入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六年那條創作軌道；同時要把中國文聯和作協的領導班子換上他們喜歡的人。經過九年的醞釀，一個由他們信得過的人組成的文聯和作協領導班子的名單也已擬定。一九八四年九月還特地在京西賓館開了一個會，與會的作家名單是他們選定的。這次會上，一些人對一九七九年四次文代會以來的文學創作的狀況表示不滿，甚至有人指名道姓地攻擊了胡耀邦。這是「左派」勢力為年底那次作家代表大會上發動反擊所作的準備。胡耀邦是經人報告才獲悉「左派」的這個舉動的，他警覺起來，決定採取攻勢。在大會前夕的一次書記處會議上，他提出二條方針：一、在大會上鄭重肯定文學創作的自由；二、胡喬木、鄧力群搞的那個作協領導機構的名單，是無效的；大會實行民主選舉。

胡啓立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關於創作自由的講話，是胡耀邦歷來的主張。這樣公開地把不加任何限制的創作自由作為黨的一個方針提出來，在共產黨掌權的國家裏還是第一次。我和大會的八百多名代表們一樣感到振奮，但心裏也明白，從紙上的自由到真正的自由，還會有不短的路程。民主選舉也受到歡迎。對於幾個月以前各省提出的作協理事會候選人名單，作了一些增減。投票

的結果，我得到的選票數目竟僅次於作家協會主席、中國聲望最高的老作家巴金，大出我的意外，却使厚愛我的作家和讀者們大為欣喜。

這時，人民日報又做了一件破格的事：自從一九五六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以來，各種組織的選舉結果不再以候選人得票多少為序，而是以姓名筆劃為序排列了，這就掩蓋了被選中者人望的高低，顧全了中國人最講究的面子。但是這一次，人民日報却按得票多少為順序公佈了中國作協第四屆理事的名單。一些「左派」文藝幹部、作家、理論家名次靠後，而像我這樣他們不喜歡、長期有爭議的人，反倒靠前了，這自然使那些人大大為惱火。

從理事中選出主席團和主席副主席之時，又發生了使他們更加惱怒的事。雖經有影響的人士一再動員，勸理事們不要選掉候選人名單上的幾個大家不喜歡的人，投票結果還是被選掉了。

在第一個主席、副主席候選人名單上，沒有我。各代表團紛紛主張應把我列入，第二個名單上才有了我的名字，我當選為副主席。著名詩人、雜文家邵燕祥，也是經大家提名列入主席團候選人名單並當選的。

從一九七九年起，中國大陸各地、各個階層和年齡層次中，都有一些人為我的安危擔憂。每隔一段時間便出現一次有關我的謠言，傳謠者中想必就有這樣一些好心的人。有時我因故未能去做一次演講，便會收到一封這樣的信：「知道你很忙，寫一句話就行：『你是不是出事了？』」我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消息，對於這些人以及雖然不那麼為我擔心，却也希望我安然無事的人，都是一大喜訊。他們會認為「那些人」再想整到劉賓雁，不那麼容易了。

只有當你對這次代表大會的成分有些了解時，你才能充分估計到這次選舉結果的意義。三分

之二的代表是五十五歲以上的作家、詩人和評論家。這就是說，思想激進又是創作上最活躍的青年作家，只有少數人參加了這次大會。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仍然出現了使「左派」大大失望的選舉結果！

無論對於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或對於當初企圖使這次大會開成另一個樣子的「左派」政治家，大會選舉的結果都應該是一個強有力的鮮明的信號：中國變了；中國的作家們變了。然而他們並不願承認、理解、接受和順應這一巨大變化，也不去反省一年前他們發動的那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失敗意味着什麼。當代中國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一些人還享有不顧歷史潮流倒行逆施在失敗之後也不肯懺悔改正的自由。這就導致一九八五年與一九八七年的小、大兩次逆轉。



第十四章

這是很危險的

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在我收到的賀年片中，有一張是普通明信片。寫信人以一句非常奇怪的話向我賀年：「大清帝國要完蛋了！」我吃了一驚：這是什麼意思？這是老舍的話劇《茶館》中的一句台詞。但又馬上想到：這意思不是十分明白的嗎？

我當然不相信他的判斷。我甚至從沒有朝這方面想過。但我不認為寫信人是敵人。他多半是一個思想激進的青年，出於對現狀的強烈不滿，才寫出了這句話。他沒有偽造自己的筆迹，又竟把這種話寫在明信片上。「真夠大膽的！」我想。

然而就在這新年假日中，到我家來的客人竟先後有三人不謀而合地說起一九四九年國民黨統治崩潰時中國的情況，還拿眼前的情況和當時相對比。而一年以前我們經常的話題還是整黨的進程。

這一年，無論我走到那兒——上海、江西或遼寧，比較熟悉的人坐在一起，又常聽到這個話題。甚至有人更進一步，提出：「那時候的國民黨和現在的共產黨，到底哪一個更腐敗？」

我結識不算太久，但在新聞界年長於我的人中稱得上是我真正好朋友的C君，這時照例邁着方步走進我的室內。他是抗日戰爭初期入黨的，在戰爭中和農村中度過很長的記者生涯。和同時代參加革命的很多人不同，黨的生活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記很少，他的人格比較完整，能自由地、嬉笑怒罵地表達自己。五十年代他身邊的很多記者被打成右派，在表決開除一些人黨籍的會議上，他敢於以不舉手公然表示反對。那次運動他混了過來，兩年後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卻沒有逃脫，被打成「分子」，失去工作。前幾年批判白樺的黨支部會議上，他又第一個發言，表示

反對，很多黨員附和他的意見，以致把那次會議開成了與支部書記原意全然相反的會議。

我們見面，總要首先談談國內的政治形勢。記得去年此時，他還勉勵我說：「老劉，沉住氣，不要怕那些人攻擊你！看，現在不是要整黨了嗎？這就證明你是正確的，你的所有作品都是幫助共產黨整黨的嘛。」今天，又說起這個話題，他又說：「老劉，沉住氣」，但下文却完全變了：「反正中國是亡不了的；要亡，就是中國共產黨亡。」

他說話時照例是含着笑，似乎在開玩笑。是的，他可能故意有所誇張，但我相信他不是說着玩的。去年以來整黨的普遍走過場，確是使很多人都大失所望了。但我沒想到他也會失望到這種程度。

希望中國共產黨能有決心、有勇氣醫好自己的病重之體；如果這不是最後一個希望，那麼就只能是在整黨失敗之後寄望於政治制度的改革了。

然而這一個希望，在一九八五年也屢受挫折。

一月初，曾使全國知識分子甚至國外關心中國進步的人士都為之振奮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結束還沒有幾天，就傳說胡耀邦說了這樣的話：「有創作自由，不等於有出版的自由。新聞工作不能和文學創作享有同等的自由。」

前一句話有點滑稽，因為那就等於作家只有寫日記的自由了。後一句，大家心裏本來也明白黨不會給記者以作家寫小說那樣的自由，但胡耀邦此時此言又等於是把新聞自由備受限制的現狀固定下來。

一個多月以後報上公佈了他二月八日關於新聞工作的講話，那是對中國新聞界潑來的一盆冷水。幾年前《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胡績偉在一次講話中說到報紙的人民性應該高於黨性；報紙對於黨應有監督的權利；當共產黨中央犯錯的時候，黨報應有權不追隨這種錯誤。胡喬木和鄧力群曾抓住這個觀點批判不止。而現在胡耀邦却附和了保守派的觀點，宣稱黨報首先應是黨的喉舌，其次才是人民的喉舌。

中國共產黨的傳統是黨的領袖的言論等於黨內立法。胡耀邦這麼一說，以後新聞制度、理論、政策的問題就沒有討論的餘地了。

在我的心裏，從一九八五年這時起，中國的天空就是一片陰霾。這一年也是一九七九年以來我個人際遇最為艱難的一年。

第一個麻煩是我的報告文學新作《第二種忠誠》惹起了中共中央一些人的不滿。以前，我只是受到幾個省委的攻擊，現在我的問題升格了。

在《第二種忠誠》裏，我寫了兩個人物，一個是哈爾濱工人業餘大學的教師陳世忠，另一個是上海海運學院的圖書管理員倪育賢。

來自哈爾濱的陳世忠，以他的不平凡的一生引起我極大興趣。他是除那位名叫傅貴的農民外我見到的另一個性格奇特的人。無論按舊的或新的價值觀念來衡量，他都屬於最好的一類人，然而二十餘年來他却最為不幸。

在和他會面之前，我已經讀過他關於自己經歷的自述。他的外貌是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瘦瘦的臉龐，戴一副度數不低的近視眼鏡。他相貌平平，毫無引人注目之處，但他的真摯和激情却

給他增添了不少丰采。很健談，但你聽到的似乎不是辭藻，而是他的心在向你撞擊。

他對中國共產黨既是忠誠的，又是叛逆的。他善於幻想，常想入非非，又是一個幹練的實踐家，埋頭苦幹，一人勝過十數人。他學的专业是枯燥的——機械工藝中的刀具，而他的精神世界又是豐富多彩的，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很像一個詩人。

他原是個孤兒。沒有中國共產黨，他是不可能成爲一個留學蘇聯的大學生的。因而他對中共感恩戴德，對毛澤東矢志不二。一九六〇年學成歸國，等着他的本來是錦繡前程，但他爲了一個信念——中共中央必須改變它錯誤的對內、對外政策和中蘇兩黨不應分裂，而把自己孤注一擲，鋌而走險了：他多次上書毛澤東進諫，一概沒有回音，便在懷中揣上一份向赫魯曉夫進言的信，直闖蘇聯大使館，在門外被中國警衛人員拘捕。這是被認爲「叛國」大罪的，他因而被判八年徒刑，葬送了自己的青春。

年輕美貌的妻子離開了。他鍾愛的女兒也離開了他的懷抱。陳世忠是個很鍾情的人，他却置妻離家破這一人間的大不幸於不顧，冒着被處死的危險在獄中繼續寫了幾十萬字的文章和信，敦促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回心轉意。

我見到他，他第一句話便是：「我這次是爲一個人的冤案到北京來的。」他交給我一份材料，標題是：〈人血不是水〉，副題——〈我向人民記者的良知呼籲〉。

那是一九七〇年四月的事，是陳世忠在黑龍江省嫩江農場服刑期間親眼目睹的一起殺人案。

他說：

「我們一百多個犯人在三個士兵的監視下打草，平時，在我們勞動的土地四周插上四面紅旗，作爲警戒線的標記。這天不知爲什麼，插了五面旗，第五面旗使一條警戒線凹了進來。李植榮只顧低頭打草，他沒想到平時二旗之間的直線已經凹了進來，於是踏過了第五面紅旗，士兵喝住他，說他出了警戒線。李植榮回說他沒有越過。他以爲他仍像平時一樣，在那塊四面紅旗標明的方形陣地之內。那士兵命令他走過去，李植榮便走了出來。這時，他就在第五面紅旗與另一面旗形成的斜線之外了。這時，另一名班長模樣的士兵走過來問出了什麼事。兩名士兵嘀咕了幾句，那班長就命令李植榮轉過身去……」

故事的下文可以猜想到：那個班長向李開槍，李應聲倒地。接着，那人又朝空中開了一槍。然後向全體犯人宣布：「犯人李植榮非法越出警戒線，經我解放軍戰士鳴槍警告不聽，被當場擊斃。現在收工！」

這件事，竟使聽過許多次死於非命者的故事、聽過一起又一起大屠殺的人，也爲之一動。它有點像遊戲。無緣無故就消滅了一條無辜的性命……真的無緣無故嗎？當然不。只有中國人能猜到兇殺的動機：只是爲了表明自己富於「革命警惕性」——這是一種優良政治素質，對於入黨、提升都很有用，就是爲了表明自己忠於職守，立了一功，也會起同樣作用，而且，這種事件會立即報告到高級領導部門。

使陳世忠分外難過的，是李植榮這時並沒有死。他中槍之後還跪了起來，好像要爲自己申辯，說這是一起誤會，然後又倒了下去。第二天派兩名犯人去收屍，屍體居然還是熱的！而一整夜都

有一名士兵看守現場，李植榮會呻吟，會求救，有十幾個小時搶救的機會。

陳世忠好像怕我不信，一口氣列舉了十四個當時在場的證人的姓名。

「這人記憶力即使再好，二十多年後怎麼還能記得這樣清楚呢？」我想，「可見他這麼多年是常常憶起這個事件的。」

他和李植榮非親非故，但一九八一年四月他本人的冤案平反之後，他就為這個死者鳴冤叫屈，要求懲辦兇手了。他四年來，給黑龍江省人大常委、省高級法院、嫩江地區法院、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瀋陽軍區和吉林省軍區寫了很多信，追蹤這名兇手。至今毫無結果。

他嘆口氣，沉默下來，半晌不語。他深深失望了。但他說他還要把這起長征繼續下去。我望着我這間辦公室裏四處堆滿的牛皮紙袋，心想：你即使把那名兇手查找到了，又能怎樣？我這些口袋裏裝着的冤案，兇手有名有姓，還沒受到懲罰呢。

很多人在三十年來頻繁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政治運動中，在個人的悲苦的或安逸的生活中，磨滅了對人的同情心。不知是一種什麼特殊的心理機制，使陳世忠這種人的心始終沒有麻木。

三十二年前，我曾費力到處尋找一種人：他能用自己的心和自己的頭腦去敏銳地感知周圍世界；他敢於提出經過獨立思考的意見，而不是人云亦云，隨波逐流；對於錯誤的、損害人民利益的現象，他敢於挺身而出去干預，去鬭爭，而不計個人的利害與安危。當年我盡費心思去尋找，也鼓勵年輕的記者們去尋找，却收穫甚微。

其後二十餘年期間，具有這種特徵的許多人又被打成人民公敵，馴服和奴性被作為全民族的

美德來宣揚和推廣。政治制度本身就在批量生產著奴才和白痴。

然而陳世忠這種人居然還能活下來，並且本色不變！我知道，這種人並未絕跡，而且十年法西斯專政把一代青年人造就成自己的叛徒。但是有陳世忠這種經歷和他這種鮮明性格的人，却仍然是罕見的。

因而，我決定寫他。我以為他為主人公，寫成了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這篇報告文學的第二位主人公倪育賢，也有着和陳世忠相似的特點——敢於直言，甘冒風險。新創刊的雜誌《開拓》決定在創刊號上把它放在首位。

我在文中引用了陳世忠在獄中以〈諫黨〉為題寫給毛澤東的長信的片段：

「……我認為，中共中央犯有一系列嚴重的錯誤。最危險最可怕的是中共中央至今沒有意識到自己犯了錯誤。這就使我憂心忡忡，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否則我就不成其為黨的親人啦。

「造成錯誤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你老人家實質上並不允許別人批評你的缺點錯誤；對於稍微尖銳一點的原則性批評，馬上翻臉，施加殘酷打擊。這樣下去，誰還敢說真話呢？……你的每句話甚至每個字都是絕對真理，只能贊成，不准反對。什麼南斯拉夫、蘇聯、波蘭、匈牙利、法國、意大利、美國、印度……那些國家的共產黨都會犯錯誤，唯獨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例外。你把自己關進紅色保險箱，以為自己絕對不會犯錯誤！但是一切錯誤中最可怕的莫過於自以為永遠不會犯錯誤。你口口聲聲說馬克思主義是不怕批評的，但事實恰恰相反，遠的不說，一九五七年到現在，那一個批評毛澤東思想的人有過什麼好的結局呢？

「請你暫息雷霆之怒。……根據這些年事態的發展，我滿心憂慮地預感到，遲早有一天，包

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陳毅在內的許多中央領導人都可能被打成反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但願我的預言不過是杞人憂天罷了，果如此，則國家幸甚，人民幸甚！

「……在你看完我這份材料之後，若『龍心』大怒，那我的生命也就結束了。但我在臨刑前仍要誠懇地告訴你：

敬愛的毛主席：

『丘比特』，你發怒了，這就證明你錯了！』

《開拓》雜誌爲了擴大影響，刊物還未出，先把我的文章打成若干份校樣，拿到幾個省份，讓一些報刊轉載。標明「轉載自《開拓》創刊號」。沒想到這一來惹來了極大的麻煩。

上海海運學院首先派人來京，找《開拓》的主編，要求抽掉此文。又到中共中央幾個部門上告，反對發表《第二種忠誠》。

與此同時，這家刊物所屬的工人出版社的上級——全國總工會主管宣傳的書記，也認爲這篇作品有問題，命令暫不發行，却指不出什麼理由來。

其後，便開始聽到來自上層的意見了。說法不一，有的指責它否定了「學雷鋒」運動；有的認爲文中涉及到中蘇歷史上的分歧問題，值此中蘇關係在微妙發展之時，不宜公開；有的則認爲陳世忠致毛澤東的信對他太不敬了。

那麼對於作品的主題和題目《第二種忠誠》，贊成與否呢？聽不到反對意見。其實，恐怕真正的問題出在這裏。文章在結尾處是這樣寫的：

「忠誠，像美麗一樣，也有不同的品種。勤勤懇懇謙虛謹慎，老實聽話，從無異議，這是一種忠誠。懷有這種忠誠的人，本人在個人利益上也須做出或大或小的犧牲，但比較安全，順當，一般不致招災惹禍。由於在上級眼裏可愛，仕途往往可以步步高升。

第二種忠誠，像陳世忠、倪育賢身體力行的這種，就不大招人喜歡了，直至不久以前，往往還要付出從自由、幸福直至生命這樣昂貴的代價。

很多年來，前一種忠誠，由於受到格外的愛護栽培，不斷灌溉、施肥，便生長得茁壯而茂密了，相比之下，在我們的政治田野裏，第二種忠誠就貧弱而稀疏了。在乾旱而貧瘠的土地裏，它們能夠生存下來而未絕種，已近乎奇蹟。

危險的是又有第三種忠誠作爲第一種忠誠的變種生長起來。只要是上級的旨意，明知錯誤而有害，也認真執行，甚至還要做得過頭，以博得上級賞識；遇到重大是非爭議，分外謙虛謹慎，不置可否，明哲保身，把責任上交或下放；善觀風向，順風轉舵，隨時可以反戈一擊，另換效忠的對象。這種忠誠嬌嫩欲滴，嫵媚誘人，可愛度又勝過第一種忠誠一籌，只不過它結出的果子却是苦澀的，甚至有毒。」

這裏提出的問題，在中國已有三十年的歷史了，多數中國人心裏是清楚的，只是沒有人公開

地提出來罷了。所以《開拓》雖然禁售，隨後又有「禁止轉載」的指令，全國至少已有十幾家報刊轉載完了。陝西的一家報紙，轉載《第二種忠誠》的那兩期，就印行了一百萬份。

指責我否定了雷鋒，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雷鋒是六十年代初期政治需要的產物。由於「大躍進」帶來的大饑饉，人們，首先是大學生對於歷來中國人深信不疑的一些根本性政治原則，包括對於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路線和政策之正確性，開始懷疑。這也就是陳世忠之所以能出現的原因。因而，需要把人心收攏起來，恢復政治上的穩定和對毛澤東的堅定信仰，雷鋒和聲勢浩大、持續二十幾年的「學雷鋒」運動便應運而生。果然收到了很大效果，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樹立起來了，中國進入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陳世忠在給毛澤東的信裏，也寫了他對雷鋒的看法：

「我看到你的題辭：『向雷鋒同志學習』。現在全國人民都在學雷鋒。我承認雷鋒身上有很多寶貴的品質，我當然應該向他學習。但是我認為雷鋒並不是一個完善的典型，他身上有嚴重的甚至致命的缺點。他的美中不足就在於他唯上級命令是從，從不知抵制上級的錯誤決定。雷鋒有句流傳很廣的名言：『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做。』我認為這句話是不準確不科學的。它孕育着連你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巨大危險。首先，它把你和黨等同起來；其次，它預先就斷定了你永遠是絕對正確的，不但你過去和現在說的話絕對正確，雷鋒必須句句執行，而且連你還沒有說出來的話也早就注定了句句是真理，雷鋒早就準備去照辦了。這不是十足的盲從主義是什麼呢？

你想想，如果全國人民、全體黨團員真的都成了雷鋒，將會形成一種什麼局面呢：社會風氣、道德面貌固然會煥然一新，可是一旦你說錯了話，你代表黨中央做出了錯誤的決定，又有誰

能夠幫助你們糾正呢？……不錯則已，一犯錯誤就將錯到底，後患無窮。」

歷史已經證明，陳世忠的預言又說對了。批評和反對《第二種忠誠》的人，誰也無法駁倒陳世忠的這些話，然而他們又反對對於雷鋒和學雷鋒運動的這種評價。這就證明他們實在太需要雷鋒式的忠誠了，因而連至少是同樣忠誠的陳世忠都容不得。

陳世忠二十一年前就向毛提出過這個問題：

「現在再請你看看另一個青年人陳世忠。依你看，雷鋒和陳世忠，這兩個年輕人哪個更好呢？你更喜歡誰呢？你一定會說，當然雷鋒好，你怎麼能跟他比！是的，雷鋒是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而我是人民監獄裏的未決犯，天上地下，根本沒法比。但是回顧我的一生，我的遭遇和雷鋒一樣苦，我對黨的感情像雷鋒一樣深，所以我才更覺得自己無權置身局外，袖手旁觀，而必須像親生子女那樣，拋開個人得失，直言不諱地面諫君前。我自信，雷鋒做到的好事我都能做到，但有一點不同，我不相信世上有先知先覺的救世主。」

陳世忠省掉了一句話：雷鋒做不到的好事我也能做到！正由於此，他成了階下囚。真的，陳世忠做的「雷鋒式」的好事，絕不遜於雷鋒。他甚至超過了雷鋒，因為他是在被共產黨冤屈地打成反革命，剝奪了自由，拆散了家庭，葬送了青春的情況下做的這些好事。他自己是這樣概括他的一生的：

「一起冤案，兩次（獄中）救火，
三次救人，四次捉小偷，

五次長跑冠軍，六年留場（勞改場）就業，
七份判決書，八年判刑勞改，」

即使按最正統的共產黨的道德標準來衡量，陳世忠也是一個對於共產黨和對於人民赤膽忠心、真正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但是僅僅由於他不能和共產黨的錯誤妥協，不能見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的事坐視不理，或者換言之，僅僅由於他也用這些標準來要求共產黨自己，從它的領袖到一般黨員，他就不能見容於這個黨了。

在他工作的那個哈爾濱工人業餘大學，陳世忠對於校領導及其上級哈爾濱市總工會分配住房問題上以權謀私等錯誤提出批評，因而被視為異己。在北京，又由於他曾經批評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錯誤，而不受歡迎。

這也就是陳世忠不同於雷鋒的主要之點。所以，北京的上層人士認為「第二種忠誠」否定了雷鋒運動，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從一九五八年提出「共產黨員要做黨的馴服工具」算起，已經過去了將近三十年。雷鋒的宣傳已延續了二十二年。這期間，共產黨犯下了極大的錯誤又有意糾正這些錯誤。但是從褒雷鋒和貶陳世忠式的人物，已可見出在意識形態上，這個黨不想有大的改變。它大概仍然相信，只要中國人絕對地信任和服從仍然是「光榮、偉大、正確」的中國共產黨，中國現代化的實現，就絕無問題了。

它看不見，人們早已不肯接受雷鋒式的馴服和盲從了。共產黨的組織，也已經變了。因而，

繼續向人民提出他們已經厭倦甚至受到他們嘲弄的要求，就只能使自己進一步脫離人民。同時，抑制人民對於已經腐敗或正在腐敗中的黨組織與黨的幹部的批評和鬭爭，也只能保護腐敗，終至不可收拾。

看來，似乎中國共產黨是過於自信了。但是在這種自信下面，是否正是缺乏自信，擔心一旦允許人們自由地思考，他們就會脫離自己的控制呢？

我逐漸明白了：中共領導層中那些人之所以被這篇文章激惱，這篇文章之所以在全國乃至海外華人中受到那樣廣泛的歡迎，從根本上說，不是要不要哪一種忠誠的問題，而在於我突出地宣揚的是陳世忠這種獨立的人格，而在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一個人的人格有多大的獨立性，也就帶有同等的叛逆性。

這一點，當時連我本人也並不很自覺。我只是覺得陳世忠很可愛，很珍貴，在三十餘年來刻心經營造成的平庸者的汪洋大海裏，陳世忠是一個罕見的孤島。

這次衝突，使我認真地思考起一個問題來：究竟是什麼東西使這個黨和我之間始終存在一種疏離？它會開除過我，又糾正了錯誤使我回到黨內，但幾乎從我回到黨內的第一天起便又以警戒的眼光注視着我，這是為什麼？

因為這個黨內已經有太多的人不是我的同類。他們是近三十餘年滋長起來的。但還在更早的時候，我對於黨內的某種傳統已開始產生懷疑了。我來到解放區不久，便常常聽到「謙虛謹慎」這個詞和「忠誠老實」並列，作為幹部修養的最基本要求。我看到這些要求在實踐中是什麼樣子，便開始有了反感。

和黨內嚴格的紀律與等級觀念相配套，「謙虛謹慎」就變成謹小慎微和對上級的卑微敬畏。在對待同級幹部中也「不要鋒芒畢露」。在一個你應該蔑視或反對的人面前，你也必須表示尊敬和服從。你必須壓抑你的真實感情和真實的思想；你必須使自己的姿態、表情和別人沒有什麼兩樣。而對於你的評價、你的榮譽與沉浮又必須取決於你的直接上級，於是「謙虛謹慎」的道德素養要求就和功利結合到一起了。

這其實就是一個每日每時不停地窒息中國人個性和人格的過程之一的側面。此外，你的舉止言談要和別人盡量一樣，你的生活方式不能有異於衆人；你的「群眾關係」（這是鑑定幹部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一個要求入黨者不能不過的一關）必須好——不能觸怒得罪什麼人，即使那是你本應反對或蔑視的人。

這套無形的機器在人群中不停地運轉，其功能就是削平每個人個性的稜角，使大家變成彼此相同的人。然後，這些大體相同的面孔上，均表露出對於權威的相同的恭順和馴服。

這就造成一個結果：虛偽成爲一種美德。上下左右之間，人人帶著謙恭的微笑，和和氣氣，背地裡卻施展陰謀詭計，拳腳相加。有多少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一朝得勢便露出滿面猙獰！

但更多的人則不是政治野心家，也未必是小人，而僅僅是變爲平庸。獨特的個性被磨滅了；良知變麻木了；奉行「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明哲保身哲學。

久而久之，中國人種的一部分就退化成這種人：臉上掛著永遠的微笑；口中說著很易用電腦翻譯成外文的通用語言；大是小非從不表態，把來日可能被追究的責任上推下讓；辦事四平八穩，說話滴水不漏，在自己工作中把政治安全的保險系數打得高高的，絕不會萬有一失。

平庸成爲美德，無能才能上升。當你看到一批又一批正直、勇敢、有真才實學而又敢於堅持自己人格的人在無盡無休的政治運動中倒下去了，就不致對這些爲了保護自己而喪失了自我的人責備求全了。

但你也很難喜歡這種人。他們喪失了常人具備的許多素質。他們必須把自己完善到見邪惡而不怒，見苦難而不悲，都臨危機而不急，知誤國而不悔。必須要達到在大苦大難面前無動於衷，除危及烏紗帽之外的一切不慌不忙而又能心安理得、毫無愧疚之心的境界，才具備了身躋高位，永保無虞的條件。

爲了這種人的安全和安寧，也還需要另一些人的配合，那就是億萬中國人必須蒙昧而馴服，心甘情願地把自己的命運完全託付給他們。

上海海運學院對我的攻擊，更是堅決而猛烈。攻擊我的又是「嚴重失實」：倪育賢是個壞人，你把他寫成英雄！於是，一九八五年四月，我帶領四名年輕助手，來到上海，進一步核對事實。

上海，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城市，一九七九年二月我到這裡，一出飛機場，迎面一排新刷的紅色油漆標語就使我吃了一驚：「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是北京已經否定了的口號呀！時隔六年，上海仍保留著文革塗在它身上的濃厚色彩。在我住過的賓館裡，前來和外國人談判的中國人員，大都穿一身中山裝，這在北京已很少見了。一位內蒙的青年作家，去訪問一位退役的將軍，竟被視爲政治上可疑分子拘留了十幾天，還追查向他提供地址的人，並且使那人寫了「洩密」的檢討。

爲調查的方便，我們本應住到海運學院裡面去。但是到上海幾個小時之後，便發覺絕不能這麼做。

海運學院黨委利用它的權威，已在校內做了充分部署。以黨委名義通過黨支部一再向全體工作人員作了傳達：「倪育賢是壞人」、「劉賓雁錯了」、「黨中央要懲處劉賓雁和《開拓》雜誌負責人」……。同時，黨委還把整黨停下，派出得力幹部四處調查倪育賢二十餘年來的表現，準備向我發起更強大的進攻。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倘若住進海運學院，能有幾個人敢於冒事後遭受打擊報復的風險於不顧，來向我們訴說真情呢？

於是我們就決定住在黃浦江外灘的一家旅館，請海運學院的人從浦東乘擺渡越江而來，和我們談話。調查的結果，證明我所寫有關倪育賢的事實都是確有其事。

最先見到並且見得最多的還是倪育賢。我們首先把他做爲一個懷疑對象，重新了解我寫過、而海運學院黨委否定的那些事實。幾個晚上，我和我的助手們一起研究，倪育賢這個人究竟怎麼樣，他提供的有關他本人和外界的情況可靠性究竟如何？

陳世忠和倪育賢都是上海人。除了我在《第二種忠誠》中所寫的他們那個共同特點——敢於直言、甘冒風險堅持真理以外，他們就很少有相似之處了。

倪育賢聰明機智，能言善辯，也和陳世忠相近。但他有時在隨機應變上過於靈活。這方面那個在五十年代受過共產黨更多正統教育的陳世忠就是寧折不屈，甚至有點迂了。

倪曾經給「四人幫」的重要人物寫過幾封信，表明他和他們是一致的。海運學院的幾個人便

死死抓住這幾封信，大喊大叫，說這便足以證實倪關於他文革中反對林彪、四人幫的種種說法都是偽造的，他是個「政治騙子」！

倪育賢的確不是一個完人。一九七一年，他被海院開除，生活無著，想求上海市委給找個工作，寫信說了違心的、也違反他本人實際政治態度的話。一九七五年，在工廠當工人謀生，寫了一篇批判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的長文。他剛剛把文章寄給毛澤東和「紅旗」，就發覺他的工具箱被撬，他放在工具箱中的日記被盜，同時有人盯他的梢了。工廠裡幾位同情他的人主張他應該以某種方式，比如寫一封信，做些政治偽裝，以保護自己，他起初不肯，後來別人代他起草了一封信，他還是發了。

那些年，很多中共高級幹部也給林彪、江青等人寫過「效忠」信，目的是獲取更高的權位，倪育賢連個共產黨員都不是，他寫信又不過是謀取生存或安全，能算多大罪過呢？

倪育賢還有一件事被那些人抓在手裡：他在文革初期是「造反派」！還是個頭頭！我並沒隱瞞他這一點。他一向是一個政治興趣很強的人，文革一起來，他站在一些受欺壓的領導幹部一方與在權力上占優勢的另一方展開爭辯。這是他第一次顯示他的政治才能。他思維的機敏和富有鼓動力的口才，特別是他的正義感，使他在文革籌委會的選舉中贏得了很多選票，成爲副主任。但是他沒有像反對他的另一派對教師和學生施用暴力，而且始終反對遊鬥、打人和抄家。而且當他發現這些行爲無法制止時，便實際上退出了文革，一個人到全國各地搞社會調查去了。這時，上海發生了全面奪權的所謂「一月風暴」，倪育賢沒有參加。他那十年的主要經歷便是：被學院開除，在工廠被批鬥。只要倪有一點政治野心，以他的才幹，投靠四人幫肯定會撈到一官半職的。

海運學院的方針是：倪育賢二十餘年來所做的好事，必須一件件推翻；文革期間加在他身上的罪名，一條也不能拿掉。

一九六二年，倪育賢能給毛澤東寫信反映農村大饑饉，建議改變農村「左」的政策？——他們不相信，他們要以自己的調查把這件事推翻。

既然他們把此事做為重點，我們自然也要做為重點。倪育賢當年在部隊裡的戰友和上級，他們找了一批。我的兩位青年助手，也找了一批，逐一查核是否有過這件事。

他們調查的結果是：倪沒有給毛寫過這封信，或者，被調查人答覆說：不記得有過這件事。我們查問的人，大部份的人回答則是：有。記得。「他向我借過錢付郵費呢。」

中國的事情就這麼有趣！

倪的那些對頭對這件事竟然認真到這種態度，派人去北京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去查一九六三年給毛澤東信件的收信記錄。把所有卡片都翻遍，沒有這封信的記載，於是與高采烈得勝還朝了。

也許應該怪我，我在文章中把發信的時間一九六二年誤為一九六三年了。幾個月後，北京告知上海市委向海運學院轉達：查到了，倪育賢確是給毛澤東寫過那封信。

他們當然不會放過最能傷害倪育賢名聲的他的所謂「生活作風」問題。十四年前，海運學院當權的大派為了制伏這個政治對手，作為開除他學籍的理由之一，就拿出他的「男女關係」問題來。那時，政治上的理由是他自編自印了有相當明顯的反對左傾機會主義色彩的「列寧語錄」。

現在，海運學院的當權派則聲稱：那個「列寧語錄」根本談不上反「左」；至於男女私情問題，那是確實存在的。不信嗎？證言俱在！

文革期間為置一個政治對手於死地而用高壓手段取來的證言，居然還有效！但是對方既然這樣認真，而中國人至今還把這類問題視為一個人善惡的主要標準，我們也就不能置之不顧了。

這可難壞了我的助手們。

十四年前的某一個晚上，一個既非共產黨員、也不是幹部的二十歲的青年倪育賢是不是曾和某位女郎睡過覺呢？向誰去查核？找那位已經做了母親的人去調查嗎？

也是十幾年前的某一個下午，倪是否曾把一個不相識的女人馱在自行車上送到她家，從此就多次去和她發生兩性關係呢？早就有人查過，那女人否認了。後來再以另一種方式詢問，她似乎又承認了。相信哪一個答案呢？

都不是強姦。那是犯法的。假定查實，也只能算通姦，現行刑法已沒有這條罪名了。完全是兩個人私人之間的事，對於社會、對於共產黨的黨風黨紀和海運學院畢業生的學習成績（它近年來大大下降了）似乎概無影響。

然而我們還是做了些調查。無從斷定有過這些事。但是即使有過，又怎麼樣呢？在文化大革命那種空前大混亂之中，一個生理上已經成熟的未婚男性同一個已經成年的女性產生了感情並進而發生了婚前或婚外性關係，這和他政治上是進步或反動、或做為一個總體的人是善人或惡人，有什麼關係呢？迄今尚未聽說過康生、張春橋或姚文元有「男女關係」問題。

一天下午，一對中年夫婦從黃浦江對岸來到我的房間。男的叫沈仁杰，是海運學院外語教師。他妻子黃錦如，是位中學教員。整個下午，談話主要是在黃錦如和我之間進行，那位丈夫有點呆，

似乎還沒有從一場大震動中清醒過來。

災難從去年五月起降臨到這個家庭。說起來人們都不會相信是發生向外國開放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上海：他們的女兒和一個美國留學生談戀愛，要結婚，海運學院領導堅決反對，又不敢明來，就向這位剛剛入黨的沈仁杰施加壓力。

直到海運學院黨委那些維護國粹即傳統民族觀念之糟粕的正人君子們再也阻擋不住了，不得不同意那對青年去登記結婚，他們絲毫不覺得對於為這件事把沈仁杰整得死去活來有什麼對不起他，在整黨的會議上還繼續批判：「很難設想，一個在黨的領導下工作多年的同志，竟然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都劃不清！當然，那個外國人，可能是好人，但也可能是壞人，說不定就是壞人。」

說這個話的人不是中國農村裏的老太婆。這是在中國經濟和文化最發達的大上海市的一個高等學府裏，一個有高等文化的人或領導高級知識分子的人說的話。

那個沈仁杰為什麼不提出抗議呢？他為什麼不憤然拂袖而去呢？他是位大學教授（雖然名義上仍是「講師」），上海市勞動模範，多年的先進工作者。這就是說，他不僅是個知識分子，還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他的良知不會反對女兒出於愛情去嫁給一個他也覺得可愛和可靠的外國青年。然而他竟無力和那種愚昧的、反動的要求相對抗，去鬥爭，而只能忍氣吞聲，甚至企圖自殺。在半個月中，他的體重就下降了十五斤，被整得精神恍惚，語無倫次，一年後還未能復原。

需要什麼樣的條件，才會出現這種奇事呢？整他的一方必須是蠻橫而強大，挨整的一方還必須是軟弱而馴服。

不幸得很，在海運學院（不同程度上也在中國的不少大學裡），這就是以學校黨委、行政為一方、以教師為另一方的這麼一種關係。

半個月中，有一批教師走進又走出我的房間，有的比沈仁杰年長，有的比他年輕。他們每個人都有一段辛酸的歷史。從五十年代起他們就是不受信任的，每個人都是一次或歷次政治運動的鬥爭對象。是他們支撐着海運學院，哺育着一屆又一屆學生。他們應該是學校的主人，因為沒有他們也就沒有這家學院了。然而正如北京的某些大學一樣，他們却處在權力階梯的最下層，甚至連工人都不如。「喧賓奪主」，本應屬於輔助地位的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幹部掌握着教師的命運。職稱的評定，級別的晉升，榮譽的分配，出國的批准，住房的分配，甚至參加學術活動與發表學術論文的机会等等，總之，教師的包括政治權益與物質生活條件在內的全部命運都決定於這些人。

我在了解這學校的政治歷史中，發現一個奇怪現象：教師們除了充當政治上的懷疑、批判和鬥爭的對象外，他們似乎完全游離於學院的政治歷史之外。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工作幹部之間兩派勢力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同時也是學生中間受壓抑與受迫害的人同執行「左」的路線的政工幹部及其工具——學生黨員之間的鬥爭。像我一年前在西安市看到的一樣，十年殘酷鬥爭中勝利的一方仍然是文革前就佔優勢、文革大部時間掌權的那一派力量。「左」派永遠得勢，「實踐」證明「左」派永遠是正確的。

可惜這個勝利又帶著天然的黑斑，因為勝利者並不理直氣壯。一個是：文革與它之前的政治運動不同，黨也分成兩派，並和群眾一起在公開的戰場上進行爭奪，各自的秘密乃至主要成員的政治、道德面目，都在眾人面前公開了，而有些人的面目、表演的姿態和動作是並不雅觀的。再

一個，被他們打敗的一方，並不服輸，其中有些人就人品與能力而言也確是高出勝利者一籌，同時，還有很多無辜的受害者、受壓者和他們對於被迫害致死者的記憶，也使勝利者在分享勝利果實時不太放心。

只有證明自己正確（而且是一貫正確）才能證明自己掌權有理，而為了表明自己正確，便不能承認錯誤，他們不能向他們整過的人真正賠禮道歉，不能真正情願地給他們以補償。勝利者只能按自己的需要來書寫歷史。

這時，却跳出一個倪育賢，說他是正確的，受害的，還透露海運學院中「左」派得勢抵制共產黨三中全會路線的貫徹！這怎麼行！

在倪育賢所做的好事裡，有一件是這些人無法否定的，因為倪育賢就是因為這件事而被作為政治犯逮捕坐牢，平反後才回到海運學院圖書館工作的。

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清晨，倪育賢來到上海淮海路，在東湖賓館的大鐵門上貼出一首「大字詩」，題為〈小平引〉。後一闕是：

「毀譽幾回逃龍劍，貶謫三遭建國柄。

半世功過天下白，一身是非百姓清。

柔少易遭狐群滲，剛多難與狗黨親。

宦海沉浮渾閑事，不用小平民不平！」

這時，四人幫覆滅才不過兩個多月，中國還在它行駛十年的那條軌道上繼續滑行。這一年裡，反對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而在文革期間被捕、但未處死的人，還要有五十餘名（無一不是中國人中的精英）先後被送上斷頭台。還有相當長的時間，不能說文化大革命是錯的，不能說天安門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當然，更不能議論毛澤東的是非。華國鋒還是中共中央主席，他正在極力反對鄧小平復出。

據我了解，倪育賢這首詩，是四人幫覆滅後上海市第一張政治上表達不同意見的大字報。在那種政治氣候下，這是需要相當膽量的。倪育賢還不滿足。三月三十日深夜，他又到國際飯店的牆上貼出一首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長詩，題為〈我不信！——紀念天安門廣場慘案一周年〉。

當時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下令逮捕倪育賢。他在牢房裡住了將近四年，幾被處決，倖免一死。一九七九年一月才被無罪釋放。

海運學院那幾個人沒法說倪育賢的這種行動是反動的、討好四人幫的。但他們仍然要貶低倪育賢，說他只貼了前一張大字報，並未見後一張；被捕和坐牢都是有的，但上海市委並未要處死他。

我們找到了當年和倪一起到國際飯店張貼大字報的人。一位前海運學院的領導人也向我們證實：市委某領導人的一次講話中，曾提到決定處死王申酉（華東師大學生，已槍斃）等人時，名單上本來也曾有倪育賢。

我終於沒有按照海運學院黨委要求的那樣承認「失實」，檢討錯誤，反而把所有蒐集到的有關海運學院的材料寫成了〈第二種忠誠〉的續篇——〈未完成的埋葬〉。

從上海匆匆趕回，我就準備去西德了。

去西德，是八五年年初就定下的。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自向西德駐華大使作了允諾。定於五月廿六日起飛，這是聯邦德國大使館爲我選定的一個百花盛開的季節。五月中旬，機票、在西德活動的日程和大使餞行宴會的帖子都收到了，到了五月二十日，忽然，人民日報外事辦公室主任來了，傳來總編輯的旨意：不能去了。我大爲驚訝：別的都好辦，人家那邊活動日程都安排好了，那涉及很多著名報刊的總編輯、作家和社會名流，德國人辦事可是很認真的呀。外辦主任也覺不妥。「這樣吧，」他說，「總編輯明早去日本，我到機場歡送時再爭取一下。」結果仍然不行。怎樣答覆人家呢？外辦主任讓我編造一個理由，我說：「對不起，我實在編不出來：這是你們決定的，你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去吧！」

他們的想像力也有限，就告訴西德駐華使館說：「劉賓雁先生現在在在外地採訪，很忙，抽不出身來，這次去不成了。」

我一聽，噗哧一聲笑了。有這麼說話的嗎？就是中國人之間事先約好請客吃飯，不想去了，這種理由也拿不到桌面上來呀。

偏巧大使館的新聞參贊陸伯赫先生挺叫真，那天下午驅車一逕到我公館來了。他走進我的書房兼客廳的時候，劉賓雁先生正坐在沙發上看信呢。不用解釋，我們相視而笑了。

從我入黨之後就常常聽到黨的幹部說「政治影響」這個詞，意思是，無論做什麼事一定要考慮會不會造成不利於黨的政治上的影響。然而這種編造假理由騙人，謝絕外國邀請的事，在我一個人身上就幹過好幾次了。這樣做，不僅有損於黨的形象，更有損於中國的信譽。我又一次體驗

了一個真理：中國官員做事，只看眼前功利，而不顧長遠影響。老在那裡說中國的民主和自由大著呢，比資本主義國家還多出一大塊。還說我們中國「不存在人權問題」。可是劉賓雁這麼一失約，德國立即會有三十來個單位和個人知道，決不是由於這位記者本人失信。

這樣，本來應該遊萊茵河的時候，我跑到長江上來了。湖北省作家協會要開代表大會，非要讓我去一趟不可。後來我才明白，因為要改選領導班子，兩派鬥爭激烈；我去，對於改革派有點站腳助威的意思。我答應了，可是很快就接到中國作協黨組一位書記的電話，先是客客氣氣地問我想不想去。我說想去，並且已經告訴了湖北。這時，對方勸阻起來了：請再考慮一下，是否還是不去爲好。我火氣上來了：我成了什麼人了？非法的黑戶口？我還是中國作協的副主席嘛！那邊未再勉強。

可是也並不客氣，好像真要特意表明一下我其實並不是什麼副主席，明知我去參加省作協代表大會，作協黨組卻非要另派一位《人民文學》雜誌的副總編輯去在會上朗讀中國作協的賀信不可。我們還是同車而去的。

順長江而下，我來到江西省省會南昌市。省黨代表大會就在我住的賓館裡召開。短短幾天裡，幾乎平均每天都要發生一起惡性（即重大）刑事案件。一家電影院裡忽然爆發了一顆炸彈。一家旅館裡有人用手榴彈自殺。省委大院門前，省政法委書記之子被人槍殺……省裡的人告訴我，自從一九八三年全國開展「從嚴從重打擊刑事犯罪分子」的運動開展以來，惡性即重大刑事案件非但沒有下降，反而逐年以很高的比率上升。很多案件是受害者投告無門，無路可走，便採取暴力

向加害於他的官員施加報復。

既無言論自由，又不能自由結社，於是便有人自發地、秘密地採取非法手段來表達合理的意志了。上海幾名青年個體戶憤於政權的黑暗，密謀把盈利積攢起來購置槍枝彈藥，暗殺貪官污吏。不幸尚未舉事便暴露了，整個集團被逮捕。江西省幾乎同時也出現一個相似的集團，成員都很年輕，甚至有十五、六歲的。他們以「除暴安良」為目的，也準備以武力懲辦為非作歹的官吏。也被撲滅。

這時，全國二十八家省市的法制報刊主編正在廬山開會。有一天，十四位主編來到我的住處閑談。我又向他們提出今年以來我每到一地、或每見一位外地來京的客人就要提出的問題：「整黨開始以來，你們那裡的黨風狀況是有所好轉了呢，還是更壞了？」異口同聲的回答說：「更壞了。」

一個惡性刑事犯罪的增加，一個黨風的繼續腐敗，這二者之間是不會沒有關係的。這兩種現象，又同時作用於人民的情緒。我不禁又想起年初收到的那張明信片上的話：「大清帝國要完蛋了！」

然而，我覺得中國的政局似乎還沒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還想採訪女省委書記萬紹芬，想透過她的生涯，讓人們既看到日益深重的危機，又看到中國社會的希望所在。

沒有想到，正在我採訪萬紹芬同時了解江西省的問題與可喜的變化時，北京已經有人要向我開刀了。那裡正在召開六省市的整黨匯報會。一位負責全國整黨工作的大員在講話中（一定是把我視為整黨的大敵，不然何須這個會上說我呢？）指名道姓地說：「都說劉賓雁敢講話。他敢講

什麼話？我看他是到處胡說八道，他每到一處，就支持那裡的造反派，破壞安定團結。劉賓雁和王若望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

這是我回到北京以後方才聽到的。那人物雖然很大，我卻並不介意。只不過聽說那個講話被傳達到全國各縣，像每次關於我的真真假假不利的傳說一樣，使很多關心和同情我的人為我擔憂、焦急，而反對我的人則興高采烈。

我竟沒注意到，這次講話又是我的問題的一次升級。開春以來從黨中央傳出的關於我的種種非議，還局限於對《第二種忠誠》的非議。這一次，老先生的講話已經是對於我整個人的否定了。

從三年前起，我就聽到不止一個朋友和熟人的勸告：不要再寫報告文學了，樹敵太多，還是寫小說吧。有人甚至把事情說得更具體：「胡喬木、鄧力群對你的看法，你總不能不考慮吧？」

「當然不能不考慮。」我答道：「等到他們不准我寫的時候，我也就不再寫了。」

很早以前便有人問我：你和一家人那些年受到那麼多罪，為什麼一九七九年重新拿起筆來，就寫《人妖之間》這種作品呢？難道不怕再禍及全家嗎？

最初，我的回答是：「在一九七九年那種氣氛下並不覺得《人妖之間》這種作品會帶來多少危險。」後來，這個答案不夠了，因為我已經遭到猛烈攻擊和威脅，卻依然在寫。我自己也找不出答案。女作家張潔為我找到的解釋是：「劉賓雁這人傻，他是個『笨人劉老大』！」^①我覺得自

① 短篇小說《笨人王老大》，作者王毅、劉錦雲。寫文革中一個農民的悲慘遭遇。曾獲全國短篇小說創作獎，並被拍成電影，但被禁演。

己並不很傻。但後來觀察我的小孩子劉冬冬，有所發現：他很聰明，又有些傻。別的孩子欺負他，他都不理會。他母親說：「冬冬這孩子缺點心眼兒。」我有所悟：我大約也是缺點心眼兒；對有些事，我的神經比常人遲鈍。

後來，我終於找到了答案：第一腳邁出去的時候，我確實不知深淺，想不到會有什麼危險。後來看到危險了，並且看到轉眼之間我竟得罪了三位「諸侯」——省委書記，對我形成了圍攻，但這時已經覺得我背後有一個力量在成倍地增長，那就是我的讀者，中國各階層的人。他們人多勢衆，在背後推著我前進，我甚至覺得出他們越來越熱的呼吸。於是，我欲罷不能，甚至有恃無恐了。

不過仔細想來，還有一個原因。我並不看重有些知識分子比較看重的東西。我不想得到掌權者的恩寵。迄今我失去的東西，無非是一次又一次的出國機會而已。也許還可以把住房也算上，混得好一點的話，我的住房本可以不那麼擁擠，可以比《人民日報》工人的住房水準高一些。

國情、民情和我自己的情況，決定了我的心情。這年夏天，我覺得自己也未嘗不可以奢侈一下了，便接受了一位過去的學生每年一次的邀請，到遼寧省的一處海濱略事休養。

正準備把已經定稿的《第二種忠誠》的續篇交付一家刊物去發表，忽接《人民日報》總編輯的電報：「上海海運學院黨委聲稱續篇一旦發表該院師生即將赴京請願望勿發否則個人負責」。

他們竟會相信並屈服於海運學院那幾個人的恫嚇！「個人負責」嗎？我從來也未要旁人為我負責。還是要發！

但繼之又來了電話，傳來一位政治局委員兼書記處書記的意見，還是勸我勿發。我不能不猶豫了。不發就不發吧。

寫江西省委女書記的報告文學，已經排好，也不准發。這固然不完全是由於作者是我的原因，但後來發生的故事就同我有關了：一位政治局委員兼書記處書記到江西觀察時追查：是誰請劉賓雁到江西來的？他到此意欲何為？為什麼請他上省黨代表大會的主席台？……

和兩個月前企圖阻止我到湖北去開會一樣，我似乎又成了一個「黑人」！

心情不免有些沮喪。於是，在《人民日報》記者部的一次例會上我就說了幾句話：「報告文學越來越難寫了。看來，我不得不停筆一時了。」這話不知被誰一傳，變了樣子。九月號的香港《鏡報》月刊封面上刊出我的大幅照片，大字標題寫著：「劉賓雁宣佈退出文壇」。以訛傳訛，海外報刊紛紛報導、評論我的境況。幾家出版公司搶印我的作品集。熱潮持續了好幾個月。

「退出文壇」的報導雖然失真，但這股熱潮卻確實反映了兩點真實情況：一、我確實進入了一九七九年以來的最困難時期；二、海外關心中國政局與中國命運的人過分看重了我這個人，以我為風標來測知大陸的政治氣候，看中共中央對於實行政治民主化到底有多大決心和誠意。

就在我「宣佈退出文壇」的幾乎同時，我的問題又進一步升級。中紀委派出的調查組進駐《人民日報》，介紹信上寫的是：「調查劉賓雁等同志的問題。」主要是我，兼及王若水，也許還包括《人民日報》總編輯秦川。

帶有嘲弄意味的是：正當中紀委的工作組坐在《人民日報》審查我的言論和行動時，我卻坐在中紀委的會議室裡以我的言論和行動幫助中紀委解決一個已有二十四年歷史的錯案。

姜懷玉，山東省文登縣一名小學教員。一九六〇年大饑饉時期，他發覺本大隊的黨支部書記董某一夥盜竊集體糧食肥私（村中因餓致死者達五十餘人），便站出來揭發，從此便開始了他一家人的厄運。那姓董的倚仗縣委中有人，又依靠文革期間成爲一派勢力之首的省勞模（後來還成了黨中央委員）張某爲後台，多次拘捕姜懷玉，施以酷刑。姜全家老小也備受折磨，死的死，逃的逃，孩子遭打罵，不能上學，隊裡扣發口糧、燃料，連房屋也被迫拆掉，購糧充飢。女兒姜山華從十七歲起陪父上訪告狀，現已三十三歲。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局中受理此案的人，心懷歹意，與山東省、烟台地區和文登縣的人合謀，製造假調查，做出顛倒是非的結論。姜懷玉不服，找到了我。我請《人民日報》兩位年輕記者協助我到山東實地做了詳細調查，我們把調查結果呈報胡耀邦，經中共中央書紀處批示，由中紀委重新審理此案。中紀委也派人去作了調查，與我們調查的結果一致。

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山東省、地、縣三級黨委派到北京的人員，仍然堅持他們長期以來的看法，認爲姜懷玉不是個好人，上訪無理。主持審理此案的中紀委常委李之璉是位公正無私而同情人民疾苦的老幹部，山東省來人的態度氣得他拍起桌子來，怒斥他們無理，我們三名記者也和李之璉站在一起，在一次次會議上依據無可辯駁的事實，和那些人展開唇槍舌戰。

中紀委終於做出了比較公正的結論，但如同歷來的作法一樣，並不追究過去的是非和爲惡者的責任，只不過議定姜懷玉是受害者，對那一家人給以微薄的補償——每人一千元人民幣。然而山東省委仍然拒不執行，反誣李之璉偏袒了姜懷玉。於是這個案子便無限期地拖了下來。

不過當中紀委辦另一類事情時，却能大刀濶斧，雷厲風行。一九八五年發生的兩大事件，充

分暴露了這個中紀委完全背叛其使命，和阻礙中國進步的勢力同流合污了。一是在所謂「晉江假藥案」問題上大做文章，把中共各省委書記中最熱衷於改革和最富膽識的福建省委書記項南拉下馬來。一是懲辦了廣東省海南島自治區的書記雷宇，也是一位頗有建樹，在當地享有很高威望的改革者。所謂「晉江假藥案」，無非是一個村莊裡的小藥廠對兩種具有營養和保健作用的滋補品冠以藥品的名稱而已。海南島的所謂「汽車走私案」則不過是雷宇按中央政府的方針（允許海南島從事一些汽車進口生意，以從中獲取的利潤加快改變海南島的貧困）行動中發生一點失誤而已。中紀委對於誤國的老朽、賣國的新貴一概不管，却迎合黨內保守派的意旨加害獻身改革的忠良和精英，使它在中國人面前聲名掃地了。

十一月，又傳來一個不愉快的消息。中共中央書記處的一次會議紀要上貶低《人民日報》，讚揚幾年來穩健有餘而傾向保守的新華社，同時指責「有些人」「企圖利用自己手中的輿論工具來影響黨的決策，這是很危險的」。這「有些人」，當然不會是指那些長年無所作爲或爲保守派鳴鼓助威的人，而顯然是指《人民日報》，它的兩任總編輯和與保守勢力不懈地進行鬥爭的新聞工作者。很可能也把我和已經卸職的理論家王若水也包括在內。

這同時也是向所有進步的新聞工作者發出的帶有恐嚇性的警告。我感到不解的是總書記胡耀邦對於這些新聞工作者幾年來冒著風險、頂住壓力所進行的艱難的鬥爭，應該是一清二楚的，怎麼會同意這種觀點和同意發出這個文件呢？

這個文件只不過使我對這個黨中央更加失望，却絲毫未能起到使我感到自己的境地已經「很

危險」，因而必須懸崖勒馬、痛改前非的作用。我從來都認為中國的新聞界對這個三十年來屢犯錯誤、一九七九年以後仍然不斷在重大決策上發生失誤的共產黨中央遠遠未能施加應有的影響，現在就發覺得必須影響其決策——十一月的這個書記處會議紀要本身不就是又一個錯誤嗎？

一九八五年並不僅對我個人是最壞的一年，對全國來說，它也是一九七九年以來最壞的一年。表面看來，這一年似乎風平浪靜，沒有搞任何運動，實際上却比批白樺的一九八一年、反精神污染的一九八三年還要壞。

這一年，新聞自由縮小得幾近於無。從北到南，幾年來獻身改革卓有成效的許許多多企業家遭到停職檢查、撤職甚至無端判刑等懲罰，紛紛中箭落馬。置法律於不顧，一意推行「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實行苛刑峻法的結果，反而使刑事犯罪案大幅度增加。物價加速上漲，通貨膨脹率達到兩位數，遠遠超過官方公布的數字。

這年秋季，從北京開始，各地大學生以紀念「九·一八」國恥日、反對日本對華經濟侵略為名紛紛上街示威遊行。這其實是一個信號，表明人民群眾對於政治現狀的不滿又有新的發展。當局却只顧分化瓦解和壓制學生運動。許多當年從事過反對國民黨的學生運動的中共幹部都以為所採取的態度和手段簡直與當年國民黨如出一轍。

總之，我從十幾個省分得到的信息使我不安。我覺得中國已進入險象叢生、危機四伏的局面。各種社會矛盾正向臨界線接近。

然而對於這一切，我却沒有力量去施加影響。整整一年，我認為最需要報導的東西一概不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根據去年從陝西蒐集到的材料，我寫了三篇報告文字，其中兩篇都必須

隱去地名、人名，刊物才敢發表，這就已經不是報告文學了。

我仍然不甘於沈默。怎麼辦呢？我的老朋友，上海《文滙》月刊總編輯梅朵，一位反右運動中遭到比我更大不幸的人，傾其全部心血把這本刊物辦成全國質量最高、影響面最大的文學刊物之一。他願意為我提供園地，問我願不願意為他寫個專欄，每期一篇文章？幾年來我一直苦於手裡材料很多，拋不出去，也急欲幫助一些受難者做一些呼籲。報告文學的形式笨重了些，況且我原想為之講話的許多人的厄運，也並不都宜於做報告文學的素材，我也無法跑到現場一一查實事情真相。那麼，取個巧，用日記的形式把我的筆記本上的記載和有些人來信中傾訴的事實拋出去，公諸於世怎麼樣？文字可以很簡短，可以完全不表明我的態度；也可以使些招法避免「失實」的指控。說幹就幹，從一九八五年初，《我的日記》就在《文滙》月刊上開始連載了。

它還真起到了我預期的作用。

遼寧省台安縣的一位律師因仗義執言，得罪了許多當權人物因而被五花大綁，遊街收監；南京一位姑娘愛上一位年齡比她大三十歲的老師、前右派而被人拆散，她本人因而失去工作；遼寧省四平市委書記黃勛章，因堅決懲罰四人幫幫派分子和大力推行改革而觸怒了許多人，遭到誣陷被開除黨籍；四川省宜賓縣人大常委委員、工人技術革新家劉永江因反對任命不任職的官員而被捕坐牢。上海師範學院幹部趙興華反右和文革中遭受冤屈，因反對四人幫幫派分子，長期沒有工作……《我的日記》為許多人鳴不平，雖然因而改變了命運的只有少數人，但它至少起到了「公開化」的作用。

然而我又覺得寫這種東西心情很不舒暢，因為越是重大的問題，我越是不能寫；同時，為了

不給人攻擊我「把中國寫得一片黑暗」，我在每月的日記中還必須想方設法寫一、二篇「光明」的。這年五月，我以將赴西德訪問為理由，索性中斷了它。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被禁止訪問西德半年之後，我忽然又得到機會準備出訪了。時間只有兩周，三人同行，走六個城市，只能走馬看花，能得到什麼東西呢？

我不甘心雙手空空回來。一九八五年一整年，《人民日報》未能發表我任何一篇我真正願意寫的報導。這次外出，我能不能透過在西德的見聞，向我的同胞說一些中國人應該知道或思考的事情呢？這就是說，又像一九八三年那樣，我被逼只能通過寫外國的事情借題發揮，繞彎子來對中國的事情施加影響了。不覺得自己可憐嗎？不。倒覺得能站在法蘭克福的大街上向北京喊話，即使很累，也是一件樂事。只要能突破保守派所設的限制，觸動他們所極力要維持的中國人精神中那些蒙昧、僵死的角落，便於願足矣。

但是還需要找到一個題目，一個同德國和中國都有關的題目。下了飛機，我們活動的第一站是法蘭克福，第一個參觀點又是哥德故居。感謝歌德老人，一定是他在天之靈給了我指點，我忽然想起：今年不是德國納粹政權垮台四十周年嗎？明年不是中國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嗎？我們早就被打招呼了，一九八一年還發了一個文件，指令少寫、最好不寫文化大革命——能夠把它們忘掉，最好。老是哭哭啼啼，寫悽悽慘慘的往事，有多麼討厭！而德國人並却不是這樣。一九四九年西德通過的「基本法」不就根據希特勒上台的教訓審視了魏瑪共和國憲法，對於德國的政治制度作了一些改革嗎？中國却原封不動地維護著三十六年前制定的政治制度不思更改。好！就在這

個問題上下手。

我決定了一個行動方針：今後十天裡，不論在德國的那個城市，也不論見到的是什麼樣的德國人，我都要環繞著這個把西德和中國緊緊連在一起的紐結提出問題：德國人是怎樣對待一九三三—一九四五年那段歷史的？根據歷史教訓，西德的政治制度有了什麼變革？

事先訂好的活動節目中，只有三分之一能提供我所需要的機會。每提出三個問題，也許只有一個答案於我是有用的。我當然可以借助文字材料，但它們都是德文的。費力蒐集到一些英文書籍，又大多是寫希特勒時代的德國的。

但是歸來後檢閱我的筆記和一路上夜讀舊書中蒐集到的材料，發現我還是成功了。我把文章的題目定為〈他們不肯忘記〉。朱洪主張我不必在文中點到中國，我還怕讀者看不懂。後來所有讀過這篇文章的人都對我說：一看就明白。你雖然一字未提中國，但整篇文章卻讓中國人想到中國的問題！

我向我的同胞們描述著德國的這部份怎樣掙脫了民族傳統中消極東西的束縛，從惡夢中醒來。中國讀者會驚異那傳統竟與我們自己身上的某些東西有一些相似。我告訴他們聯邦德國如何把中央集權制改為聯邦制；不是靠空喊，也不是靠掩蓋矛盾，而是靠政治制度的改革實現了「安定團結」。他們聽懂了我的潛台詞，讚揚我這篇「出訪文學」寫得好，我感到欣慰。

像從來一樣，這種欣慰帶來的溫暖，驅走了這一年不停向我襲來的寒意。



第十五章

陰轉晴轉陰

中國的政治氣候，像老人喜怒無常的脾氣一樣，忽陰忽晴，誰也摸不準。一九八六年四月起，天氣又逐漸轉暖了。

這時我正在四川成都蟄居。報紙上開始宣傳對待知識分子要採取「寬鬆、和諧」的方針了。又見中宣部長朱厚澤出來講話了。朱是很得知識界人望的人，原是貴州省委書記。他被胡耀邦看中，調到中宣部以後，政治氣氛就不好，他很謹慎，從未公開發表講話。我覺得這兩件事可能是政治氣候開始好轉的標誌。

果然如此。這時又傳達了那小鄧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雖然毫無新義，甚至通篇講話中連「民主」二字都一次未提，但總算表示政治還是要改革吧。於是，在我從四川北上經過江蘇、安徽兩省時，已經感覺得到知識分子的情緒有所好轉。我也興奮起來，在安徽省會合肥採訪起一位長時受壓制的改革者趙雲鵬來。文章雖然未寫成，我爲此事走訪合肥市委書記，却促使市委提早恢復了那位已被停職審查多時的年輕的經理的職務。

七月間，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在軟科學座談會上發表長篇講話，傳出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信息。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提出「建設一個有高度民主和高度精神文明的新中國！」的口號以後，五年間不再聽到「高度民主」，連不很高度的「民主」一詞也很少見到了，「精神文明」倒是叫得很歡，各級政府還成立了「五講四美三熱愛」辦公室。精神文明的內涵被歸結爲講禮貌、講衛生和熱愛共產黨等等，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有點像三十幾年來不斷宣揚公民要具備「主人翁精神」而不使公民享有主人翁地位一樣，現在是要求公民在一個他們很難獲得尊重的社會裡互相以禮相待了。又是一個少數人爲自己編織的幻想。近來廣泛進行的「普及法律知識教

「活動，也是只宣傳公民必須守法，不得違法、犯罪，却根本不告訴人民：法律首先是保障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享有憲法所賦予的權利的。把這三件事聯繫起來，就能多少揣摩出中共有些領導人心目中人民的真實地位了。奇怪得很，這一套東西令人聯想起五十年前國民黨在中國推行的「新生活運動」來。連思維方式都很相像：不去改變公民的無權地位，無力克服黨的腐敗和由此帶來的各種憂患，却要求人民講道德、守法紀、維護現有社會秩序如全心全意、興高采烈、規規矩矩地跟隨執政黨前進！」

這是可能的嗎？這場試驗正在進行。拭目以待吧。

且說萬里那個講話，還沒有見報，當天就開始在北京的知識分子中傳了開來。我就是聽兩位朋友跑來興致勃勃地告訴我的。大家最感興趣的一點，是萬里說「政治決策問題，人民群眾也可以參加討論」。這是因為有一個比較，一九八〇年北京大學的一位哲學家郭羅基曾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題目是「政治問題也可以討論」，因而獲罪，直至後來被點名批評和放逐。而現在萬里竟說不僅一般政治問題、連政府的政治性決策也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見了！

萬里在講話中，還一度離開講稿，說起我的文章來。他說，「劉賓雁的文章〈第二種忠誠〉我最初沒有看過，聽說引起很多人反對，找來看了。我看很好嘛，我們就是需要第二種忠誠嘛。」這個消息，自然也被我的熟人當作喜訊前來告訴我。

幾天以後，萬里約我去見他。我來到中南海裡他的寓所。萬里的夫人和著名農業問題專家、也是萬里的得力助手吳象和萬里的一位公子也在座。

這是我與萬里第一次單獨談話。關於他，有兩件事我印象最深。一次是文革前，大約是一九

六五年，正是毛澤東提倡幹部革命化的時候，萬里當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他率先垂範，去和北京市著名勞動模範傅祥一起到北京街頭去挑了大糞。報紙上曾廣為宣傳，還登了一幅大照片。當時我對這種作法不很讚賞，那時正是報紙上時常宣傳清潔工人以苦為樂、知識青年去當修腳工不以為恥的時候。我覺得掏糞工這個工種就早該取消，有什麼好宣傳的呢？

十年以後在萬里被長期「靠邊站」之後復出，出任鐵道部部長。這時鄧小平開始主持中央工作，對動亂中的中國開始了一次氣勢恢宏的大整頓。一九七五年春天，萬里在整頓混亂不堪的鐵路運輸時建樹奇勳，一舉成為全國人心目中的英雄。那時東部鐵路樞紐徐州因鐵路工人中兩派之爭，一再癱瘓，另一樞紐京廣線的鄭州一帶也在一個造反派頭頭控制之下，一片恐怖，人心惶惶。人們曾以為這是誰也無法解決的難題，而鐵路交通的阻塞使包括北京在內的城市人民已經十分可憐的生活物資供應越發困難了。這時，萬里出馬了，他乘專車直奔徐州，對鐵路工人發表演說，進行說服動員，又對造反派的兩派首腦曉以大義，恩威並施，並把不聽規勸、繼續鼓動罷工的一個造反派女頭頭逮捕起來，終使津浦線鐵路運輸恢復正常。繼之又揮戈西上，大刀闊斧地平息了鄭州的動亂。在全國上下幹部精神萎靡缺乏鬥志的背景之下，萬里勇於負責的精神和雷厲風行的氣魄，令人敬慕，振奮人心。

四人幫覆滅以後，他又以同樣的氣魄在安徽省掃蕩幫派勢力。不怕保守勢力的上下夾攻和四周省份「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壓力，率先在安徽省推行農村生產責任制，在醫治飢餓與窮困上速奏奇效，贏得「要吃米，找萬里」的美譽。近幾年在意識形態上兩種力量的鬥爭中，他始終和胡耀邦站在一起。一九八三年冬季他和胡耀邦是力阻「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主力。記得那時我

聽到他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傳達。我極感興趣地聽出了他字裡行間的潛台詞。那時他還不能公然批評「清污」運動，但他借題發揮地向保守派分子發出了警告。我清楚記得他借談農村政策問題表達了這樣的意思：歷史是不可扭轉的，任何企圖阻擋改革大潮的勢力，終將被歷史埋葬。不久，又聽到一個那些陰暗日子裡十分鼓舞人心的消息：在一次全國高等教育工作會議上，國家教委主持會議的人在開幕詞中說的是一派保守的調子，而最後一天，萬里到會，則完全推翻了國家教委提出的一套觀點。

萬里見到我，第一句話便是：「我們就是需要你寫的那種『第二種忠誠』。一個黨，一旦聽不得不同意見，它就完了。無論是共產黨、國民黨或者社會黨、基督教民主聯盟，都一樣，只要聽不得批評，就必定要垮台。」

他頗有感慨地說：「我們中國現在是聰明人和奴才太多而傻子太少了。很少人敢於直言，這是危險的。」接著他就提起魯迅〈關於聰明人、傻子和奴才〉的那篇雜文。他常常提到魯迅，而且大段大段地引用他的文章。原來當他在山東讀師專時，曾寫過小說，想做一個作家。那時他直接從上海的《申報》上讀魯迅的作品。文革被監禁期間，又把魯迅全集通讀了第二遍。中共領導集團裡，有這樣文化素養的人太少了。我心中又一次出現了多次發生過的感慨：這個黨是如此重視意識形態，但建黨六十餘年，現在竟找不到一個真正懂文化的人來作主管宣傳的書記！

萬里主張我把鄧拓和吳晗寫一寫。他為他們遭到毛澤東那樣殘酷的打擊，很是不平。

幾個月來我心中的那個疑慮，也是文化界許多人的一個心事，我向萬里提出來了：一九七九年以來，中國的政治形勢總是忽晴忽陰，反反覆覆。曾有幾次，大家以為保守派既已偃旗息鼓，

鄧力群和胡喬木這兩員大將不再露面了，想必不會捲土重來了。可是沒過多久，又是一場風暴。我問萬里：現在胡喬木和鄧力群又有一段時間不見了，可是大家不敢放心，說不定幾個月後他們又得意洋洋地出來了，您看有這種可能嗎？萬里笑了，看來他早已胸有成竹，表示我不必對此多慮。我本來就趨向於樂觀，經過他這樣一位權威人物證實，自然備覺興奮。幾個月以後發生的突變，證實連萬里也被蒙蔽了。

我又說他在軟科學座談會上的講話極好，知識分子們聽了都很振奮，問他那講話能否全文發表？他讓秘書拿來經過文字修飾的定稿交我，說已送鄧小平、胡耀邦審閱，估計不會有什麼改動。讓我帶回面交《人民日報》社長，找幾個人寫一些文章，配合這個講話發表。

萬里接見我的消息很快傳開。他關於《第二種忠誠》所說的那些話，也迅速傳開，並在一些小報上披露出來。這些，連同幾天後問世的萬里那個講話，被認為是中國政治形勢明顯好轉的可靠迹象，知識界普遍感到欣慰。

不料不久就傳來令人不快的消息：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和中顧委的會議上討論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時，文革前的中宣部長陸定一站起來，建議刪掉決議文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字樣。萬里也附議。但鄧小平却主張保留。我照例又過於樂觀，當友人們議論這件事認為是不祥之兆時，我却認為那不過是一句空話，鄧小平反對刪去，無非是一種姿態，作給保守派看的，我不相信「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遭到全國抵制、草草收兵之後，鄧小平會同意再來一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什麼運動。

四個月以後，中國政局的又一次逆轉將證明我和萬里都失算了。

但是那個夏天直至年底，人們的心情都不壞。「清污」留下的寒意好像已被驅散，天氣一片晴朗。於是，我認為應該是我們到黑龍江去營救王福綿的時候了。

已經有兩年半了，我心中時常浮現出一個人的形象，他好像呼喚著我。我和他只見過幾面。但在我所見過的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中，這個人却特別令我牽念。

王福綿，黑龍江省伊春市的一個工人，四十歲上下。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他還在我家裡對我談話，夜裡突然被抓走了。第二天凌晨他妻子、朝鮮族的李華生慌慌張張跑來，流著淚告訴我這個消息時，我極為震驚和憤怒。我覺得王福綿就好像在我眼前被抓走的——我們的談話還沒有完，他今天上午約好要到中紀委去談話，揭露伊春市前市委書記王斐的罪惡。

是伊春市公安局從四千餘里外派出的警車隊把王福綿抓走的。王福綿不服，掙扎，他們就威脅說：「別逞英雄！這一路上你要再開，也不整死你，可是有辦法叫你瘋！」

我知道這些人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很著急：真把王福綿逼瘋了，他就沒有發言權了——他對王斐一夥人的揭露就會無效，自己也冤沉海底了！

於是我趕忙給派出所、給公安分局打電話。我以為王可能還拘留在北京的一個什麼地方。我要盡最大力量把他搶救出來！電話很難打通，好不容易通了，對方又說這類問題只能在公安系統的內部電話上談。一位朋友又幫我去疏通市公安局。

這時，我妻子忽然患了急性腸炎，疼得在床上翻滾，我必須陪送她去醫院。

我是一個「慢性子」，很少有心急火燎或怒不可遏的時候。這一天我却同時充分地體驗了急和

怒。下午傳來消息：王福綿早已不在北京，當夜就被押送東北了。效率真高啊！

我也很少像這一天這樣沮喪過。我想起幾十個人的類似的命運。這王福綿是條硬漢子，現在竟被那些人像縛一隻小雞一樣抓走了！中國人解放三十幾年了，公民的地位竟仍然如此可憐，隨時可能失去人身自由，怎不令人難過！而我雖然知道這次逮捕十之八九是非法的，竟然也束手無策！我在日記上寫道：今天是我有生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我仍然擔心王在這四十餘里路途上可能遭到不測。第二天是星期日，伊春市委的電話無人接。

我索性把電話打到哈爾濱王福綿的死對頭王斐的家裡。他已榮升為中共黑龍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長了。我自報姓名，說：「伊春市的王福綿剛剛被警車隊從北京抓走了。逮捕證正寫的是『侮辱誹謗』，據我所知，他到北京是來告你的。所以他『侮辱誹謗』的可能就是你……」

王斐當然知道我是誰。他有些緊張，先洗清他自己，說他文革期中也是受迫害的，一九七〇年才恢復工作，調到伊春。他和王福綿並無個人怨仇。我問他就他所了解，王福綿是個什麼樣的人。他說：「這人文革中遭過很多罪。後來平反了，補發了四千多元工資，還定了工傷。不過，現在伊春的情況比較複雜，有人攻擊市委。王福綿可能叫一些老幹部當槍使了。」

聽了這幾句話，我更放心了：王福綿不可能是個壞人。王斐最後一句話的意思，我要三年以後才能明白。

王案比大興安嶺問題更難辦，因為直接涉及省委的大人物。組織部長是共產黨一級黨委中除第一書記外最重要的人物，因為任何幹部的升降任免都須由組織部提名。王斐能夠升任組織部長，肯定是得到了當時省委最高人物楊易辰的特殊信任和經過中央首肯的。這不是一塊能輕易搬得動

的石頭。我繼續等待時機。直到一九八六年秋季，這個時機才終於到來了。

在一次社長兼總編輯和幾位副總編輯都在場的會議上，我介紹了王福綿一案的簡單過程。我特別指出：《人民日報》在這個問題上是有錯誤、有責任的，因為從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四日王福綿被捕到同年七月，黑龍江對於王福綿始終未採取行動。直至《人民日報》發表了黑龍江省委提供的一篇報道，那裡才開始對王進行審判，而偏偏在這一篇報導上，《人民日報》出了一個大的差錯：標題上把王福綿寫成「三種人」。也是事出有因，因為黑龍江省委的那篇文章從頭到尾就把王福綿描繪成一個「三種人」，他是個政治野心家、造反派頭頭、官迷，自封為副市長，達不到目的就到市委去鬧……但文章作者很狡猾，他沒有寫「三種人」這個詞，而報社的編輯却不慎加到標題上去了。黑龍江省委不在自己的報紙上報導，却偏要把稿子送給《人民日報》發，然後它的省報和伊春市報再來轉載，這就給人一個印象：王福綿是由中央定為「三種人」了。

社長兼總編輯是新上任不久的，為人十分謹慎。我擔心他會像前任那位一樣不以為報社負有責任，便向他和幾位副總編輯舉出例證，證明這確是一起以打擊報復為目的的假案：逮捕證上寫的是「侮辱誹謗罪」，開庭審判時又變成「擾亂社會秩序罪」，而最後又撤銷了原判，把被告定為「偏執狂」患者，送進精神病院！而那些早已欲置王福綿於死地，逮捕前幾個月就成立了龐大的專案組，逮捕後又以幾個月時間對所謂「同案犯」三人和四十餘名受株連的人以各種非法手段逼供逼證和誘供誘證，倘若王福綿真是個罪犯，何至於如此笨拙地一再更改罪名而最後又不敢定罪呢？

我終於打動了他們。我沒想到社長會這樣痛快地點決定派人去黑龍江，由兩位比我年輕的

記者陪我同行。

我懷著十足的信心來到哈爾濱，相信王福綿的事情不難查清。一個重要原因是這時國內的政治氣氛於我有利。王福綿的政敵手段拙劣，破綻百出，如何掩蓋得了？

接待我們的人是新任省委常務書記的周文華。一九八三年秋我在佳木斯市採訪時曾合作得不錯，況且四十年代他在青年幹部學校學習時，應該算是我的學生。他仍然像過去一樣笑咪咪地和我寒暄，說話仍然是細聲慢語的。他過於溫和和十分謹慎的性格，是幾十年來仕途順利的人所共有的。我不喜歡這種性格，但以禮相待，相信他會比一個生人更能合作。

我交出《人民日報》的公函，說明來意，提出要求：首先要看王福綿一案的案卷，要和主管此案的高等法院的人談談，也希望見一見關在精神病院中的王福綿。周文華細心地、彬彬有禮地聽著，表示願意幫助。

三天過去了，沒有回音。再見面時，用文華說因為有了新的規定，只准上級黨委和上級法院的人閱卷，所以必須向北京請示。至於和王福綿見面，尚須查找他所在的精神病院，故須等等。高法的人嘛，出差了。

我竟未發覺這三個答覆都是搪塞。好在我在哈爾濱有見不完的故舊和新客人，等等也無妨。又是三天過去了。打電話找周文華，答說尚在請示中。八天後，高法的人倒是來了，一來竟是三位，兩個和我們對談，第三個是專做記錄的。我掃了一眼，記我的話竟也十分仔細。明白了，這是接受使命，要揣摩我們的底細的。

我們打電話給北京本報編輯部，請派人去最高法院打聽，查閱案卷究竟需要什麼手續。答覆說：只要省委同意便可。我明白了。在給周文華的電話中我發了脾氣：「我們不是出於好奇，甚至也不是爲了一般採訪而要求看卷的。我們是奉命爲了糾正《人民日報》的一個錯誤而來，了解王福綿的案情是必不可少的。況且，王福綿一案既非大案要案，無任何機密可言；本人既已被定爲精神病沒有責任能力，這個案子就已經撤消，案卷有什麼必要保密？我越說越衝動，抑制不住火氣了：「假如不是你們心裡有鬼，爲什麼不敢給我們看卷？你們若是正大光明，此案無懈可擊，給我們看卷不正好證明你們省委正確嗎？」周文華被我問得啞口無言。我再生氣，他也不發火，仍然慢聲細語地敷衍。

總之，爲了和咫尺之隔的王福綿相見，我們等了十四天時間。而法院的案卷則始終不敢給我們看。不准看卷，並不是他們的勝利，而只能證明他們在製造這起假案中幹了許多見不得人的勾當。我相信一待我們到伊春實地調查，群眾就會把一切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提供給我們。

他們實在太膽怯了，這就反而使他們露出了更多的馬脚。《黑龍江日報》的副總編輯主動提供一位了解伊春情況的記者幫助我們，那位青年記者本人也早就表示願意給我幫助。後來忽然沒有消息了。這家報紙文藝版的一位編輯，願意用他的假期陪我去伊春，向副刊主編打招呼時，也不准他走，而且等於把秘密向他攤開，笑咪咪地說：「你若是兩天來說，我會毫不遲疑地同意你去。現在，不能了。你也不必問，心裡自然明白。」更有趣的是省電視台一位過去同我合作過的青年記者，已經背著錄影機到哈爾濱車站準備與我同行，他的科長却慌慌張張跑到車站來把他硬給拽走了。

我並不氣惱，倒像一個旁觀者似地看著這場滑稽戲一幕幕演出，覺得好笑。可笑的倒不是這種手段本身，而是那些不得不採取這種手段來對付我的人。就像死活不肯給我看案卷一樣，不許記者們協助我工作。他們一定是以爲這一來我就無法了解此案的真相了，這是妄想。那天晚上和我們三個《人民日報》記者一起登車去伊春的，仍然有省、市報刊和鐵路報紙的三位記者和女詩人林子，另有一名伊春地區的老工人業餘律師已經先行。他們都知道省委一些大權在手的人物在破壞這次調查，不會高興他們協助我工作，但根本無所顧忌。

去伊春的前夕，我和兩位同行的記者終於被准許去看王福綿了。他就住在省公安廳所屬的精神病管治醫院裡。

走進他所在的那個病房時，十幾名穿著淺藍色病人服裝的人一起起立，我一時竟識別不出哪個是王福綿了。只有他一個人衝著我笑，我這才發覺他把絡腮鬍子刮得精光，人顯得比兩年半前更年輕了。

院長和病房的醫生經過一年多的觀察，都覺得王福綿不像有精神病的人。我們和王長談，把他的話錄了音，覺得他神智清醒，邏輯能力很強，毫無病態。

這之前，我曾去過北安精神病防治醫院，並和王福綿鑑定爲「偏執狂」的三個醫生面談過。他們只和監中的王談過一個小時話。兩位資深的醫生最初認爲王只不過是「人格障礙」，算不上精神病。第三個原是獸醫，改行作精神病醫生的，則認爲是偏執狂。而那兩位醫生居然就接受了從獸醫改行的同行的意見，倒是一件很值得玩味的的事情。

偏執狂的症狀是什麼呢？我找來文革期間在省公安廳主持下制訂的「精神病司法鑑定標準」，

那裡是這樣寫的：「一種罕見的精神病，自信強，主觀武斷，剛愎自用。多具一定文化水平，智力較高，精明能幹，但看問題片面，不接受批評；對現象主觀臆測，牽強附會；其妄想具有一定現實性，內容並不荒謬。早期易被視為正常人，不過思想偏激而已。病人意志活動增強，四處奔走，申訴上訪，連篇累牘地寫控告信，不達目的不罷休。少數人誇大妄想，自命不凡，自認為要作出偉大貢獻……」。

讀完這段文字，我不禁不寒而慄！它簡直就是針對王福綿，以他為原型摹寫下來的。甚至可以用到我的身上。「自信……片面……不接受批評……自命不凡……」這些正是五十年代以來黨的官員對於稍有獨立見解或欲有所作為的知識分子的批評。關於「四處奔走申訴上訪」等等則適用於流落北京街頭的數以千計的所有蒙冤多年的受害者。這些條文的政治功利性太明顯了。而起草這些條例的竟是黑龍江省精神病學界的最高權威，他本人就受過多年政治迫害。

而執行這些鑑定標準的精神病醫生，又不可能都是道義責任感和人道主義精神很強的人。知識水準如何呢？反正北安精神病院的很多醫生至今還不知弗洛伊德是何許人，而這家醫院並不比同類醫院更差。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大陸從未出版過弗洛伊德的著作，去年才開始解禁。

我在我記憶中的王福綿身上查尋，他精神上是否具有不正常之處呢？似乎確有一點異於常人。他寫的那些揭發控告材料，常使我感到像討伐奸逆的檄文似的，鼓動性的詞藻太多。他和我談話，常常激動得站立起來，走來走去，鏗鏘有力地發表演說般講話。

然而倘若他沒有異於常人的氣質，伊春市也就不會有一個眾所周知的捨生忘死同邪惡鬥爭的硬漢子了。他文革期間因反對軍隊支持的一派勢力，幾度被捕，受盡酷刑，始終不屈。

他此刻卻被定為「偏執狂」而關在精神病院。這種病是醫治不好的，故等於終身監禁，比判二十年有期徒刑還要殘酷。那王斐和他有多大仇恨，一定要下此毒手呢？

伊春市中共市委對我們也笑臉相迎，彬彬有禮，像省委的周文華一樣。由市委宣傳部一位副部長接待，每日三餐陪同。第三天中午，我們說起有人向我們抱怨：來找我們談話，招待所樓下有人攔阻，說記者們不願見。那位副部長馬上解釋說：「沒有的事，這兩天你們不是見了三十一個人嗎，有誰阻撓過呢？」

噢，怪了，我們並未委託你幫我們登記和計算來客人數呀，你怎麼記得這麼清楚呢？他無意中供認了確實有人在監視我們和來訪的人。

我們已經獲知，我們到來之前，省委已向市委布置：「記者們來，不許他們看任何有關王福綿的案卷和文件。」市委作了對付我們嚴密的準備：在兩個招待所連續開了幾天會。現在我們來後約見主管王福綿案的市委書記和組織部長，兩個人都忽然生了急病住到醫院裡去了。

這就在繼封鎖案卷、不許記者協助工作之後第三次暴露了他們有罪，因而怯懦。

我採訪八年，第一次見到瀰漫在伊春市的這種恐怖氣氛。

一位當地的作家走進我的房間。開始，談話倒也自然。我把他的電話和地址隨手寫到放在茶几上的錄音帶盒上以後，他的神色就不對勁了，先說：「劉老師，你還是把那電話號碼擦掉吧！」我塗掉了。他眼睛還盯著那個紙盒，又說：「您把那個地址也塗掉吧。」其實那並不是他家的住址，只不過寫了他所住的區，三個字。

本來去年春天，這裡就傳說我要來。當官的驚慌了一陣，老百姓則有很多人盼我來，要向我反映伊春市的問題。但是六月間伊春市那些因我過問王福綿事件而對我又恨又怕的官員一聽中央那位整黨大員批評了我，如獲至寶，趕忙向下層層傳達，直至家喻戶曉。既然連中央大員都指名批評了劉賓雁，找他談話就更要小心了：他可能已經出不了力，鬧不好還可能受他的牽連呢。

市委小招待所這個地方也令人怯步，我們本來不想住到這個地方，可是住到哪裡能躲得掉市委派出的監視者呢？

然而那些多行不義者多少年來迫害的人實在太多，他們激起的憤慨也過於強烈，因而我們一行八人終日仍有接待不完的控訴者和揭發者。晚間，我們則分別到一些人家去見那些實在不敢來招待所的人。

王斐爲什麼要陷害王福綿呢？

王福綿不能容忍，文革期間犯有嚴重罪行的人，包括對他的一派追蹤、逮捕、施肉刑的人，都被市委書記王斐一一重用了。他不止一次地把一百多人的名單交給市委，提供很多罪證，但七年過去了，一概無效。這他才到北京上告。

王福綿不了解王斐的苦衷。他憑什麼要保護非親非故的「三種人」呢？他是不得已呀。文革中他也幹得很歡，他上任不久，就在全區開展對「走資派」的批判，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十八條」，批判鄧小平的運動中他在全省領先。爲此，「四人幫」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孫健對他十分讚賞，講話中號召伊春全區人支持王斐，主張省委重用王斐。王斐還把這講話印成文件在全區傳達了呢。他若是認真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事」，就勢必把自己和「三種人」一起給揪出來。

王斐既然是伊春市委書記，也就是「黨的領導」，不僅有權決定打擊誰，保護誰，而且由於每一級「黨的領導」都代表黨中央，於是他就毫不費力地代表鄧小平把當年反對鄧小平最積極的自己保護下來，卻把反對批判鄧小平的市委會的一個領導人黃瑞武監禁起來，作爲「清查」運動的主要對象。而一年前批鄧的時候，也是在「黨的領導」王斐的主持下，伊春街上的大字報寫的主卻是「揪出小鄧小平黃瑞武！」

「四項基本原則」的另一項「無產階級專政」的效能，這時也用上了。既然我是「無產階級」對你實行「專政」，就不必講究任何法律程序。一旦我認定你是敵人，就可以先定罪名，採取行動，然後再蒐集罪證。爲了證明黃瑞武是敵人，而敵人必定重用壞人，就把一位給黃瑞武看過病的老醫生警勝文再抓起來。此人壞在那裡呢？一九四九年以來一直懷疑過他曾是「國民黨的少校軍醫」、「逃亡地主」、「國民黨的旅長」、「有過二條人命」、「販過毒」，雖然審查了將近三十年，而且終於平了反，但是人們印象更深的是他「歷史複雜」。不過最好能給他安上一個沒有平反過的歷史。這也不難。伊春真有一個歷史上的「壞分子」，是在關內定的，偏巧和警大夫同姓，名叫警長善，還是同一個村的。把那人的檔案放到警勝文的檔案裡，抽掉警勝文的檔案不就得了！害得警大夫到現在還找不到他本人真實的檔案，成了一個沒有歷史的人。另外，他不是常給女人看病嗎？抓幾個女人關起來審查。找來十二個，最理想的是那個姓孫的。警大夫給她扎過針。「專政」方面需要孫證明警大夫姦污過她，那女人無論如何不肯承認。那麼，「總摸過你吧？」答說那也沒有。「在小腹上扎針，手能不摸？」「那怎麼能算呢？」「只要摸了就行。」憑這一條，「專政」機關就判了警大夫三年徒刑。這就足可證實黃瑞武「重用壞人」了。

七年以後，「黨的領導」又需要對王福綿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了。照例成立了一個專案組。然後派人追捕。可是罪證尚未齊備。市委幾個領導幹部自知理虧，王福綿手裡又捏著大量材料（因而他家才發生過兩次火災，把大部分材料都燒掉了）。不過「黨」和「專政」機關收集百姓的材料，方便多了。王福綿不是和市委幹部爭吵過嗎？好，這就是「大鬧市委」，四人幫的爪牙都由工人轉為幹部，很多人還身居要職，為表示公平，市委也會讓王福綿他們商議一下各人自認為能擔任什麼職務。幾個朋友反認為王福綿一向主持正義、大公無私，義務為受害者出庭辯護，可以擔任分管司法的副市長。好了，這就可以搞成一條罪狀了——他伸手要官！他還幫助受害者寫過大字報揭發一個區法院院長稱王稱霸、欺壓良民，好，這就是「侮辱誹謗」！材料還嫌單薄。不難，所有單位不都有「黨的領導」嗎？捕人的同時，由各單位黨支部命令與王福綿有牽連的四十多人停職反省，強迫他們交代王福綿的罪行。

還有幾個長期和王福綿在一起跟市委作對的人呢，不給以處置，他們還會到北京去上告。也一併抓起來！不夠判刑，但「無產階級專政」創造了一種補充制度——「勞動教養條例」，沒有犯法、但不聽從「黨的領導」的，也可以剝奪自由，這不叫刑事處分，稱為「行政處分」。於是，把三個人一一抓將起來。

可恨的是這時和文革時期不同，要講法制了，「無產階級專政」沒有過去方便了。捕王福綿的時候必須寫個「逮捕證」，上面寫了個「侮辱誹謗」。把人抓起來後，又發覺「侮辱誹謗」必須是公開的，很難找到那麼多人製造假證，以致王福綿在拘留所蹲了四個多月，還不敢開庭，又超過了法定期限。以「破壞社會秩序」好不容易判了四年刑。王福綿一上訴，省高級法院又犯了難。

因為一查，「破壞社會秩序」罪也成立不了，因而既不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又不敢決定重新審理、撤銷原判，因為那一來就得釋放王福綿，他去北京上訪就會更起勁啦。急中生智，找來三個精神病醫生，這才既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又符合了法律程序。

堅持王斐那種人所需要的「無產階級專政」，方便無窮。對於王福綿和他的「同案犯」，要抄家就抄家，要撬鎖搜查就撬鎖搜查。連王福綿的妻子在北京給孩子治病住旅館，伊春市的便衣警察都可以去撬開她的門鎖，搜查她的衣物，並且還敢偷走劉賓雁給她寫的一封信。

狠狠收拾王福綿的直接效果，就是封住了伊春一百二十萬人的嘴。誰還敢揭發王斐？王福綿是伊春最勇敢的人，最能言善辯和很能寫的人。連他都只能乖乖地蹲在精神病院，多半是一輩子休想出來了。誰還敢試一試？

踏上去哈爾濱的列車時，我們已經掌握了推翻王福綿這起冤案的足夠依據。同時，我發現了一個除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地區和四川省宜賓地區以外的又一個黑暗王國。王斐的罪行遠遠不限於製造了一個冤案。

小興安嶺的森林資源已近枯竭，再有六、七年就要砍光了。王斐任中，家家一把小圓鋸，學校、機關皆可伐林。許多幹部非法運木材，謀取厚利。至少有兩個林業局設有家具廠，專門為需要巴結的省或中央的幹部製造高級家具，免費贈送。

這裡成了一個是非善惡顛倒的世界。王斐的兒子王小三開車到水果公司偷水果，遭公司保衛人員郭德奎制止，發生毆鬥。王小三反成原告，郭德奎被公安局追捕，三年不敢回家。

這就使許多人的票面價值與真實本質全然相反。「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官職可以私相授受，群眾普遍傳說「兩千元可以買一個科長，五千元買一個局長」，想必是把實物和各種給賣方的好處也折合成現金計算的。這自然是因為當官有很多好處。文化局長的一張報銷單子上的開支項目就很說明問題：羽絨衣，水獺帽，電飯鍋，皮鞋，藥品……。這些都屬於「辦公用品」。而銀行貸給文化用品廠的五十多萬元貸款就在諸如此類的開支上用完了。計劃生育辦公室的幹部大吃大喝，以致把婦女用的避孕環都吃進去了——說的是政府撥給的那筆經費。

人民滿腹怨氣，無處宣洩。自然界的報復是今年刮起了從未有過的十一級大風。人間的報復則是去年和今年的兩起大火。伊春市區居民長年堆積許多木柴，極易起火。但過去的火災只殃及二、三十戶至多五十戶人家，這兩起空前大火則一燒就是兩千多戶！政府防火無能，救火不力，還查不出火因，卻可以對火災不負任何責任。至於去年的那起大水災，則純粹是市委和市政府失職造成。為講排場，一個不足一公里長的市區，非要修一條環城公路不可。為此扒掉了河堤，水勢不大，卻淹沒了市區。

有些官僚卻因災得福。一些長年虧損的工廠，靠保險費變成「盈餘」。由此得到啓示，一些經濟官員竟密謀放起火來。為首的是伊春區（即伊春林區的市中心）副區長劉德偉。事發，此人畏罪自殺了。

回到北京，我和兩名記者聯名寫了王福綿一案及王斐一夥人罪行的詳細報告，送交胡耀邦和胡啓立，建議派出更具權威的調查組，糾正此案。這時已是十一月。兩個多月以後，胡耀邦失去

官職，我被開除出黨，王福綿的解救也就擱置起來了。

就在我為恢復王福綿的自由而鬥爭時，有人已在策劃對我下手了。我要使王福綿重新獲得發言權。但幾年來被我的發言所傷害和激怒的人以及擔心我的繼續發言會給他們造成威脅的人，這時開始把幾年來的計劃付諸實現了。我的行動和言論開始受到監視。

我此時尚未察覺。但我好像知道自己所餘的時間已經不多，拚命加快行動。一九八六年我跑了湖南、四川、江蘇、安徽、黑龍江、上海、福建七個省市，有三個省市還去了兩次。從五月起我又開始了演講的高潮，先后在五個城市作了十幾次演講。

我的年紀比大學生高出兩倍，但像往常一樣，我喜歡他們，並且不是像長輩那樣居高臨下，而是很親近。他們也不把我當成另一代人。我自己也有些詫異：怎麼我的自我感覺老是像三十幾歲的人似的呢？難道我的生命歷程凍結在一九五七年了嗎？

有人說從一九八〇年起，大學生大大不如前三屆那些從文革中摸、爬、滾、打過來的學生了。他們從中學校門直接邁入大學，幼稚而缺乏政治興趣。因而當一九八五年五月我站到南京大學禮堂上掃視會場時，我愕然了：學生們擠滿了大廳走道的所有空間，肩與肩、胸與背緊貼在一起，危樓也有人。講演結束時，我不得不借人家一個書包來裝學生們提問題的條子。這盛況超過了一九七九年我去過的所有大學。

當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廿七日我到天津南開大學做我對大學生的最後一場演講時，聽眾之踴躍與熱烈又超過了一年半前南京大學的場景。我見台下實在站不下了，便問主持人：叫同學們坐到台上來怎麼樣？話音還未落，潮水般的人就湧上講台，一直坐到我腳邊。

我心情非常激動，眼睛都溼潤了，真想向這些學生們喊一聲：「孩子們，我是多愛你們哪！」我何以會這樣衝動呢？因為我認定中國的希望就在他們身上，可惜毛澤東的錯誤使中國少了幾百萬大學生。我興奮，因為他們並不像有人說的不關心政治。今晚這裡並不放映電影或表演雜技，純粹是對祖國前途的關注和由此萌生的許多疑問把他們引到這裡來的。我同時又有些難過，因為潛在於這些年輕的心裡的火種，那渴望真理並願意為國獻身的熱情不被珍視，反而被看作莫大的危險，急欲熄滅之。

我難過，因為我不能像四十年前在天津和哈爾濱那樣用我熱誠的心去點燃他們的心。在「解放」的三十五年之後，我反倒不像在日本占領下和國民黨統治下那麼自由了。而且，我現在還被看作是一個危險人物！

我呼籲擴大言論自由。我指出，經濟改革受到舊政治體制和陳腐的意識形態的雙重束縛和干擾，三方面的改革必須同步進行。三十餘年來所犯的一個戰略性錯誤，就是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個發展階段一刀切開，一根血管和神經也不准相連，全然否定人類在資本主義時代所創造的精神財富，包括西方政治制度中合理的部份。我勸告青年人不要因整黨失敗、黨的腐敗仍在加劇而悲觀失望，要把眼光放到中國社會大變革過程上去。歷史總是以人們意料不到的方式表現自己。一九七六年四月以前，誰想到過會發生一個天安門事件？到天安門烈士紀念碑上獻花圈、書寫和抄錄詩詞以及發表演說的那些人自己，也想不到自己是一個偉大革命事件的創造者。我說：在任何社會的任何時代，大學生都是舊秩序的掘墓人。中國的希望在於青年知識分子身上……

我呼籲青年作家不要走進象牙之塔，而要更多地關注現實和中國人民的命運。「文學疏遠了人

民，人民就會冷淡文學。」在一個溫飽問題和人權問題尚未解決的國家，作家不能不傾聽人民的呼聲。

臨近年終，我又被召喚到遙遠的武夷山去作最後一次採訪。那裡一位天才的藝術家，把全部心血傾注到山林建設的陳建霖為反對濫伐森林和破壞風景區而進行的堅毅鬥爭和因此遭到的壓制迫害，喚起我無限同情。

中共福建省委書記陳光毅聽取我對武夷山危機和陳建霖事件的介紹後，立即決定派出一個公正的有權威的調查組。陳建霖也被邀請參加調查組，使我們感到振奮，認為問題的解決有望。

這時，十二月十日，我突然接到《人民日報》急電，召我回京。在機場上，我聽到人告訴我：「美國之音」今晨廣播：安徽省合肥科技大學的學生上街遊行了！

我並不驚訝。我已有些預感：整黨的不見實效和政治制度改革的不實行，已在大學生中造成焦急和失望情緒，他們可能會採取行動，表達自己的政見。

這並不壞，我想。這時我絲毫沒想到大學生的示威遊行對於我的命運會帶來什麼影響。

除夕的前一個晚上，由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的：你們——我們：作家與讀者聯歡晚會在北京舉行。這本是一件可喜的創舉，這時卻令主辦的人甚是發愁了。此時正值全國學潮起伏彼起，特別是因北京大學學生此刻隨時可能衝出校門，首都氣氛十分緊張，會場首都體育館距北京大學和大學區極近，擔心觀眾會喊起反政府口號，或舉出大幅政治標語。我的出現已很不合時宜。取消這個活動已為時過晚。去掉我的出場吧，又因節目單已經印好，導演張辛欣也堅決反對，只好照舊。但比較謹慎的作家聽說我仍然要出場，就不肯冒險，不來演出了。

那天晚上我的心情很複雜。會場坐滿了人，但售票時已嚴加控制，把大學生排除在外。觀眾席中坐著許多便衣警察和公安學院的學生。電視台還在錄像，但我們都知道明天電視台不會播放了。為什麼對於人民竟恐懼到這種程度呢？

我坐在觀眾席上。青年詩人楊煉在朗誦他的詩。聚光燈打在他瘦削的身上。他很隨便，很自然，一條腿隨著詩的節律輕輕顫動著。我沒有用心去理解詩句，但當他讀到每節詩後面的疊句「啊，這麼多人！這麼多人！」時，我的每根血管都似乎震顫起來，因為我一直思念著牆外的中國，全國各地大學校園中群情激動的學生。

辛欣把我的節目排到幾乎是最後。我出場前，全場全部燈光熄滅，音響設備播出既像輕輕的鼓聲又像的答的答鐘聲的聲音。辛欣示意我不要急於走入場地，她要使我的出場特別引人注目。忽然，燈光亮了。我由打在我身上的聚光燈伴送，走入場地的中心，觀眾的掌聲很響，且不肯停息。我不顧那些心驚膽戰的作協幹部過於緊張（這時最易發生意外），於是使用自己的聲音把掌聲平息掉，開始了我的朗誦。

那是導演張辛欣精心為我挑選的，讓我複述我今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報告文學《沒上銀幕的故事》的故事。它是寫西安電影製片廠廠長吳天明銳意改革的事蹟，因而是我的作品中較為溫和、不致激怒當局的一篇。一面講述，我心中一面覺得窩囊，因為在我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和眼前的中國形勢緊密呼應、使聽眾震撼而又受到啓示的警句，今天卻硬是不能講。

「別了，我的讀者！」我在掌聲中退場，和走到看台前部和我招手的人頻頻揮手，想道，「這很可能是我們的最後一次會面了。」



第十六章

在國外

在中國，我大概可以算作在國外旅行比較多的一個。

一九四九年七月，我和一百餘名中國的年輕人一道，心情非常興奮地跨出了中國之門，進入仰慕嚮往已久的「社會主義祖國」蘇聯。

這次是赴布達佩斯參加每兩年舉行一次的「世界青年聯歡節」，我和中國藝術團、參加世界民主青年聯盟代表大會的代表團同行。一九四七年第一次舉行這兩個活動時，中國還只能從解放區派出兩人參加。現在，全國解放在即，我們已經以一個國家代表團身分出現了。

國境上的第一站是敖特波爾，意為「反擊」，顯然是二十年代中國執行反蘇政策和後來日本對蘇威脅時代留下的痕跡。車站的餐廳裡，為我們設下了極其豐盛的晚餐。我們以為一定是蘇聯政府的友好表示，便饕餮了一頓。不料並非招待，要收費，賬單上開著九千多盧布，使代表團秘書長韓天石大吃一驚——一餐飯竟用去代表團全部經費的一個相當大的部份！

繼之，是海關檢查。面色嚴峻的軍人仔細檢查了我們攜帶的所有物品。這是一個意外，因為我們未曾想到對於一個同是由共產黨執政的友好國家會如此戒備，我們怎麼會對蘇聯懷有敵意呢！所有膠卷，所有寫有字跡的筆記本都必須扣留，歸途發還。我們大為不快。

當然，我們把這些看為細枝末節，認為並不代表蘇共中央的態度，因而並不影響我們對蘇聯的感情。

火車經越西伯利亞，總共要走十一天之久。

餐車為我們開飯時，兩邊的車門緊閉，透過玻璃，可以見到許多蘇聯人簇擁在門外等候入內。我還以為這是為了中國客人就餐時的安寧。後來才得知，蘇聯公民吃不到我們這樣豐盛的飯菜。

每天早餐每人三個煎蛋和每餐都有的一碟黃油，當時都是奢侈品。

一路上常常見到貧窮和匱乏的跡象，我以為這一定是四年前才結束的戰爭造成的，同社會制度無關。

我幾次到蘇聯人乘坐的車廂中和他們攀談。一位中年婦女向我提出一個問題：「毛澤東會不會步鐵托的後塵，和蘇聯決裂？」使我吃了一驚。問她何以有這種想法，她說她擔心中國共產黨有民族主義傾向。當時我沒想到一個普通俄國人的這一疑慮會是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所抱的猜疑態度的結果。

對於蘇聯人在中國流露出來的民族主義——大國沙文主義傾向，我倒深有體驗。一九四八年冬瀋陽解放後，我們接收到三青團瀋陽市團部的一幢建築。那是日本人留下來的一幢高樓，地點位於市中心。我們把青年團市委設在這裡，同時在此建立了青年俱樂部。有一家電影院同這個建築相連，卻是蘇聯的財產。這年年底，蘇聯影片出口公司中國東北分公司的經理忽然提出要求，要中國政府把我們青年團的這幢建築交付他們作為公司的辦公樓使用。態度之蠻橫，令我們憤慨。我們理所當然地拒絕了這個無理要求。對方竟又向東北最高權力機構——中共中央東北局再次提出，非要樓房不可。此事竟驚動了東北局書記高崗，他指定東北團委書記韓天石出面和對方交涉，陳述理由，委婉勸說，才得到對方同意接收了另一幢樓房。

倘若這些俄國人不是把自己看作中國的征服者，怎麼會如此蠻不講理呢？

我們抵達莫斯科，住在大都會大飯店，又見到一件奇事：國民黨政府駐莫斯科大使館剛剛搬離。中央通訊社的辦公室就設在這家飯店裡，兩天前才撤走。此時距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

已只有兩個多月時間了。

大約是鑑於尚無正式邦交的關係吧，對於我們——新中國派出的第一個代表團，蘇聯官方竟沒有派任何人前來接待。我只見到兩位青年中文翻譯——後來成為我好友的L·德柳辛和另一位翻譯索羅金後來都成為有名的漢學家。

我們乘火車一入匈牙利境內，便被一團節日般歡慶的氣氛包圍起來。每個車站上，都有載歌載舞的盛裝少女歡迎我們。布達佩斯更是迷人——對於剛剛走出戰火和貧困村莊的這些中國人，簡直如入仙境。處處是歌聲，處處是鮮花和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人。黑髮、黑眼睛但皮膚皙白的匈牙利姑娘對中國人分外熱情，自稱「我們的祖先曾是鄰居」。

每個日夜都在如醉如痴的氣氛中度過。在電車站上，一位美麗動人的匈牙利少女會過來約我星期六在這個地點見面。看藝術演出時，樓上的少女們會頻頻地扔紙團挑逗我。甚至走過街頭咖啡館時，竟有一位青年女工要求我吻她。一個長期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環境，又受到嚴格的黨規訓練的中國人，自然會手足無措。我面對那位女士，老半天拿不定主意應該吻她什麼地方，最後草草吻了一下她的額頭便跑掉了。

一天晚上在一家飯店裡隨意活動，有兩男兩女坐在我的對面。當時我的英語水平已使我能聽懂那兩個意大利男子請兩位匈牙利女郎陪他們到附近的樹林裡去遊玩。孔夫子（雖然我未讀完過他任何一本書）的教導提醒我：那兩個男人一定不懷好意！這兩個女孩轉眼便會喪失貞操。這還得了！我不能袖手旁觀，於是我設法把一位女郎叫到一邊，用英語勸告她：「千萬不能到樹林裡

去，那是很危險的。」

狂歡中，我尚未失去政治警覺。在電車中偶遇兩位女郎，瘦瘦高高，都很漂亮。我同她們搭訕幾句，發現原來是美國人，還是記者！心想多半是以記者身分偽裝的中央情報局特務，便匆匆走開了。

政治也會在我不喜歡它打擾的時候闖到我身邊來。兩位操俄語的匈牙利翻譯，常和我打交道。二人都不隱瞞他們都是黨員。令我驚奇的是那位戴深度眼鏡的女翻譯私下對我說：「當心那人，他是鐵托的奸細！」第二天，那位男翻譯又對我說：「小心那女人，她和南斯拉夫有關係！」那位女郎好像有責任保護我的安全，常陪我外出。一個晚上，我被安排到一個區的俱樂部參加舞會。我一入場便受到一群匈牙利女孩子的包圍，都要和我跳舞。這時女翻譯忽然拉住我往場外跑，口口聲聲說：「這裡很危險！很危險！」我不願意走，使勁掙扎，但還是拗不過她，一場舞都沒跳，被拖走了。我只能暗暗罵她。這一生中，我再也沒遇到過那樣的美女如雲並且以我為中心的場面。

在集體去巴拉頓湖遊覽途中，我們在一家飯店小憩。一位自稱是保加利亞記者的女人過來和我寒暄，還請我到她房間，贈我一些保加利亞香煙。爲了這件小事，女翻譯一路上不停地批評我缺乏警惕，她認定那個保加利亞女人又是鐵托的特務。

我不相信鐵托會有那麼多奸細和特務在匈牙利活動，尤其不可能的是說別人是特務的這兩名派到中國代表團的翻譯也都是特務。我只覺得這種神經過敏很可笑，卻沒有去想過這種狀況將給這個美麗的國家造成什麼後果。

的確，現在回想起來，匈牙利依然是我去過的所有國家中最可愛的一個。也許這是因為我在匈牙利第一次看到歐洲文化。布達佩斯的建築和街道，多瑙河兩岸的景色，特別是匈牙利人，他們的文明和優雅舉止（連士兵都顯得溫文爾雅），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蘇聯也派出一個很大的代表團和藝術團到布達佩斯來。蘇聯人十分謹慎，每晚演出後，立即集體乘大轎車返回住處。那裡整天鐵門緊閉，不見有人出入。相比之下，中國代表團則自由、隨便得多。除指定分別參加的活動外，我們的個人活動完全是自由的。這是一個特殊時期，國內戰爭已基本結束，人民共和國尚未成立，因而以後出國代表團將要規定的那些紀律還沒有制定。異國風光和聯歡節的氣氛又是那樣新奇動人。這樣，我們精神上便鬆懈下來，享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以後也不會再有一種自由。一向受到傳統禮教和政治紀律約束的規矩矩的中國人，這個時期都多多少少成了浪漫主義者。我和幾位青年人竟和外國女孩子交了朋友。但中國古老的傳統並沒有放鬆我，以致使我丟了醜。我結識了保加利亞姑娘安娜，我們時常一起到多瑙河畔的露天舞廳，她糾正我的舞步，一起跳「藍色的多瑙河」。她帶著我手拉手到山上散步。她教我唱一支十分動人的抒情歌曲。如此而已，我始終彬彬有禮。直到她第二天要回國，晚上臨分手時，我忽然覺得應該補一個什麼課，於是向她鄭重建議：我們親吻一下吧？她有些意外，但還是同意了。我把自己的嘴唇輕輕在她嘴上貼了一下，以爲這便完成了接吻。她當時沒有笑我。但是後來她在信中連連嘲弄我說：我終於領教了中國人是怎樣談戀愛的！我心中也有些難過，因為我給中國人丟了醜——中華民族在這方面是技冠全球呀！

我們一行人，從匈牙利回國途經莫斯科，少事停留。十月一日在這裡，我們度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國慶。

我是在城市裡、並且是在一個俄國化的城市裡長大的，因而莫斯科不過是放大的哈爾濱。但是我們一行人中有將近一百人是從延安老解放區來的演員，其中一些人連中國的大城市也沒進過，莫斯科的一切在他們眼裡就新奇得很，甚至覺得和紐約與倫敦相差無幾了。

在以後的三十年裡，蘇聯在中國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帶有雙重意義：它既是社會主義「老大哥」，又兼具西方文明代表的身分。中國傳統文化（包括中國共產黨的傳統）與西方文化之間的矛盾，竟在兩個被稱為「共產國家」之間的關係上顯現出來。

有幾個晚上，我們被蘇聯人招待到莫斯科大劇院去觀賞芭蕾舞和歌劇。第一場是「天鵝湖」。衆人觀罷這場芭蕾舞，一回到旅館，我就聽到延安來的幹部和演員們議論紛紛，不能理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怎能允許這種藝術存在！「這純粹是資產階級的貨色嘛！」一位老黨員說，「這種作品毫無政治意義，它能給觀衆帶來什麼益處？」很多人同意這個觀點。說起那麼多女演員赤裸著大腿（有些人看不清她們穿著肉色的長褲），他們臉上還露出厭惡的表情。我在一旁沒有說話，雖然對於「天鵝湖」竟引起這麼強烈的憎惡，頗感意外。

一年以後，當我作為新中國派出的第一個代表團——中國青年代表團的譯員又一次來到蘇聯，在一次地方共青團領導幹部舉辦的宴會上聽到一位團市委書記竟當著中國客人講起一個「葷笑話」時，不免吃驚了：一個男人患陽痿，有人出主意叫他借一個擠奶器來，一裝上去果然有效，夫婦大喜不止。不料那擠奶器一發動起來，就不再停止，也卸不下來……

在中國，這種笑話不計其數，但只能在私下，在最好的男人中講。這一次，中國客人並未怪罪這位主人，把這件事看做兩個民族性格上的差異，一笑置之。然而我們決不會在這一點上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

這時我已經注意到：在中國流傳甚廣的蘇聯作家K·西蒙諾夫的小說《日日夜夜》中，有在戰火紛飛中軍官和女護士談戀愛的描寫。另一部獲得斯大林獎金的小說《考驗》裡，寫到戰爭初期一家莫斯科的大機械製造工廠向烏拉爾一帶轉移途中，廠長和女秘書竟在一起睡了覺。在中國，這種事本身就是不能允許的，更不能准許在文學作品中去描寫。

然而中國人對這種事的好奇心，卻比蘇聯人更強。當一九五〇年西蒙諾夫帶著一位女秘書到中國旅行（後來他寫了一部關於新中國的紀實影片）時，我聽到一個中國人對我說：「那女秘書是西蒙諾夫的姘頭！」我心想，這也許是可能的，可是你親眼見到他們睡覺了嗎？

從一九五〇年起，隨著朝鮮戰爭的開始，中國關上了大門，從此與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足足隔絕了二十二年。這種隔絕，還包括西方以往的文化在內。

中國和蘇聯之間人員的交往，也遠不如現在和美國之間的交往這樣頻繁。那些年，出國被看作是一種難得的幸運。

我的俄語主要是從書本上學來的。到一九四九年，我的聽力和口語能力仍然很差。但由於缺乏翻譯人才，也由於我是個黨員，「政治上可靠」，因而我就得到了比那些俄語比我好得多的人更多的去蘇聯和在國內陪同蘇聯代表團的機會。

我曾去蘇聯四次。我曾長期自費訂閱蘇聯的《文學報》和蘇聯最有影響的文學刊物《新世界》。每個星期，我都從北京國際書店買回一批蘇聯出版的小說和文學評論書籍。然而到一九五六年為止，我對蘇聯國內真實的政治情況幾乎一無所知。對於蘇聯農村的真實情況，直到一九七八年我才真正了解。

在我和蘇聯的關係上，驗證了一個真理：一種虛偽的意識形態是很可怕的，它可以使一個人有意地不去追究事情的真實情況，情願受騙和自己欺騙自己。

從童年起，父親就把一個思想深深植入我的腦海：十月革命後的俄國是人類的一個理想世界；列寧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自幼對於俄國十九世紀文學的愛戀，通過它對於俄國人民產生的感情，以及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篤信，也助長了我對於蘇聯和蘇俄共產黨的崇拜。

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獲知相反的情況。我十五歲時就讀過安德烈·紀德訪蘇紀行一書的日譯本。他對於蘇聯共產黨限制新聞自由，報紙上只寫它認為應該告訴人民的事情非常不滿。記得我對這個事實本身，和紀德的態度是一致的，因為日本人的報紙就是這樣嘛。但是紀德說的卻是蘇聯！帝國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無不攻擊詆譭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安德烈·紀德這樣一寫，他就是反蘇，和社會主義的敵人站到一起去了。即使社會主義身上真有一點瘡疤，那瘡疤也並不那麼可厭。

其實，第一次進入蘇聯境內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窮困，還伴隨著對於中國人的並不友好。然而我能自然而然地替每一個跟自己原先的設想不一致的現象，找到有利於蘇聯宣傳家的解釋。第一次晚餐收了我們昂貴的費用，因為我們僅是過境，並非蘇聯邀請的客人。當我們在西伯利亞

鐵路列車的餐車中大吃黃油和雞蛋，而許多蘇聯人被攔在緊緊鎖閉的餐車門外，我並不去想這是因為他們不能分享我們這樣豐盛的早餐，而是因為我們是蘇聯的客人，主人要維護我們的安寧。後來發現輕工業品短缺，食品供不應求，便認為那是不久前結束的戰爭造成的了。

然而我也不是完全沒有看到蘇聯社會的真正的弊端。無論是那些和我們朝夕相處、十分親密的俄國青年翻譯，或是在車站上向我們頻頻表示友好的男女公民，為什麼臨別時都不給我們留下自己的住址呢？是不是擔心同外國人通信會帶來什麼風險？蘇聯人習以為常的那種只有一個候選人的選舉制度，甚至於使我覺得荒唐可笑。一九五〇年冬季在諾沃西比爾斯克的一次奇遇幾乎把一個了解斯大林一九三八大屠殺真相的線索送到我眼前——一個早晨，和我們代表團住在同一個公寓的一位老婦人非要拉我到她家中去坐坐不可。她拿出一本像冊，給我看幾張軍人的已經發黃的照片。她特別指給我看其中的一位，說這位將領如何英勇幹練，卓有功勳，是她丈夫的好友，但不幸被殺害了，而他是完全無辜的。原來他就是圖哈切夫斯基將軍！我們一九五六年才從赫魯曉夫的報告中證實他的悲慘遭遇。

雖然那位老婦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她的神經質和嘮嘮叨叨，但我並不懷疑她說的事是真的，我甚至奇怪她何以這樣大膽，敢把這樣犯禁的事告訴一個外國人。不過儘管如此，我仍然把它看做一件個別的冤案，因為我不可能相信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裡會發生罪惡滔天的大屠殺。

一九五四年春天，我作為隨同中國政府代表團的記者團的一員，到瑞士採訪討論印度支那問題的國際會議。

一下飛機，便在機場上張貼的報紙上見到一條大字標題的消息：蘇聯駐澳大利亞使館的一個名叫彼德洛夫的官員叛逃，投奔西方。報紙上還刊有彼得洛夫用來從事間諜活動的工具的照片——一個裝有照相機的煙盒等等。我不經思索地認定：這一定是捏造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官員不可能叛逃！因而那個煙盒等等自然也是騙人的把戲。

這一年我已經二十九歲，而當我十幾歲時，卻曾經對於一九三九年蘇聯軍隊侵入芬蘭一舉的正義性發生過很深的懷疑。那懷疑會令我十分苦惱：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怎麼可以欺凌一個小國呢？我久思而不得其解，憋得不行，就把這個問題拿來向一個陌生的二十幾歲的大學畢業生求教，使他吃了一驚——一個小孩子怎麼會思索這樣嚴肅的政治問題！

現在，經過十幾年黨的教育，我竟不再懷疑我頭腦中的教條，而不肯相信確鑿的事實了。

從日內瓦街頭，可以明顯地看到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富足和穩定。然而我並不羨慕這個國家，我認定這是它幸運地享有長達二百年的和平並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得到好處和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的結果。

我對於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卻並不全是來自教條。我的祖國雖然尚未擺脫窮困，但它的經濟和文化卻正在欣欣向榮地發展之中。四十餘年後的今天，我仍然相信，如果毛澤東不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兩次發狂，中國絕不會是一個今天這樣窮困和落後並且危機四伏的國家。然而話說回來，畢竟是中國人民允許甚至歡迎過毛澤東把他們一步步引向一個又一個災難！

五月一日，當我在明媚的陽光下觀望瑞士的工人們在日內瓦街頭懶洋洋地為慶祝國際勞動節而遊行時，我心中充滿了憂愁。人是這樣地少！稀稀疏疏的隊伍，不喊口號，沒有歌聲，哪裡像

個無產階級的樣子！

當我二十八年後又一次來到資本主義世界時，中國和西方世界都已面目全非了。

一九八二年八月底，我和朱洪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土地。我曾去過日本、瑞士，但見識一個最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卻是初次。

當我們的飛機在舊金山機場降落時，我回頭一望：驚訝地看到有兩架客機尾隨在後，將同時降落。在機艙右側我看到一幢小小的舊建築，上面有「一九三四」字樣，想必是四十八年前這個機場的主要建築了。看來，相當於中國南京市機場現在的規模。

在候機室等行李時，我有意觀察了這裡究竟有多少登機入口，來不及數完，我數到九十幾個，已足夠使我吃驚了。

然而就在舊金山，中國領事館門前昨夜又有一起中國留學生遭到搶劫。這種事情已發生多起；以致警察不得不把一輛警車經常停在領事館門外。

這是美籍華人女作家聶華苓和詩人保爾·安格爾對我的第四次邀請。我在中國第一次見到保爾時，立即出現一個念頭：一個地道的美國人！這次長時間相聚，美國普通人性格中那些最可愛的東西，我在保爾身上都看到了，尤其是真誠。華苓的曲折而痛苦的經歷，並沒有消蝕她作為一個藝術家所不可缺少的天真和對人民的赤子之情，同時具備著中國女性的溫柔與堅韌。事業中的艱難並未使她退縮。她通過每年邀請的中國作家對於促進中國的進步所起的作用，可惜尚未被人充分地理解。

中國幾十年來對於美國的宣傳，無非是經濟危機、失業、犯罪和種族歧視。現在人們或多或少已經從這種偏見中解脫出來了。然而對於美國半個世紀以來經歷的變化，它的富裕和自由以及它所難以擺脫的真正的問題，還遠遠沒有足夠的了解。

我應該幫助中國人了解真實的美國，但我尤其應該讓我的同胞透過美國更深刻地了解中國。直接報導中國的實情，束縛越來越緊。然而美國幾十年來的變遷和它的現狀，不是有很多事情可以給中國人以啓示嗎？我借題發揮，我的對手就不易抓到什麼把柄了。

於是我便忘記了朋友們臨行前的叮囑：在美國輕鬆一下，把身體弄好。「五月花」公寓樓下室內游泳池終日開放，但我的游泳衣始終是乾的。我從未體驗過的蒸汽浴「三溫暖」樓下也有，我也竟一次也未去嘗試。最使我後悔不已的是此次到美國四個月，只看了三部電影。

沒有車子出去買報，見到公寓裡很多人把報紙隨處亂扔，我便把別人讀過的報拿來，剪下我可能有用的材料，每每搞到深夜。

我極感興趣地發現，這個國家在很多方面都處於同中國相反的另一個極端。上帝給了美國人以廣闊的生存空間、充足的資源與良好的氣候；中國人則受到了虧待，又由於大量的人口繁殖、頻繁的戰爭和三十餘年來的盲目破壞，使自己的生存條件越來越壞。在美國的孩子和學生悠哉遊哉地享有過多的自由；中國人則從小學生起就受到家庭與學校的嚴格管束，必須受更多的訓斥，做更多的功課，假期也只及美國學生的一半。美國人有很多政治自由，卻並不怎麼珍惜，其政治制度又限制了這種自由——世界上很難找到這樣高價競選出來的參議員和總統；中國人則為獲取這種自由前仆後繼一百餘年，至今連能否依自己意願選舉一個村長還是個問題。酗酒在美國成為

屢禁不止的大害；中國人唯獨在這方面享有更大的自由，卻很少有人酗酒。美國人在自己住宅的四壁之中享有私生活的充分不受干擾的權利，但苦於孤獨和空虛；中國人的語言裡連 Privacy 這個詞都沒有，很少有人會感到寂寞。美國政府高官和社會名流的隱私，美國記者可以隨意揭露；在中國，恰恰是這一類人的隱私受到最大的保護。美國人生活中沒有政治口號和任何「基本原則」，卻也能維持穩定和發展；中國人則必須生活在幾個「念念不忘」或「基本原則」的指導下，還要為「安定團結」傷很多腦筋。美國老百姓和政府打官司一般是老百姓贏；中國人則連和本單位「組織」發生糾紛時都經常是輸方。中國人以為只要有了充分的自由和富足，人們就一定會生活得更幸福，人的精神素質也會不斷提高；美國的實際卻並不如此。中國人最難理解的大約是美國的吸毒、虐待兒童和在兩性關係相當自由的狀況下為什麼強姦罪仍這樣多……

特別有趣的是：和中國「左」派持相同立場的政治力量，在美國卻被稱為右派或極右；中國被共產黨稱為右派的人，在美國卻是左派或自由派。在道德（如兩性關係）問題上和文化問題上，中國的「左」派和美國的右派簡直可以組成一個政黨。

因為時間太短，見聞畢竟有限，除報刊上的材料外，我還要借助長期僑居美國的華人的體驗。在去東海岸旅行之前，我特別擬了一個我最想了解的一些問題的提綱，事先寄給我將要會見的人，請他們在我拜會的時候可以有以教我。

歸國前我陸續寄走二十六箱書、報和資料。關於美國的書我看得越多，越覺得對美國社會的了解不夠深透，因而越是不敢輕易下筆。加以國內的事情鋪天蓋地而來，終於未能按原先的願望寫成一本書，只發表了幾篇文章。



第十七章

艱難的職業

《人民日報》像蘇聯的《真理報》一樣，是全國輿論機關的最高權威。但由於中國共產黨對於意識形態的重視和對於統一全國人民思想的要求，比蘇聯共產黨又高出一籌，《人民日報》在中國的地位就更加重要。很多人認為這家報紙上的每篇文章甚至每句話都代表中共中央的意志。文章在報紙上的位置、標題字號的大小、中央領導人姓名排列的順序或在報紙上出現的次數，都常常是許多幹部用以揣測政治動向的依據。

一九七八年以後，當各省的黨報和北京的其他報紙都基本上保持歷來的面孔，官氣十足，四平八穩，似乎有意拒讀者於千里之外時，《人民日報》獨樹一幟地有了很大變化。它成了黨內改革派的號角，對於排除種種阻力，貫徹鄧小平的改革路線起了至為重要的作用。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〇年，是《人民日報》的黃金時代。像中國其他領域的情況一樣，並無明令新聞自由可以擴大，而實際上《人民日報》卻大大改變了一九五八年以來中國新聞界只能做官方的傳聲筒和一味粉飾太平的狀態，使自己享有的自由比其他同是黨報的報紙擴大了許多。這一方面和當時北京的政治形勢較好、胡耀邦的地位比較穩定有關，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於當時的社長兼總編輯胡績偉、副總編輯、哲學家王若水和報社編輯部許多人有較大的道德勇氣，敢於承擔風險。

即使在那三年，《人民日報》也常常遭到保守派的箝制與攻擊；有時不能發表自己認為需要發表的文章，又不得不發表不該發表的文章。有時，一篇明明受到讀者廣泛歡迎、政治效果也很有利的文章，也會招來中央某些權威人士的強烈指責。

一九七九年新疆石河子發生了一起兇殺案。在一個軍墾農場裡，青年女子蔣愛珍遭到一些人

誹謗，散佈謠言說她和一名男子有不正当的性關係。她四處求助、控告無效，激憤之下便拿起民兵的步槍，打死幾名造謠中傷她的人。《人民日報》就此發表了一篇報導，題為《蔣愛珍為什麼殺人？》，頓時引起全國熱烈反響，收到一萬多封來信，創報紙歷史的最高紀錄。各地讀者以種種方式給蔣愛珍以同情和支援，向陳腐的、不能保護公民權利的政治制度提出抗議。這強大的浪潮阻止了當地法院按常規判蔣愛珍死刑，經過長時間折衝，一九八六年最終判了她十五年徒刑。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同情一名故意殺人犯呢？這本來是一個值得特別重視的事件，但官方某些權威人士卻不予理睬，反過來責難《人民日報》，指責那篇報導是「提倡殺人」！完全不顧報紙的動機和良好的效果。

編輯部時常接到來自權威人士的電話，對一篇報導甚至一首詩、一句話嚴加責難。

一九八〇年初，迎合黨內保守派，借政治氣氛突變之機，一位共青團中央書記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竟發表長篇演說，從頭到尾攻擊《人民日報》。

這位工人、勞動模範出身的政治家，從六十年代起就受到胡耀邦賞識，也是經胡提擢，方當上團中央書記和人大常委的。而一九八〇年初，正是胡耀邦和他所支持的《人民日報》在黨內保守派攻擊下處境艱難之時，此人何以出此一舉呢？我驚異不解。從此，這個人物就成了我注意的目標。他在以後數年中繼續走紅，名震全國。到一九八六年夏季，他又以一次關於文藝問題的開明的講話受到萬里的高度讚賞，又由萬里推荐給鄧小平，鄧小平也很賞識他。但幾個月後，善於審時度勢和揣摩最高領導人意圖的他，又以對本市學生運動採取「鐵拳」政策而得到鄧小平的青睞。那時，其他城市的領導人卻都因對學生手軟而受到責難。於是，一九八七年反對「資產階級

自由化」運動之後，此人便躍入中共權力的頂峰。

《人民日報》編委會仍然沒有屈服於這種壓力。胡績偉在應對那位已經並不年輕的共青團書記的指責的信件中，只承認《蔣愛珍為什麼殺人》一文的標題或有不妥，但接下來就以嘲弄的口吻寫道：「令我們深感驚訝的是：一位團中央書記竟然反對人民日報宣傳張志新的英雄事蹟！」女烈士張志新一九七九年以來已成爲全中國青年敬佩的英雄，團中央也提倡過青年人要向張志新學習。

但是進入一九八一年以後，隨著黨內保守派在意識形態領域發起反攻——在批判作家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的同時，又一次舉起「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大旗，《人民日報》的境況便愈益艱難了。

這年夏天，中共中央宣傳部下達的一個文件作了規定：今後報紙上的批評揭露性報導，須經（被批評與揭露的單位或個人的）上級黨委審閱批准，並經被批評者本人過目，始能見報。

事實上是在這個規定以前，各省、市黨報上也從來很少見到批評揭露性報導，即使《人民日報》駐外省的記者，願意寫這種報導的人也只有少數幾人，而他們卻不斷接到恫嚇性電話和信件，有一位記者的孩子甚至遭到毆打。

這就是說，如果共產黨中央認爲報紙不應只是歌功頌德，還應該使公衆了解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況（而不是仍然像一九五八——七八年那樣蒙蔽他們），並使報紙成爲克服黨風腐敗、制止黨政官員濫用權力謀取私利和欺壓公民的武器的話，它今天應該做的就不是進一步限制記者和報紙的自由，而是擴大新聞自由。

然而，這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卻仍然一再表示黨風必須整頓，因為那是一個執政黨的生死存亡所繫！

我此時並不懷疑它的誠意，並且深知消除黨內的腐敗現象絕非易事，因而更加不能理解：既然如此，為什麼對於貪官污吏最懼怕（其他制約已不起多大作用了）的報紙上的公開批評，不是鼓勵而是施加限制呢？

那個文件還寫道：近來文藝作品中以五七年反右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為題材的多了起來，「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以後還是少寫為佳。對於中宣部那個文件，我的感覺是：我本來就被繩索捆住了手脚，現在又被勒緊了喉嚨。

這時，我已被中國社會一個巨大的浪潮推入一種特殊的境地。

各地讀者越來越多的人在尋找我的作品。一本刊物只要目錄上有我的名字，很快就會脫銷。我的幾本書，由於中國的特殊出版制度，每本只能印一、二萬冊，不出一周就賣光。我的讀者遍及各個階層和各種年齡層次。他們常常靠傳閱或複製才能讀到我的文章。黨內的腐敗和社會上危機在繼續發展，而能夠對這類現象給以揭露、分析和抨擊的人卻越來越少。這就使全社會，首先是關心中國命運並意欲獻身於變革的人和受到不法官僚欺壓迫害的人，把期望集中到我的身上。我每天平均收到二十幾封信件。每天到《人民日報》傳達室找我的人，大約有十六、七個。為了不使我負擔過重，人們不輕易把我家的地址告訴來訪者。

仍然有接待不完的客人找上門來。時常是我早上尚未起床，門外已有人等候。中午歸來，樓

梯上坐著兩位。晚上我剛剛端起飯碗，敲門聲又打斷了我的晚餐。

只要我在北京，傾聽來客的談話並記錄下來，便是我生活的主要內容。一個人的傾訴，常常會打開一面窗子，使我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世界。我足不出戶，便可以經常保持對許多省份現狀的了解。有些人的充滿戲劇性事件的經歷，常使我驚嘆：簡直超出小說家的想像！我開初以為坐聽別人敘述是件輕鬆的事，後來發覺它竟也很累人——我常常受到談話內容的震撼——驚奇，憤慨和同情一起向我襲來；我常和對方一起發愁和一起研討如何擺脫苦境；我又有一個作詳細記錄的習慣……

柴樹珍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每隔一段時間就拄著拐，艱難地爬上我的樓層。她四十多歲了，尚未結婚。當她十六歲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造紙廠當女工時，第一次遭到侮辱——一個科長對她使用暴力，企圖強姦。不久，她向之求助的另一個幹部又企圖強行姦污她。她四處投訴的結果，是招來殘酷的打擊報復——從道德上和政治上公開詆譭，利用政治運動之機殘酷批鬥。文革中誣她反對「中央文革小組」，文革後又誣她為「四人幫」爪牙，逮捕她並投入水牢，她的下肢和視力就是這時被毀壞的。

年近五十的鄧明遠是另一種犧牲。一九五五年他剛從技校畢業，因揭發遼寧省一家林場場長貪污，被扭送精神病院。那場長的罪行後來被證實，被判刑十五年，而這個罪犯刑滿恢復自由之後多年，鄧明遠卻還不能恢復正常人身分。中央林業部部長親自干預，還不能去掉他「精神病患者」的帽子，至今不能成家，不能得到正常工作的權利。他流落北京街頭，餐風露宿已經多年。為了維持生存，他先是扛著一套設備給人們的T恤或背心上印字或圖案，現在又學會了微雕。只

用幾秒鐘，他就把我的姓名刻到一支鋼筆上，字體清秀工整。

滕天羽又屬於另一種類型。一九四七年他是記者，在蘇北《鹽阜日報》發表一篇不出三百字的報導，揭露一個縣委書記貪吞農民的土改果實（地主的浮財）。事隔幾天，那人就到滕的家鄉捏造罪名槍斃了滕的父親，一位政治上開明、為共產黨工作的教師。將近四十年間，滕蒐集了許多人的證言，證實其父無罪，那起槍殺純是出於政治報復。他不斷控告，結果是罪犯的官職節節上升，而滕天羽卻不斷受到陷害，直至被剝奪工作的權利。

找我者並不都是歷史上的受害者。幾乎所有各種性質的歷史陳案，還都在眼前重複發生，甚至有一定地位、因而理應受到更多保障的人身上，也在發生。全國人大常委委員，黨的市委書記，軍內擔任高級職位的老幹部，在省級黨報頭版頭條上受過表彰的先進人物，也無力在他們反對過的壞人面前保護自己，有的失去職位，有的被陷害和開除黨籍，有的連人身安全都不得保障。

帶有嘲弄意味的是：許多人正是因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教導、主張或指示而行動，或為保護國家財產，或為忠於職守，或為推行改革而觸怒了那些損害社會和黨的利益的人而受到迫害的，而共產黨的政府、法院或黨紀機關卻無力或無意給他們以保護。

來找我的並不都是求援的受害者。有很多是來自各省的仁人志士，出於憂國憂民的胸懷，找我共商改造中國的大計。貴州省貴陽市一位青年數學家蔣光棣，曾從北京很遠的地方拖著一條殘腿，接連找我四次，我都不在。想到他以病殘之軀每次都要在路上輾轉跋涉數小時，我很覺內疚，便特地約好時間相會。

「我們想向黨中央提出一個建議，」他代表貴州省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說，「從一九七七年到

一九七九年考入大學的青年人，對國家特別寶貴。他們當年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經歷過狂熱、失望、反省、覺醒（有的還受過迫害）的整個過程，又大都在農村、工廠或軍隊磨練過，可以說是十幾年在中國社會底層摸爬滾打過來的，體驗和認識了很多東西。他們痛恨極左路線，對改革有很高的熱忱，年紀雖輕但已相當成熟，是一支很可貴的力量。若是畢業以後就各奔東西，便會沈沒下去，很難有所作為。能否成立一個類似北伐革命期間的黃埔軍校那種學校，把每屆畢業生集中起來進行一番政治訓練，然後派往各地做為改革的骨幹力量呢？他們將會對抗保守派，把改革進行到底。」

他又謙卑地說：「也許這個設想太大，難以實現。我們還有退一步的想法：把一個地區或一個縣交給我們，讓我們按照三中全會精神在那裡率先地、不打折扣地推行改革，行不行？」

我相信，這兩個建議都是蔣和他的朋友們看到黨內保守派對改革的威脅，經過深思熟慮提出的方案。幾個月以後，我從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口中聽到和第一方案幾乎完全相同的設想。

蔣光棣的赤誠，令我受到鼓舞。以後很多年我還記得他的身影。我開始注意貴州省，逐漸了解到在那個邊遠而落後的省份裡，年輕人政治熱情特高。「這將是產生中國新一代政治家的地方」，我想。

我把蔣光棣寫好的建議轉送胡耀邦。二年以後收到蔣從貴州的來信，告訴我：胡耀邦把他的信批轉中共中央組織部，中組部又轉給貴州省委組織部。那裡的官員找蔣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座談了一次，從此便再無下文了。

我很難過。我想像得出蔣光棣將如何失望。但他這種人的存在，卻是我的希望所在。

黨內也常傳來令我振奮的信息，湖南省慈溪縣一位年輕人瘦削而挺拔的身影幾次出現在我面前。他是中共縣委宣傳部的幹部。他向我描繪的圖景是：全縣很多黨政部門，甚至包括公安局的局長，都熱切希望實現徹底的改革，一致反對保守和腐敗的縣委書記，卻硬是拿不掉他，只因他在地委有一個後台。他代表很多黨的幹部要求我用自己的筆助他們一臂之力。

我是一個很易被打動的人。他頭一次來我便應允了，但第三次來我還沒能踐約成行。他顯然是很失望，但並不放棄對我的期望。

河南省洛陽市的伊川縣，縣委宣傳部有三名大學畢業生（自然是黨員），不止一次聯名寫信來，告訴我們和縣委書記本身以及他包庇下的黑暗勢力進行艱難鬥爭的情況。那是名酒杜康的產地。縣委書記每年動用幾千瓶酒來討好和賄賂從地、省到中央的上級。改革已進行四年，那裡的農民見到記者下來，還會圍住吉普車，跪倒在塵埃，苦苦哀求記者幫他們解除基層官員的勒索和壓迫。寫信的三位知識分子甘冒風險，和縣委書記堅持不懈地鬥爭了幾年——給報紙寫稿公開揭露、給「內參」寫稿報知上級，竟然一概無效，最終一一被調出縣委。而縣委書記卻榮升到地委，包庇他的一個地委書記則到省委榮任要職去了。

這些消息，自然會令人沮喪，但我也從中看到可喜的變化：在六十年代，黨委機關內部下級幹部敢於如此公開而持久地反抗腐敗的上級，是不可想像的。

我很想到伊川去。我寫的將不會是一篇純暴露性的報導，那三位知識分子難道不是正面人物，可以鼓舞黨內外人士起來為清除黨內腐朽勢力而鬥爭嗎？

然而我又沒有去成。精力和時間有限，並不是主要原因。那兩處的地委和省委是不會同意我

發表這樣的報導的。發表後也會招來「破壞安定團結」的指控。

我長期為一個疑問所困擾：為什麼越是受到讀者普遍歡迎的報導，上邊越是不滿呢？為什麼當《人民日報》銷行七百萬份時，他們指責不休，而當降到三百多萬份時，他們反而滿意和表揚這張報紙呢？

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曾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新聞工作者因批評性稿件而被定為右派。二十餘年來中國大地上進行的無聲的、然而都是充滿血和淚的辯論，難道還不足以證明一九五八年以來的一場又一場災難並非由於報紙上暴露黑暗太多而是由於掩飾了一切錯誤與問題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報紙上充滿關於光明的謊言與虛誇，而正是這個時期，中國走向無邊的黑暗！

在反覆的思索中，我發現：一九七九年三中全會提出「撥亂反正」以來，經濟領域從理論到實踐都有了很大改變，文學創作也突破了一九四九年以來一個又一個禁區，新聞工作則根本沒有任何變動——從理論到政策，一切依舊，對於一九四九——一九七八年新聞史上的是非，沒有進行過任何的回顧與清算。

不能排除這裡有認識上的問題。年邁的領導人仍然把報紙看成自己發號施令，用一個口號、一種思想或一種政策把全國人民統一到一個意念或一種行動中去的工具。他們不認為「國家的主人公」有必要、有權利了解哪怕是一部分重要信息，參與哪怕是一小部分政治和決策。他們自己當然需要了解全國情況，但那可以通過多種「內參」來解決。不過由於那些老朽的人不愛聽不愉

快的消息，進入八十年代以來「內參」上關於黨內和社會上各種危機的信息也越來越少了。

從根本上說，這是由於他們不相信人民，同時又對自己的統治缺乏自信。我曾利用多種機會表明：人民並不是一看到壞消息就驚慌失望、失去對未來的信心的，相反，我的讀者除個別例外，幾乎所有人在來信中都寫道：「讀了你的作品，我感到振奮，看到戰勝黑暗的希望。」然而老年人卻持不同看法，依然認為維持和加強人民對黨和對未來的信心最好的辦法還是盡量多講成績，讓整個報紙充滿光明。

我越來越看出問題不僅在於認識，甚至首先不在於認識。不然，當報紙上出現關於里根總統的兒子排隊申請就業和意大利總統夫婦生活如何儉樸等等時，為什麼他們那樣敏感，責難報紙總編輯：「你們發這些報導是什麼意思」呢？

有整整三年時間，我不能在《人民日報》上發出我認為最需要發表的任何一篇報導。我仍然可以在文學刊物上發一些報告文學，但也必須小心謹慎。

作為《人民日報》的記者，這三年我只能寫「正面報導」。經濟改革的成就和它給數以千萬計的人民從生活方式到人際關係造成的變化，我也願意去寫，並也確寫了不少。但我從四面八方獲得的信息，都呼喚著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對於黨本身的改造。因而我的注意力始終集中在中國政治生活的弊端方面。當報紙的八個版每天向人民傳送喜報時，我認為自己的使命越發是要把社會上和黨內愈益加深的危機報告給人民。

然而我卻只能寫光明與成績，於是我就想方設法在這種正面報導中透露一點反面的信息。寫遼寧省的改革者的成績，我同時寫他遇到的保守勢力的對抗。寫江蘇省縣和市裡整頓黨風，開頭

和結尾我寫成績，中間部份我一定要寫取得這成績要遇到多少艱難，同時告訴讀者還有哪些事至今未能解決。寫黨中央號召全國人民學習的先進人物朱伯儒，我不像有些報刊那樣只寫他如何行善，扶危濟貧，而一定要寫他是在怎樣一種特殊的環境下行善的——黨風普遍敗壞，他無力改變，只能靠個人一點有限的力量做一些杯水車薪的好事。我特別寫明他兩次救人，都是在公社黨委門前，而那本應是共產黨任何一級組織的天職。

這樣，我就使朱伯儒不僅僅起到一個行善榜樣的作用，同時喚起人們注意這個黨今天也沒有多少改變；不醫治它的腐敗，縱有一萬個朱伯儒也解救不了中國人民的困境！有些上層人物很敏感，他們覺察出我的用意，說「這篇文章裡有刺」！的確有刺，然而它明明就長在生活裡面。寫出來才叫真實。

從一九八七年一月被開除出黨到一九八八年三月我出國為止，我隨時可能接到法院的傳票，出庭受審。這一小片陰影始終懸掛在我頭上。禍根自然是在「失實」——開除黨籍的決定中所寫的一條罪名「顛倒黑白，造謠中傷」上。

所謂「失實」，是從一九七九年我重返新聞界後始終跟蹤我的一個罪名。對於我的幾乎每一篇都引起爭議的作品，只有一篇由中宣部派出一組人進行了調查。那是一九八〇年夏季的事。四個人二十天中徵詢了贊成和反對《人妖之間》的上百人的意見，結論是：在非主要情節的細處，確有幾處出入。但作品的價值應予肯定，它的主要缺陷與其說是失實，毋寧說對於與王守信一案有關的主要問題上還未揭深揭透。「中共」黑龍江省委拒絕接受這個調查報告。報告中對省委也有

批評。但刪掉批評的詞句之後，它仍然不被接受，調查成果也就報廢了。

從《人妖之間》以來，我所寫的報告文學的命運，大抵如此。我不敢保證我寫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個細節都沒有任何差錯，但就基本事實而言，則我敢說是符合實情的。我曾做過一個比喻：一座大樓建成了，質量不錯，就是廁所裡掉了二塊瓷磚，難道就因此要把整座大樓推倒嗎？

固然，廁所裡一塊瓷磚也不掉，豈不更好？但是，在疾患纏身的中國社會，要查清與「黨的領導」有關的案件是極為艱難的。《人民日報》曾披露，河北省一個縣的一個局長貪污二千餘元公款。省委派出幾次調查組，先後竟有八百多人次提供偽證，硬說此人沒有貪污！一個單槍匹馬、權威遠低於省委調查組的記者，又將如何獲得絕對真實的情況？

事實上，大眾傳播媒介的失真問題，確實存在，而且不可謂不嚴重。虛誇成績，歪曲以致顛倒重大歷史事件的是非，最晚從一九五八年就開始了。中央和各省市的黨報報喜不報憂的問題，直至今日，從未改正過。我在講演中說過：這些報紙連全國或本地區的陰暗面的百分之都從來沒有披露過，這難道不是最大的不真實嗎？任何一家報紙都經不起這樣的質問。遠的不說，一九五八年以來你曾經發表過多少虛誇成績、甚至無中生有的正面報導？你又曾隱瞞過多少黨和各級官員的錯誤以及它們造成的災禍？吹噓和偽造成績的報導受到鼓勵、嘉獎或默許，是遍及全國的現實。甚至有明文規定的制度：一篇這類報導在一定級別的報紙上見報，作者就能立一次戰功。那些口口聲聲攻擊我「失實」的中共省委，沒有一個不是鼓勵或默許著它們本省的黨報上連篇累牘地誇大成績而隱瞞錯誤和問題。

我被開除出黨後全國各地刮起的翻案風，並不限於我本人所寫的報導。幾乎所有寫了這類報

導的記者，都遭到攻擊。

而在中國新聞界，願意寫這種報導的人雖然不少，真正能寫的卻只是極少數人。以我的估計，不會超過記者總數的二十分之一。

即使這樣，「左派」即保守派仍不放心。「反對自由化」運動的目標之一就是新聞界，說是要「理直氣壯地整頓報刊」！除必須封掉一批報刊外，還要整頓「新聞隊伍」，把帶有「自由化」傾向的記者和編輯統統從報社、電台、電視台和雜誌的編輯部清洗出去。

一九八二年七月我來到過中國的天然良港連雲港，那裡的朋友提醒我注意本地官員和居民的一個特點：感覺遲鈍，表情呆板。果然有同感。連雲港是隴海鐵路的東端，西通新疆，橫貫全部大陸，東臨大海，面對全世界，這些人何以會給人以木鈍之感呢？我明白了：長期閉關鎖國，使大海如同沙漠，原是聯繫外界的通道，反成了隔絕的屏障。一切等待「上邊」擺布的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的消失，又剝奪了人們主動去感覺外界和予以反應的必要。總之，生活的呆滯造成人們思維方式與精神狀態的呆滯。

同樣的情形發生在新聞記者身上。中國的政治制度把報紙的編輯和記者變成官員，他們也只能也須聆聽上級官員的指示，按照黨的需要和黨的思想去寫指定的題材，越是順從、越是對事關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幸與不幸的各種現象無動於衷和麻木不仁，在思想方式和表達方式上越是有私人特色越好。這就使記者的思維方式與生活方式無異於官員，以致從他們的神態和風度上，你都很難發現新聞記者的特色。

從八十年代第一年起，一些敏於感受和勇於直言的記者，常常在發表第一篇報導之後就遭到地方黨委的壓力而不能再寫下去，甚至不再能作記者了。這就使另一些記者不敢步其後塵。《黑龍江日報》後來甚至不得不在記者中指定專人去採寫點不違大忌的批評性報導，但被指定的記者的妻子得知此情，便到報社來鬧，不肯使全家人承擔風險。於是又不得不從經濟上給這種記者一點補償。

但是人畢竟是一種特殊生物，有時在囚籠裡也會有跳舞的欲望。沒有新聞自由，也要打扮一下自己的報紙的外貌，使它不那麼令人望而生厭。一些地方報紙就在欄目的增減、編排形式和標題的處理之類東西上搞「新聞改革」了。

《人民日報》記者部主任這時也忽生一念，提倡記者們寫「評論性新聞」，還把西方記者的這類作品拿來供大家觀摩。開會討論時，我很不耐煩，就發表了反對意見：「學習是可以的，但是做得到嗎？為什麼三十多年來我們的報紙上不見這種評論性新聞？這不是個形式和技巧的問題，是記者的地位以及由這種地位決定的精神狀態的問題。中國的記者寫什麼、不寫什麼自己不能決定，甚至怎麼寫也不能作主，為了一篇報導必須邁幾次衙門的門檻是常事。處處仰人鼻息，怎麼能有獨立思考指點江山、高談闊論的氣概？首先要改變這種『三孫子』似的地位，然後才能有『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激情和勇氣。」

幾年過去了，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中國報紙上果然就沒有出現過什麼評論性新聞。

大陸新聞工作者所處的這種卑微的、因而不能有所作為的地位已經貽誤了中國三代記者。很多人辛勤勞作一生，到白髮蒼蒼時仍然寫不出幾篇給讀者留下一點印象、對生活發生一點影響的

報導。還在五十年代，人們已經在議論「中國為什麼出不了名記者？」的問題。我為中國的老記者們很難編出一本略有一點價值的文集而難過。在一九四九——一九七八年的中國報紙上，有個記者能發出真正是自己的聲音？

現在，這樣的歷史還在被某些人人為地延長下去，怎不令人心焦？



第十八章

我和胡耀邦

從五十年代初期胡耀邦到共青團中央工作起，我就對他發生了興趣。他身上有一些他那個層次上的老幹部所缺少的東西。他勤奮好學，竭力使自己能夠博古通今；他愛思考，富於創造精神；他也重感情，有較多的人道主義精神。他靠自己的人格魅力，而不是靠資格老、地位高而獲得我們這些人的尊敬。

他正好比我年長十歲，我和他幾乎沒有什麼個人交往，但奇怪得很：三十幾年來在幾個重要時刻，他對於我的命運都發生過重要影響，而最後，我倆又幾乎同時遭到毀滅性的政治打擊。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和廿四日相繼傳出胡耀邦倒台和開除劉賓雁的這兩則新聞，都曾震動過中國和海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打倒的若不是這兩個人，它給中國人帶來的幻滅與失望，它給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形象造成的損害或許就會輕多了。

一九五三年胡耀邦到共青團中央擔任書記，帶來了一股清新的氣息。共青團工作開始突破戰爭和國內階級鬥爭時期沿襲下來的嚴肅、刻板的傳統作風。胡耀邦個人性情與作風中的特色——大膽潑辣，勇於進取和不拘一格的創新精神，感染了整個共青團工作。「青年突擊隊」、「共青團監督崗」等新的組織形式出現了。共青團更多地關心青年的生活和學習，而不是一味跟隨基層黨委抓運動、搞生產，文化娛樂活動也增加了。

我從《中國青年報》一九五一年創刊起，就提倡在報紙上開展公開批評，始終得不到支持。一九五六年胡耀邦提出「大表揚，大批評」的方針，這才使批評真正合法化。在他的支持之下，這一年《中國青年報》開始辦「辣椒」副刊，使諷刺性批評第一次在共產黨的報紙上集中出現，受到全國熱烈的歡迎。

但是胡耀邦畢竟不能擺脫強大的傳統與體制的制約，他不能不遷就來自中央和各省高級領導層的要求。「辣椒」創刊不久就遭到一些上、中層官員的強烈指責，於是「辣椒」不得不節節後退，變得越來越溫和了。一位讀者畫了一幅漫畫：一個賣菜的人問賣菜的人：有沒有不辣的辣椒？回答是：有，到《中國青年報》上去找！胡耀邦能保住「辣椒」不致停刊，卻無力使它辣起來。

這年秋天我到湖南採訪，寫了一篇批評湖南省委的稿件，發到《中國青年報》的內參上。我批評那個省委的院子大得驚人，辦公樓越建越多，而坐在裡面辦公的人對於下面情況的了解卻越來越少，問他們許多有關工業的問題都答不上來。令我意外的是不久就聽到胡耀邦對這篇稿件的嚴厲批評。我相信這不是他的本意，而是湖南省委書記提出抗議的結果。

他本人的意識和審美趣味中，也有一些戰爭時期生活帶來的局限。他剛來團中央不久，《中國青年報》上刊載了我翻譯的一首寫一個遠征到歐洲的蘇聯戰士思鄉的抒情歌曲，不久，聽到胡耀邦指責這首歌是「靡靡之音」，我很驚訝。後來他還對另一些抒情歌曲作過同樣的評價。我想：他大概除了進行曲以外，別的都看不上眼。

胡耀邦真正表現出他的本色，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前後。

反右派運動開始後不久，他已率代表團赴歐洲參加二年一度的世界青年聯歡節。返國時他一到新疆的烏魯木齊境內，立即打電話給主持運動的團中央一個書記羅毅，問他團中央各單位已打了多少右派？羅答曰：一百餘名。胡吃了一驚，立即告訴他暫時煞住，待他返京時再議。

六月初我從上海歸來不久，反右派運動剛剛開始，胡耀邦到《中國青年報》聽取人們對於團中央和他本人的批評。天氣很熱，二樓會議室坐得滿滿的，還有很多人聚集在兩個門外邊。這些

人中，大約除了社長兼總編輯張黎群以外，誰還都不知道毛澤東「引蛇出洞」的謀略，故發言還很踴躍，並且有些還相當激烈。

我坐在擁擠的人群之中。「我講不講呢？」心中有些猶豫，因為我已覺察到形勢有些不妙，並且預感到自身安全已受到一些威脅。坐在我旁邊的幾位同志一再慫恿我講，我便按捺不住了，於是站立起來。我先是根據我年初以來在幾個省份的觀察陳述了黨內特權階層和官僚主義之嚴重以及群眾中日益增強的不滿，指出這種情況孕育著的危險，繼之又表明了我對於這場反右派運動的憂慮和不理解。我說：

「前一段的鳴放，我以為基本上是健康的，它打破了長期以來的沉悶局面，人們敢說真話了。政治積極性高漲，心情也比較舒暢了。我擔心，中央會把批評帶來的危險估計過高，而對於官僚主義和特權終將使黨脫離群眾的危險估計不足。我擔心群眾的積極性會受到挫傷。」

整個會場屏息而聽。胡耀邦也始終看著我。這個會議室裡全是我相處多年的同志，我知道他們絕大部分都是同意我的觀點的。顯然，正如我近兩年來的作品和言論得到他們的同情並感染了他們一樣，我這時講話中愈益激烈的情緒也在他們心中喚起共鳴。雖然沒有一個人鼓掌，但我完全能夠體驗到他們的贊同。於是，我的情緒更加激昂起來，把批評的矛頭向胡耀邦指去了：

「你們不了解群眾。耀邦同志，你住在深宅大院裡，知道老百姓一個月吃幾兩油嗎？你知道豬肉和雞蛋漲到多少錢一斤了嗎？你不知道。你們也不了解我們，老是不放心，怕知識分子造反。其實這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國發生匈牙利事件那種動亂，我是不會上街反對共產黨的。但是我也不會跟在工人後面盲目地只喊共產黨萬歲！……」

這最後一句話，表達了我對於當時報紙宣傳的反感——《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工人階級說話了》之後刊載了不少工人表示向共產黨效忠和反對「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的來信，我知道那是官方組織來的，向知識分子施加壓力。

當我結束發言坐下來時，我仔細看了看胡耀邦，見他面有愠色，「我觸怒了他，」我想，「但是，隨他去吧！」不過二十幾年後，憶起當時情景時，又覺得胡耀邦面色嚴峻也可能出於另一種原因。那時他早已知道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預謀，而據說他還曾想過保護我的。聽了我的發言，他會不會是覺得這樣一來我的右派命運已難改變因而不悅呢？

下一次見面，已經是一九五八年二月，我的命運已定，準備下鄉勞動改造的時候。胡耀邦把團中央系統幾名資格較老、地位較高的右派分子找到團中央小會議室去，接見我們。他待我們的態度和以前一樣，仍然以「同志」相稱。這時我們這些人最關心的是前程問題，心情都是灰溜溜的。胡耀邦主要就是談這一點，反覆地說只要改正錯誤，將來仍然可以大有作為，千萬不要灰心，也不要怨氣。他似乎有意表示，他並不認為我們這些人是反黨分子，是敵對分子。談到犯錯誤的原因時，他特別提到我，說：「比如劉賓雁，就是驕傲了嘛，尾巴翹得太高了嘛。」

這時，我儘管也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但對於定為敵人，始終沒有想通。胡耀邦這一句話，明白地透露他並不認為我是人民公敵，這對我是一個安慰。

從此就未再見到他，足足闊別了九年。

但是卻斷斷續續聽到他在反右期間曾竭力縮小打擊範圍。他在歐洲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回來，一到新疆的烏魯木齊，立即打電話給北京團中央的羅毅，問他已經打了多少右派，羅毅說一

百多個，胡耀邦叫他立即剎車，待他回來再議。《中國青年報》共打了十七名右派，約佔編輯部人員的百分之十五，同其他新聞單位相比是低的。各省市的報社、電台，這個比率高達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不在少數。大家都認為：若不是胡耀邦干預，《中國青年報》右派的數額要翻上一番還不止。他曾竭力保護過幾個人。我們的社長、總編輯張黎群，性格與胡相近，思想解放，一九五六年以後對於使《中國青年報》的「自由化」起了很大的作用。「鳴放」期間，他在新聞座談會上發言，批評黨報辦成了傳聲筒、佈告牌，意見很尖銳，並在一些報紙的頭版報導過。僅憑這一條，他也難逃右派命運了。胡耀邦親自到鄧小平面前為他說情，他才能倖免於難。團中央書記處書記項南，和《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鍾沛璋，一九五六年都曾大力鼓吹過應學習南斯拉夫的經驗，把共青團辦成真正青年自己的組織，增強它的獨立性，去掉官氣和衙門作風。反右運動時中共已把南斯拉夫的黨視為「修正主義」黨，很多青年人只因說了鐵托一句好話便被打成右派。胡耀邦費了大力，項南終究還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者，留黨察看二年，降了三級。胡耀邦保鍾沛璋保了一年，但到了一九五八年夏召開團中央全會時，幾個團省委的書記又揪住鍾不放。鍾終於未能逃脫，成為右派。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一九六六年冬季的一天，我和胡耀邦又見面了，想不到竟是在這樣一種場面之下：紅衛兵把他弄到《中國青年報》來，又把我從編輯部樓上揪到院中，讓我倆迎著大門站在一幢紅樓前面。大約是匆忙中欠缺準備，沒有給我們脖子上掛牌子，卻拿來兩張長長的白紙條，讓我們各自寫上自己的罪名，高高舉起來。我不肯寫，他們幫我寫了，好像是「沒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我在這場批鬥會中，始終沒有看胡耀邦一眼——因為對於他或對於我，都是過於難

堪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胡耀邦手裡那張紙上寫的是什麼。

鬥爭會的主題是：批判胡耀邦一九五七年包庇右派分子劉賓雁。罪証是毛澤東關於劉賓雁的文章《上海在沈思中》的那條批語——即「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要把事情搞亂」，胡耀邦當年爲什麼壓了下來，不向團中央系統的工作人員傳達？

逼我交代時，我說胡耀邦沒有包庇過我，我受到的懲罰並不輕，爲了證明他未曾包庇我，記得我還舉出過一件事證明胡對我是並不留情的——現在不記得了。亂烘烘中，我沒有聽到胡耀邦兄怎樣爲他自己辯解的。

一九六九年以後，我和胡耀邦同在河南一所「五七」幹校勞動，同是審查對象。我們在大路上迎面相遇過兩次，默默對視，沒有說話。在那種情況下，也是不能說話的。

他回北京較早。他在京賦閒期間，很多老部下，北京的和外地的，都常去他的寓所看他。我卻始終沒有去，但內心裡是關注著他的。那時來北京上訪的冤假錯案受害者，常有人找上他的家門。警衛人員起先阻擋，經胡叮囑，什麼人都可以長驅直入了。傳說他還愛和青年人在一起，每當他長子胡德平的朋友們相聚閑談時，他常坐在一旁吸著煙，頗有興味地聽著，說到可笑的事，他便和大家一起笑起來。

一九七九年以後，命運又把胡耀邦和我連在了一起。這一年年初我的右派問題能夠平反，無疑是胡耀邦對《中國青年報》作了指示的結果。年底，第四屆文代會閉幕的宴會上，很多人去給胡耀邦敬酒，我也去了。我問他：「我送給您的書，收到了嗎？」他連連說「收到了，收到了。」從他的神色看，他很謹慎。我知道當時政局還很複雜，我的《人妖之間》和這次大會上的講話，

又引起高層人士的非議，他大概不願意被人看到我們之間有較近的關係。

我贈他的那本書是由我編輯、並有三分之一的文章由我從幾種語言翻譯過來的《南斯拉夫哲學論文集》。我從中得到不少啓示。我相信胡耀邦也會喜歡它的。

後來中國政局的發展，竟使我和胡耀邦這種關係固定下來：由於我招來越來越多上層人物的反感，被目爲「自由化」分子，胡耀邦的處境也始終困難，地位常常不穩，並且被老人幫視爲我的「後台」，因而我也就越發不便於去和他接觸了。

一九八五年四月，一位政治局委員十分坦率地告訴我：「你不去美國（哈佛大學尼曼基金會的邀請），是我的意思。那個活動時間太長，你難免要在外邊講話，報紙上給你一歪曲，國內那些（反對胡耀邦的）人就要做文章了。你們這些人出點什麼事，他們都記到胡耀邦的賬上。他們認爲胡耀邦是自由化分子的保護傘。」

早在一九七九年春季，反對胡耀邦的人已經行動起來了。我所知道的最早一個舉動，就是在林希翎問題上對胡的抵制。林希翎一九五七年是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班的學生，是當時北京各大學學生中站出來批評共產黨和教條主義的最活躍的一員。那個夏天，胡耀邦曾請她到家中長談六個小時。據說胡還把他的秘書介紹給林，成全他們的婚事。就在這對青年人準備結婚的時候，二人先後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

後來林希翎被關到監牢長達十五年之久，若不是毛澤東忽然想起和問起她，還要繼續坐下去。出獄後她回到浙江省家鄉的縣份，已是四十歲出頭的人了，在一家小工廠當起學徒工來。一九七九年她到北京要求平反時，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她給胡耀邦寫了一封很不客氣的信。我認為她不應該這樣寫，因為它會使胡傷心，而胡又從未傷害過她。想不到胡耀邦並不介意，還批示道：「我看還是以改正為有利」。胡先後批示過三次，主張給林希翎平反。而黨內那些對於右派平反和對於胡耀邦本人都抱敵意的人，就拚命抵制，胡越是主張給林平反，他們就越是不肯。單是人民大學黨委中那些「左」派（當年把林希翎打成右派的人仍然健在和掌權），顯然是沒有這大膽量和那大力量的。

那個一九八〇年初在胡耀邦面前造謠攻擊我，一個月以後又跑到《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面前對我造謠中傷的中組部副部長，我和他素無宿怨，顯然他整我的目的也是打「隔山炮」，意在攻擊胡耀邦和他那種給右派平反的堅決性。

一九八二年六月，在一次會議上，遼寧省省委書記郭峰當眾向胡耀邦遞交我的一篇報告文學〈好人啊，你為什麼這樣軟弱？〉的翻印本，說：「劉賓雁這篇文章裡很多都不是事實！」黑龍江省委書記楊易辰這時也站立起來，對胡耀邦說：「他的〈人妖之間〉也是一樣，有很多失實！」兩位「諸侯」同時譴責我（早已不是第一次了），胡耀邦覺得他不能不有所表示了，於是就寫了很長一段批示。我猜想，他遇到這種困難局面肯定已不是第一次了：他不能無視省委書記這樣高層領導幹部的意見，必須站在他們一邊說些指責我的話；同時，根據他對本人和我的作品及其所起的作用之了解，他又不能完全聽信省委大員們的指責，還必須為我說幾句話。我猜想，這段文字是他費了很多心思寫出來的。他的意見，寫在給兩位中宣部副部長、中國文聯主席周揚和《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的信裡。

「劉賓雁同志這篇文章，是遼寧郭峰同志在座談會時當面交給我的。交的時候，他當著省市書記的面聲言，劉在文章中所引舉的一些例子，很多不是事實，省委也不同意劉在文章中有關遼寧工作的一些評論。」

黑龍江楊易辰同志接著說，劉的〈人妖之間〉一文許多地方也不是事實，黑龍江省委對這篇作品得獎感到很不理解。

由於他們的意見，我把劉今年一月發表的這篇文章看了一遍。

首先，我覺得這篇文章並不是文學作品，而是一篇抨擊一個省的黨內政治生活的特寫。一個作家可不可以、有沒有權揭露黨內黑暗呢？當然可以，當然有權。但寫出來送給誰，是送給有關黨委、或哪個人還是逕直送給哪個報刊公開發表，這就要從有沒有利於問題確實得到正確的解決來考慮。

一個報刊能不能逕直發表抨擊性和揭露性的作品呢？也不是不可以，而是要考慮：為了向黨向人民負責，需要加以核實，需要向該地黨委和當事人加以核實，使自己發表的東西真正經得起檢驗。

現在這兩方面的問題都沒有解決好。我們說，我們對撥亂反正是堅決不動搖的，誰也不能誇口說，撥亂反正能夠比黨中央更堅決。但撥亂反正不能亂撥一氣，而且不能稍有疏忽。這樣的問題，我覺得我們有些同志並沒有弄清楚，說得不客氣一點，有點過於自信。

賓雁同志歷史上遭受過不公正的打擊，許多同志對他很有同情，這是對的。現在，我們也要盡量尊重他，愛護他，這也是對的。但有不少同志感到賓雁同志看待問題確有點情緒。我覺得這方

面的意見我們也要聽一聽，並以同志式的志度，同劉交交心，請你們考慮。」

我完全理解胡耀邦的苦境，所以對於他的「有的人過於自信」等批評，未提出異議。但對於所謂的「情緒」問題，我覺得需要澄清。這是保守派人物常常投向前右派分子作家或記者的攻訐：看，他們熱衷於揭共產黨的醜，是因為他們念念不忘共產黨過去整過他們，肚子裡有一股怨氣，是對共產黨復仇！我在給胡的信中寫道：

「對於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的事，我早已想通了。這是無法避免的悲劇，不是毛澤東，也會有另一個人來完成它。所以無論對於毛主席、當年直接把我定為右派的人或共產黨，我都不抱埋怨情緒。」

「有沒有情緒呢？有的，那是另一種情緒：當我聽到看到黨內為謀求私利而結黨為惡、違法亂紀、巧取豪奪之輩踐踏國法黨紀、殘害無辜一類行徑時，我常情不自禁地要去干預，恨不得立即把這些醜人醜事公之於衆。我的心情可能有些偏激，工作方法可能失於粗糙。這才是我的問題。」

胡耀邦看了這封信，比較滿意，想給我以鼓勵。但是他並不寫信給我，卻把信寫給周揚和賀敬之，再由他們把這信轉給我看。他並不是不給文人寫私人信件的，給詩人臧克家寫過，給哲學家郭羅基也寫過。從對我的這種分外謹慎的態度中，既可以看到我在上邊一些人眼中已是一個危險人物，也能看出胡耀邦地位的軟弱，他必須小心翼翼地提防他的對手，不授人以柄。

不斷聽說我已被列入中央宣傳部掌握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名單。從種種跡象看來，大約是一九八一年那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前後就有了這麼一張名單，我已名列其中了。

一九八一年第一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即批判白樺運動的那個秋天，大約是胡耀邦最困難的時期之一。九月廿五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的大會。我坐在主席台上，胡耀邦在離我十幾米處發表講話。我可以清楚看到坐在前幾排的由國外請來的研究魯迅的專家，我的朋友李歐梵也端坐在那裡。我有些心不在焉，沒有認真聽胡耀邦講些什麼。忽然，我從那些外國專家的面孔上見到驚愕和緊張的神色。我趕忙細聽胡的講話，並從我面前那本講稿中追尋他方才講了些什麼。我也吃了一驚，原來關於中國作家，他講了這樣一些話：「……還有另外一種人，這種人骨子裡從來就是仇恨新中國，仇恨社會主義，仇恨我們的黨，如同魯迅所說的……是化了裝從背後捅刀子的人。……對這種人的反革命罪行，必須繩之以法。」

文藝界有這種人嗎？怎能用這種詞句呢？況且，這是紀念魯迅的大會呀，怎麼在這個場合攻擊和威脅作家、藝術家呢？散會時，我見匆匆離去的周揚和賀敬之面色都很難看，他們大約也沒有料到胡會講這些話。他們一定是把這看作對於文藝界又要開刀的不祥信號了。各國專家們反應也很糟糕。他們本來就很不滿意：從老遠地方把他們請來，卻連紀念魯迅的學術報導會都不許參加！多請些外賓來，本來是周揚的主意。形勢驟變，他的權力立即縮小，不能主事了。

胡耀邦一定是估計到這次講話必定會造成很壞的效果，所以當天下午又把文藝界的幾位首腦人物請到人民大會堂的會議室，特地解釋了一下：這個講稿經過一些中央領導人修改，不代表他的本意。

四個月前，鄧小平談批白樺的《苦戀》問題時點了幾個人的名，其中有三位是理論家，都是一九七九年以來為給鄧在三中全會上制定的新路線提供理論依據和批判「左傾」教條主義做出了貢獻的。哲學家郭羅基是比較年輕的一位，曾和胡耀邦通過信，胡讚賞他的文章，據說還幫他修改過。但郭幾年來的言論已引起「左」派的不滿。一九八一年以後他再也不能發表文章了，鄧小平還決定他必須調離北京。他沒有走，兩年以後又重申這個命令，他才不得不到南京大學去任教。為什麼非讓他離開北京不可呢？只能有一個理由：使他同胡耀邦脫離接觸，怕他的「自由化」思想影響胡耀邦。

胡耀邦很少能保護住他應該保護的人。郭羅基之後，又有一位曾給胡當過助手的阮銘被搞掉，他的下場更慘——開除黨籍，通知各家報刊不得發表他文章。據我所知，胡是主張成立調查組查清阮銘的問題的，但還不等調查組成立，陳雲的一個批示下來了：開除黨籍！胡耀邦毫無辦法。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和副總編王若水又失去了職務。著名理論家李洪林被免去中宣部理論局局長的職務，也很長時間不能發表作品。

一九八四年秋，我寫陝西省一個案件的文章引起一場大風波，竟鬧得胡耀邦為首的書記處一個多月不得安寧，以致胡不得不出面批評我。他的話是：「劉賓雁沒有接受一九五七年的教訓。他還是不作《人民日報》記者，去當作家吧。」在《人民日報》傳達之後，編輯部一片嘩然：「誰應該接受反右派鬥爭的教訓，不是黨中央嗎？難道要被迫害二十幾年的『右派』來接受教訓？」可能是後來胡耀邦的地位又有所改善，我也就沒有離開《人民日報》。一年以後，又提出我不要作記者的問題，也未實施。

一九八五年二月胡耀邦不聽勸阻，斷然發表了〈關於新聞工作的講話〉，使很多人感到失望。我見到他兒子胡德平，問他：「那分明不是他本人歷來的觀點，為什麼要發表呢？」胡德平默然不語。我斷定胡耀邦又遇到麻煩了，多半是年初中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提出的「創作自由」問題惹起高層一些老人的強烈不滿，胡才不得不以這次講話緩和對方的攻勢。

然而這一次的讓步卻未免太過分了。我和我的朋友們這幾年對於胡耀邦處境之艱難是了解的，因而能夠諒解他不時做出的退讓，但是一九八五年以後他節節後退，直至一九八六年夏季已經作出決定「十三大」後他必須下台，他仍一味遷就，就顯得過於軟弱了。

很可能，我對於他不斷受到的攻擊、威脅和牽制，對於上層內部鬥爭的複雜性仍然估計不足。但胡耀邦本人性格中的弱點，顯然也是導致他失敗的原因。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胡耀邦在上海視察時最後一次談到我。一定是上海市委領導人就我剛剛發表的報告文學〈未完成的埋葬〉（揭露上海市高等院校中「左」派勢力）向胡傾訴了不滿，才引起這個話題。胡耀邦說：「劉賓雁的作品，我每篇都看。聽說有三篇文章失實。十一月中旬寫黑龍江的這一篇，又有人指責說又失實。我讓人去了解一下，果然又失實了。」

向誰了解呢？多半是向黑龍江省紀委。而我的那篇報導就是揭露這個省紀委書記的兒子的。向中紀委了解嗎？中紀委早已聽信那位書記的指控，向《人民日報》指責我「失實」了。

在胡耀邦已經下台、我也被開除黨籍之後的半年，中共中央（一九八七）一九號文件向全黨轉發了胡耀邦的檢討。其中關於我的一段是：「劉賓雁過去曾在團中央工作。他給我寫過幾封信，我沒有見他。這個人右派立場根本沒有轉變。我多次對《人民日報》打招呼，說這個人不能當記

者。」

這幾句話在海內外傳開，造成對於胡耀邦很不利的影響，我相信這些話是胡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說的，我能夠諒解他。果然，幾個月後我的一位友人和胡的一位親人都向我傳話：那段話是胡在一九八七年被迫辭職前受到極大政治壓力的情況下不慎說出的，並無加害於我之意。看來事後他也很懊悔。據傳，一九八七年十月，在中共「十三大」主席團會議上，胡耀邦就此向一個大人物發問：當把我講話的錄音稿送我看時，那時我刪掉了這些話，你為什麼在十九號文件上又恢復了？那位大人物被問得張口結舌，十分狼狽。在胡耀邦已經下台、我也被開除出黨之後仍然採取這種落井下石的惡劣手段敗壞人的聲譽，是非常卑鄙的。不過那個大人物也很快就得到了報應：他在「十三大」上接連兩次落選，他失去的選票有一部分是與人們獲悉他這一次不光彩的舉動有關的。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辭職的消息公布後，我不斷聽到各地傳來人們為此不平的消息；他的聲望不但未因此而下降，反而升高了。當時我會對友人們說過：「看吧，他們到一定時候可能把胡耀邦的檢討拋出來，敗壞他的聲譽。」以我對胡耀邦的了解，我猜想他在檢討中一定會說過頭話，而這就必定損害他的威望。果然不幸被我言中了。

從胡耀邦這段話裡不難看到：在導致他下台的各種因素裡，必定有一種是他對於我的同情和支持，不然他何必說到我，並且還說得那麼重呢？這就證實了一九八五年那位政治局委員對我講的話屬實：胡耀邦的對手（也是我的對手）確是把他看作了我的後台。強加於我的所有罪名，同時就成了胡耀邦的罪狀。我確曾寫過幾封信給他，但大部是爲了幾起冤案，附有我們的調查，他

都認真看了並作了批示。但我從沒有求見之意；我若真想見他，料他也不會拒絕。至於幾次不讓我作記者，事情是有的，但他的意圖是爲了減少我的報導給他造成的麻煩，也可能還有使我不致因激怒某些人而遭不測之意，完全不是由於我是沒有改造好的右派。

胡耀邦被一些人視爲異類，是不足奇的。他是中共中央領導人中最尊重知識分子的一個。那些人中真正關心文學藝術和主張給藝術家以更多自由的，也是胡耀邦。《人民日報》是在他的支持之下，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〇年才有了更多的新聞自由。而根本的一點，則是由於胡耀邦在那些人中是最堅決主張把改革（不僅僅是經濟改革）進行到底的人。他的政治文化視野最開闊，最同情人民的苦難以及他和毛澤東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牽連較少（對於反右派運動他實際上是抵制的；文革前夕的「四清」運動，他本人則是一個受害者），是把他與其他領導人區別開來的主要特徵。

我知道我每引起一個省委的不滿和攻擊，都給胡耀邦帶來麻煩，他始終暗暗關心和同情著我，每次給我以保護，不然我是不可能繼續寫作到一九八七年的。他對不止一個人說過：劉賓雁這個人能夠成爲一個大作家。

我和中國許多知識分子與有志於改革的人一樣，對胡耀邦寄予極大的信賴與期望。胡耀邦的安危，成爲我們關注中國政局動向的中心。一九八一年對《苦戀》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一九八二年秋黨的「十二大」前夕《解放軍報》和上海《解放日報》同時發表的那篇奇怪的文章（作者是《解放軍報》總編輯趙易亞，文中不指名地批評胡耀邦等主持宣傳工作的人對於意識形態領域「自由化」的氾濫負有責任）以及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最終目標都是要

搞掉胡耀邦。我和我的朋友們都常為胡耀邦的安全捏著一把汗。

胡耀邦個人品質上的優點，特別是他待人過於寬厚，又無防人之心，以及不玩弄權術，不幸在政治角逐場上都成了他的弱點。他的缺點——感情易於衝動，有時在決策和言論上失於輕率，而在另一些時候又欠堅定和果斷，以及他不善於識人，以致勢單力薄，則是導致他失敗的另一些內在原因。但從根本上說，他的悲劇則是歷史條件造成的。他不幸早生了十年。

因而，我們就既為胡耀邦不得不常常退讓，甚至被迫說違心之言感到失望，同時也能有所瞭解。

胡耀邦在我的問題上，從一九八〇年初到一九八六年底曾四次在黨內表示他的態度。對照他一九八〇年一月和一九八四年九月的兩次講話，已能看出他的處境是明顯地惡化了。一九八一年九月紀念魯迅誕生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表露的對待文學界和作家的評價，明顯地與他歷來的和以後的態度相反，這時他的地位一定很不穩固。這次講話的調子也印證了同年夏季一位政府大員在歐洲對中國留學生透露的那個情況，即十月份即將開始一次新的反右派運動。

接下來，便是胡耀邦的辭職和我的開除出黨。從朋友那裡傳來的消息說，他仍在關心著我。我想像著他胸中激盪不已的心潮，不禁為他扼腕嘆息。

在胡耀邦那種資歷的高層幹部中，像他那樣在一九五七年及右派運動中保持清醒、有所抵制，因而上沒有沾染髒東西的人，為數很少。這就是他任中央組織部長期間所以能在給九九%以上的右派平反中那樣勇敢和堅決的一個重要原因。但顯然，他因此也必然招來黨內各個層次上為數甚多的反對糾正那起一九四九年以來最大冤案的幹部們的不滿。一九七八年那場為糾正毛澤東錯

誤路線作輿論準備的全國範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實際上也是胡耀邦起了主導作用的。《光明日報》上發表的題目相同的那篇「特約評論員」文章，是胡耀邦親自修改，先在胡任校長的中央黨校的刊物上刊載的。胡耀邦又是最熱衷於平反冤假錯案、懲辦腐敗官員和糾正黨的不正之風的人。他對整黨和懲辦高幹子弟犯罪分子過於認真，是他直接激怒某些老人、使他們最後決定除掉他的一個因素。

胡耀邦對人民有深厚感情，體念人民疾苦，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正義感很強，嫉惡如仇。他尊重文化，酷愛學習與思考，敏於接受國外新思潮和傾聽中國知識分子的呼聲。他天性真率，待人寬厚，不搞陰謀詭計。因而，他是最堅決、最勇敢的改革派。這些特質，鮮為他那個層次的人所具有，在中國的官場上，都成為胡耀邦的弱點。他不善識人，在起用的人中很少是真正與他肝膽相照、在中國的改革大業中能與他榮辱與共的人。他作出決斷時有時失於輕率，有時求成過急，而在另一些時候，他又缺乏時機所允許和所需要的果斷。

歸根結底，還是中國的歷史條件決定了胡耀邦的失敗。戈爾巴契夫比他幸運得多，他主持朝政時，斯大林已死去三十二年。斯大林時代的當權者除葛羅米柯外全部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國則是全然不同的政治局面。

但是胡耀邦畢竟在否定毛澤東路線（撥亂反正）和發動、推行經濟改革上，即改變中國之命運上功不可沒。也許，只有當中國和世界對於鄧小平的真面目有了更多的了解，從而知道自一九八一年起鄧小平一直和黨內老人幫、保守派站在一起，壓制在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改革方面的進步力量，才能充分理解胡耀邦在中國的改革中所起的至為重要的作用。他的被迫辭去總書記一職，

使更多的人、包括原來並不喜歡他的人對他抱同情態度。黨內擁護改革者和廣大知識分子懷念他。一切遭受迫害、蒙受不白之冤者懷念他。西藏、新疆等地少數民族也對他懷著感激之情。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清晨，我在紐約的泛美飯店剛剛起床，《中國時報》駐紐約記者杜念中先生忽然闖進我的房間告訴我：「胡耀邦去世了！」

我愕然良久。儘管昨天在「美洲華僑日報」上看到了一則關於胡耀邦病危的報導，但我仍然不相信他會死去，更想不到這個噩耗會來得這樣快。

半小時以後，《中國時報》召開的「五四」七十周年討論會就要開始。杜念中先生請來自大陸的三個人——我、王若水和阮銘到他的房間裡就胡耀邦的病逝舉行一次座談。很巧，這三人都是八十年代初期以來因主張把中國的改革進行到底而觸怒黨內保守派，被清除出黨的。胡耀邦無力保護這些人，原因在於他所代表的力量在黨的上層中是過於薄弱了。

第二天下午，討論會結束，我和幾位朋友議論起北京的大學生會不會借悼念胡耀邦之機掀起一場爭取民主、自由的示威遊行。多數人猜測這種可能性是有的，但官方一定會層層阻撓，使它不會成功。我並沒有和他們爭辯，但心中不以爲然，不知是否我的願望又摻入我的判斷，我認爲警方會試圖阻撓，但大學生鬱積已久的憤懣會因對胡耀邦的同情而以加倍的力量爆發出來，因而官方未必敢於正面對抗，也未必有這種力量。我估計，在天安門廣場再次形成一九七六年那種規模的以悼念周恩來爲名、以反對四人幫統治爲實的壯烈的示威運動，不是不可能的。

事情又被我猜中了。

十天以後，舊金山另一次爲紀念「五四」七十周年而召開的中國問題討論會的前夕，許多中國人和美國漢學家聚集在電視機前焦急地等待北京的畫面出現時，我們所有人都陷入同樣的焦慮：既然鄧小平斷然表示不惜流血也要把學生的遊行鎮壓下去，四月廿七日（美國時間則爲四月廿六日下午）這一天，很可能有一些大學生要橫臥到血泊之中。

按照中國官僚政治的慣例，每一級官員都要聽從上一級主管官員的意志行事；越是重大問題，提出異議或拒絕執行指令的可能就越小。何況，這一次是最高長官以斬釘截鐵的方式既規定了此次學生遊行屬於少數陰謀分子操縱的反革命動亂性質、又表明了不顧一切後果進行鎮壓的決心呢？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二十七日這一天更大規模、浩浩蕩蕩的學生遊行卻順利地完成了，遇到的阻力比前次反而更少。我爲此感到慶幸，並不僅在於避免了一次流血。顯然，主張殘酷鎮壓的絕不止鄧小平一個人。這是一九七九年從西單民主牆開始連續三次鎮壓青年和學生的民主運動之後，鄧小平和幾個強硬分子的意志第一次失靈。原因可以列舉幾種，但最重要的是結果：這個集團在反對民主運動的問題上第一次發生了分歧，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礙。他們也許可以不把人民的憤怒放在眼裡，但鄧的講話在首都新聞界和黨、政機關一傳達，人們一片嘩然，據當時在北京的人說，簡直像要造反的樣子，連鄧小平在內，沒有一個人敢於和能夠壓服反對的意見。顯然，他們既看到黨會公開分裂的危險，也害怕自己成爲遺臭萬年的千古罪人。

我想，胡耀邦兩年以前因反對鎮壓學生而作出的犧牲，和他因推行自由化路線而在中國人民中贏得的極高威信，在制止已經舉起的屠刀上不會沒起到一定作用。他本人已經消失了，但當那

些曾迫使他早逝的人們在如何處理學運問題上爭議不決、舉棋不定時，他的亡靈一定在這些人面前出現過，作為一種無聲的警告。

從北京到舊金山來開會的一位朋友告訴我：在胡耀邦病逝前半個月，當他和一位朋友作最後一次長談時，他又一次提到了我，對於一九八七年初他在檢討中所說的那幾句不利於我的話表示懊悔。這已經是第五次我聽到這樣的話了。在國內有三次，五十年代以來和我同事、同是胡耀邦下屬的人向我轉達過胡耀邦的歉意。在美國，一次在大學講演之後有兩位年輕人找到我和朱洪，他們是胡的親戚，特地鄭重地代表胡向我致歉，求我諒解。

在北京，有一次他是這樣說的：「我這一生對不起三個人。前兩個人，是延安時期的事。第三個，是劉賓雁。」

在他生前最後一次談到我時，他又提到他對不住項南，因為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中他沒有使他免於遭難。其實那時他的保護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項南沒有成為右派和被開除出黨，而僅僅受到處分。

我很少聽到過一個擔任過中共最高領導職位的人為自己的過失如此痛心地懺悔過，縱使這種過失曾使幾千、幾萬甚至更多的人遭到過不幸。這又是胡耀邦有異於他的同僚之處。那些胡耀邦為他們的平反和復出出過極大力量、而後來當胡遭到危難時卻卑鄙地出賣他，以告密手段向他捅了致命一刀的人，卻至今不見他們的天良有過一絲閃現！

我沒想到胡耀邦會對那幾句關於我的話而耿耿於懷這麼久，更沒想到他會去世這樣早。我悲哀地想，早知如此，無論如何我也要離開中國以前給他寫一封信，或者索性去找他談一談，告

訴他我完全能夠諒解他。我還要向他表示我的感謝——這也會是我的幾千萬讀者的感謝，因為沒有他的保護，我一定早就被迫停筆了。



第十九章

適得其反

這年冬天，北京下了少見的好雪，第三場雪最大，從一九八六年除夕起降到一九八七年元旦這一天。這天凌晨北京大學的學生與市民近萬人冒雪到天安門廣場示威，要求民主，反對官僚主義。我慶祝一個朋友銀婚的晚宴歸來，踏雪步行，心情激動得很，在心裡為讚頌大學生和譴責野蠻的鎮壓而賦詩一首。

十二月十日我在福建進行最後一次採訪時，被《人民日報》總編輯急電召回，原來是要向我澄清幾件事情。主要一件又是：這年春天我在上海黃浦體育館作講演時，是不是號召過大學生起來爭民主、爭自由？那次講演，是去年四月的事，講題為「我和報告文學」，談我的經歷和報告文學創作上遇到的問題，根本未涉及當前政治。我奇怪：這次講演會就是《人民日報》駐上海記者站主持的，怎麼會弄錯呢？但這幾年關於我的政治謠言已經太多，所以也並不稀奇。但是我當然覺察到他們想把鼓動學潮的責任加到我的頭上。

北京的空氣已因學生的示威遊行而緊張起來。我仔細諦聽著各地的動靜。武漢、蘭州、濟南、上海、杭州、重慶、南京和天津的大學生也相繼上街了。最後一起，是我的家鄉哈爾濱。

每聽到又一個地方的大學生湧入到示威浪潮中來，我都興奮一陣。這些人，是中國的希望所在。在這個特殊的國度，當絕大多數的公民都成為國家的僱員，而被小心保護下來的「二窮二白」又使黨的思想控制格外有效之時，無家室之累和後顧之憂、又敏於感受和勇於反應的大學生，同其他國家的中國的其他時代相比，就格外重要和可貴。奇怪，我並不覺得那是和我相隔兩代的人，似乎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個。也只有靠人民力量的推動，中共領導才肯向前走，這是幾年來經驗証明了的。一九八六年裡，中央領導人一面表示政治體制要改革，同時又一再聽到從上邊傳來這種

論調：亞洲「四小龍」，不是也沒有搞民主化嗎？人家經濟不是也上去了嗎？

從十二月中旬起，我不斷聽到北京的這個或那個會議上連續點了一些被認為有嚴重問題的知識分子的名（自然首先是早已擬定的「持不同政見者」名單上的人），每一批名單中都少不了我。他們要下手了嗎？打算幹什麼？關心我的朋友已經勸我清理材料信件，做被抄家的準備了。

爲了保住我今後的發言權，不給那些已經在磨刀的人以藉口，我當時還不想捲入這場學生運動。我向副總編輯提出我想到海南島去避避風潮，正好那裡有人請我去休養，他立即同意了。

一月一日，警察拘捕了幾十名北大遊行的學生，後來又放了。這時我還不知道中南海前一天召開的那次緊急會議，不知在對待示威學生上有兩種不同的主張，鄧小平已表示不惜採取流血手段了。也不知我的政治命運已在這次會上被決定。但離開北京時我心情的煩躁不安，卻和一九五七年六月反右派運動開始時非常相似。

我有過許多機會去遊覽中國的風景區和名勝，都放過了。這一次我終於能享受一下了。我和朱洪來到海南島最南端的三亞市。我們來到海邊上鐫刻著「天涯」、「海角」的兩塊巨石邊。原來這就是宋代詩人蘇東坡度過最後一次流放的地方。

真巧，一月五日我們乘飛機南下，就在這一天，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正式決定開除我的黨籍。《人民日報》領導趕忙讓人追我找我，一直沒有找到。直到十日，我才接到海口市的海南島自治區文聯的電話：昨晚《人民日報》來電，要你回電。

副總編輯不在家，我請總機把電話接到記者部一位同志家裡。他告訴我：「現在形勢非常嚴峻，非常嚴峻。『二號文件』你還沒有聽說嗎？方勵之、王若望已被開除黨籍，你也差不多，應該盡快回來。」

我「也差不多」，這是什麼意思？兩種可能：已經和方、王一樣被開除了，但他不便告訴我，也可能是尚未最後決定，但已基本上定了。

第二天，我打電話到我家，女兒小雁告訴我：中紀委書記王鶴壽已通知《人民日報》社長，書記處決定開除劉賓雁出黨。幾日來向我表示慰問的電話不斷。多名外國記者來電話要採訪我。在路上遇到報社的人並不相識，也對我女兒表示慰問。

從昨天起，朱洪就擔心我心情不好，安慰我。開除出黨，確是一件大事，對我很不利。但由於我早有會遭到大打擊的準備，故精神很鎮靜。

從一九八二年起，我就知道自己不會有好下場。一些先例已擺在那裡：先是哲學家郭羅基、作家白樺、詩人葉文福、評論家阮銘，後來又有哲學家王若水、李洪林等等，一個個或被剝奪發表作品的權利，或被撤職、開除黨籍。

記得我和王若水有一次議論過我們的前途，我說：「真怪，我們這些人無疑是最擁護三中全會路線的，爲改革寧肯犧牲自己，可是我們一面這樣做，一面又不得不提防著隨時可能被我們所擁戴的人踹上一腳。你說是不是？」

王若水說他也有同感。果然，一年以後，他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就被拿掉了。在這以前，他發表文章、演說和出國就不斷受到限制。李洪林出於好心，試圖以三中全會的精神重新解釋「四項基本原則」，連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我們要堅持的是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等三篇大論

文，第四篇（我們要堅持什麼樣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就發不出來了。前三篇，也被「左派」理論權威指責為「反面文章正面做」，倒成了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罪人，失去了中宣部理論局局長之職。

我想，我的最後下場，大約也會像這些人一樣，通知各家報刊不得發表我的作品，我從此便無聲無息地在讀者面前消失，而多數讀者大概會以為我是膽子小，不敢寫下去了。這當然於我不利，而我又無法發表聲明說我是被迫的。

公開宣布開除我黨籍，對我就有利得多。不論他們怎麼說，我相信中國的讀者一眼便能看穿開除我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距我回北京只有四天時間了。我對朱洪說：「趕快抓緊時間游泳！」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海濱浴場：幾千公尺長的白色珊瑚沙灘，碧藍碧藍的海水，游到很深的地，仍能一眼望到海底。」

我不相信這一次厄運又會剝奪我的一切，更不會像三十年前那次打擊持續那麼久。我一定會再次來到這塊海灘游泳，而且不會在很久以後。

一路上心情平穩，幾乎和我平時採訪歸來差不多。但當飛機在北京機場上空開始降落時，我心中忽然閃出一個念頭：在北京機場門外等候著我的會是什麼人呢？幾秒鐘的緊張。什麼事都是可能發生的。隨它去吧！

在機場門外隔著玻璃望著我的，原來並不是武警，而是《人民日報》新任黨委書記許仲英和

總編室黨支部書記王庚南。都是記者部老同事，還特地開來一輛麵包車，把我家裏好幾口人也拉來迎接我。這是從來沒有的事，彷彿我在外立了大功，戴譽歸來似的。

由於三個班機幾乎同時降落，行李房擁擠著許多旅客，忽然，我見一位像貌堂堂，身材魁偉的三十多歲的男子攬著一位老太太微笑著向我和朱洪走來。「您是劉賓雁同志吧？」他自報身份，「我是從駐外使館回來度假的。」卻並不說姓名，握著我的手說：「我們使館的同志都很敬佩您。」他連說幾個「敬佩」。我想他一定還不知道我已成了罪人，便問他：「一號文件看過了嗎？」「看過了。」我不免有些驚訝了：一個外交官，在這麼多人到場的情況下，怎敢恭維我呢？他又添加了一句更犯禁話：「祝您獲得諾貝爾獎！」這才離去。

黨委書記和支部書記把我送到家中。爲了不使他們難堪，我主動告訴他們我已知道發生的事了。約好明天上午到報社去看有關文件。

當晚，躺在床上，我翻閱了幾封最新的來信。我的一位青年朋友，一位哲學家在一月九日的來信中寫道：

「老劉：上封信中我曾提到了你的天真，事實卻一再驗證了我的悲觀。老虎總是要吃人的，不管是印度虎還是東北虎。但不要急，歷史總不是屬於老虎的。現在形勢嚴峻，黑雲壓城，我卻格外相信進化論。一個敢於把自己黨內最優秀的人開除出黨的黨，一定是在自掘墳墓，我們又有什麼急可著呢？釋迦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有此一胸懷與大勇，他終成大佛，即大覺

悟者。老劉，現在輪到你了！我的朋友乙文革中坐了十年監獄，爲了什麼？因爲他酷愛讀書。放他出獄那天，他著對監獄大門唸了一副對子的上聯：『不回頭，明知苦海無邊』，卻多年對不出下聯。一日，他對我說，『你知誰能對出下聯？』我說『在下便可。』隨後當場對它一聯：『既脫身，頓悟三千有限』，橫批『我行我素』。乙兄爲之絕倒。好了，老劉，時代要你成爲大慈大悲大勇大智的活佛。天下事、人間事有何不能溶而化之，包而藏之者？

若我們還感覺委屈，冤枉，這就未免可笑了。鍾會使文帝誅嵇康，潛曰：『康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鸞除之，以淳風俗。』結果嵇康就戮。但他毫無悔意，更不覺冤枉，只是將刑前命人取琴一張，撫廣陵散一曲，嘆曰：『廣陵散不復傳矣』。他明知無辜受害，卻只嘆美的價值無存，將自身榮辱置之度外。這是大胸懷。老劉，你要挺得住！

國家民族劫數未盡，我們這些愛國家愛民族的人只好含淚看它受難。一個病毒性感冒患者非發高烧七天才能好轉。在此期間中藥西藥全沒用。

××兄送你《尼采》一部，頗可於黑暗中慰你心靈。查拉圖斯特拉的精神正在你身上顯現。

我愛你至深，此刻更覺心痛。但硬漢子死了算，活著就只爲摘著大痛苦，大悲哀，這是你老劉的命運，天命。你受難了，但別忘了，全民族和你一起受難。基督死前只大喊了一聲：『人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苦難的民族從來不知道自己在作什麼。你代表全民族的精英受難。你替全民族受難。

此刻，我和妻多想陪伴在你身旁，爲你、朱洪和孩子們分擔痛苦。我深信，全國有許多人想替你受難，但他們作不到。」

我流淚了，謝謝你，我的朋友，你已經爲我分擔了痛苦。當很多人和我在一起時，幸福便會把我的痛苦淹沒。

十五日早晨我到約定的會議室去看文件，見一人在那裡擺弄一個大錄音機。兩位書記來了，給我看了書記處的決定。原來只有一句話：「一月五日，中央書記處決定開除劉賓雁的黨籍，由《人民日報》黨組織辦理。」好簡單呀！黨委書記說我可以談談自己的意見。我本來沒準備講話，我就說：「我的意見，準備在黨支部大會上談。我要談得很系統，需要準備。」他們也沒有強求。我便讀起一號文件來。但一面讀，我又是一面想：也許這是一個說話的機會。他們催我回來，說不定就是讓我說話，未必出於惡意。雖然沒有準備，也不難，還是說吧。我便對著錄音機向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首腦人物發言了，一面思索一面講。

我指出，自從一九七九年一月我的右派問題改正起，黨內便有一些人一再造謠攻擊誣陷我。這說明黨內有一股勢力，反對三中全會給錯劃右派平反的決定，始終認爲我們這些人不應回到黨內。我和許多曾被定爲右派的人一樣，是三中全會決議最忠誠的擁護者，有我的全部言行爲證。我所寫的全部作品中所提出的問題，都是共產黨要解決的問題。我著重指出：不提出任何理由而作出開除的決定是不嚴肅的。我入黨不是稀里糊塗進來的，出去也不能不清不楚。不舉出開除的理由，我又怎能申辯呢？

事後告訴我，當天晚上就把這四十五分鐘的錄音帶複製了四份，分送黨中央、中紀委、中央

辦公廳等處，還特別告訴我：最高領導人都能聽到。

從十二月起，就蒐集我一、二年來在各省講話的錄音帶的記錄了。此刻，駐外記者仍有專程送我講話錄音帶的人來京。專門從事把錄音帶變為文字的人員，此時仍在連夜加班工作。可見，開除我，是蓄謀已久，最晚也是從一九八五年派出調查組時便開始了。

有趣的是在《人民日報》大院中，同時又有另一批人，正在想方設法改變開除我的決定。繼十五日之後，廿二日黨委和紀檢委的人再一次請我談自己的意見。這次我有準備了，講了近兩個小時。我又一次提出：我等了半個多月了，怎麼還不見開除的理由？又是趕製四套錄音帶上送。直到一月二十四日，即按原定「每五天宣布開除一個」的計劃，當日下午六時半中央廣播電台就要向全國播出開除我的消息了，上午九時紀檢委書記和兩位黨委、支部書記才把開除決定交與我看。我在空白處寫上：「開除程序完全違反黨章規定。開除決定從頭到尾是不實之詞。我保留黨章賦予我的全部申辯權利。」已經這個時候了，書記們還要我把反對意見寫成書面材料，中午就派人來取。好像還在作最後一分鐘的努力，爭取挽回。

他們始終不敢開黨支部大會。即使爲了做做樣子表示開除的合法性，也應該走走這個過場。他們也不是不想開會，但分別找過我所屬支部的黨員分別談話，發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反對，而且難以說服和壓服，這才不得不咬咬牙，敢冒違反黨章之嫌了。

在報社以外，也作過試探。找過中國作家協會黨組，三人都認爲開除不妥，於共產黨不利。中共北京市委書組徐惟誠找過六名北京作家，其中三人堅決反對，剩下的三人中還有不表態的。這期間，也不時有消息傳來：可能要取消開除的決定。直到公開宣布的前一天深夜，我已經

要入睡了，女作家張潔還打來電話：「聽說不開除了，改爲嚴重警告了。」我躺在床上思索起來。到此時爲止，許多朋友都希望爲我不被開除出黨，我自己也希望他們改變那個決定，雖然已作好被開除的充分準備。但聽到張潔的話以後，我倒動搖了：到底開除好一些，還是不開除更好呢？

一月二十四日從下午三時起至十時，共有二十七位客人到我家向我表示慰問。

八年前也是這一天，一月二十四日，我結束了爲期將近二十二年的政治僵屍生活，重新回到中國共產黨內。兩次開除，一個原因：我公開批評了共產黨內部的弊端。

這一生中，我因受難而得到過別人的同情，因成功而受到過人們的祝賀。我蒙受過最大的屈辱，也享受過極高的榮譽。今天，我卻同時經受著這兩種東西，這是從未有過的體驗。這是幸福嗎？是的。我應感到幸運，因爲只有極少的人有緣得到這種享受。

當天在報社大院裡遇到一位工人，他說：「祝賀您，他們使您成了完人。」一封來信中也寫道：「你完成了你自己。」我感到驚異，因爲從也沒有這種感覺，倒是老覺得自己才剛剛開始。我的影響是在反對者對我的攻擊聲中不斷擴大的，而反對者愈演愈烈的腐敗過程又不斷喚醒和激怒著更多的中國人，他們對於我這支筆的期待便越來越重了。

下午七時，中央電視台將像十天前公布開除王若望、五天前公布開除方勵之一樣，宣布開除我黨籍的決定。我不久前結識的青年朋友王××忽然來了。他是特地從家裡趕來陪我看電視新聞的。我明白：他擔心我經不起一生中第二次打擊。

朱洪坐在我右側，王坐在左側，扶著我的胳膊，看新聞聯播。播音員左側字幕上映出「《人民

日報》紀律檢查委員會決定開除劉賓雁黨籍」，我心中暗暗覺得好笑：終於還是推到報社紀檢委頭上了！以前中紀委和報社紀檢委之間互相禮讓很久，都不願承擔這個光榮使命。播音員的表情和音調都很平淡，沒有一點「義憤填膺」和「全國聲討」的意思。

我淡然、坦然地迎接了在十億人面前對於我的侮辱和誹謗。

據後來各省傳來的消息，此時此刻，不少中國人爲我痛哭。不是爲我個人的不幸，而是爲了失去的希望——對這個黨和中國前途而感到悲傷。有高聲痛罵的，有縱酒澆愁的。也有不少人此時決定撤回入黨申請，決定擱筆，或決定遠走他國。

開除決定中有八個字，說我的報告文學「顛倒是非，造謠中傷」，《人民日報》方面曾再三要求更改，而遭到拒絕，「別處可以刪改，這八個字是無論如何不能動的。」

我從海南歸來，便聽到不止一個人告訴我：中央某要員已指示各省委、市委：今後凡有到法院控告劉賓雁者，應一概受理和立案追究。

全家人對我被開除出黨都能處之泰然。但我們不能不對於以法律手段進而剝奪我的人身自由有所戒備。中國的司法，我們都明白，仍是唯黨的意圖和政治需要是瞻。查看「刑法」，誹謗罪最高刑期是三年，還要剝奪公民權一年。倘是我得罪過的七個省、市委和許多當事人一起訴呢？法律界有的朋友主動來爲我做律師，有的朋友到大學裡幫我請律師。我不得不考慮應付八年來我在全國各地所樹之敵，隨時可能向我發動的襲擊。

每天收到許許多多來信、電報和電話。對我熱情的慰勉，對於我的對手激烈的譴責，對於中國現狀和未來的憂思，源源不絕地沖到我的面前。應接不暇的客人，來自祖國各個省份。他們絕

大部份都是素不相識的工人、學生、知識分子、農民和軍人。每隔幾天，便會收到寄贈的禮品——食品、藥品、保健用品和紀念品。也收到多起贈款，都一一退還了。武漢的幾位工人來信說，他們猜想我可能已經入獄，決定每月集資五十元補貼我的生活，並願將我家人的生活困難承擔起來。南方和北方的省份裡，都有人請我甚至我的全家到那裡長住，願把我們養起來。一些市和縣的高、中層幹部甚至解放軍的師長，歡迎我去休養。香港的企業家和僑居澳大利亞的老人願意給我以重金資助。國內的一位科技人員願從他即將獲得的專利中拿出十萬元助我。

三分之二以上的來信，讀者都簽署了自己的真實姓名和住址，雖然他們都知道這些信可能根本到不了我手裡，而會給他們自己造成麻煩。

也有極少的幾封年輕人的來信是看了報紙後信以爲真，對我表示惋惜和譴責的。這使我能夠清醒。我的一些老友，也有在當面忠告和背後議論中給我以指責的。他們竟然認爲我「看陰暗面太多」！也不奇怪，大都是養尊處優或安享幸福晚年的人了。

爲進行批判而印發的我們三人的「言論摘編」，反而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我們。因數量有限，只能朗讀或傳閱。於是就出了這樣的笑話：有人遲到，不知讀的反面材料，聽到一半就感嘆地說：「寫得太好了，是什麼文件？」上邊發現效果相反，便急忙回收，但已被複印多份，廣泛流傳了。有人影印後出售，黑市價格竟高達四十餘元。

官方的批判文章，則連主持這場運動的胡喬木都認爲是失敗的。看來是沒有辦法的事。戈培爾的謊言當年能夠奏效於德國，是因爲借助於全然不同的歷史背景，正如文革期間的宣傳也曾蠱惑過許多中國人一樣，但重操故伎於今日，就只能令人生厭了。在真理和謬誤之外，實難找到第

三種語言。「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同樣是倒行逆施，故即使筆下生花的文人也不能不重複當年四人幫「大批判」那一套陳詞濫調了。爲扭轉頹勢，鄧力群便以高價徵購，每千字出稿費九十元（相當於現在標準稿酬最高額的四倍半）外加每天十五元的伙食標準，把一批文人集中到一起絞盡腦汁，結果仍然拿不出一篇像樣的文章。胡喬木要求一改前一時期都署假名的作法，必須署作者的眞名實姓，很傷了一些作者的勇氣。他們不是白痴，知道大名一旦和批判文章連在一起，便必定招來億萬人的詬罵，「每千字九十元」也難彌補這筆損失。這麼一想，就全無靈感了。

「這三個人中，劉賓雁影響最大，也最難批。」——他們都這樣說，因而必須著重批判劉賓雁。但原定舉行的新聞界批判會，忽然推遲了。事情是這樣的：事先做過一次預演，鄧力群等人看了，很不滿意，說：「這些人怎麼就是對劉賓雁恨不起來呢！」下令「提高發言的質量。」上海《文匯報》被指令必來一人，但誰也不肯來，便讓一名青年編輯來湊數。但此人到北京一看氣氛不妙，寧肯回去挨批，把發言稿一交就擅自回了上海。兩周後勉強開了會，仍然是冷冷清清的。《人民日報》是非去人發言不可的，副總編輯不得不去唸了「提高質量」後的發言稿，第二日登在各報頭版。副總編輯收到不少罵他的信。其中一信寫道：「劉賓雁未必流芳百世，你×××卻必定遺臭萬年！」他哪裡知道副總編輯的苦衷呢！

一些了解中國內情的朋友，對我採取了「三不」方針：不寫信；不打電話；不去採訪。爲了安全。

信件의 檢查有沒有呢？我不敢說每封信都檢查過，但是丟失信件的現象確實有過。有人還在

某省委的辦公室裡見到一大堆該省公民寫給我的信。

電話有沒有竊聽呢？電話打到一半對方說話的聲音常忽然變小，好像離你很遠很遠了。有一回，負責監聽的人忽然按捺不住插進話來：「你們可不許議論首長的是非啊！」

至於在我家裡講話是否安全，則始終是一個謎。在一月份那些氣氛非常緊張的日子裡，有的客人以筆代口來對話，好像彼此都變成了聾啞人。這實在太費勁。後來，我就忽然成了音樂愛好者，和客人談話的同時還要讓錄音機播放樂曲。但是又聽說這是徒勞的，因爲科學技術已能過濾掉音樂聲響，專把人的對話保留下來：從此，索性就放棄一切戒備，心想：反正在這個房間裡所談的東西，都是很多中國人也在談論的，有什麼可怕別人聽的！

「有沒有人監視？」常有人問我。即使有，我也能諒解，爲了國家的安全，個人的安全就必須作出一點犧牲。「無產階級專政」、即國家機器，幾十年未能如馬克思和列寧所預言的那樣逐漸縮小而是不斷加強，至少有一個好處：可以使中國人有較多的就業機會。

很多中國人還是不顧可能遭到的危險，或相信不會有什麼危險，走進我的家門。我本來以爲一月事變會使我清閒下來。我計劃閉門讀書三年，可是一年下來，卻既未能閉門，也沒讀成幾本書。

爲什麼是「三年」呢？

反自由化運動開始後，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是：今後中國會怎麼樣？這是我家裡時常討論的話題。保守派的這場攻勢比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三那兩次來勢更猛，把衆望所歸的改革力量的領袖胡耀邦都給搞下來了，我也未能像過去那樣僥倖漏網。這就使很多人陷入悲觀。有人說至少得十

年八年，局面方能改觀。有人甚至以爲一個中國的勃烈日涅夫時代開始了。那就是十八年！我持不同看法，認爲半年之內會有小變，三年之內會有大變。聽的人半信半疑，甚至根本不以為然。

我的樂觀是有理由的。從一九八五年起，我就不看重上層的人事變動，而認爲中國的歷史進程更多地是由人民群眾來決定了。感謝在那些艱險的日子裡不怕竊聽器和監視者而一如往常、甚至更頻繁地到我家裡來的朋友們，他們使我對於中國情況的了解沒有中斷。

我至爲幸運的是，命運的轉折反使我交下了幾位最值得信賴的朋友。一位詩人和一位記者，從我遭到厄運之後的那個夜晚起，就常常來陪我坐到深夜，大約是爲了驅散我的痛苦吧。他們把最新的消息及時告訴我，一起議論形勢的動向。

三十年前我遭到政治打擊以後的二十二年中，願意和敢於到我家來的客人不超過寥寥數人。今天，仍然是那個共產黨對於同一個我採取了同樣的措施之後，我家卻日日夜夜賓客盈門。有些來客在不久以前還和我保持一定距離呢！這就是我那「三年之內」必有大變論的一個依據。

「反自由化」運動，出現了前所未見的局面：不是少數人、而是大多數人對這場運動採取了反對和抵制的態度，有的公然在會議上表示反對、想不通。

幾年來數以千萬計的人開始獨立從事經濟活動，他們對可能發生的危及自己經濟利益的政治變動十分敏感，也反對這次運動。

他們本來就不相信共產黨對私人資本的政策會長期不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證實了他們的懷疑，於是他們就更加不肯把賺到的錢投入擴大再生產了。有人索性把企業變賣爲黃金儲存起來。數以千萬計的本應轉化爲生產資金的錢現在投入了消費市場，建房和修祖墳成風，賭

博風氣在城鄉愈演愈烈。這就助長了本已相當嚴重的通貨膨脹。

「這是保守力量的一次大暴露，它使人們放棄幻想。繼之而來的必是人民的大覺醒和中國的大進步。」——我這樣分析當前的局勢。

這是因爲我看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跡象：知識分子已經不再滿足以沈默來抵制一場他們不能接受的運動，而是公開陳述反對意見，甚至慷慨激昂地提出抗議和發出質問了。雖然人數不多，但已有人開始採取行動。幾位青年作家曾進行活動，企圖組織一大批作家爲我被開除出黨一事聯名提出抗議。只因發覺有一些影響和一定地位的作家不肯冒險（計算下來只有八人願參加這次行動），踴躍參加者又大都是知名度不高的青年作家，乃至作罷。但相當一批作家和記者憤然擱筆，則是事實。很多老黨員產生了退黨的念頭，有些人已經退黨。一些要求入黨或即將入黨的青年，改變了態度。

外省的知識分子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勇敢地抵制一場政治運動。黑龍江省委派出四名官員到黑龍江大學坐鎮，要求人們揭發我一九八六年在那裡講話和活動中的問題，遭到拒絕。省委要求大學指定中文系派人去省委寫批判我的文章，無人願去。武漢華中工學院和湘潭大學，都有教師唱對台戲，在課堂上公開講授和讚揚我的作品，官方竟未追究，這兩位教師在學校的威信反而更高了。

在山東、浙江和山西，二月間有人見到傳單和標語。將近四十年來，這種現象只在一九七六年出現過一次。

保守力量的進攻也是很猛烈的。新上台不久的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和深圳市委書記斷然封閉了

《深圳青年報》。繼胡耀邦下台之後，急忙拿掉中宣部部長朱厚澤——一個最得知識分子人望的中央委員。繼開除三人之後，又擬就了第二批處分名單，十六個人，連趙紫陽最得力的助手艷彤也在其內，同時草擬第三批五十人的名單。作協的幾乎全部工作都癱瘓了，一切問題都要請示中宣部文藝局，很像實行了軍管。對中國作家協會與師問罪，窮追不捨，一定要他們承認一九八四——九八五年的第四次作協代表大會在選舉主席團時搞了陰謀詭計。用以取代作協黨組的一個新班子名單已擬定，只待走馬上任了。糾集所謂「百名馬克思主義精英分子」在河北省涿縣開會，會上殺氣騰騰，要對三中全會提出的「撥亂反正」再來一次「撥亂反正」，暴露了他們的真實目的——推翻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改革、開放路線，把中國拉回到一九六六年以前那個時代。

我的書籍被禁止出版和銷售。私人書攤上秘密出售，價格高於原價七倍。我在黑龍江大學講演的錄音帶，據說也變成了商品，四盒一套，每套四十元。一些地方出現了我的作品的手抄本。

在我所到過的所有省份，都刮起了強勁的翻案風。山東省電台和報紙最先發難：「劉賓雁揮手山東，破壞安定團結，遭臨沂地區幹部堅決抵制。」臨沂地區立即行動起來，被撤職和被處分的「三種人」有的恢復了職務，有的聯名上書中央，控告我，甚至同時把一九八四年上台的省委書記梁步庭也告了。長期遭到他們迫害、已經平反的人則又一次人人自危，有的被迫逃亡。《陝西日報》的報導意欲推翻已由中央解決的、我在《三十八年是與非》中報導的郭建英一案，被中共中央火速制止。黑龍江、遼寧、四川等地的報紙，也連篇累牘地發表攻擊我的文章，推翻我幾年來的批評和揭露。

保守派幾年來不斷批評「報紙首先是人民的喉舌」的觀點，堅持說黨報必須是「黨的喉舌」。

這個時期很多家黨報的面孔最有說服力地證明了所謂「黨的喉舌」是什麼意思。它們不僅成為保守派的得心應手的工具，還成了本地四人幫幫派分子、貪官污吏和「土皇帝」的喉舌。

曾經跟我合作過的記者、我在作品中讚頌過的人物，都成為打擊對象。

四川省渡口市黨報的青年記者余以太，曾和我一起採訪全國最大的個人貪污案，合寫報告文學《千秋功罪》。他從一九八二年起就一直受到中共渡口市委的迫害，全賴《渡口日報》兩位總編輯的保護，才未被剝奪工作權利。這一次我的事一出來，他的日子就很難過了。

我所揭露過的人中間，只有這篇文章的主人翁，即貪污犯青素瓊未成為我的仇敵，反成了我的朋友。我只到監獄採訪過她一次，並未說明我的身分。不料數年後，有一天我忽然收到她的來信。她向我報告因她痛改前非，勞改期間表現好，刑期已從無期減為十五年。她把自己勞改所得捐贈給非洲災民，為此感到自豪。我覆信勉勵她。她又給我寄來了她親手製作的紀念品。我的事出來以後，我以為她必定不會願意別人知道我們之間通過幾封信，因為這於她顯然是沒有好處的。想不到她竟在獄中鬧起來了！她對我被開除一事公開表示抗議，還揚言要為此在獄中發起一個群眾性行動。她受到懲罰，被關到單人牢房裡去了。

我的對手看中了這個機會：一個犯人，劉賓雁揭露過她罪惡的人，為什麼非但不仇視劉，反而對他如此同情呢？這種反常只能有一個解釋：劉在文章中包庇了她。劉賓雁在文章中不把重點放在鞭撻這個貪污犯上，卻用很多筆墨寫促使她犯罪的社會原因，把很多黨的幹部寫成罪人，這不是包庇青素瓊嗎？

省裡派出兩名資深的新華社記者去渡口找余以太談話。「《千秋功罪》是按劉賓雁的意圖寫的，

你可以不承擔責任。」「那怎麼行！我也是作者之一嘛。」「你寫雖寫了，但思想是劉賓雁的呀。」「都是兩人商定的。」「你不會同情貪污犯的。你和劉有分歧。你不會同意把重點放在與毒素環並無直接關係的那些事情上。但劉賓雁不肯聽取你的意見。你把這些寫一寫就行，不會再追究你的責任了。」余以太斷然拒絕，堅持說他完全贊同那種寫法。

由劉賓雁的一個合作者在報紙上揭發他如何包庇一個大貪污犯，這是多麼高明的主意！可是軟硬不吃的余以太竟不肯合作。那就讓他嘗嘗不聽從「黨的領導」的苦果吧。由渡口市委作出決定：從《渡口日報》將余以太除名，但又不許他離開渡口市。

在遠離四川八千里的黑龍江省的哈爾濱市，對另一位青年記者楊萬霖也下了手。楊萬霖長年以來「追隨劉賓雁的思想，去年又主動陪他到伊春去為王福綿翻案」，因此，楊就是「劉賓雁在黑龍江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急先鋒」！必須離開《人才信息報》。這張報紙也因發表有關劉賓雁的文章太多，必須停刊。

《第二種忠誠》的主人公陳世忠既然被劉賓雁讚頌，就必定也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可惜他不是黨員，按政策不屬於批判之列。但正好在評職稱，好，那就卡住他！儘管他一九六〇年就以優異成績從蘇聯學成歸國，教學、著述和科研成果在哈爾濱工人業餘大學教師中遙遙領先，也硬是不去申報評他為副教授！

在許多省份，一些素不相識的人也受到我的牽連。那些敢於直言、對腐敗官員敢於鬥爭的人，往往被目為「小劉賓雁」而遭到排斥或打擊。甚至還出現了「劉賓雁分子」。

四月裡的一天，一位六十歲上下的男子來到我家。光頭、衣著樸素，舉止莊重，很像平時我

們心目中那種「黨多年培養出來的好幹部」的形象。誰也看不出此人竟是江西省贛州市的「劉賓雁分子」！原來是這樣：他在軍隊任職時看不慣上下氾濫的不正之風，要求復員，以為地方上會乾淨一些。分配到贛州市電力局任副局長。上任不久，才發現這裡以權謀私的現象比部隊裡還要熱鬧。於是他就和那些人鬥，鬥來鬥去，「反自由化」運動一來，他竟被看作「劉賓雁分子」，成了反對「黨的領導」的「自由化」罪人！

劉賓雁既然遭到黨中央的懲罰，「小劉賓雁」、「劉賓雁分子」自然就理虧了，一個個成了「同案犯」。而劉賓雁以及他的「同案犯」原來反對的那些貪贓枉法、欺壓良民之徒，這時自然就成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正面人物」，至少是揚眉吐氣，一個個覺得自己有黨中央為他們出氣、撐腰，搞掉了胡耀邦和劉賓雁，從此可以放心大膽地為所欲為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趙紫陽五月十三日講話之後，即「反自由化」運動開展了不到四個月，便基本上煞住了。我原先的估計是「半年之內便有小變」，猜中了。

不久，鄧小平對外賓講話中又一再表示還是要反「左」，以及「左」的危險是主要的等等。群眾自然是歡迎的，但也並不信以為真。他們還要再看看，「為什麼不把『左派』分子也抓出幾個來開除出黨呢？」

在宣佈我開除出黨的前後，《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標題是：《共產黨首先要講紀律》。講紀律是對的，「首先」就不對了。共產黨不是法西斯黨，不是青紅幫，它首先應該講的還是黨綱上書寫的革命目的和馬克思主義嘛。

在實踐中，紀律，靠權力所貫徹的紀律，確實已被放到第一位。這年一月，中國南北各地有

十幾家刊物（僅四川省就有三家刊物）因刊載有我的講話、作品或他人寫我的文章而必須銷毀。《人民文學》封面上有我一張小小肖象，也必須撕下來重印。不說爲什麼，這是紀律，是命令。中國大百科全書文學卷僅因關於我的條目應形勢之需必須縮短幾行，也要銷毀。

幾個月之後劉賓雁又可以發表作品了，關於他的條目也許並不須壓縮了，但上百噸紙張和數以百萬元計的人民幣卻已付諸東流。但絕對不會有人來追究誰的責任。難道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然而權力和紀律也有不大靈驗的時候。

《文學評論》雜誌第一期有我一篇短短的小文章《門外議小說》。許是已來不及銷毀重印，便把那篇文章撕了下來，改印了中文目錄，英文目錄中用墨筆塗掉了那文章的標題。我那文章結尾的幾行因轉到了別處，也就無法撕毀了。這就激惱了中國社科院院長，厲聲質問：「開天窗，這是我們當年在國民黨統治區對付國民黨的手段，怎能用來對付共產黨！」答曰：「這是經過院黨委同意的。」「你們爲什麼要發這篇文章，不認爲有問題嗎？」主編劉再復和副主編、編輯室主任一起回答：不認爲該文有什麼問題。院長越發惱怒，說：你們若不想幹，可以辭職。於是主編、副主編都交了辭呈。但這又不合組織程序，又怕於院長的聲譽不利，二位主編終於又保留了職務。不過院長又要求《文學評論》必須發表批判劉賓雁的文章。《文學評論》是全國同類刊物中最有權威的，它的版面上和主編、副主編的筆下都出現過給我以肯定評價的文章。按常規，刊物和主編爲了表示改過自新和「消除惡劣影響」，是無論如何不能不發批判文章的。但劉再復自有他的邏輯：正因爲我們寫過肯定劉賓雁的文章，現在既然不知劉賓雁錯在哪裡，怎能不負責任地否定劉

賓雁和我們自己呢？他的態度是：「總之，我的名字（印在刊物封面）不能和批判劉賓雁的文章同時在《文學評論》上出現！」說罷就到廣州養病去了，一去就是五個月。這樣，《文學評論》就始終不發表批判我的文章，而劉再復和他的刊物也至今安然無恙。

這件事立即在北京傳爲美談。同那些對方巴掌還未打過來就匍匐在地上的人相比，和個人並未受到任何威脅就發表擁護「反自由化」運動言論的科學家、作家和民主黨派的領袖們相比，劉再復和《文學評論》的全體編輯們顯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高尚氣節；在他們，「首先」不是「紀律」，而是真理和良心。

劉再復事件又一次驗證了一個真理：在中國現行政治體制下，雖然憲法中關於言論自由的規定還不過是一紙空文，但七十年代中期以來已經出現了這樣一種態勢：中國人只要有勇氣向前邁進一步；他們能夠享有的自由就會超出歷來被允許的那個限度而有些擴大。而當這新贏得的自由得到默許時，就會變成所有人的自由。

中國歷史已經跨進一個新的階段，雖然很多人尚未認識它，極少數人則不肯承認它。

朱厚澤在中宣部會議上向全體人員告別時，態度很強硬，最後說道：我在中宣部工作期間的是非功過，留待後人評論。很多人以熱烈的鼓掌讚許了他的工作，也讚許了他的這種態度。有些人很惱火，就追查是什麼人鼓了掌。這又有什麼用呢？那時那位反對朱厚澤的大人物鄧力群就坐在台上，鼓掌的人同時也是在示威，在表示一種對於權力的蔑視，難道他們沒想到會被追查嗎？難道他們會懼怕追查嗎？

我和《人民日報》的幾位同志一起去參加中國作協和北京市作協分會舉辦的元宵節聯歡會。

這是我遭難後初次在公開場合露面。很多人鼓掌，很多人過來握手，表示慰問。事後也有人很不高興，怪罪到作協頭上。這又有什麼用呢？

後來又採取一切限制我繼續發生影響的機會。我先後被邀請參加在遼寧召開的兩個會議，中共遼寧省委一概不准我入境。位於北京市朝陽區的經濟學院、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系、有的商店、居民委員會和《人民日報》內幾個部門提名我為區人民代表的候選人，官方謊稱我已調往中國作協（那是一個月以後的事），不能作朝陽區的代表。然而投票時發給我的選民證仍是朝陽區的！《人民日報》電話總機受命不得接通我的分機電話。我宿舍的傳達室奉命不准告知外人我家所住的單元。《人民日報》領導企圖把我的住處遷到遠離編輯部的地方，以切斷我和編輯、記者們的聯繫。

然而這一切又有多少用處呢？《人民日報》的同志對我從未像現在這樣熱情過，兩千多名工作人員，自然大部分是不認識的。每次進出《人民日報》大院，我都必須準備二十分鐘在路上接受人們的寒暄和慰問，有時還向我通報些最新政治新聞。我走到街上，無論在北京或外地，時常被認出來。即使我帶著墨鏡和大口罩也無濟於事。這樣，有時出去買一次菜，就交下三個新朋友。到天津市我教過書的耀華中學參加校慶，校方已從紀念冊上塗掉我的名字，也不敢宣佈我的到會，但仍然阻擋不了師生和校友找我簽名、題辭和拍照，從上午九時忙到下午三時，最後我不得不狼狽逃命。後來恩准我出席的北平市文學界和新聞界的任何活動，也大體如此。一九八七年最後三個月裡我拍的照片數量，遠遠超過我一生六十二年所拍照片的總和。

滑稽的是他們一方面極力要使我從中國人的記憶中消失，同時又必須使我出來亮相，表示他們的「寬容」。那個王震將軍，老是誇耀他擁有四百萬或三百萬人民解放軍，不怕知識分子造反。

老人幫一定是沒有料到還有一些幾百萬大軍解決不了的問題。中國留美學生一千二百人反對「反對自由化」運動的簽名，美國華裔作家、學生和政治活動家的兩次公開聯名抗議和美國與歐洲漢學家的兩次聯名抗議以及愛國華裔名流紛至沓來的規勸懸崖勒馬的信件，又造成了一種需要。方勵之出席學術報告會公開報導之後，需要我也出來亮相。既要停止我在《人民日報》的工作，又不准我離休；既不准我發表作品，不准賣我的書，卻非要我到中國作協去當專業作家不可。無非是給人看：方勵之不能當副校長了，還可作研究員；劉賓雁不作記者了，但還是作家嘛！這不是虛偽嗎？我向來厭惡虛偽，因而我拒絕了發我一條消息而要我參加的任何活動。

接著，又遇到一個困難。美國三處、法國一處邀請劉賓雁出國。這倒是亮相的一個好機會，可是這機會未免又太好了。不能讓他去，雖然這又會帶來另一個問題，即當初讓他亮相所要解決的那個問題。

從前，每當我走過《人民日報》大門口的傳達室時，都要小心繞開一點，生怕擁擠在室內室外的上訪者把我認出來。來我家的這種客人已經過多了。

進入一九八七年以後，傳達室忽然冷清多了。從前往往是隊伍都排到街上來，現在室內卻寂無一人！一問，原來並不是受害者減少了，而是有了新的規定：只准在本地的上一級機關上訪；凡法院已經判決的，報社也一概不予受理。其實過去的所謂「受理」，也無非是收下上訪者的申訴材料，然後向有關的機關一轉了事。只有極少數來訪來信，報社會派人過問，更少的案件，會在報紙的「讀者來信」版上公佈。

正如報紙上和「內參」上要盡量少登不愉快、不體面的報導一樣，首都街頭也要盡量減少那些令人不愉快又對國家不體面的上訪者。改革和整黨都沒有使這種人少起來，痛苦和怨恨之河的源頭反而有水量增多的趨勢。怎麼辦呢？那就在下游多設閘門，把洪水攔截在北京城外。這就符合「平平安安搞四化」的方針了。

但是把所有出氣口都堵住，果真就能「平安」嗎？蒸汽卻有增無城，不怕有一天會爆炸嗎？幾年來一再加諸我的一個罪名是「破壞安定團結」。「安定團結」這個詞被當作一項原則第一次提出來那一天，目的就是要維持現有政治秩序不變，而那種秩序乃是毛澤東時代秩序的延續，是一種專制的秩序，而這種專制是壓制人權、保護腐敗的秩序，因而任何爭取民主和社會進步的活動，都必然要破壞他們全力維護的「安定團結」。而他們在政治上所做的一切，又都恰恰是破壞真正的安定團結的，因為它們使中國人民失去對於這個國家可以變好的任何希望，失去對於共產黨所掌握的政權的信任。這就使一些人不得不鋌而走險了。中國出現的槍聲、爆炸聲、火警及列車顛覆事件等，一部分就是受欺凌受迫害者的報復。最近，毛澤東紀念堂前，甚至公安部院門口都發生了爆炸事件。

最可怕的還是愈益嚴重的普遍的冷漠。人們自認為有充足的理由不關心社會和國家，對它們可以不負任何責任，同時牢騷滿腹，一肚子怨氣。社會好像在解體。比罷工更可怕的怠工迅速蔓延。

年輕人想盡一切辦法奔往國外，形成一個空前的浪潮。

能責怪這些年輕人嗎？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這塊國土上見過什麼使他鍾愛難捨的東西？貧

窮、落後？文革的殘暴？一九七九年以後出現了生機，有了更多的自由，更廣闊的出路，這個國家變得可愛一些了。它本來可以一年比一年更可愛。但是「左派」的破壞卻使改革受挫；高幹及其子女和黨內犯罪分子的貪占、掠奪活動猖獗，而改革者的安全卻得不到保障。「反自由化」運動更使許多中國人對於這個國家的未來完全絕望了。

開除出黨給了我休養生息的機會。一般中國人很難理解：一個人怎麼會忙到這種程度呢？我自己有時也覺得奇怪：沒有時間讀書、運動，沒有時間看報和寫日記，而這還是謝絕了很多客人來訪，很多信件都長期未予答覆，而我每年的寫作量又不超過十五萬字的情況之下。

現在，我可以休息一時了。幾年來精神上的一大負擔是——覺得很多應該去採訪的地方還沒有去，答應人要做的事很多都沒有完成。現在既然我已被剝奪了那種條件，便可以解除我的負疚感了。

我的睡眠時間確比過去增多了。也能和孫兒一起玩了。有時用一條繩子拉著他騎的三輪自行車穿過大街，像牽著一隻小狗一樣，體驗到一種閑適的樂趣，也頗感欣慰。

然而我的心仍然被中國各地發生著的令人不安和焦慮的事牽動著。五月以後燃燒在大興安嶺的熊熊大火，使我的心焦灼難耐。這是罪孽呀。那裡倒下的每一株樹，都是再也無法生長起來的，因為自然生態早已發生了不可挽回的變化。我們給子孫留下的將是什麼！

這次災害本來不是不可防止的。我的資料櫃裡就放著揭發大興安嶺地區森林警察隊情況的資料：因黨政機關的人情、關係壓倒國家利益，很多品質低劣、不能稱職的人混進了森林警察隊伍。揭發大興安嶺地區令人髮指的黑暗與混亂，控訴因維護國家利益而遭到殘酷迫害的信件，我幾乎

每年都要翻閱一遍，但中共黑龍江省委對我的態度卻使我始終不能踏入那個此刻正在燃燒著的林區。而就在災難之中，當地一些幹部仍不忘擅權胡爲，爲掩蓋自己的惡行甚至膽敢毆打和囚禁力圖揭露真情的記者！那裡的人們說：「這場大火把什麼都燒掉了，獨獨沒有燒掉不正之風！」

九月以後我的境況稍有緩解，當長年堅持和大興安嶺黑暗勢力英勇鬥爭的宋秀蘭等人又來到我家時，我忍不住還想用我的筆把大興安嶺地區的邪惡勢力狠狠鞭撻一番。僅僅由於一個技術上的困難——我畢竟沒去過那裡實地調查，終於未能如願，只好把他們介紹給別的記者了。

不能自己寫公開報導，我就爲一些人代寫申訴材料和設法向第十三次黨代會分發這些材料。我鼓勵一些年輕記者到我想去而未能去成的地方去，揭露那裡的黑暗。

經過美國著名記者哈里孫·索爾茲伯里先生的斡旋，我終於可以踏上訪美的旅途了。

其實我對出國訪問的興趣並不很大。美國雖已五年不去，那裡又能有多少變化呢？無論變或不變，同中國又有多少關係呢？只要我的政治境況再好些，我寧願到中國的一個縣份住它二年，或者就住到大興安嶺去。這幾年我真正去基層的時間太少了。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地方像中國這樣發生著普遍、深刻、劇烈的變化，而十億人民命運的改變，必定是具有全人類的歷史意義的。

此次出國，我的心情並不很好。當你背後是一個富強而繁榮的祖國你可以爲之驕傲時，那將是什麼心情！而現在，中國在人們眼中正在掉價。繼菲律賓向每個入境華人（僅限於大陸）索取一萬元美金爲抵押之後，澳大利亞政府又決定索取二千六百元作爲生活費的押金——這錢握在澳政府手中，每周允許入境探親者領取一百美元爲生活費，半年花光——走人！這是何等的歧視

與侮辱！可見中國的國格是像人民幣一樣在不斷貶值，這是任何自欺欺人也掩蓋不了的。

預計出國後會有很多人向我提出一個問題：中國大陸的希望何在？自一九八八年初起我便向每一個我見到的人詢問：在你周遭，你看到一些什麼現象是可以令人對了中國的未來寄予希望的？意外的是我竟很少得到滿意的回答。很少有人樂觀。無論知識分子或工人，我聽到的幾乎全是「沒勁！」「沒意思！」一些青年作家對於文學創作的前景也抱悲觀態度。

最樂觀的回答我是在最後聽到的，距我起程已經很近。山西省作家鄭義（第一篇正面揭露文革的小說《楓》和《老井》、《遠村》的作者）和我通了一次電話。我又問了同樣的問題。他對文學創作樂觀的，「一些青年作家正埋頭寫更有份量的、超越自己過去的創作的作品。我正在寫的長篇，也是如此，不超越過去，我是不會拿出來的。」那麼政治形勢呢？「我也樂觀。啊！我告訴你一個最新的好消息：晉東南地區的潞城縣，這次人代會選舉，官方提名的候選人全部落選啦。縣人代會主席副主席和縣政協主席副主席，官方提出的候選人也全都落選。現在那裡是真正的無政府（沒有產生新的縣政府）狀態。本來省委照顧潞城縣，知道那裡黨風太腐敗，人民特別不滿，讓他那裡的人代會最後召開。想不到倒把它害了。今天傳來一個縣的消息，明天又傳來另一個縣的消息，都是關於官方候選人落選的消息。這一來，潞城縣的人民代表就膽子越來越大，弄假成真，真正行使起民主權利來了！」

這是我在中國聽到的關於中國的最後一個信息，它卻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拚命阻擋中國政治上前進的那支力量，也就是曾經使中國落後於世界的那支力量，仍然不肯認輸。中國的各種危機還在繼續發展。中國人必定還要在曲曲折折的道路上爲中國的進步付出代

價，甚至是很重的代價。我們還將要度過很困難的時期。但是中國畢竟已經變了。中國人絕不會允許任何人把自己拉回到老路上去。經濟改革解放了的數以億計的人，它所創造出來的那種日益雄厚的社會力量——擁有自己的經濟利益並有志於發展這種利益的數以千萬計的人，要求有一個能使自己的利益得到安全保障的政治環境。他們正在尋找自己政治上的代言人。他們現時不得不依靠地方上的官僚，並給他們一些好處。當他們的經濟實力發展到一定地步時，那些官僚就不得不依賴他們的支持了。這個微妙的演變過程，將使權力的權威逐漸退讓於經濟力量的權威，而經濟實力的擁有者將獲得越來越大的政治上的發言權。優秀的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進步中將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同時和新興的社會力量逐漸匯合起來。

中國共產黨內也在發生著變化。正派的黨員對於黨內的腐敗勢力越來越不能容忍。許多思想一貫正統、保守的黨的幹部，這一年立場發生迅速轉變，對於保守派的倒行逆施採取了抵制或反對的態度。

中國的政治外殼，近期內也許不會發生明顯的變化。但是在這外殼的內部，變化卻已經發生。黨代會的代表並不是經過真正民主的程序產生的，卻已經能夠選掉人們所不喜歡的人了。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不久前各省、市、縣的人代會的選舉中。

在同一種制度、同一個共產黨領導之下，領導者屬於同一個共產黨，但在不同地區、不同部門與不同的單位，已經出現越來越大的差異。今後，有頭腦、有勇氣的共產黨員領導幹部，將有更多的自由使自己的地區、部門、單位走在改革潮流的前端。

當然，中國人民也已在開闢爭取社會進步的新的通道。青年知識分子中的精英，正在作不懈

的努力。

當人們因「反對自由化」運動的發生而感到沮喪和悲觀時，他們忽略了一點：中國近二十年的歷史大部分是以這種獨特的方式獲得進步的動力的，就是說：是中國共產黨所犯的一個又一個錯誤，在推動中國大陸的進步。他們還忽略了另外一點：中國歷史前進的速度顯然是加快了。「蓋棺論定」已不再適用，許多人物的是非功過，生前在人民心中已有定論。中國人的教育水準雖然低於西方各國和蘇聯，在這方面的清醒和一致卻超過那些國家的人民。

在中國人表面上，對社會的冷漠和對政治的厭倦之下，掩蓋著內心深處對於國家現狀與前途的強烈憂慮。二億人口的蘇聯《真理報》銷量超過一千萬份，而在十億人口的中國《人民日報》的發行量卻只有三百餘萬份（絕大部份還是公費訂閱），這絕不表明中國人的政治興趣低於蘇聯人。一個真正真實地反映中國現實和中國人民政治意願的報紙，它的銷路達到二千萬份（並且是私人訂閱）是並不困難的。

總之，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過程中，中國人的政治覺悟進一步提高了；他們的自由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了。一個自發的、未經黨的領導倡導的爭取和獲得更多自由的過程正在中國加速進行。在離開祖國之前不久，我對朋友們說道：「我常常覺得中國的空氣中就像是飄浮著某種物質，每時每刻在促使自由擴大。你看不見這種物質，但你會感覺到這個奇妙的過程。」

因而我是樂觀的。在我離去期間，中國什麼事都可能發生。無論發生的是我們期望的好事，或者是我們但願其無的壞事，都將促進中國的進步。

我絕不忽視脚下的泥濘，而且還有一段也許是更加泥濘的道路要走。

但是抬起頭向前看，我卻是樂觀的。以我六十三歲的老齡，我仍然相信我能見到一個真正民主化了的、人的權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和尊重、從而是一個快樂的、迅速發展的中國之出現。爲什麼呢？

因爲中國的一切問題已然達到極限。因爲中國人民近四十年付出的代價已經過於巨大。因而，中國人民已經達到一個新的覺醒。

一九八八年七月廿四日·洛杉磯



後記

既是結束，又是開始

這本書總算寫完了，但是沒有寫好。也許再改上幾遍會好一些？却又沒有把握，因為很可能不是書沒有寫好，而是我這輩子就沒有過好，但又可能不是我一個人，而是這六十四年或更長的時間裡，中國人的生活就沒有過好。那麼，要改的就不是書，而是我的歷史或甚至我們民族的歷史了。

多麼想重新再生活一遍！然而一想，那又會十分可怕。因為那一來我可能會變成全然不同的另一個人，會過於聰明和過於小心，而我這一生假如說有什麼可取之處的話，那就是我不很聰明也不很小心。

我們這個民族大約是過於古老也過於聰明了。有過多的善於明哲保身的人，又有過多看破紅塵、遠離世事而不放棄人間享樂的人。那往往是非常聰明的人，看著他們寧願無所作爲而深得其樂，我實在爲他們也爲我們這個民族可惜！因爲在中國，已有過多的超人才華自生自滅，終身不被人知也不爲己知，無聲無息地走入了墳墓。

我未曾測驗過自己的智商，但可以推想自己少年時代便不是一個聰穎的孩子。上學時成績靠前，但從未進入前二名。有些課程如數學、化學，因無興趣，學得很吃力。我不是一個不肯刻苦學習的人，但命運給予我的學習機會又太少了。近三十幾年特別可憐——當我有時間讀書時，我先是必須勞動，後來中國又無書可讀；而當我可以得到很多書時，我又再無時間可以讀書了。我多麼渴望能坐下來兩耳不聞窗外事，每天讀它一本書——即使按這個速度，又何嘗能讀完必讀的書！一九八八年來美國，讀書便是我的一大心願，但僅僅在九月初我試過幾天，就再無機會了。

這一生有太多想要做而未能做完的事。我的童年只有很短的時間是在可以放風箏的鄉村中度

專講一場。我和妻子在穿梭般的飛行中，到過美國東部、南部、中西部和西部的很多地方，然而竟無暇一顧當地的景色和名勝古蹟。在洛杉磯住了半年時間，去了很多所大學，却終於未能去看近在咫尺的世界聞名的賭城拉斯維加斯。我們去了風光明媚的佛羅里達，却竟沒看到海，只做了兩場演講，過了一夜，便匆匆轉道去了北卡羅萊納州。

在這期間，按我的本意，應該讀書。我自知自己對於一個世紀以來西方人文科學的發展幾乎無知。我必須使自己從理論上更好地武裝起來，把中國社會的十分獨特又非常複雜的問題認識得更清楚些。蘇聯和東歐又有那麼多事情需要我了解！在國外這段時間，又是一個極難得的機會，可以使我用小說的形式把自己多年來對於中國的觀察、我熟悉的那許多人物、事件和由中產生的思想以較報告文學更高度的概括表現出來。然而我却找不到時間可以安閑地坐下來……。

一九八八年六月，當我和朱洪去法國和西德訪問的時候，緬甸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學生運動開始了。每天早晨我第一件事就是去買報紙，看昨天仰光街頭的示威遊行又有什麼進展。那裡，人們對於奈溫將軍的貧窮而又專制的社會主義曾忍受了二十七年之久，現在終於忍無可忍，起來推翻它了。那麼多人走上街頭！手無寸鐵的學生們和尚們，竟迫使統治者必須幾乎每隔一個星期，便更換一個政府。我的心不時轉向中國，焦急地再三詢問自己：「中國人民幾時才會奮起呢？」四十年來所未有的通貨膨脹已經使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人們也看到這是中共政權縱容官僚特權集團胡作非為，又無能治理經濟的結果。為什麼還能忍受下去呢？中國人為什麼就不能像過去南朝鮮的學生和工人。像今天的緬甸的學生那樣起來，不怕犧牲一切地去和暴政作鬥爭呢？我甚至懷疑在中國人身上，中國的哲學、醫學中歷來頗為重視的那種稱作「氣」的東西，是不是

過的，而當時自己正好是愛放風箏的年齡。後來就再也沒有條件放風箏了。一九五六年冬，我為四歲的兒子買了一個大風箏，決定明春陪他放風箏時過過癮。然而第二年春天我是那麼忙，兒子也實在太小；到了第三年的春天我却必須遠到他鄉去接受改造了。

現在，我應該可以帶孫子放風箏了。然而我却必須滯留在一個不屬於自己的國家。而且，北京最適於放風箏的天安門廣場上空，飛著的不是風箏，而是向示威學生撒戒嚴令傳單的空軍直昇機！我幾時才能和我可愛的孫子、外孫擁抱；也決定於號稱人民軍隊的軍隊繼續以中國人為敵要多久。

去春離開中國赴美國時，我是不那麼熱衷的。如果我的政治環境正常，我寧願到一個縣裡住上一兩年。我知道，中國的兩千多個縣裡，那些小鎮和村莊裡發生的變化對於中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而我對它們的直接了解却太少了。

來到美國以後，又面臨著一個抉擇：是埋頭讀書寫書呢，還是應熱情的中國留學生邀請，去向他們演講呢？我選擇了後者，因為海外留學生，渴求知道中國的真實情況，我不能讓他們失望。我決定把中國大陸的真實情況不加粉飾地告訴大家，儘管我知道，只要我的話觸怒了中共當局，我便會喪失今後在大陸活動和發言的權利，而只有大陸，才是我真正的活動場地。

於是，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講授「中國當代文學與社會」的同時，我開始接受西岸一些大學的邀請去演講。到哈佛大學參加尼曼基金會的活動時，又到東部、中西部和南部的大學去演講。到一九八九年五月，我已經在美國的四十幾所大學做了演講。除幾家中國學生很少的大學以外，在每一所大學我必須講兩次——一次公開演講之外，再為幾百名中國留學生和他們的妻子或丈夫

因長達四十年的恐懼與失望而耗盡了呢？

這時，正是一九八七年初以來瀰漫在大陸的失望、悲觀、沮喪和頹唐的情緒愈益嚴重的時候。然而我不同意許多人的悲觀論調。我不相信經過十年文革而覺醒，又在經濟改革中獲得更多自由的中國人，會自暴自棄，仍然任人擺佈自己的命運。

但是就連我也沒有料到，四月間胡耀邦的逝世引起的北京學生示威運動會演變為中國歷史上空前壯烈的民主運動。全世界的目光被吸引到北京。四月下旬，我和朱洪決定，放棄康乃狄克州三一學院為期一年的聘請，提前回國。後來我們又作過兩次回國的決定。但是四月末鄧小平決定不惜流血也要鎮壓學生運動，五月二十日李鵬政府悍然宣布在北京實行軍管，以及最後六月四日對北京市民和學生的大屠殺，使我們不得不三次改變歸國的計劃，而最後的結果是我們非但不能提前返歸祖國，反而成為流亡者，有家歸不得了。

像所有沒有喪失理性的中國人一樣，我沒有料到鄧小平集團會悍然決定血洗首都，也沒有料到他們還會在全國實行狂搜濫捕，隨意槍決許多優秀的中國青年人。瘋狂一詞已不能解釋他們的所作所爲了。六月九日，當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時，我心中浮現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這些政治狂人怎麼會連這個問題都沒有考慮呢——他們將如何對中國繼續進行統治？

顯然，由於這夥算槍桿子起家的武夫長期迷信武力，蔑視人民而又懼怕人民，他們已然喪失了理解中國人的能力。他們一定以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人仍然像二、三十年代那樣可以聽任軍閥的宰割，或像五、六十年代那樣盲目信從以「中國共產黨」名義發出的任何指令、說教、或欺騙。

表面看來，他們似乎達到了目的。在瀰漫全國的白色恐怖下，中國似乎又回到了一個無聲的時代。然而實際上從此開始的却是一個對於統治者說來，比他們向人民作出妥協要可怕得多的時代。

天安門廣場上和平鬥爭的火焰被撲滅了，然而這火焰却在無數中國人的心中燃起——善良的中國人民在屢次受害、上當之後仍然沒有完全拋棄對中共一小撮反動分子的最後一點點期望和幻想，從此消失了，代替它們的將是不共戴天的仇恨。反動政府在上海槍決三名「暴徒」之後的幾天之後，一列火車被爆炸。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人民的憤怒將使各種早已有的，但幾倍於以往的暴力反抗活動伴隨著早已有的但今後規模要廣泛得多的怠工運動，將使這個政權一天也得不到安寧，使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加劇發展，最終把他們徹底埋葬。

我曾為中國共產黨實現和實行對全中國的統治貢獻過我的青春，而現在黨內少數法西斯分子既背叛了全黨，又成為人民公敵。我們這一代人曾以為自己獻身於中共所領導的鬥爭可以使我們的子女生活在一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此刻，我們下一代中的優秀分子不是已經慘死於屠刀之下，便是被瘋狂追捕之中。我在大陸的幾乎所有老年、青年和中年友人，大都成為中共反動派的通緝、虐殺的對象。少數僥倖逃到國外的，也和我一樣成為流亡者。而這些，却是發生在我們這個「人民共和國」即將慶祝它成立四十週年之際！

撫今追昔，我並不感傷。四十年來中國人所付出的慘重代價，看來都是不能不付出的。既然一九四九年他們那樣歡天喜地迎來了這個政權（在最初幾年，它確實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又那樣順從地接受和容忍了這個政權的統治，夫復何言！然而現在中國人民變

了，他們不再能容忍這個政權了，而執掌這個政權的幾個老人和他們所代表的官僚特權集團却既不肯改變自己，又不願交出政權，那麼等待他們便只能是滅亡。誠然，人民還將付出血的代價，然而他們必定會擺脫這個像章魚一樣吸附在他們身上的嗜血的怪物。

這就是中國人民從政治上的童年狀態進入成熟時期，由等待他人解放自己過渡到自己解放自己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我曾經和我國人民一起受騙和受苦。但我並不羨慕那些一帆風順、養尊處優的人，因為回顧三十餘年來的風風雨雨，我得到的東西比我失去的要多。我能在自己生命的後期看到光明的到來，而我畢竟曾經和將要為這光明做出一點貢獻，這就是一種幸福。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後的一個早晨，當我走過哈佛廣場旁的露天咖啡館，看到人們坐在半是綠蔭、半是陽光的椅子上悠閒地翻看報紙時，我第一次感到安寧的可貴，因為這時我的朋友們正在中國大陸上，在死亡的威脅下四處尋找一個庇護所。我從來沒有像那一刻那樣懂得自由的價值。

然而我知道，也正是在這個時刻，我國人民更加接近了一百餘年來夢寐以求的自由。四十年來，中國的統治者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衆叛親離，遭到全世界的敵視，從未曾如此脆弱，以致必須靠謊言以及對一切可疑者斬盡殺絕的辦法圖求苟安。他們的罪行遠遠超出毛澤東在文革期間所作所爲，他們所享有的人民的信任却不及毛澤東的百分之一，而中國人民的覺悟程度又百倍於當年了。毛澤東曾以他的一整套意識形態和個人魅力使全中國人民盲從和迷信，鄧小平却一無所有，所能依恃的唯有武力而已。

喪鐘已經敲響，中國埋葬它的最後一批封建軍閥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底於洛杉磯

歷史與現場⑧

劉賓雁自傳

著者——劉賓雁

發行人——臧遠侯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106和平西路三段20號四F

發行專線——(02)三〇六六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02)三〇二四〇九四

(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打這支電話。)

郵撥——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主編——吳繼文

責任編輯——李濰美

校對——陳錦生

排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源耕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華展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二刷——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定價——新台幣二八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二二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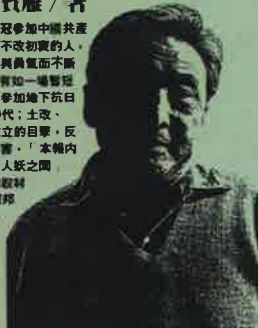
ISBN 957-13-0084-5

劉賓雁自傳

劉賓雁 / 著

這是一個關冠參加中國共產黨，虛誠奉獻不改初衷的人。因著他的良知與勇氣而不斷受難的歷史：有如一場驚天動地的夢的童年；參加地下抗日組織的青年時代；土改、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日軍，反右、文革的受難。「本報內部消息」、「人紙之間」等諸多名作的取材實景。兩期難得的命運糾葛……

這是一個美麗
的靈魂水
晶般的傳奇
！



ISBN 957-13-0084-5



9 789571 300849